

总第51期
2025年第4期

常州文史研究

热烈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



准印证号: S(2025)04000055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 76 周年 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成立五周年活动 暨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2025.11.1）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2025.11.1）



吴振达主持

吴建忠讲话

冯国平讲话

赵贤德发言

《常州府志 1694-1911》第 2 次编纂工作会议（2025.11.1）



张尚金主持

孙晓峰发言

吴建国发言

杜仁彬发言

郑国强发言

张敬纬发言

上官鹤锦代表谢达茂发言

参观武进院士馆（常州院士展示馆）（2025.11.1）



《季子研究文化丛书》序

沈宝祥

公元 2025 年，是常州地区人文始祖季札诞辰 2600 周年。

季札诞辰 2600 周年，应隆重纪念。

季札诞辰 2600 周年，也是弘扬季子精神的极好时机。

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等单位联合策划，编著出版“季子文化研究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一套“丛书”共三本：《季札辞国论衡》，谢达茂、王晓刚编著；《华夏仰风》谢达茂、赵利娟编著；《季子庙考释》，谢达茂著。这三本书各有特点：

《季札辞国论衡》，按时序梳理了近两千年来人们对季札辞国的“褒”“贬”之论，为研究季札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季子庙考释》，作者从《汉书》《南史》《唐书》等史籍和历代方志中，查找到修建季子庙的信息，在苏、浙、鲁等地建有季子庙 25 座。作者本着“史料‘真’，记叙‘实’”的严谨治学态度，将这 25 座季子庙的始建年代、兴衰存亡过程等历史情况，一一查考记述。

《华夏仰风》，作者历十余年的努力，收集到从汉代到当今颂咏季札的诗歌 833 首，并作解读。

三本书合计有 1300 多页，篇幅大，难度大，这是作者多年艰辛努力取得的学术成果，是献给季札诞辰 2600 周年的厚礼。

常州武进地区有一批潜心研究地方文化的学者。多年来，他们收集、挖掘地方文化资料，深入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其中，有关季札的著作尤其令人瞩目。这一套“季子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扩展了季子文化研究的广度，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季札。

本人很惭愧，对季札的了解很少，很肤浅，更谈不上研究。

闲来无事，翻阅《史记》，对季札的事迹，略知一二。

司马迁《史记》的《世家》部分共三十篇，首篇就是《吴太伯世家》。在这一篇中，司马迁讲述了季札礼让诚信的感人事迹。司马迁对季札赞誉有加。他在文末结语说：“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

在司马迁心目中，季札还是品评人物的标杆。在《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将这二位同季札对比。他认为，张耳、陈馀虽世称贤，二人当初曾“信以死”，但后来却“据国争权”。司马迁说：他们“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有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他们毕竟不能与太伯、延陵季子相比。

《史记》“集解”说：“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之。”《史记》“集解”系宋人所写。这说明，当年，季子受到吏民的敬仰和广泛赞颂。

季札的思想和他的高尚行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影响绵绵不绝，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古人阐述颂扬季札的著述，也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三本书再次表明，常州武进地区的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知。

延陵季子，春秋圣贤，他让千乘之国，退耕延陵之地，成为常州地区人文始祖。季札在延陵的实践留下的文化资源，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常州武进地区来说，收集、挖掘有关季子的资料，深入研究季札，大力弘扬季子的思想和高尚品德，必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2025 年元旦，93 岁，写于北京

作者：江苏武进县奔牛（今属常州市新北区）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参与创办《理论动态》，为理论动态组成员，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参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创办，任高级顾问，兼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拨乱反正中，有 30 多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亲历拨乱反正》等著作。

主管单位:

常州市武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常武文史研究》编委会

名誉主任

沈建钢 陆小玉 周福元

郝建成 王才中

主任

范正洪

副主任

王云芬 陈刚 高国华

张尚金(常务) 王晓刚

李祺明 王敏其

顾问单位

武进区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武进区地方志办公室

武进区档案馆

常州市武进图书馆

中国春秋淹城旅游区管委会

江苏武进太湖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

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

常州市武进区炎黄文化研究会

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冯仲云研究分会

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

常州市天宁区舜文化研究会

常州市武进区城南书院文化研究会

顾问

薛 锋 虞建安 王国方

恽 伟 恽永忠 朱炳国

法律顾问

储春平

目 录

◆卷首语

《季子研究文化丛书》序 沈宝祥 (1)

◆活动报道

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成立五周年
活动暨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记实
..... 许国裕 (4)

◆季子研究

《季子研究文化丛书》总述 张尚金 (6)
躬耕本是英雄事——舜山小镇躬耕者巡礼 陆林深 (7)
经两千年褒贬 季子更见神圣 冯士彦 (10)
从季子出使看春秋晚期吴晋的陆路交通 石晓琴 (15)
这些成语因季子而来 周二中 (17)
季子赋 何建军 (20)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一息尚存 誓死抗日
——武进籍抗联名将冯仲云抗战故事 肖 飞 (22)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恽逸群坚守“孤岛”，开启抗日宣传战新局面
..... 顾祖年 (25)
陆振轩，用生命开辟抗日交通运输线 许正宏 (29)
一本族谱上的131名抗战先辈

◆人物春秋

季札后裔辛亥英杰吴殿英 庄琦玲 (39)
中国网络之父：常州院士顾冠群 郑国强 (43)
风骨常青
——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秦仁昌先生 秦大峰 (46)
航空元老包文进 包立本 (48)
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一生致力于“教育向下扎根”
..... 大 志 (50)中国风工程事业开拓者|孙天凤 同济风工程团队 (54)
战火砥砺的青春——记离休老干部何志新 谢达山 (58)
女外交官毛娅平 包立本 (60)

劳模型修志专家 学者型人民公仆

——祝贺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在常州设立张尚金
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 黄海国 (61)
桑榆霞满照汗青——张尚金先生修志四十四载赋赠 秦大峰 (67)
慈善初心不改，奔牛公益典范的邵山涛 邵永乐 (68)

从小皮匠到企业家——记王和中的创业人生···蒋茹芬	(71)
中国常州武进籍四位摄影名家	
——吴稚晖、吴中行、薛伯青、汤德胜·····张尚金	(74)
奚伯浩：从病魔中爬出的电子专家·····奚金芳	(77)
◆三亲实录	
前粟茅峰觅英踪	
——勋绩追踪与《长滆铁闸》·····陈东夫	(78)
消失的上店古镇，不逝的浓浓乡愁·····恽仲坤	(80)
我为金鸡路题名·····肖 飞	(84)
桃李芬芳忆往昔 校园重聚暖重阳	
——记常州市东方小学退休教师重阳节特别活动	
·····赵小萍	(86)
◆史海沉钩	
点亮常州常州电力发展史·····杜宇伟	(87)
◆史志文献	
《南朝齐梁趣谈》正式出版·····张 军 葛小林	(95)
《伟哉，南兰陵萧氏》出版·····张 军	(95)
肖飞新作《冯仲云抗倭记》出版·····	(96)
一部兼具思想性、文学性与可读性的佳作	
——浅评《冯仲云抗倭记》·····金 平	(97)
省庄记忆 · 时代华章——《省庄村志》首发仪式	·····(98)
《常郡八邑艺文志》献疑·····张 军	(99)
◆姓氏文化	
诚信求实 争创一流	
——常州（延陵）人文精神·····张尚金	(100)
毗陵刘村毛氏宗祠落成暨毛宪纪念馆与红色文化纪念馆开馆	
·····张尚金、秦大峰	(102)
常州前黄世恩堂张氏宗谱宏发·····武文献	(103)
三河口楼岗敦復堂清康熙《张氏新建祠堂记》碑	
·····徐永宣文 奚世明点校	(104)
西盖赵氏始迁祖赵孟堙记·····赵德明	(105)
◆地情民俗	
常州名称探微·····李亚雄	(107)
奔牛名称由来有“新”说·····李亚雄	(110)
孟河惜字洲地名的来历·····程协润	(112)
魏村青城曾是武进四大名镇之一·····郭重威	(113)
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程协润	(115)
太子报恩百渎村·····何晓华 智 化	(117)
◆学术探索	
浅论武进县（今常州西北）为齐梁故里·····张尚金	(119)
齐梁故里之争中的武进地望与县治辨析·····唐立峰	(120)
对齐梁故里的考证·····郭重威	(124)
关于开发建设江南运河第一河口的思考与建议	
·····高 平	(126)
论淹城研学旅游始于乐园青铜大门·····冯士彦	(128)
名家写序见个性·····	(130)
◆封面： 任洪兴、赵忠和、吴永欣为“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	
◆封底： 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牌匾	



《常武文史研究》编辑部

编辑部

主 编：张尚金

执行主编：谢达茂

副 主 编：杨汉平 肖 飞

张祥海 陈富大

储宁玲 程中伟

责任编辑：张祥海

审 校：张尚金 张祥海

许国裕

本期摄影：刘建中

封面设计：上书房文化传媒

登 录：中华延陵季子网

地 址：武进图书馆三楼

（延政中大道65号）

电 话：0519-86311215

电子信箱：2516864808@qq.com

邮编：213164

主办单位：

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

制作：上书房文化传媒

QQ：641282105

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 76 周年

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成立五周年活动

暨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记实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至今76周年。2025年11月1日，在雪堰举办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成立五周年活动暨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本次活动由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州市武进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由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雪堰镇吴稚晖故居管理委员会、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承办。同时召开了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四届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常州府志（1694—1911）》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会议共有三个阶段，实到参会人数132人（详见本次活动集体照）。现将三个阶段记实如下。

第一阶段：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 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成立五周年活动

一、活动由主办方委托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秘书长储宁玲主持。她首先介绍了活动的九项议程。

1. 介绍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学者。
2. 举行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3. 举行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授牌仪式。
4. 市科协主席任洪兴致词。
5. 原武进区文广新局局长、武进延陵季子和地方文献两研究会党支部书记郝建成致词。
6. 原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市县指导处处长、工作室领衔人张尚金发言。
7.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关工委主任赵忠和讲话。
8. 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会长、常州市

吴稚晖研究会顾问周建春宣布“常州市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领导班子、工作组名单”。并颁发聘书。

9. 参观院士博物馆。

参加这次活动的领导学者有：

1.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关工委主任赵忠和；
2. 江苏省档案馆原副巡视员、退休干部、研究馆员 于晓庆；
3. 常州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任洪兴；
4. 常州市原文广新局副局长 张戬炜；
5. 常州市原文广新局副局长、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周晓东；
6. 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梅香；
7.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虞建安；
8.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市县指导处处长 张尚金；
9. 常州市档案馆二级调研员 张步东；
10. 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监事长、江苏理工学院教授、博士 赵贤德；
11.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杜仁彬；
12. 武进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陶春健；
13. 中共武进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杨美英；
14. 武进区档案馆副馆长 张小锋；
15. 曾任武进区文广新局局长、武进延陵季子和地方文献两研究会党支部书记 郝建成；
16. 武进区科协副主席 张颖；
17. 曾任中共前黄区工委书记、雪堰镇党委书记 杨迪平；
18. 武进地方文献、延陵季子两研究会法律顾问 储春平；
19.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会长 吴建忠；

20. 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馆长 吴永欣;
21.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名誉会长 王立新;
22.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吴仁山;
23. 常州市高晓声文化研究会会长 吴建国;
24. 常州翱翔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县薛氏文化执行会长、法人代表 薛飞。

前来参加会议的还有金华兴、陆林深、苏刚、余忠良、周建春、肖飞、吴强、夷香萍、谢雪梅、秦文、陈平、章顺明、冯和年等专家学者和兄弟学会负责人共130多人。

二、揭牌仪式

2025年7月，由江苏省科协、省社科联、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江苏省国防科工委，联合公布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为2025年度省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为此，在11月1日，举办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成立五周年活动。并决定在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举行“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和“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揭牌仪式。

1. “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

由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关工委主任赵忠和以及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任洪兴为“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并向吴永欣馆长授牌。

主持人介绍说，这是今年常州市唯一入选单位，可喜可贺。让我们进一步学习科学家精神、大力开展好群众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特别是要在广大少年儿童中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培养好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事业的后备军。祝贺省级教育基地落地常州，扎根武进雪堰。

2. 宣布武进院士博物馆领导班子、工作组名单

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会长、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顾问周建春宣布“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领导班子、工作组名单”。内容如下：

首席馆长：张尚金

馆 长（法定代表人）：吴永欣

执行馆长：冯良

副馆长：郑国强 吴百英

顾问：程中伟 董农美 储宁玲 秦文

李梅香、虞建安、张步东、陶春健、张颖、杨

美英、张小锋、杨迪平等领导和专家为上述人员颁发聘书。有关人员上台领取聘书，并合影留念。

3. “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揭牌

江苏档案馆原副巡视员（副厅）、研究馆员（正高）于晓庆和常州市原文广新局副局长周晓东为“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揭牌，工作室领衔人张尚金上台接牌。

主持人介绍审批经过。2025年7月，按照省委老干部局统一部署要求，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研究同意，在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设立“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这是江苏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首个以共产党员个人名字命名的老党员工作室。2025年10月28日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吴文明等人到常州为“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授牌。

主持人介绍了领衔人张尚金，在党为民69载，“三立”修志44年。热烈祝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常州设立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并落地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为什么领衔人是张尚金，他是自学成才的好学生、省政府表彰的好教师、开拓实干的好干部、江苏省有影响的方志学者和修志专家、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张老常说：我是一名“社科小工”。而大家说他是“最忠诚的社科小工”。张老是季子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是诚信文化的率先践行者，更是广义方志学的首席创立者，“常武七大特色文化”的推广传播者。

主持人继续介绍。如今88岁的张老，仍不知疲倦的为宣传季札、深耕地方文化、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而努力奋斗，他是一棵“常青树”“不老松”，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老黄牛”。他是我们年轻一代永远值得学习的好典范，好榜样！向张老致敬，学习！再学习！

三、领导、专家和来宾致辞

1. 常州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任洪兴致辞。

2. 曾任武进区文广新局局长、武进延陵季子和地方文献两研究会党支部书记郝建成致辞。

3.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市县指导处处长张尚金致辞。

张尚金说：“祝贺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祝贺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揭牌仪式。”他接着说：“这是江苏省第一个地方志系统挂牌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老党员工作室。”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市县指导处处长张尚金，方志学者，老党员，今年88岁，宝刀不老，笔耕不辍，贡献社会。张老挺拔有力走上讲台，手持话筒，站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座右铭，讲话中气十足：“人生如朝露，价值在贡献。健康为第一，真理是生命。一切献给党，终身为人民。七十古来稀，八十不足奇，只要活一天，尽力作贡献。”还说：“活着就要拼命干（胡耀邦语）。”“明天就死又何妨，只要拼命做工，就像您永不会死一样！”（胡适语）”

他说：“我以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的名义，接受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秦文的邀约，双方同意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和江苏省少先队秦文名辅导员工作室作为合作单位。”

张尚金为党和人民工作69年，编史修志44年，矢志不渝。他宣布：“老党员工作室将补修出版《常州府志（1694—1911）》、认真办好《常州院士展示馆》，指导编修《郑陆镇黄天荡村志》《洛阳镇马鞍村志》作为近二年的工作任务！”

第二阶段：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四届二次 (扩大)会议

会议由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秘书长吴振达主持，主要内容如下。

1. 会长吴建忠提出加强财务管理的几点规定。
2. 党支部筹建人冯国平发言。
3.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名誉会长、理事、教授赵贤德讲话。

第三阶段：《常州府志》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

会议由《常州府志1694—1911》总纂张尚金主持，主要内容如下。

1. 宣布个人申请自愿加入编纂小组的冯国平为编纂组成员。
2. 聘请张祥海为常州府志编纂组财务出纳（专款专用）。
3. 由上官鹤锦代读谢达茂《关于常州府志艺文卷的编纂情况汇报》、请吴爽展示艺文志样本。
4. 各人汇报编纂情况并进行学术探讨。
5. 常州市文旅局原副局长张戬炜发言。

张戬炜发言，语出惊人，文字不朽。没有文字记载，后代子孙怎么知道你的功德呢。张尚金组织编写《常州府志续修》，功德无量。张戬炜说：“作为中国人，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实际上，重视的是立功和立德，建立功勋和道德模范。”

张戬炜接着说：“三不朽，只有立言，才能不朽。道理是：所有的功，所有的德，离开了言，是不存在的。霍去病，去赶匈奴。据说，一口气赶到匈牙利。如果没有立言，当事人是知道的，但是事后，随着年代的变迁，是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只有一个不朽，立言不朽，天下唯文字不朽。”张戬炜还说：“武进是常州的根基。可以这样说，没有武进，就没有常州。只有武进人，站起来第一个说，我要修《常州府志》。其实，在清朝，已经有人弄过了，但是最后，没有弄成。今朝，张老，张尚金部长在做了。他让子孙后代记住了当年的常州府是多么的辉煌，也记住了武进是常州府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在这里，既是立言，也是立丰碑。”

活动期间，许多与会人员参观了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

（许国裕）

《季子研究文化丛书》总述

张尚金

季札，姬姓，吴氏，名札，称吴季札、吴札，号公子札、吴季子、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周简王十年，吴寿梦十年（前576年）四月十八日生；周灵王二十五年，吴余祭元年（前547年）封于延陵（一说周灵王二十四年，吴诸樊十三年，封季札于延陵）；周敬王三十六年，吴夫差十二年（前484年）四月十三日仙逝（或更后），享寿93岁（或更长）。他是春秋晚期的一位仁人、贤者、君子、节士，在历史上享有崇高声誉。

季札是延陵见于史载第一人，也是古延陵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延陵，春秋末期邑名，其区域以今常州为中心，东至江阴以及张家港局部，西至丹阳、金坛，南至宜兴，北至长江。季札幼娴礼乐，其出使诸国在中原，观乐审音在周鲁，以义正人在戚邑，守礼葬子在嬴博，挂剑示信在徐国，三让王位在宫廷，逊耕采邑在延陵，这彪炳千秋的懿德和功绩，备载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先秦史著以及历朝志乘。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发凡专门记载对国家有重大影响但又不是开国皇帝的著名家族历史的“三十世家”，季札所在的“吴泰伯世家”位列第一“世家”。司马迁用约4400字记叙商代末期吴泰伯开创句吴国，历约800年传至第二十五代君主吴王夫差时灭亡的历史，其中记叙季札事迹多达1800余字，最后在文末这样赞颂：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西汉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季札为“九级人品”第二级的“上中仁人”，地位仅次于孔子等“上上圣人”，与“亚圣”孟子等齐名。

东汉之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唐间的史籍中，对季札事迹和行历的记叙时而有之，诸如西晋《续汉书》、南朝《后汉书》、唐《资治通鉴》《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等。

宋咸淳四年（1268年），时任常州知州史能之纂《重修毗陵志》，是为常州存世最早的郡志，其在“地理”卷记载，“周灵王二十五年，季札封延

陵”；在“秩官”卷记载，“季子札，寿梦第四子，封于延陵”；在“祠庙”卷记载“延陵季子庙，按山谦之《丹阳记》云：南庙在晋陵东郭外，北庙在武进傅落城西，西庙在润州曲阿”；在“陵墓”卷记载“公子札墓在县北七十里，通典注晋陵申浦有季子墓”。其还在《人物序》中记叙季札风节对后世的影响：

古毗陵人性朴直、俗习淳厚。盖是泰伯、季子以来，流风胥渐尚矣。载稽耆旧，魁垒奇傑，代不绝书。我朝以德业词章称者于世为盛，若名节之掀揭，理学之渊源，尤于世教有补。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时任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建“常州先贤祠”，在所撰《晋陵先哲传序》中称：“传称大江之南，其人轻心易俗，而晋陵亦江南也，荐绅先生以及布衣韦带之士，独以名节自卫，以道义相追。”欧阳东凤所立《晋陵先哲传》，第一人即《周·延陵季子》，有结言如下：

论曰：凡是能让千乘之国者，其心有国也。季子视去其国如挂徐君之剑，而以延陵为已嬴博。其于吴何有？岂谓后世遂以让名我也。大舜之大也，视弃天下犹敝屣甚矣。札之才，似舜也。见舞韶箭而观止，有以也夫。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时任常州府知府于琨组织纂修《常州府志》，主纂陈玉琪发凡起例，就季札事迹的记叙，在承袭前志的基础上，又在“艺文”卷刊列唐润州（今镇江）刺史萧定撰《改修吴延陵季子庙碑记》，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撰《延州来季子赞》、宋吏部侍郎邹浩撰《先贤徐君墓碑记》、宋常州知州朱彦撰《延陵季子庙记》，宋哲宗皇帝《敕封（季札）昭德侯诏》，明南京国子祭酒陈敬宗撰《季子庙十字碑记》、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撰《重修季子庙碑记》、江阴知县黄傅撰《季子论》、太仆寺少卿都穆撰《季子墓碑考》等文，并刊列自汉代至明朝间著名的咏季札诗歌10余首，以为彰显季札的功德风节。

康熙《常州府志》之后，常州府至清末的两百余年断修无志。

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任武进知县王祖肅修清《乾隆武进县志》，阳湖知县陈廷柱修《乾隆阳湖县志》。二志均崇季札为唯一先贤，立传（节录）如下：

季札，吴泰伯后，吴王寿梦子。寿梦有子四：长诸樊，次馀祭，次馀昧，次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乃立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谢曰：“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之义。”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以次致国于札，以称先王寿梦意。于是，季札封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馀祭卒，弟馀昧立。馀昧卒，欲授札。札让，逃去，乃立馀昧子僚为王。公子光曰：“我真王，嗣当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遂杀王僚自立，是为吴王阖闾。季子至，曰：“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哭僚墓，复位而待，终于延陵。孔子称其知礼，于其卒也，题其墓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在今江阴县申浦西。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时任武进知县孙琬、阳湖知县王德茂倡议合修县志，称《武进阳湖合志》，由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任武英殿协修、安徽凤台知县等职，主讲江阴暨阳书院的“一代通儒”李兆洛主纂，成36卷。李兆洛承前志所载，在志中多卷分别刊列关涉季札的记述，又在“坛庙”卷整理刊列坐落于阳湖县中右厢的《季子祠》、坐落于阳湖县东门直街的《延陵季子庙》二文。尤其是在“人物志”中单列季札为“先贤”，刊列《乾隆武进县志》《乾隆阳湖县志》中所载季札生平事迹。

自清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朝代更替，政局多变，社会动荡，对于季札事迹的记载、季子文化的研究中断近百年。直至1987年版《武进县志》、1995年版《常州市志》、2008年版《江苏省志·人物志》，开始恢复对先贤季札的记叙。之后，古延陵区域的常州、武进、江阴、丹阳等地的政府部门，以及一些从事地方文史研究的学者、爱好者，陆续撰写了一些记述和研究季札的文章。

200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文化部原副部长潘振宙、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胡福明、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吴榕、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汪文超，常州市原副市长薛锋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由曾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处长张尚金、曾任常州市武进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吴之光、时任常州市武进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谢达茂，发起成立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得时任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局长郝建成的支持，注册地址为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65号武进图书馆三楼，并于2009年5月12日举行成立大会。

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是全国第一个季子文化研究学术社团。之后在2020年，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成立（首任会长吴林华）。2022年，由常州

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和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成员吴榕、沈宝祥、张尚金、吴建国，和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吉祥发起，以及常武地区的老干部、学者、乡贤薛锋、赵忠和、秦志法、陆惠根、谢达茂、沈建钢、顾相才、吴林华、周建春、刘灿放等参与申报的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成立（首任会长周群）。

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成立之初，创办大型季刊《延陵季子研究》（第二期开始改名为《武进文史研究》），15年来共已印发45期（现改名为《常武文史研究》），刊载季子研究方面的论文300余篇；注册设立“中华延陵季子网站”，已上传资料和文章600余万字，后又建立“延陵季子公众号”，将季子研究成果推向全国，乃至世界；撰写书稿《延陵季子史料集》（上下册），交常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审稿、补充图片并出版，列为“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软件工程项目”；创建“延陵季子京剧演唱队”，坚持常年演出；每年在季札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命名为“常州市第X届诚信日公祭活动”，至2024年已连续举办16届。

季子研究，任重道远。清嘉庆六年（1801年），太子少保充任会典馆总裁刘墉由京城赴江阴，与时任江苏学政，署于江阴的侄子刘縯之会面，有诗《承恩赴江阴学署侄吏部侍郎縯之任所，賚御书匾额、赐物，为母九十生日，路经齐河，晤铁冶亭中丞，别后有诗见寄，即依韵奉和》。刘墉在江阴期间游历君山，作诗《君山眺览》，又作《和元人君山诗》七律一首，其在颈联出句“遗踪季子藓碑高”，为季子墓前有传为孔子所书的“十字碑”而感奋，又在尾联出句“荒唐志乘知难据”，对古延陵区域的《毗陵志》《江阴县志》《丹阳县志》《毗陵高山志》等志乘，就记载的季札行实、墓址等不尽统一，甚至多有矛盾的现象称为“荒唐”，诸如《江阴县志》《丹阳县志》所载“季子墓”的地点不一、刻立“十字碑”的时间不一、敕封季札为“昭德侯”的年代不一等。再如季札卒年，继明《毗陵高山志》之后，见多部县志记写“阖闾七年（前508）”，季札69岁，卒于申港；而《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哀公十年（前485），“救陈”（应该是卒于前484年或更后，季札享寿93岁或更长）等，以表示“知难据”的无奈和遗憾。在当今季子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通过论证，给刘墉诗句中的旧时“荒唐”以弥补，给近几年来出现的不实记述以辨析，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季札负责的态度。

值纪念季札诞辰2600周年（前576年—2025年）即将到来之际，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立项编著《季子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位于武进嘉泽富墅季子庙遗址区域(今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的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志存高远,“伟万里之仙骥,驰九关而天翱”,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以彰显常州武进辉煌的历史人文底蕴为己任,参与季子文化研究并支持丛书的出版。

《季子文化研究丛书》顾问:常州市原副市长、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和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薛锋、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鸣;

《季子文化研究丛书》总编: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原处长、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和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张尚金,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会长郝建成、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会长杨汉平。《季子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编著,由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和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谢达茂承担,在武进图书馆王晓刚、赵利娟的协助下,历时3年完成。该辑丛书共3册合为1函,大旨分别如下:

第一册《季札辞国论衡》(453千字),是为季札正名之作。明代文学家唐顺之有自嘲诗,出句“札也能轻千乘国,蹈道无能见早讥”,句下有注“公羊氏曰:札也能轻千乘国,蹈道则未也。”按词语解释,这两句诗的完整意思是说:“季札也能辞让王位,

(但)履行正道未曾能做到,(因而)受到早前之人的讽刺讥笑。”在这诗句的特定语境中,“轻千乘国”虽然体现志节,但与“蹈道”是对立的:履行正道就不能辞国(应该有担当精神,为社稷着想而接受王位);既然辞国就是逃避,就是未曾履行正道(导致吴国灭亡)。唐顺之所称“见早讥”,即指东汉思想家桓谭、唐大历九年常州刺史独孤及、唐大历间宰相崔佑甫、唐贞元间三典士举的丹阳籍宰相权德舆、北宋“二程理学”宗师程颐、经学家胡安国、“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以及他们的门生和学术传人,先后在各自的著述中贬责季札“辞国而生乱”(季札辞让王位,阖闾继位,传位吴王夫差23年之后,吴国灭亡),还有北宋常州知州王安石贬责季札“不为之尽礼,则近于弃仁义”,南宋教育家张栻贬责季札辞国“未免为徇其名而已,如季札之徒是也”。之后在明清间,古延陵区域贬责季札“辞国而生乱”的著名人物还有明常州府无锡县曾任南京礼部尚书邵宝、常州府无锡县东林党领袖高攀龙、镇江府丹阳县曾任刑部尚书姜宝,清末常州府阳湖县曾任户部主事钱名山等,他们都是不同时段“贬季札”的引领者。本书刊列并解读45位“贬季札”者的“要言”,同时刊列宋至清间“褒季札”阵营中的包拯、司马光、苏轼、苏辙、杨万里、叶适、家铉翁,古延陵区域的谢应芳

(武进)、徐问(武进)、薛应旼(武进)、王樵(金坛)、缪昌期(江阴)、夏敬渠(江阴)等40余人著述中褒扬季札让国高风的“要言”,通过辨析,给出观点,以为论衡。

第二册《华夏仰风》,副标题《前人咏季札诗歌八百首汇诠》(425千字)。季札事迹,俱有可录,数量最多的是前人咏季札的诗词歌赋。2014年出版的《延陵季子史料集》,在下册刊列当时采撷到的咏季札诗歌240首。之后在此基础上,经过武进图书馆人十余年来不间断的搜集,到目前为止总数已达833首。按体裁分有诗、词、歌、赞、铭等,其中以四言古风、五绝、五律、七绝、七律诗和叙事长歌为主体。按咏诗的内容分,季札典故和成语中的“全义让国”“观乐议政”“叹为观止”“君子之交”“徐墓挂剑”“嬴博之哀”“逊耕延陵”等无一不涉,皆有歌咏。本书按朝代为序刊列所有咏诗,附以作者简介,同时解读诗歌中涉及的季札事迹,讲述作者题咏的背景和诗歌背后的故事,试图起到彰显季札高风亮节,弘扬先贤理念精神的作用。

第三册《季子庙考释》(425千字),是一部考证诠释曾经存在的25座季子祠庙的专著。本书结合历史背景,解读唐代高绍所撰《重修吴季子庙记》,依区域和历史时序叙事规则,就最早季子庙的始建年代和地址、晋陵(常州)东郭外季子庙是为“正庙”地位的形成、季札“汉代三庙”曾经在东汉和南朝宋的“毁淫祠”期间被并被废的过程、常州城内蔚起三座季子庙的兴废、丹阳延陵九里季子庙香火“独盛”的原委、江阴季子庙的始建及沿革、季札胤嗣在庙守祀情况,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季札庙祀文化等一一作出诠释。试图以文字还原其旧貌,尤其就刘墉笔下的“荒唐志乘知难据”所指,给出明确的解释。

《季子文化丛书》(第一辑)引用采撷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著录的百余部著述中对季札或褒或贬的文章,引用近十年挖掘出的大量原始资料。研究会就编著者对资料的遴选、解读、编写的书稿成立审稿组,由张尚金、郝建成、陆惠根担任组长,聘请(以姓氏笔画为序)上官鹤锦、王继宗、孙晓峰、朱隽、冯士彦、杜仁彬、吴洪生、肖飞、徐敏、徐瑞清共十人为审稿组成员。目前,《季札辞国论衡》《华夏仰风》《季子庙考释》都已付排,即将出版。本人受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的委托,叙其梗概,是为总述。

2024年10月1日

躬耕本是英雄事——舜山小镇躬耕者巡礼

陆林深

躬耕本意上讲就是种田，甲骨文“躬”字的形状就是弯着身体耕种的意象，但后来引申出来的含义就多了，皇帝做做种田的样子，意思带个头，做个榜样，用意是劝农好好种田，雅称“躬耕”。古代的士人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或者无奈，也耕种而食，诸葛亮就自称“躬耕南阳”；苏东坡在山坡上开垦出三十亩地，亲自耕种。躬耕这种情结是世界性的；托尔斯泰就特别喜欢农耕作业，他从农业劳动中感受体会他的人生哲学；躬耕也贯穿古今，现代城市里很多人明明十块钱能买一堆菜，可他非要花一千块钱去种一堆菜，这也不能从经济上去衡量。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陶渊明了，他厌恶官场的虚伪和矫饰，为摆脱心灵的束缚，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决定回家种田，通过躬耕自足的方式实现他经济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他不满现实，不愿与官僚为伍，对仕途非常鄙视，选择退隐归耕，意志非常坚决。可是躬耕并不像在办公室泡一杯茶、拿一张报纸那样轻松，种田是很辛苦的。但他不懊悔，他作诗说，“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说，春耕虽苦，但不要违背当初的抱负。他又说，“田家岂不苦，力耕不吾欺。”他说，种田哪有不苦的，努力去耕种，不愿欺骗自己的诺言。他一开始躬耕其实很失败，“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从早晨下地一直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他带着自嘲，自嘲中又带着喜悦，甚至产生了诗兴，“带月荷锄归”多么美的一幅夜耕景象，他从躬耕中得到心灵上的自由，体会到了躬耕的诗意和乐趣。

然而躬耕本身绝不就是一首诗，物质生活是精神自由的基础，在农耕社会，躬耕是实现这基础的唯一途径，要么走仕途享受俸禄，要么去躬耕自给



自足，从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可是农民却没有这么浪漫，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以躬耕为生。他们就像蚯蚓那样，是以泥土为生，以泥土为食的。这是他们永恒的事业，难道躬耕不是人类永恒的事业吗？过去常有农民说，种田万万年，生在郑陆的农民作家高晓声曾经对我说：“你把地上全部铺满了金子，你能吃金子吗？”

我终于明白了，4200年前的虞舜来到舜山脚下躬耕，1600年之后，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仰慕他的躬耕精神，也选择到舜山脚下躬耕，并当作终生的事业。季札之后2600年的今天，又有一群人来到舜山脚下，继承虞舜季札的精神，开启新的躬耕历程。

这不是陶渊明因为心灵苦闷，去寻找精神出路，也不是田园生活浪漫去寻找诗情画意，而是带着时代的使命，背负着历史的重任，不是古代士人逃避现实的被动选择，而是正视现实做出的主动担当。

江苏九洲集团董事长刘灿放，深刻领会国家全面振兴乡村经济战略的重要意义，2020年决策投巨资打造舜山小镇，其中把投资农业作为持续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经济关键的一环。这不是闲情逸致，做样子的余兴，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也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是书呆子说的话，这需要艰苦的劳动，长期的付出，这需要投入产出

的计算，这种躬耕与传统产业的躬耕不一样，这是从体力劳动依赖土地到科技支撑的转变，不是形式上的复制，这需要创新。

舜山种养场建起来了，顾名思义就是包括种植与养殖，九洲食品公司与溧阳南山竹海共同开发农产品，开拓乡村产业的新版图；与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公司深度合作，投放长江名贵鲥鱼；与中国华电共同投资建设渔光发电项目，把工业和农业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上面可发电产出巨大经济效益，又为中国碳中和作出贡献，下面水里养殖黄天荡螃蟹，产出高价值的水产品。舜山小镇还把焦溪二花脸猪和翠冠梨这些著名品牌产品升级提高，促农增收，以产兴收，以产兴村。

这些新型农业，催生造就了新一代躬耕者，诺亚方舟科技公司总经理戴飞女士，原来大学学的是文学语言，后来热爱农业，转向种养方面。为了提升自己，去上海财经大学读完硕士，又去南京农业大学读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她说，农业科技发展形势始终在推着自己往前走，不断逼着提高自己的学识，现在她是舜山种养场的掌门人。她是一个技术型管理者，不但要管理，更要搞科研，一刻也停不下来，用“以场为家，废寝忘食”来形容她一点也不过分。

石陈锦是宁波来的姑娘，她大学硕士毕业后就选择到舜山种养场当新农民，她热爱农业这个职业，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黝黑，可她乐呵呵地说，哪有搞农业不晒太阳的，她说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叫，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另外一个是总有人在说中国的食品不安全，每想到这两句话就陡然生出一种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这里现在有20多位员工，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和硕士生，都和石陈锦一样，立志为中国的新型农业发挥聪明才智，为建设新农村奉献青春。这些00后的新农民天天在辛勤地劳动着，周末晚上也要来看鱼苗。大风大雨天，偏向雨中行，要去巡视检查，防止水塘发生意外。每到捕捞时，凌晨四点五点就要起床，配合捕捞装运。他们脱离了娇生惯养的习气，锻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做着不平凡的事。默默无闻，无怨无悔。

传统的养殖，环境差，资源利用率低，抗风险能力差，而这里新型的养殖，有整体空间规划，环境生态优越，有大棚保温，自动化设施，有无人机

投料，抗风险能力强，做到科学养殖，绿色低碳，上游下游打造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和农文旅融合。为了提升水产品产量，他们还不断地研究种植节节草、伊乐藻、浮草这些水草植物，调节水温，提高水质，提供养分。

舜山种养场不但讲究养殖增产，提高收益，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帮助周边农村里的农民，进行科学养殖，他们把研究得来的数据库。信息库，自己积累的经验，无偿的提供给那些养殖的农民参照。养殖场的营销渠道也形成了规模，从电商直播、出口销售、电商自营、团购、K01、商超、酒店，这些也提供给农民分享。在舜山种养场展厅有一块牌子写着这样一句话：“努力成为国内一流的渔光一体智慧渔业解决方案领军者”。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做全国渔光一体标准的制定者、方案的解决者、线上线下带的头人。2024年舜山养殖场启动了“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工程”，这是吹响了向这一目标前进的号角。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农业称为“拙业”，意思是笨拙的行业。农业投入大，收益很慢，而且不高，但正是这项笨拙的行业，却是一份崇高的事业，是一项“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物之所在，利之所在”的伟业，这是农耕精神滋养现代农业的诠释。这里聚集着一代新型农民，是一群具有较高文化，有共同理想，有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怀抱生态理念、市场理念，主动投身农业，创意创新，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一代躬耕者。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陶渊明在躬耕中发现了诗意，而这里有诗意般的躬耕者。

二

在舜山小镇还有另一类躬耕者，他们不在田间陇亩耕耘，而是在书斋砚边辛勤地“笔耕”着。

舜山小镇初建成时，九洲集团董事长刘灿放就明确提出，舜山小镇要打造虞舜、季札“二圣”文化高地。把“二圣”文化作为小镇的灵魂，把“二圣”文化作为舜山小镇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季子是2600年前常州的人文始祖，他仰慕虞舜在舜山的躬耕精神，选择在此躬耕，直至终老。季札的事迹记载于《左传》《公羊传》等先秦经籍和

《史记》中，是孔子、司马迁、班固称之为“君子诚信第一人”的圣人，他的事迹传诵千秋。

早在30年前常州市原副市长薛锋退休之际，市里有关领导就嘱托，他退下来后有时间了，可以写一些常州的人物故事，给市里对外宣传时作一些介绍的资料。薛锋于是查阅收集季子的史料和有关历史遗存，走访了常州、江阴、丹阳、江淮许多地方，还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后来他把季子研究的重任移交给了曾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尚金处长。2009年5月12日，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成立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到会，盛况空前。这个研究会成了全国第一个研究季子文化的学术社团。2020年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成立，2022年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成立，形成了省、市、区党政部门领导的、由各层次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大联合、大协作研究季子文化的新局面。还组织了有副市长带队的“重走季子路”活动，十多个人从常州出发，经苏北到山东（古鲁国）再折回徐州（古徐国），一路考察参观了当年季子留下的历史遗迹。

为了支持季子文化研究，九洲集团董事长刘灿放慷慨拿出300万元支持省、市、区季子文化研究会开展工作。还投巨资实施有关季子文化的文艺创作。表现季子形象的小说、音乐、锡剧、京剧、评弹，相继演出。公祭日、诚信日、大讲堂、学术研讨会、会刊、公众号、季子网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层出不穷，季子文化爆发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尤为令人瞩目的是，2025年由谢达茂主要担纲编著的《季子文化研究丛书》计150万字出版发行，把季子文化研究推向了高潮。其中《季札辞国论衡》梳理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季札辞国的“褒”与“贬”；《季子庙考释》从史料典籍中查找到了历代修建季子庙的记载、碑刻等历史遗存信息；《华夏仰风》收集整理注释了从历代颂咏季子的诗词共833首，并一一做了解读，让我们后人能欣赏领略到两千多年来文人骚客的才情，更能体会到天下人对季子的崇敬仰慕。这套丛书三册共计1300余页，可谓鸿篇巨制，2025年举行该丛书的首发式和新闻发布会，人们无不为之赞叹。

虞舜研究的躬耕者们又构起了另一道风景，他们同样在追寻着圣人的足迹。虞舜是上古时期的孝子、贤臣、明君，他以明德感召四方，化育万民，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

司马迁《史记》中讲“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刘灿放曾这样说：虞舜“明德”思想本质上是讲究“真善美”。追寻虞舜就是传承吸收虞舜的“明德”精神。来滋养充实提倡“德”文化，为企业文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把常州的人文历史从季子2600年向前推到4200年，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补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事业。为此，刘灿放请常州图书馆的王继宗撰写了《舜迹延陵丛考》这套书，共三册，近100万字，考证了虞舜从出生浙江上虞，来躬耕舜山直至山东，后来在山西由尧禅让给他成为天子，又“南巡”到湖南终老葬在九嶷山下一生的事迹。史料翔实，虽然仍有待商榷的地方。但这项巨大的工程对中华民族“三皇五帝”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也为中国历史学对“三皇五帝”的研究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都有研究虞舜的学术团队。为了更好地把虞舜文化研究向更高的水平推进，形成一个跨区域的大协同、大联合、信息共享的良好平台。刘灿放十分赞同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虞舜研究联谊会，团结各地有志于虞舜研究者们。九洲为此愿意做出更大的努力、作更大的担当。刘灿放还再三强调我们研究虞舜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在探究虞舜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而不能自拔。这样的研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学习、传承宣扬虞舜的明德思想。虞舜虽离我们很远，但他真善美的品德，这个精神是永恒不变的，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

让我们看看舜山小镇那些在砚田里的躬耕者们，他们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历史学的文凭，也没有历史学家的职称，但他们有着历史学家更多的追求和情怀。甚至比一些历史研究者有更多的历史感、责任感、忧患意识，更有历史学家的良知。他们更懂得挖掘中国历史优秀文化，对中华民族生存、民族自信的重大意义。他们那个不是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废寝忘食的人，为了传承、发扬、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思想的进步，他们默默耕耘。

他们搜罗广博、爬抉缜密、议论恢宏，有的一万字、几万字，有的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有的二年、有的十年十几年，怀揣着一颗虔诚的信仰，经年在砚田里笔耕不辍。

谢达茂的《季子文化研究丛书》从收集资料到

成书，算来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他感慨地说：“做这项工作完全凭一种信仰来支撑，那一个字不是用心血和生命来凝成的。”这是一些多么虔诚和辛勤的躬耕者！

三

位于常州与江阴交界处的舜过山，自古以来又称高山，也形容为“延陵之尾”。古人说得好，这里春宜雨，夏宜风，秋宜云，冬宜雪，朝宜烟，晚宜霞，夜宜月，远宜影，近宜籁。居此山，静可读，闲可樵，累可跌，岭可亭，涧可趣，松可荫。至今还流传着高山归宅、流水新沟、舜田春雨、秦岭秋云、伍胥遗庙、季子佳城、三山古渡、鸟路通衢等八景之咏。舜山还有“六胜”，即虞舜帝躬耕地，延陵季札封邑地……

九洲集团建造的舜山文旅康养小镇，就坐落在这青山绿水的怀抱之中。舜山小镇占地1175亩，一期投资35亿元，集“游、宴、研、宿、演”五大业态为一体，是长三角的“城市近郊乡村休闲”目的地。舜山小镇也是康养小镇，是“医疗康养”“护理康养”提升养老服务配套的理想地。将让人们享受到九洲新康养专属文化及专属标识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沃土。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集结着一群勤劳的躬耕者们。他们就是舜山文旅康养小镇的运营团队，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者，而同样像在田间陇畝辛苦劳动的耕耘者。最近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忙”。

我想采访万怡酒店总经理谭春，她说：“马上要开会，没有时间。”再问罗经理，他说“今天有七十桌的婚宴，现在就要去张罗安排。”谭春告诉我：“酒店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舜山小镇总经理方世宏更是一刻也约不到他，他说：

“别人休息放假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舜园负责人金芳说：“忙的时候没有按部就班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只要需要必须到场，最忙的时候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她说，在舜山小镇做文旅，需要人人都是“万金油”，人人都要“多面手”，部门间需要互相支援，有时需要去帮助宴会厅搬桌子、铺台布、端盘子，有时要去客房部撤布罩、铺床单，有时要去检票口帮助检票。同事们中

口头传诵的一句话：“我是九洲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在舜山小镇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我想约副总徐泽访谈，他连连摆手：

“这星期没有空了，等下星期吧。”问采购部陈民强也同样回答我：“这星期反正没有时间，要等下星期。”我约负责接待的陈嘉怡，好几次都是没时间。这一天，我刚巧在路边电瓶车旁碰到她，就想聊几句：“你一天要接待多少人？”“不一定，基本上要3个团队，今天马上就有4档人来。”“你们也蛮辛苦的啊！”我说。“不辛苦，趁学校刚毕业，多历练一点。再说，为了九洲的未来，辛苦一点也不计较了。”“马雨呢？怎么这次来没见到他？”马雨是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家在南京，我还不知道他和陈嘉怡两个人是负责接待的。

“他太忙了！”我问：“他忙什么呢？”“忙接待呀！”“他和我就两个人负责接待的。”陈嘉怡说，话还没说完，有人跑过来告诉她，参观游览的人已经到了，陈佳怡来不及打招呼，一下子转身就走了。我真正体会到他们真忙。我感觉到她那句“为了九洲的未来，辛苦一点也不计较了”的话，一点不是虚假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采访舜山小镇演艺部的赵璞和王铭圣，让我了解到许多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舜山小镇演艺团队现有27名人员，包括专业声、光、电人员，演艺团有舞蹈、武术、说唱、情景剧、舞台剧、古风表演，有长嘴壶、不倒翁、大碗茶、打铁花、舞狮子等各种各样的表演。往往一个人身兼数职，一天要变换多个角色，随着角色的变换，一天要更换多种服装，演员通过各种表演让游客感受到开心，感受到舜山“二圣”文化的熏陶。让人觉得雅俗共赏，心情愉悦，特别享受。赵璞说：“这就是我们演艺团存在的意义，给游客情绪上的精神饱满，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我们的节目层出不穷，与游客互动沉浸在一起，有“石头剪刀布”“投壶”“抛绣球”，游客赢了可以获得一张价值5元钱的银票。凭着银票可以在舜山小镇相应店铺内购买任何小物件或者消费各项目。怎样让游客得到独一无二的体验，是我们始终在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为了更新迭代，我们需不断编新节目，不断排练才行。每天夜里经常要排练到9-10点钟。”“你们一般一天要演出多少场？”我

问。“一般一天要演出40场到60场。重大节日，譬如国庆节，我们一天演出多达100多场。”“你们的演员都是哪里来的？”我好奇的问。“有来自海南云南的，有来自山东西安的，有来自安徽的。也算是百里挑一，这些演员都是专业学校培养的，有一至两年以上的演出经历。”赵璞补充道：“他们想与舜山小镇一起成长，渴望有一个更宽广的舞台。他们经常有摔伤的、碰破的，还有中暑的，基本上不休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用在他们身上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就像农民种田一样辛勤耕耘，要说农民种地苦，他们一点也不比农民轻松。”赵璞说。采访舜山小镇演艺团使我感慨良多，我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我的采访还意犹未尽，我很好奇地问：“那天晚上去看打铁花，那铁花真漂亮！”

“打铁花共有6个小伙子，每次要上4个人。是请外地的老师傅来教会的。这是非遗文化。那铁水在锅里要烧到1600℃，然后用一块木板打出去。他们的手上、脸上经常被溅起的铁水烫起泡。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满处疤痕，这是家常便饭了。当然他们不只是打铁花，还要扮演更多的角色，如武术、舞蹈，也在学舞狮。不时会来段《吴越往事》剧，与“二圣”对话，季子巡游……我们演艺团队10月被评为优秀团队，得到领导和游客的认可，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赵璞和王铭圣两人一同笑了。

陈民强是九洲的老员工了，他说：“舜山小镇有它的特殊性，过去也从来没有干过文旅，这里来的游客团队千差万别。有银发团队，有亲子团队，有青年，有中年，有学生。学生中又有小学生、中学生。每一个人的爱好、要求都不一样，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如何服务到每位客户的心上，需要特别的用心。但九洲“服务大众”的传统是不变的，必须时时牢记在心的。”

舜山小镇的总经理方世宏、副总徐泽都说到，舜山小镇的成长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有一个从生地到熟地的转变，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有团队的调整，有理念的调整，有服务的调整。这些都靠一套高效的温暖的管理体系在支撑。

舜山小镇的访谈使我回忆起九洲集团1988年创



立时，董事长刘灿放提出的九洲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就是“服务大众，发展自我。”刘灿放在阐述这个核心理念时说，“首先要服务大众，然后再去发展自我。如果为了发展自我，然后才去服务大众，那出发点就错了，那是本末倒置。”九洲成立近30年来始终不忘初心，把真心实意为客户服务作为企业使命，把“客户至上，服务为本”作为核心价值观。在舜山小镇，“服务大众、客户至上”的理念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员工的骨髓里、血液中。服务大众的口号已经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觉行动。他们任何时候心里装着“服务、服务、服务。”九洲集团董事长在舜山小镇开业大会上致辞说“三分建设投资，七分运营培育。”舜山小镇将不忘初心，一如既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改进提升，继续精雕细琢，厚德载道，厚积薄发，真正做到客户至上。这些理念，已经变为舜山小镇300多人的运营团队在一年365天，每天每时每刻的实践。

舜山小镇的躬耕者们，他们懂得从翻土、播种、浇灌、除草、施肥、收割、脱粒，每一步都不能少，从田间到餐桌的漫长旅程。每一粒稻谷都是有原因的，每一粒都承载着耕耘者劳动的付出和情感的寄托。舜山小镇的躬耕者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个人的疏忽和懒惰而使这片沃土荒芜了。土地是不会骗人的，唯有耕耘者不能欺人，陆游说：“躬耕本是英雄事。”这是对躬耕者最好的赞誉。舜山小镇的躬耕者们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信念。“春华秋实，有耕耘就有收获。”在这神奇的沃土上，只要坚持努力耕耘，这片田野就有希望！

经两千年褒贬 季子更见神圣

冯士彦

常州人文学者谢达茂先生，新近在线装书局，领衔出版三本新著：《季札辞国论衡》（为季札正名）；《华夏仰风》（八百首讴歌季札的汇诠）；《季子庙考释》（25座敬祭季子的神庙考证、诠释）。这是季子研究必不可缺的资料积贮，也是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成果，寒暑备尝，可喜可贺。

三本新著，由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沈宝祥作《序》、张尚金写《总述》，要言不烦，纲举目张，犹为读者赠予精准的书海导航仪。

谢达茂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热衷于延陵季子文化的不倦探索，继往开来，追根溯源，本着人和人的价值为研究的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人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创新研究，全面评价，找回真季子，绝不塑造假季札。

我赞赏谢达茂先生这种科学、坚定、鲜明的人文精神。

他精益求精，成果丰硕，遐迩受益，享誉桑梓。

史料、事理的真伪、是非、曲直；

价值、影响的大小、轻重、广狭；

重心在季札“三让王位”的功过、利害、得失的衡量及评价。

延陵季子文化的观摩、切磋、鉴赏，发轫于青年孔丘先生的实地虔诚踏勘、考察，滥觞于儒学朦胧的黎明。

孔丘极其尊崇周公、周礼，青春成长、成熟，饱受周礼哺育，得无渴求而乐享季子文化一瓣饮？我以为必然无疑！

否则哪里会有先圣孔子题其墓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篆刻汉字，保存闪光到今天。

延陵季子文化，全民性持久的深入研究，必将大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加速复兴、振兴，繁荣、富

强，紧密团结，长盛不衰。我以为必然无疑！

季子经两千年褒贬淬炼，更见其超凡和神圣。我以为必然无疑！

朱熹的学生问：“胡文定公说季札辞国生乱，温公又说季札分明君臣的重大权责。哪个对呢？”（胡公，胡安国；温公，司马光。）

朱熹回答：

“季札可以接受王位，也可以不接受王位。”似无不公。

季札以礼坚辞王位。

后人则舍弃朱熹的“可以无受”，而只采纳其“可以受”的回答，来支持“季札让国生乱”谬说。显然，纵容偏信偏执。

学生又问：“季札观乐，如何做得到‘审音知政’，那么神奇？”

朱熹回答：

“这是左氏的渲染夸饰，亦自难信。季札闻齐乐，大加赞赏，说什么‘齐国国运不可限量’，然一传再传，才12年之后，田氏专权，取代了吕氏齐国，哪里来的‘未可量’耶？这些，都是难以相信的地方。”

“审音知政”，本来就是诗歌、音乐、舞蹈等个体或群体的艺术表现，从观赏者那里获得的多元愉悦效果，即对政治现状及前景作出独特、具像审美情绪和感想的抽象判断。

朱熹无端怪罪于左丘明，又用齐国政权长达十几年之后的易主变化，来否定季札观乐审美效果的即兴艺术评论，很典型的非感性艺术机械论，于纯净美学格格不入。

权迷心窍，满肚子勃勃野心的一切贪官污吏，岂有不自然而然演化为季子天敌的？

司马迁论季札观乐，何等宏伟、崇高，知音高水平。

朱熹遥距之以十万八千里！

朱熹的艺术灵感和悟性，与指鹿为马的赵高，

当然可以同日而语。

朱熹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缺失和忽视了这面镜子，延陵季子文化研究，既不易深入，也达不到全面、准确。

我以为，这也是必然无疑的。

白居易的诗《放言五首·其三》提醒我们：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是季札的祖先，忠心耿耿辅佐成王，而受皇室流言中伤，陷于灭顶之灾的政治危机。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爵位愈尊，节操愈谦，成为名闻天下最谦恭的模范人物。

终于澄清流言，周公恢复忠臣美名；

终于剥去谦恭伪装，王莽篡位死有余辜。

但是，假如周公死于“流言日”，王莽死于“未篡时”，那么，他们一生的真伪，又有谁来说清楚呢？

传统文化研究，常见似是而非，难度不可低估，当然离不开正确的科学方法。

白居易为我们提供了辨清历史“狐疑”的可靠借鉴。

一是火烧法，火烧三日，分出玉的真假；

二是观察法，榆、樟幼苗相似，难以分辨，生长七年，才识其何榆何樟。

褒与贬，乃唯物辩证的两翼。十分有利于比较研究的惯常方法，七嘴八舌，助推争鸣，不会只有一种声音。

举一反三，寻找规律，耐心观察比较，须花一定时日，人物、事物的真伪优劣，终究会呈现出来。

经过两千年褒贬考验的季札，应该获得公正的历史结论。

白居易还说：“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感兴》）

延陵季子文化研究事业，犹夸父与太阳竞走，附丽于民族的复兴、振兴，绝无“多取”与“少求”的抉择，唯有赤诚奉献。

谢达茂先生，长年累月，吃辛吃苦，无疑是我们的楷模。



从季札出使看春秋晚期吴晋的陆路交通

石晓琴

摘要:本文简要叙述了春秋晚期吴国和晋国之间的陆路交通情况。对季机出使的路线进行分析,重点考证了彭城、戚等的具体地点,并指出了它们在吴晋交通线上的枢纽地位。

关键词:吴;晋;彭城;福阳;季机出使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军事的慢慢强大,经济的逐步发展,吴国同中原各国间外交和军事活动日益频繁,通往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渐渐完备,把吴国和北方各国紧紧连接起来。

关于交通线上各重要地点的具体位置,前辈学者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清朝对春秋战国史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一书。此书对各国的地理形势进行了梳理,考证了一些重要古城的大概位置。现代学者的历史地理研究涉及春秋战国间交通问题的著作有石泉先生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谭其骧先生的《长水集》^[2]、黄盛璋先生的《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3]等等。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的相关章节也涉及了吴国的交通问题。

吴晋之间交通路线的开辟主要是晋国为了找到对抗楚国的新盟友,积极主动地打开通往吴国的交通线。

根据《左传》的记载,晋国通吴始于成公七年申公巫臣出使吴国^{[4]689}。此时吴晋之间还没有畅通的交通径道,虽然七年云“通吴于晋”,云“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4]689}等等,并不是当年发生的事,都是《左传》提前叙述后来的事情。所以,成公八年有记载“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4]696}由于交通不便,申公巫臣必须假道于莒国,辗转才能到达吴国。应该是申公巫臣于成公八年完成了出使的使命,成公九年晋国开始了与吴国的接触,史书记载晋人“会于蒲,将寻马陵之盟”^{[4]700},并且希望吴国能会盟,是行也,将始会吴”^{[4]700}。但是因为此时吴晋会盟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交通不便,“吴人不至”^{[4]700},

吴国没有参加此次盟会。

与晋国同时,吴国也作出了响应。成公七年,“吴伐郊,郊成”^{[4]687}童书业先生分析说:“伐郊之役,盖欲启通晋之道,与上国九盟会,非欲侵犯中原也。——成八年晋、齐、鲁、邾四国伐郊,传曰:‘晋士燮来聘,言伐郊也,以其事吴故。’此说可疑。晋何至远与吴争东夷之小国?且郊近于鲁,郊服于吴,在鲁为威胁,又何以:‘公赂之,请缓师’乎?”^{[5]179}童先生指出了《左传》记载的前后矛盾,并且联系后文成公八年晋等国伐郊,是作为当时盟主的晋国响应吴国伐郊,真正目的也是通吴。

整个成公时期,吴晋两国不断的与楚国进行大大小小的战争,努力打开两国的通道。在成公十五年,“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鮥、郑人会吴于钟离”^{[4]737},吴国第一次与中原国会盟。但此时吴晋间的交通线并不畅通。

徐州自古至今都是交通枢纽,这里汴泗交流,山岗四合,接齐鲁之疆,通楚梁之道”^{[6]5601},是吴地北上的交通要地,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四省交界处。吴晋往来必经彭城(今江苏徐州)^{ru卷六中“徐州府·条”},此时彭城属于宋国。成公十八年到襄公元年,楚晋两国展开了争夺宋彭城的战争。

《左传》对这次战事的记载如下:

(成公十八年)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郑。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郭,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成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日“归”。以恶日复入。宋人患之,西4a吾曰:“何也?若楚人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关。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非吾

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4]789}

……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4]792}

……

(襄公)元年春己亥，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谓之宋志。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4]793}

《史记·宋微子世家》简单的概括这次战争云：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8]1630}

战争起于楚试图控制宋彭城，晋帅各诸侯共救宋，最后晋国获胜，将彭城归于宋。宋是晋的盟国，彭城归宋，也就是属于晋的势力范围。彭城是吴晋交通的关键点之一，故宋西组吾云“惧吴晋”，楚有彭城必然使吴晋惧，“晋必恤之”，晋必然会救宋彭城。杜预说“楚封鱼石于彭城欲以绝吴晋之道”^{[4]791}，可谓一语中的。根据《史记》记载，季札出使来回都经过了徐地，也就是彭城一带。彭城对楚国也十分重要，史载彭城之役后，“楚失东夷”^{[4]1063}。

仅仅彭城还不够，吴晋两国还渐渐占领了彭城周围的一些小城，比较重要的有逼阳和祖。逼阳在今徐州市的沛县，黄池就在逼阳附近。《水经注》云：“(沛县)宋灭属楚，在泗水之滨，于秦为泗水郡治，黄水注之。黄水出小黄县黄乡黄沟。《国语》曰吴子会诸侯于黄池者也。”^{[9]890}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黄池当在今河南省封丘县南，济水故道南岸。”^{[10]1674}存疑。祖在逼阳附近(《春秋大事表·卷六中》“徐州府”条云：“沛县为春秋时逼阳国，与山东兗州府峄县南接界。”又云：“楚地亦在沛县境。”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年》注释“祖”云：“祖，楚地，今江苏邳县北面稍西之加口。”今沛县正在邳县之西北，两种解释其实是一样的。),《左传》对晋夺取逼阳的记载大略如下：

襄公十年(春秋经)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于祖。夏，五月甲午，遂灭逼阳。^{[4]863}

十年春，会于祖，会吴子寿梦也。……

夏四月戊午，会于祖。晋荀偃、士匄请伐逼阳，而封宋向戌焉。……

诸侯之师久于逼阳，荀偃、士匄请于荀偃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知伯怒，投之以机，……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帅卒攻逼阳，亲受矢石。

甲午，灭之。书曰“遂灭逼阳”，言自会也。以与向戌，向戌辞曰：……乃予宋公。^{[4]865-866}

这次战争灭逼阳以与宋，同襄公元年归彭城于宋一样，盖亦启通吴之路也。祖与逼阳相距很近，诸侯相会于祖，遂灭逼阳国，彭城一带都在晋国控制之下了。至此，吴晋之间的交通已经基本通畅，吴国与中原各国的军事和外交往来日益频繁，以吴王为代表的吴国上层更想与中原国家一较高下，参与争霸战争，成为华夏的一员。

经过成公、襄公时期，吴国和晋国几十年的努力，吴晋之间的交通终于通畅。吴国于襄公二十九年进行了一次大型的外交活动，就是季札出使上国。关于季札出使的历史记载很多，其中比较可信的是《左传》和《史记》。《左传》对此的记载基本如下：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
……^{[4]1120-1123}

《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季札出使过程的记载稍有不同，大略如下：

(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

……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

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於三家乎！”……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8]1452-1459}

结合《左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出使上国的基本路线是先北上徐国，然后适鲁，自鲁使齐，自齐如郑，去郑后适卫，最后自卫经戚邑使于晋，由晋反国，还是经过徐国，回到吴。

春秋晚期的徐国与当时的吴国关系密切，徐子章羽乃是吴出^[4]1242，昭公三十年被吴所灭，楚迁之于城父。一般说法把未迁的徐国定在今江苏省泗洪县南。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的说法前后不大一致，昭公四年注云：“徐国在今安徽省泗县西北五十里”^[10]1252。昭公六年注云：“徐国本在今江苏泗洪县南”^[10]1280。泗县与泗洪县相距甚近，都离徐州不远。《左传》云吴灭徐时“防山以水以水之”^[4]1586，决的应当是泗水（《春秋大事表》卷六中“泗州”条）。此时的徐国在泗水附近，而泗水在今泗阳附近，离泗洪也很近。《水经注》云：“泗水又东南运魏阳城北，城枕泗川。陆机《行思赋》曰：‘行魏阳之枉渚。故无魏阳，疑即泗阳县故城也。’”^[9]895徐国应当在今江苏省泗洪县南。

季札自卫如晋，《左传》记载经过了戚邑，而《史记》却说是宿邑。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太史公欲自为一家，事虽出左氏，文则随义而换。既以‘舍’字替‘宿’，遂误下‘宿’字替於‘戚’。戚既是邑名，理应不易。今宜读宿为‘戚’。戚，卫邑，孙文子旧所食地”^[8]1458。当是经戚邑，再西行至晋。戚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北而稍东。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春秋时期的多次会盟都在此举行，如成公十五年，晋、鲁、宋、郑、卫、齐等国同盟于戚^[4]736；襄公元年冬，以晋国为首的各诸侯国大夫又会盟于戚^[4]79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七之二云：“盖其地濒河西，据中国之要枢，不独卫之重地，亦晋、郑、吴、楚之孔道也。”^[7]1卷七之二 戚条

襄公二十九年时，吴都已迁之吴，今江苏苏州。季札出使的路线为：从吴出发，先至鲁都曲阜，再至临淄；由临淄至郑都，今新郑县，然后北行到卫都帝丘，今濮阳县，再由帝丘经戚邑至晋。

季札的这次外交活动，足迹遍及当时所有的中原大国，说明其时吴晋之间的陆路交通已经通畅，吴国的北上交通已经打通。季札出使是吴国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一次重要的交流。

以上探讨了春秋晚期吴国通往晋国的陆路交通线。关于吴国到晋国路线中吴楚交界地段的情况，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如石泉先生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其中《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从春秋吴楚边境战争看吴楚之间疆界所在》等文；谭其壤先生的《长水集》中《鄂君启节铭文释地》等文），本文不再论及。春秋晚期吴晋之间的交通已经相当发达，这对两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也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速了吴国的华夏化。

参考文献：

- [1]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M].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 [2] 谭其壤·长水集 [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3] 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集 [M]. 济南：齐鲁书社，1982.
- [4] 左丘明·春秋左传集解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5]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M]. 契图要览。南直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
- [7]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司马迁·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郦道元原著·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全译 [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 [1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这些成语因季子而来

周二中

2025年5月11日，江苏常州举办了纪念常州人文始祖季子诞辰日暨第十七个季子诚信日活动，来自江苏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一百多人参加活动。近年来，武进区、常州市、江苏省先后成立了季子文化研究会，开展了系列活动。

常州古称延陵。《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即季子）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季子与孔子齐名，被学术界称作“南季北孔”。季札留下的故事很多，在后世形成了诸多成语。

季札挂剑

又称“墓门挂剑”，是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指人注重信义。当年，季札出使晋国，途经徐国与徐君相见，徐君渴望得到季札腰间佩带的宝剑，因为吴国铸造的宝剑是非常有名的。但季札因要出使上国，没有佩剑很失礼，当时就没有给徐君，等他返回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感到失去了一个知音，就到徐君的墓地，祭拜之后摘下佩剑挂在墓地的封树上，然后离去。

叹为观止

典故最早出自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大意是：“功德达到顶点了！伟大啊，就像苍天无所不覆盖一样，像大地无所不承载一样！再盛大的德行，恐怕也不能比这再有所增加了。观赏就到这里吧！如果还有其他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写的是当时季札在鲁国欣赏各种乐舞，看到舜时的乐舞，十分赞叹，说看到这里就够了，其他的乐舞就不必看了。后指赞美所看到的事物好到极点，无与伦比。

自郐以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自郐以下无讥焉。”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于各诸侯国的乐曲都有评论，但从郐国以下他就没有再表示意见。比喻从某某以下就不值得评论。

秋风过耳

汉·赵晔《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最疼爱小儿子季札，他德才兼备最合适作君王，寿梦想传位给他。季札不愿接受，他说视荣华富贵像耳边的秋风一样。

一见如故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子“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说的是季札出使郑国之时，见到了子产。他们一见如故，就好像是多年的知心之交。形容初次相见就情投意合。

泱泱大风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季子）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指气魄宏大的大国风度。

燕巢于幕

指燕子在帷幕上筑巢，比喻处境非常危险。《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子“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披裘负薪

意思是穿着裘褐，背着柴薪，指志高行洁的隐士。典出东汉·王充《论衡·书虚》：“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故事说的是季子经常出使各国，见识广博，名气很大。他出使齐国时在路边发现一块金子，叫路边砍柴人去拣。没想砍柴人说我五月天还披着皮袄，背柴禾，像那种拣金子的人吗？季子感到遇到高人而非常愧愧。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理事）

季子赋

何建军

常州季子，人文始祖，季子名札，盛贤茂德，芳如牡丹，若般金银高贵，德被中华八方吟诵。

季子公子，周室皇族，吴国王嗣，贤忠惠达，为时国力强盛，吴公寿梦称王。力精图治，积劳成疾，吴王思虑传位，成虑国隆长存，终以兄终弟及，往及季札正位，季札不就，让位诸樊，太子摄行国政，受礼制而储正统。吴王寿梦，设贤置王，彼予礼制，晚曰诸樊，以贤者为君主，宏扬国威长盛久远。太子贤德，寿梦王薨，尊王遗愿，除服让位，季札称谢礼让，附议诚学曹公子臧不位宏德。二让王座，径位余昧，二王皆薨，三王余祭，复让季札，季札复遁，去其室至荆蛮，远离都城设新会。季札至常，隐居而作，余祭登位，找寻季札，密使寻得龙城，报以赤诚君子，擢封延陵季子，治邑奄城大得民丰，乡民笑颜以尊崇，识得让位贤心而奉德祖。皆遵父愿，中兴家国，诸樊余祭余昧，忠孝贤良感季札，吴国世子高义传家风。

季札三让，高风亮节，不作王者，以礼祖制，不乱朝纲，统位有序，自古贤者众多，后世当季子贤德为最。寿梦拓国，营都刊城，寿梦王薨，诸樊进位，大展雄心，重迁都城还原，建昔日宜国原都城，都城今境丹徒内，近距丹阳九里延陵镇。季札既遁，靠近京畿，绝非隐驻，远离都城，方余祭登基无忧，真乃智者贤者尊德者也。吴境大域，上至徐州，下达萧县，西容徽赣，季札治理延陵，不叛家国德铭钟鼎。

史记首载，吴伯世家，吴国先祖，泰伯三让，成就季历，贤者登位，开启周国大朝，贤德创八百年基业。三让至德，享誉华夏，尊立国信，树炳千秋万代，维唯精神传统之尊贵。大道礼让，三让为志，吴家祖孙，始出两贤，国之为傲，敬奉为神，道德精彩楷模，天下皆为之倾慕。国之师表，民之楷模，以身知退寓众，万世当皆依为至尊。延陵季子，闻吴王旨，出访诸国，听其音律，知其国政，见微知著，闻徐君喜佩剑，至徐君薨诚义挂剑坟台，以彰诚信天下。遵守仁者信义，唯是至德至理，孔老夫子，盛赞其德，享天地之正气，寓吴下里，教舜过山，后邑申港，尊奉祭祀，得宋两皇溢赞，祀封神位，尚敬三庙壹墓堂，称颂四海，耀德昭昭，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富有天子遗风。

始祖祥光，恒荐诚信，追千载今贺祀，二千六百周年，吉祥同庆喜，颂扬人文始祖三礼让。

一息尚存 誓死抗日

——武进籍抗联名将冯仲云抗战故事

肖 飞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光辉的历史时刻，本刊择选武进籍抗联名将冯仲云的几则抗战故事，以飨读者。

征鞍再跨震敌胆

1937年，日军铁蹄加速践踏华夏大地，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作为东北抗联的重要根据地，正承受着日本宪兵队、伪军与警察大队狂风骤雨般的频繁“讨伐”。

3月，冯仲云亲自参与指挥了震惊敌胆的冰趟子战斗，给予敌军的“讨伐”一个狠狠的打击。

3月初的小兴安岭，寒风如刀，冰雪覆盖着起伏的山峦，寒意刺骨。为了打破敌人的“讨伐”阴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率领骑兵及第六师张光迪部200余人，从汤原根据地出发，一路披星戴月，向着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区挺进，与第五师蔡近葵部会师。

部队刚刚安顿下来，紧急情报便如星火般传来：日伪军700余人已气势汹汹地进山“讨伐”，正朝着我军的方向猛扑过来。敌人前堵后追，企图将抗联部队围而歼之。

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赵尚志与冯仲云当机立断，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们心中形成——诱敌深入，山路设伏！两人迅速集合部队，趁着夜色的掩护，火速向通北东山里转移，一场精彩的伏击战即将拉开序幕。

赵尚志率领部队转移后，不出所料，一股敌人紧紧尾随而来。当部队行进到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险要之地时，赵尚志立刻命令六师一部20余名战士，在山路前方充当诱饵，引诱敌人深入。同时，又带领其他部队，在山路两旁的半腰处埋伏下来，只等敌人进入“口袋”。

没过多久，只见前方出现一长串马爬犁的队伍，马爬犁上竟然有100余名日军。当这股日军的马爬犁队伍缓缓进入抗联战士的伏击射程时，随着一声令下，

“砰！砰！砰！”清脆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山林。刹那间，马爬犁上的日军应声倒地，人仰马翻，场面一片混乱。敌人为了寻找掩护，纷纷滚下爬犁，趴在冰冷的雪地上，拼命地向抗联阵地射击。

战斗打响一段时间后，狡猾的日本鬼子发现我军火力似乎并不猛烈，误以为我军兵力薄弱，便集中力量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抗联战士们沉着应对，边打边撤，如同牵着风筝的线，巧妙地将日军引入山腰处的伏击圈。

赵尚志站在高处，看到一群群气势汹汹的日伪军正朝着陷阱冲来，他猛地一声怒吼：“打！”瞬间，4挺机枪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子弹如狂风骤雨般射向日军阵地。鬼子兵们猝不及防，纷纷倒地，死伤惨重。

敌人见势不妙，慌忙调转方向，仓惶逃窜。此役，日军一大尉军官当场被击毙，死伤30余人，抗联战士们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毛毯等物资，首战告捷！

胜利的喜悦并未让赵尚志和冯仲云放松警惕，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判断敌人绝不会甘心失败，必定会调集大批军队前来反扑报复。于是，他们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前进，甩开敌人，转移至冰趟子，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

“冰趟子”坐落在今黑龙江省冰趟子林场境内。此处群山巍峨，林海茫茫，冬季里山泉凝结成冰，层层叠叠，宛如天然的冰雕屏障。在坡上的山路旁，坐落着4座大木营，每座屋子都能容纳一二百人，原本是来往山里的车马店。

赵尚志在木营里召开了军事会议，他目光坚定地对大家说：“这4座大木营结构坚固，非常适合固守；沟的两侧是茂密的山林，可以设下伏兵；沟口狭窄，既能截断敌人的退路，又能阻击敌人的援兵。总而言之，这里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战场！”

冯仲云完全同意赵尚志的判断，他认为在这里再布置一个“口袋阵”，一定能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让日本鬼子再一次尝尝抗联战士的铁拳。

3月7日傍晚，日军竹内部队的守田大尉率领日伪

军700余人，沿着山沟口向“冰趟子”木营逼近。首先进入抗联伏击射程的是一群伪军，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抗联战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紧接着，200名日军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如同饿狼般向木营猛扑过来，山路和冰层上密密麻麻全是敌人。

关键时刻，我军6挺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如同雨点般射向敌群，手榴弹也纷纷在敌群中爆炸。冰趟子的冰面又厚又滑，日军穿着笨重的大头鞋，行动极为不便，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在地。他们刚想向前冲锋，就在冰面上失去平衡，人仰马翻，场面十分滑稽。

沟里冰趟子上的敌人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有的甚至掉头就跑。日军指挥官见状，狂舞战刀，声嘶力竭地命令士兵冲锋，但日军在冰面上行走艰难，自顾不暇，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进攻。

为了牵制敌人，减轻正面部队的压力，冯仲云与郝贵林各带领一支小分队，从两侧密林和北部河沟中杀出，如同两把尖刀，拦腰突袭敌人。然而，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依然集中力量攻打正面木营。

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气温急剧下降，枪支被冻得无法正常使用，战士们的手指也冻得麻木，几乎无法弯曲扣动扳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就轮流到木营屋内的火炉旁烤手、烤枪，然后又立刻回到战场，继续投入战斗，没有一个人退缩。

夜幕渐渐降临，趴在冰雪中的日本兵被冻得瑟瑟发抖，早已失去了战斗力，加上冰面湿滑，他们不敢再向前推进，枪声逐渐稀疏下来。此时，赵尚志判断敌人即将撤退，于是命令部队加强沟口的阻击力量。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停止了攻击，开始狼狈撤退。抗联战士们在沟口处与敌人展开激战，又杀伤了大批日伪军。

这次冰趟子战斗，抗联部队共击毙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其中日军守田大尉、津田庆一准尉、曹长高山五朗、天野松治、伍长三井勇三等多名军官被击毙。我军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马匹、粮油、服装、军毯等军用物资，而抗联牺牲7人。

这次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志，充分彰显了赵尚志、冯仲云卓越的军事智慧、指挥才能，也是抗联斗争史上敌众我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踏破冰崖归军营

1940年3月下旬，小兴安岭的早春宛如一张残酷

的双重面孔。阳坡积雪的边缘，金黄色的冰凌花倔强地顶开薄冰，山雀于新绿的枝桠间欢快跳跃、婉转鸣唱，传递着春的讯息；然而，背阴之处却依旧被数尺深的积雪重重覆盖，雪粒与冰水相互交融，人踩上去，恰似陷入黏腻的泥浆，每迈出一步，都需耗费双倍的气力。

就在这般时节，冯仲云毅然率领30余名游击队员，身着缴获而来的日军军装，迎着凛冽刺骨的江风，艰难地从苏联波亚尔科夫秘密踏上返回东北的征程。队员们的脸庞，因长期露营，被烟火熏烤得黝黑，长发纠结成毡，凌乱不堪。

冯仲云要带领这支队伍翻越高耸的小兴安岭峰顶，前往西麓，踏上几百里荒无人烟的艰难路程，去寻觅三路军指挥部的踪迹。每个人的背囊之中，都装着40斤粮食，再加上枪支弹药，弯腰前行之际，宛如一座座缓缓移动的小山。

在阴坡的雪地里，他们常常不得不手脚并用，膝盖深陷湿雪，直至大腿部位，每当起身，雪块便簌簌掉落，露出已然磨破的裤管以及冻得发紫的皮肤。夜幕降临，小兴安岭的春夜气温依旧在零下30度左右。树林里燃起的篝火，成为众人唯一的温暖依靠。队员们将枯枝落叶堆积起来，权当作“床铺”，五六个人紧紧挤在篝火旁。

冯仲云总是最后一个休息，他借助篝火那微弱的光亮，仔细查看地图，与队长反复敲定岗哨的位置，精心制订第二天的行军计划。到了午夜时分，他又挨个唤醒沉睡的队员，生怕他们在低温之下，因久坐不动而冻坏肢体。

行军至第四日，当队伍在小柞树岗稍作休整时，岗哨突然急切报告：“远处有穿皮袍的骑马者！”刹那间，所有人神经紧绷，那极有可能是被日军收买的鄂伦春炮手队。这些山林猎手组成的伪军武装，对地形了如指掌，枪法精准绝伦，对于负重前行的抗联队伍而言，无疑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冯仲云当机立断，果断下令“轻装急行”。然而，队伍尚未走出5里地，对面山梁便骤然传来密集的枪声。

冯仲云一面迅速组织反击，一面有条不紊地指挥撤退。子弹“嗖嗖”地擦着头皮飞过，转瞬之间，就有几个队员不幸死伤。

突然，战士老郝重重栽倒在冯仲云脚边，鲜血迅速浸透了他的棉裤。冯仲云毫不犹豫，一把将老郝背到背上，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撤退。

老郝的鲜血，洒在冯仲云的衣服上，又滴落至

地下，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殷红斑斓的血迹。“政委，放下我！”老郝剧烈地咳嗽着，温热的血滴落在冯仲云的脖子上，“你们能活着到指挥部，就是我的胜利！永别了……”话音刚落，他突然伸手夺过冯仲云腰间的手枪，随着一声沉闷枪响，身体重重坠落在雪地上。

经过一番激烈对射，队伍终于撤了下来，继续踏上赶路的征程。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完全凭借着手和脚摸索着前行。前面战士脖子上系着的白手巾，便成了后一个战士唯一的路标。他们穿过茂密厚重的森林，又遭遇一片塔头甸子，积水没过膝盖，腐烂的草根在水下悄然形成一个个危险的陷阱，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泥沼之中。

一脚高一脚低，愈发增添了行军的疲惫，几个受轻伤的战士，已然无力再向前走。众人挣扎了半夜，大约走了20来里地，无论如何，都再也没有前行的力气了。

不料，前方突然发现了篝火闪烁的火光。冯仲云迅速集合大家商议，在这深山密林之中，断然不会有其他队伍，判断必定是白天前来袭击的炮手队又绕到了前面。他们是马队，行动迅速，倘若不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就难以摆脱他们的纠缠。

冯仲云当机立断，决定把伤员和女同志隐蔽在一个小沟里，自己则带领其余20多个战士，卸下负载，悄然摸到篝火旁边。

第二天凌晨三点，当第一缕晨光悄然爬上枪托之时，战士们猛然跃起，端起机关枪疯狂扫射，手榴弹在敌群之中炸开，绽放出朵朵夺命火花。睡梦中的炮手队，根本来不及反抗，大部分被当场歼灭，残敌匆忙骑马逃窜，而他们留下的马匹，成为了转移伤员的关键所在。

队伍继续艰难行进，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岗，越过一条又一条沟壑。依据水流方向的变化，有人判断，已然越过了小兴安岭的峰顶，抵达小兴安岭西坡。然而，令人忧心忡忡的是，队伍此时已断粮三日。树皮被啃食得干干净净，有的战士甚至饿倒在地。战马杀光之后，猎手冒险射杀的一只黑熊，成为了大家的救命粮。幸运的是，猎手还惊喜地发现了新的脚印：“对面山上有三四十人走过的痕迹！”

在这样的深山之中，怎会无端出现脚印，必然有其来路。冯仲云让猎手在前面追踪，自己则带领部队随后紧紧追索前进。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前行了20多里，便惊喜地看到前面有部队。一番

对话之后，得知他们正是三路军指挥部的人员。

历经艰苦卓绝的21天行军，目的终于达成。当队伍在木沟河畔看到三路军指挥部的篝火时，战士们激动得相拥而泣。冯仲云和李兆麟这两位老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抗联血脉世代延

1935年深冬，东北大地被战火与酷寒双重撕裂。

11岁的朝鲜族女孩李小花蜷缩在汤原县梧桐河畔的红松树下，破旧的朝鲜族长裙被荆棘划出道道裂口，沾满泥雪的布鞋早已磨穿鞋底。这个生于1924年的女孩，刚刚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父母与兄长作为抗日志士，在与日寇的激战中相继牺牲。后来，她遭到敌人追捕，只能整天躲进深山之间。这时，65岁的中共地下交通员李升路过这里，得知她的身世后，牵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抗联营地。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冯仲云作为抗联的首长，正在营地为部队的战略转移和物资筹备忙碌着。他一看到小花，心中一阵刺痛，当即坚定地说：“这是烈士的血脉，我们必须护她周全。”

他解下自己的粗布军大衣，轻轻披在小花肩头：“孩子，就跟着我们走吧。”那一刻，寒风中颤抖的小身躯，第一次感受到超越血缘的温暖。就这样，李小花成为了抗联队伍中最小的成员。

初入部队的李小花如受惊的小鹿，整日抱着父母遗留的铜顶针沉默不语。冯仲云和抗联战士们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她如何在寒冷的冬天搭建简易的窝棚，抵御风雪。在行军间隙，用烧焦的木棍在桦树皮上教她写字，还将缴获的日寇罐头省下来给她补身体。

每当夜幕降临，冯仲云总会坐在篝火旁，为她讲那些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战的英雄故事，对她说：“孩子，你看这长白山的雪，看似柔弱，却能压垮侵略者的脊梁。”

慢慢地，李小花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她开始主动融入抗联的生活，李小花开始主动为战士们缝补磨破的棉袄，用朝鲜语唱起《阿里郎》为大家提振士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小花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坚韧和勇敢。她跟随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更令人惊叹的是，她凭借朝鲜族对山林的敏锐直觉，多次在巡逻中发现敌人踪迹。

1936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李小花在营地附近巡逻时，她敏锐地发现了灌木丛中几根折断的树枝和新鲜的马蹄印，判断这是日寇侦察兵留下的痕迹。她立刻

飞奔回营地，向冯仲云报信：“冯叔叔，有敌人！”

冯仲云迅速组织队伍转移，可狡猾的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在激烈的战斗中，抗联队伍被压制在一个山谷里，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时，李小花主动请缨：“冯叔叔，我知道野猪岭有条隐秘山道，能引开敌人！”冯仲云看着李小花坚定的眼神，果断点了点头。

李小花带着几颗自制的土炸弹，沿着陡峭的山路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她故意在落叶堆中踩出声响，成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20多个日军紧追不舍，李小花在山林间灵活穿梭，时而将土炸弹投向敌人，时而利用地形隐藏自己。当她终于甩开敌人，浑身是伤地回到营地时，战士们纷纷围上来，眼中满是心疼与敬佩。

从那以后，冯仲云决定亲自指导李小花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她不知摔倒了多少次，身上布满了伤痕，但每次她都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坚持。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父母报仇，为被日寇残害的同胞们讨回公道。

在一次攀岩训练中，李小花不慎从三丈高的崖壁坠落，被树枝挂住时已昏迷不醒。冯仲云背着她狂奔两里路赶到卫生室，让军医抢救。李小花慢慢苏醒了，她一看到冯仲云，便用微弱而真切声音喊道：

“阿爸吉……阿爸吉（朝鲜语对父亲的称呼）！”这位铁血汉子眼眶泛红：“傻丫头，你若有事，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小姑娘却扯着他的袖口坚定地说：“阿爸吉，不怕，我还要为爸爸妈妈报仇，还要打鬼子！”

从此，李小花与冯仲云单处时，总时亲切地喊他“阿爸吉”，冯仲云也像对待亲女儿一样精心照顾她，要将李小花培养成一名真正的抗联战士。

冯仲云深知烈士子女的成长需要特殊关怀，他将李小花安排在抗联第六军被服厂工作，既保证她的安全，又让她在集体中接受锻炼。在这里，她学会了用柞蚕丝缝制军服，为伤员清洗包扎伤口，还参与设计了抗联标志性的八角帽，帽檐上的红布星，是她用母亲遗留的红头绳一针一线绣成。时任被服厂厂长的裴成春常夸她：“这丫头的手比银针还巧，心比炭火还热！”

1938年11月的雪夜，李小花和抗联六军被服厂及后方医院转移，不巧在宝清县张家窑子与敌人遭遇。激战中，抗联首长及被服厂厂长英勇牺牲，李小花躲在雪坑里才逃过一劫。

此时天寒地冻，在漆黑的夜里无法辨别方向，李

小花忍受着饥饿和严寒的折磨，经过整整3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抗联第六军第四师的驻地，当战士们看到这个满身冰碴、怀里紧抱缝纫机零件的小姑娘时，无不为之动容。

这场惨烈的战斗让李小花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也更加坚定了抗日决心。此后，她主动申请加入战斗部队，冯仲云批准了她的请求，并安排经验丰富的老战士对她进行枪械、战术等严格的军事训练。

1940年，冯仲云选派李小花到苏联远东的抗联教导旅接受特种训练。在这里，李小花系统学习了武器操作、滑雪、跳伞、无线电通讯等技能，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特种兵。训练期间，冯仲云作为抗联代表多次前往苏联，他特别嘱咐教官：“李小花是烈士后代，要严格要求，但也要保护好她。”

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她攀爬数十米高的木制跳台，从最初双腿颤抖到能在千米高空冷静开伞。第一次实跳时，运输机引擎轰鸣着掠过雪原，她深吸一口气跃出机舱，当伞花在蓝天绽放的瞬间，脑海中浮现的是冯仲云临行前的叮嘱：“记住，你背后是四万万同胞的期待。”

这样训练了5天后，女兵们进行了登机跳伞。运输机盘旋在千米高空上，轮到李小花时，她鼓足勇气跳出机舱，迅速拉开主伞，按照教练要求观察地面，掌握风向和落脚点，最后落地。跳伞成功了。

第二次3000米高空训练中，突发的鼻血染红了她的衣襟。为了不被教官发现停训，她悄悄用手套擦拭血迹，直到平稳落地才敢松开攥紧伞绳的手。苏联教官竖起大拇指：“中国小姑娘，哈拉少（好样的）！”最终，她以全优成绩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特种兵。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此时，李小花随教导旅空降至东北，执行破袭铁路、侦察敌情的任务。在一次渗透行动中，她身着日军军服潜入车站，用流利的日语骗过哨兵，成功将关东军军火运输路线图传回总部。当苏军坦克轰鸣着碾过她标注的铁路枢纽时，李小花终于用自己的方式为父母、为万千同胞报了仇。

战后，李小花常对晚辈说：“冯政委（冯仲云）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更教会我什么是信仰与忠诚。他常说，抗联战士倒下了，但精神不能倒！”这份精神传承，正是冯仲云对烈士子女最珍贵的培养，至今仍在白山黑水间回响。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恽逸群坚守“孤岛”，开启抗日宣传战新局面

顾祖年

1937年11月，经过“八一三”以后3个月的鏖战，上海战场突然沉寂下来。中国军队被迫向西撤退，上海四周尽陷敌手。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仍在中国人手里，但随即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岛”。

在恬静空旷的徐家汇路上，早已名满沪上新闻界的杰出报人恽逸群独自踽踽而行。他透过路边漫长的铁栅栏，看到对面中国地界上昔日商店林立、繁华热闹的南市，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然成为一片望不到头的废墟，心中不禁怒火中烧……

上海沦陷后，恽逸群的许多战友如夏衍、邹韬奋等抗日宣传的主力和救国会的负责人等都已经纷纷撤离到内地。昔日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突然偃旗息鼓，上海新闻界——中国新闻事业的摇篮面临着生死存亡。恽逸群因为是“上海通”，中共上海地下党要求他留下来继续战斗，以恢复、扩大抗日宣传阵地。

坚守孤岛，开启抗日宣传新局面

1937年11月底，上海民间出现了挂有外商旗号的第一张具有鲜明抗日立场的中文报纸——《华美晨报》，它的出现突然打破了中国军队西撤后抗日宣传舆论一时陷入沉寂、焦虑的气氛！甫过一个月，同样挂有外商旗号的《大美晚报》也办起了四开小型日报《大美报》。这两张洋商报都请来恽逸群担任主笔，恽逸群甚至兼任大美报副刊《早茶》的主编（两个月后由柯灵接任）。由于多数朋友离开了上海，恽逸群必须将两报的大部分评论担当下来，其余则邀约王任叔（巴人）、周木斋、戴湘云等友人撰写。由于不再做夜班编辑的工作，恽逸群每天一早就到报社上班，匆匆在马路边的小食摊上吃完早餐后，便回到写字间翻阅当天的报纸，开始构思撰写评论文章。恽逸群才思泉涌，往往不到半小时，一篇评论写就，几乎不须改动即可交付在一旁等候的排字工人。由于他的迅速高效而少有差错，恽逸群获得了“卷筒纸”的绰号，比喻他写稿像

印刷机上的卷筒纸一般既快速又连续不断。恽逸群每天撰写的评论，既有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和罪行，又有抨击日军在沦陷区推行“以华制华”、掠夺榨取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还有驳斥主张和侵略者“亲善”“和平”的种种汉奸谬论，甚至批判国民党为一党私利而搞摩擦、闹分裂的错误行径……在恽逸群的支持、参与鼓动下，私人经营的华美出版公司又出版了《华美周报》《华美非常时期丛书》，甚至开办起“华美广播电台”，通过出版物和强大的电波向江浙沪皖等省沦陷区人民，详细报道抗战消息，宣传介绍八路军和党的持久战略战术等。在这艰苦而忙碌的间隙，恽逸群还写作出版了《抗战国际知识》和《外蒙问题的考察》两本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帮助读者正确厘清复杂的国际形势。

一人身兼四五家报纸主笔总编，创造历史

由于恽逸群等一些坚持留下来的抗日文化人以一当十的艰苦努力，上海沦陷区的抗日宣传很快重又振作活跃起来，日寇企图扼杀上海抗日宣传的阴谋破产了。

《华美晨报》《大美报》利用英美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有效抵制日本人的压力，坚持开展抗日宣传的事实，大大鼓舞了留在“孤岛”的抗日报人。于是，抗日报人群起效仿，纷纷以高薪聘请洋人作“董事长”或“发行人”，向外国注册登记，开办起众多的“洋商报”。1938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开办了挂英商招牌的《每日译报》；接着，挂英商、美商招牌的《文汇报》《导报》《申报》等十多家报纸接踵问世。“孤岛”一时成了洋商报的天下，抗日宣传迅速蔓延扩大，抗日新局面也由此打开了。

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恽逸群以其抗日的坚定立场、卓越的文才、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抗战的统战工作特长，出众的能力，博得了新闻文化界人士的一致认同。恽逸群的担子更重了。他除了担任《华美》《大美》

两报的主笔外，又应邀担任《译报》和《导报》的总编辑、主笔，负责这四家报纸的全部评论和部分社论；同时为《循环报》组织部分评论。可以说，恽逸群把握、指挥着“孤岛”抗日宣传的主阵地。他每天发出的不是一颗炮弹，而是一排排炮弹轰向日寇和汉奸，沉重打击着他们的反动气焰，极大张扬鼓舞着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士气。恽逸群一人同时为五家报纸撰写评论，这种过人的精力、敏捷的文笔、渊博的学识，至今在中国新闻史上罕有而被新闻界传为美谈：他每天白天完成写稿的准备后，一到晚上，一家家报社的工友就骑了自行车到他家取稿了。恽逸群招呼来人稍等，随即展纸濡笔疾书，半小时左右即写就一篇，然后交来人带走，真可谓“倚马可待”。恽逸群住房狭仄，全家挤住一间客厅，有时他在写作时，几个女亲戚串门和他的妻子闲聊，免不了有叽叽喳喳的嘈杂声音，恽逸群照样精神专注而埋头于写作……一篇篇抗日檄文在恽逸群笔底下流出，射向敌寇的心脏。

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揭露汉奸汪精卫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沦陷后，日寇又放出劝降的“和平”空气，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借机散布“战必败，和未必乱”等求和言论，汪精卫又利用蒋介石以弱御强的“焦土抗战”策略在长沙大火处置上的失误，借题发挥，写文章指责焦土抗战是要把战区内、沦陷区内的东西都烧光，是要使“大家都变成大贫”，“使人与物质俱成灰烬”，而敌人“其困难决不如我之甚”云云。汪精卫的言论立即受到上海一些汉奸报的追捧并转载，说唯有“中日和平”才是唯一出路。恽逸群早就警觉到汪精卫屡次发表与抗战国策相悖的言论别有用心，看到他的文章受到汉奸们的捧场，觉得必须即刻站出来批驳，肃清其影响，于是在1938年11月24、25日连续两天在《导报》上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的评论。恽逸群指出：实行焦土抗战，原是因为中国还不能断绝日军的接济，为了不把自己的物资送给它白白受用，而采取的一种正确的战略战术。目的是为了陷敌于困境，从而加速其失败……汪精卫却说焦土抗战是要把一切都烧光，使大家“平等”，这显然是故意混淆曲解。汪精卫反对焦土抗战，“无疑就是反对抗战”……

恽逸群的这篇檄文，是全国第一篇公开揭露汪精卫汉奸嘴脸的文章，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汪精卫尚未公开投敌，仍是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重庆国民党中央宣部部长、汪精卫同伙周佛海大为

震怒，一面指责《导报》“曲解国策，自误误国”，一面责令上海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调查，要给予作者严厉“制裁”。

早已成为日伪暗害对象的恽逸群，得到中共地下党密报后，迅即携妻暂时躲到朋友家避难。虽然与外界断绝了来往，但他却一天也不放弃战斗，仍每天写出一篇篇评论，由自己的亲属外甥前去拿取，送往各个报社。

恽逸群的宏文《异哉汪精卫之言》发表不到一个月，汪精卫就逃离重庆，在越南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撕下伪装，彻底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恽逸群料事如神的洞察力，无所畏惧的胆略，受到上海新闻界的普遍赞誉，再次给予他“彗星”（意即“光芒四射”）的称号（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恽逸群公开预言“西安事变”必将和平解决，震惊舆论界）。

两次面对死亡威胁，临危不惧

对洋商报汹涌如潮的抗日宣传，日寇恼羞成怒，一面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驻沪陆海军头子向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取缔反日言论；一面组织汉奸特务对抗日报进行残酷镇压。仅在1938年1月、2月，《华美晨报》两次被特务投掷炸弹，接着《文汇报》《大美报》也受到炸弹袭击，不少报社员工倒在血泊之中。作为抗日宣传急先锋的恽逸群，自然是日寇汉奸欲加清除的主要目标。日寇向租界当局提出要求逮捕12位新闻界的抗日分子，恽逸群赫然名列。尽管租界当局没有理会接受，但侵略者猖狂至极——《社会日报》社长蔡鹤皋被日本特务暗杀，头颅甚至被悬挂在法租界一条马路的电线杆上；《华美晨报》《文汇报》分别收到装有血淋淋人手的“礼品盒”；恽逸群和许多记者、编辑都收到了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日寇企图以此以儆效尤。恽逸群和上海新闻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和威胁。

但是恐怖活动吓不到恽逸群。他依然紧握如椽之笔，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此时，上海妇女界领袖、共产党员茅丽瑛，著名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一批知名人士，因坚持抗日立场，拒绝被收买当汉奸，一个个遭日伪特务暗杀，倒在屠刀之下。恽逸群怀着极大的愤慨写下《悼刘湛恩博士》一文，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恐怖是卑怯的表现，屠杀是崩溃的先奏……刘湛恩博士的‘成仁’的唯一结果是……使中国人民格外认识清楚，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做奴隶，一条是做斗士……刘博士的死，

将感动无数中国人变成坚强英勇的斗士，促成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迅速到来……”恽逸群铿锵评论，不仅是悼念英勇牺牲的刘湛恩，也是表明他自己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汪逆投敌后，到了 1939 年，上海出现了恐怖活动高潮。著名的 76 号魔窟的几百个汪伪特务爪牙，腰别手枪、炸弹，每天公然大摇大摆地在租界内活动，租界巡捕不敢得罪，视而不见，各界抗日分子接连遭到绑架或暗杀。恽逸群的处境再次面临着危险。他又一次接到恐吓信，威胁他：如再发表抗日言论，定将“以武力制裁，炸弹与枪弹并来，不为言之不预也！”恽逸群每天上班的路上，都要事先写好遗嘱，怀揣在身，以防不测，住宿经常变换地址。恽逸群妻子劝告他赶快离沪，恽逸群却坚定地回答：“不到最后关头，我是不能走的……被特务吓倒，我们还当什么新闻记者！”

面对死亡威胁，恽逸群继续战斗不息。1939 年 4 月 22 日，恽逸群和几家抗日报的负责人商量后发表了《共同宣言》，郑重宣告：“我们决竭其全力反对侵略者及汉奸的活动。我们对于侵略者及汪逆羽党和一切汉奸的活动，决予以迎头痛击……”但是日本侵略者自恃武力，在指使汪伪特务投掷炸弹，绑架暗杀，加紧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对租界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强烈要求取缔抗日报纸。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委曲求全，以“宣传抗战，言论激烈”为由，勒令《译报》《导报》《文汇报》《大美报》停刊一周。

洋商报面临着生存的严重威胁。几家被迫停刊的报纸负责人不断聚会，商讨对策，恽逸群以坚定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今后的局势固然会更严重，但不能办大报，我们就办小报；不能办日报，我们就办刊物；一切都不能办，就办壁报。我们决不屈服……要和敌人斗下去！”这时，租界当局在日寇压力下宣布紧急戒严，断绝交通挨户搜查，实际是搜查抗日分子。恽逸群又提笔给尚未停刊的《华美晨报》写了《炸弹五百万》的评论，指出：“租界要搜炸弹，我们保证永远搜不完，因为租界上的炸弹有四百几十万，这些炸弹全藏在最秘密的地方，就是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心里的炸弹是永远搜不完的！”表达了共产党报人恽逸群宁死不屈，欲与日寇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恽逸群抗战的不屈经历，感动了夏衍

就在这抗日报纸和报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的夏衍，秘密来沪探望妻儿。在充满恐怖肃杀的气氛中，夏衍和恽逸群等分别相约在咖啡馆会晤。夏衍了解到恽逸群等一些抗日报人、文化人在“孤岛”舍生忘死、英勇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非常感动，回到桂林后，写了名为《心防》的剧本，反映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的战斗生活。剧中主人公刘浩如，在报社担任主笔，他带着妻儿在孤岛奋战，撰写抗日救国的评论，在敌伪追缉的情况下，怀揣遗嘱，随时准备牺牲，和敌人进行“韧性的战斗”。夏衍笔下的“刘浩如”，正是恽逸群原型的写照。

1939 年 5 月下旬，敌伪特务再次向《导报》投掷炸弹，这是对恽逸群的再度威吓和警告。恽逸群临危不惧，写了一篇评论《唯一的不安》，发表在次日的《导报》上。日寇、汪伪见威胁、恐吓无效，决定采取进一步的镇压行动。在《导报》被炸后几天，中共地下党领导紧急命令通知他：撤退转移到香港去。

随着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到 1939 年 5 月的 20 个月中，恽逸群以他的杰出才能，率领一批抗战报人在敌占区、在上海“孤岛”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和汪伪集团，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抒写了灿烂的篇章，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正如恽逸群在《孤军奋斗的二十个月——上海新闻界的战绩》一文中总结指出的：“在去年五月之前，上海两租界——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完全属于中国的，是中国的经济堡垒，是中国的文化堡垒，是东南游击区的政治堡垒。我们用什么力量守这个堡垒的呢？不是武力，更不是金钱，而是文化，说得具体一点是笔尖。在文化部门中成绩最著的是新闻、补习学校、戏剧三种，特别是新闻事业坚定了广大的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所以有人说，上海的几家报纸足抵二十万大军。从对敌人的威胁和维系沦陷区的人心上来说或许这个譬如并不夸大。”（载 1940 年《新闻记者》第二卷第六期）

是的，历史得到了证明：恽逸群等一批抗日报人，在“孤岛”举起的抗日宣传大旗已经载入了史册，几家报纸创造的辉煌业绩，足抵 20 万大军！

陆振轩，用生命开辟抗日交通运输线

许正宏

序言：八十载岁月峥嵘，血火记忆镌刻山河；九万里风鹏正举，镜头笔墨礼赞英魂。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以缅怀之名集结文化之力，以跨越时空的视觉叙事，奏响一曲壮怀激烈的山河壮歌。

展卷之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的再现，更是精神的传承，谨以此文向所有为反法西斯而战的先辈致敬，让历史的回响在锦绣山河间永续激荡。

你看过纪录片《1943 - 驮工日记》吗？你知道抗日战争最危难的时期，开辟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雪域高原人工驮道（人称“死亡之路”），把一批批国际援华军用物资，从印度运到新疆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吗？你能想象完成这项壮举的主要策划并亲力亲为的主人公，竟然是从武进雪堰走出的留法工科学子，一介文弱书生吗？你知道这件真实的传奇故事为什么被尘封了六十年吗？

求学报国 与邓小平同期跨出国门

陆振轩，1902

年6月出生在武进雪堰镇雅浦村的一个书香之家。他10岁父母双亡，由时任商务印书馆辞典部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百科辞书——《辞源》的伯父陆尔奎抚养长大。他先在雪堰镇道南小学堂读书。父亲去世后，被伯父接到上海，在伯父安排下，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接受西式教育。举人出身的伯父，同时成了他学习古文的最好老师，让陆振轩有了熟悉中西文化的优越条件。后来陆振轩考入上海大同学院学习。

大同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

严，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一心苦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决不允许学生从事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陆振轩，克制不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冲动，不顾校方禁令，走出校门，加入爱国学生运动，走上街头，参加反帝、反封建游行。后被校方知道。面对将要被处分的结果，他未待校方下达开除决定，便离校而去。

这时他伯父陆尔奎因主编《辞源》用眼过度，双目失明，无力再供养他。他便通过门房娘舅吴稚晖引荐，前往北宁铁路唐山机械厂当练习生，学习钳工等机械技术，独立谋生。

这时的吴稚晖，法国、中国两头跑，正在大力推行勤工俭学，倡导科学救国。这正好符合了陆振轩的意愿。吴稚晖看到这个外甥有远大的抱负，便帮助他实现了这个梦想，使陆振轩有幸与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起，同期跨出国门，追求科学文化和救国之道。

陆振轩在法国勤工俭学，整整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他在里昂中法大学、里昂中央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学业，获得了机电工程等工学学位；结识了同在法国留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罗振英。



▲陆振轩在法国里昂（前排右起第一人）

1931年，在法国工作不到一年的陆振轩，为了

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国家建设，毅然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副教授。两年后，应留法同学的邀请，他辞去教职，赴石家庄参加正太铁路的管理工作，任车务处副处长。

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沦陷。他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军的铁蹄蹂躏得满目疮痍，十分痛恨，加入了抗战队伍。他先后到湘桂铁路、安南铁路、滇越铁路从事军用物资的转运工作。

1938年，国民政府运输局在大后方成立最大的后方机构——西南运输处，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和进出口业务。陆振轩被委任为昆明运输事务所所长，专门接收从缅甸运来的军用物资，再转运到重庆、贵阳等地，每天接转汽车达数百辆之多，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后因工作出色，被擢升为滇缅公路运输局副局长。

周旋多国勘察转运路线

接受盟国援华抗战军用物资转运特使这个任务后，陆振轩时不我待，立即物色各有专长的6名年轻人组成一个7人核心团队，也即开辟西亚“丝绸之路”的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滞留在卡拉奇港口的军用物资，通过铁路转运至西亚伊朗边境城市沙海屯，再装上军用卡车，由公路向北，进入苏联土库曼斯坦边境城市阿什哈巴德，然后再换铁路至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阿拉木图与新疆边境的霍尔果斯有公路可以直通。

这些军用国际援华物资只要能够转运到霍尔果斯，那就可以穿过新疆的绿洲，通过公路运往中国内地。

1943年7月，陆振轩等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启程，前往西亚。当时从昆明到西亚伊朗没有直接航线，必须先到印度，再乘火车前往。而昆明到印度的航线要经过缅甸北部上空，缅甸当时已被日军占领，这条航线已经十分危险，但又没有其他办法。陆振轩等为了及时完成这项任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硬着头皮乘坐飞机冒险。

飞行员为了不被日军发现，驾驶飞机忽上忽下，有时飞得很低，几乎是贴近山脊在飞，稍有不慎就会撞上崇山峻岭，机毁人亡。就是这样，最终还是被日机发现盯上。

驾机的飞行员经验丰富，他沉着冷静，左冲右

突，最终摆脱了日机，飞入印度领空，安全地将他们送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机场。

陆振轩等下飞机后，便换乘火车，前往伊朗边境城市沙海屯。沙海屯为英国势力范围，在美国的斡旋下，中国已在那里挂起了印伊运输处牌子。

加尔各答到沙海屯的铁路相距2000多公里，在火车途中，他们要在几个城市换车。其中在新德里换车时，中国外交部驻印机构的负责人早已在那儿等候，向陆振轩等转达国内指示，要他们以最短的时间，在西亚办妥一切手续，争取尽快将抗日急需军用物资运回国内。

当时伊朗被进驻的英国、美国、苏联切割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反法西斯阵线，美英苏是同盟，但相互之间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又相互防范，都想扩展控制区。在卡拉奇滞留的援华军用物资，要想顺利经过英国、美国、苏联控制的地带，需要这三个国家的全力配合，办妥一切手续并派军用卡车转运。另外，还要伊朗（伊朗一直被西方殖民地控制，受西方舆论宣传，看不起中国）大力支持，方能把这些军用物资运到新疆边境霍尔果斯。可是事实上要想真正达到这个目的，非常困难，因为它不是由中方说了算。这三个国家应中方外交部门要求，在打交道磋商过程中，有的并没有按中国的意图予以积极支持，结果导致了明支持暗阻挠的局面。加上国民党对苏联有戒心，没有达成借道苏联转运的共识。最后宣告西亚“丝路”军运失败，国民政府只得令陆振轩等返回卡拉奇待命，另想办法。

突破重围冒死开创新路线

陆振轩从伊朗沙海屯回到印度卡拉奇后，心急如焚。特别是当他从收音机里得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半壁江山，太平洋战争十分激烈。国家灾难重重，前线急需要军用物资抗战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到处打听，整天思索着寻找另一种途径来替代西亚“丝路”，解决转运问题。他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无意间在英国人写的一本书中，发现从印度到新疆曾有两条路可通：一条是北道，还有一条是南道。北道就是曾经想要开辟的西亚“丝路”，南道是一条驮马人力古道，但这条古道充满着艰难险阻，从卡拉奇经克什米尔首府斯林那加到拉达克首府列城，然后翻越海拔六七千米，空气稀

薄、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才可以到达新疆叶城。

这条古道实际上很少有人行走，因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翻越喀喇昆仑山脉时，只有一些“白骨引路”的古痕迹，有人把这里比喻为死亡之道。它要通过三处海拔5240~5648米的山口，最险恶的山口汇集了11条冰川，驿道就在冰坡上。驿道在山谷中还要涉水而过，行走这条古道，随时都有可能献出生命。但这时的陆振轩已顾不上这些，他立刻向中国驻印大使馆查询，确认这条古道是否真的存在。出乎他意料的是，大使馆竟不知道有这条古道。

陆振轩不等有关方面去核实，就马上向国内交通部报告，提出请求让自己带队，去尝试踏勘探路，开启这条通道。

这时交通部正为西亚“丝路”开通失败而发愁，得知陆振轩发现了这个古道信息后，不管是否能够成功，便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委他以交通部公路总局驻印代表的身份，全权负责办理物资的调拨和运输，并让他顺道踏勘沿线的气候等状况，以供今后修筑公路参考。

这条南道“丝路”，全长2959公里。从卡拉奇港口到列城有2200多公里，有铁路、公路和驮道相通。印度在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下，驮道也修得很好，有两米多宽，而从印度列城至新疆叶城，因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人工修筑的驿道很少，只有靠“白骨引路”。英国虽与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经陆振轩与英方再三协商，英方也只肯负责卡拉奇至列城的转运，其余六七百公里古道运输由中方自行解决。

陆振轩面对这个现实，决定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意志与自然环境挑战。随后他便以交通部名义，与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取得了联系，让新疆派驮马从叶城到列城接运。

新疆方面予以积极配合，根据陆振轩提出的方案，物色了祖孙三代都从事驮工、在少数民族中人缘较好且很有威信的叶城人木沙，任驮队总领队；在喀什、和田、克孜勒苏三个地区筹集了1000余匹骆驼、马匹；招募了180多名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驮工，备足了往返途中人、畜生活必备的粮草。驮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艰难跋涉到达了列城，沿路把返回需要食用的馕（新疆面包）、羊

肉干等食物埋在石头之中，并做好标记。

当他们到达列城时，大批军用抗战物资已从卡拉奇运抵这里等候。陆振轩等马上指挥驮工把国内数百辆瘫痪在公路上急需要替换的军用卡车轮胎、汽车配件和英国空军制服呢料等，装上驮马上路。



▲装载了轮胎等军用物资的骆驼

冰川险途挑战生命极限

1944年10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后，陆振轩率领的首趟运送抗战物资的驮队开始正式出发，踏上了崎岖的返国路途。这是一次重要的试运，关系到能否打开这条通道，能否挫败日军的封锁。临行前，陆振轩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记录踏勘笔记，为后续驮队运输做好铺垫。

一路上，这支驮队充满了艰险和曲折，陆振轩在《1943-驮工日记》中真实详细地记录了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壮的雪域高原人力运输故事。

10月以后的喜马拉雅山脉，天气已经寒冷刺骨。生长在江南的陆振轩等一批青年，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磨难，每天与长期生活在野外的少数民族驮工一起，行走在高山冰川险道上。有的地方，所谓的道就在悬崖上凿出仅能一匹驮马小心通过的脚印，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河流，牵马走过，一不留神就会滑入巨壑深沟。

途中无数的考验，都被陆振轩记录在“日记”之中：

.....

第四天，“山麓越走越陡，坡度足有35度以上，走这条路比我想像的难度要大得多。这里空气稀薄，气喘头痛，驮马双腿打滑，路上出现了不少死伤的驮马”。

第五天，“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驮队走得非

常慢。经测算，我们的驮队每小时只能走三里路。旭要克河涨水，流速湍急，驮队根本过不去，我们只能沿山腰凿空的旱道盘旋着爬行”。

第七天，“卡尔东到班登塞山麓，两边都是峭壁。盘山的牧道，共有35个弯。沿途看到的白骨越来越多。木沙告诉我，一般由叶城来的驮队走到这里已经疲劳不堪，返回时驮马十有一二要死在这里”。

驮队中，每个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特别是陆振轩等从江南来的队员，反应最大，话都说不出，蹦出一个字，大家都感到胸闷、乏力，气喘接不上来，迈几步必须停顿休息一下。

陆振轩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驮队中没有人再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木沙开玩笑说，我是重点保护对象，只要我能扛得住，就没有问题。”

第十二天，驮队到了海拔5368米的西塞拉山口。“离西塞拉山口越来越近，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沿途可见血迹斑斑，木沙说：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它的鼻子出血，给它减压才行”。

西塞拉，是翻越昆仑冰山的行旅者公认的最险要的地段。西塞拉山口两面都被海拔7450米以上的雪峰夹击包围着，北面直接与世界第二高峰、海拔

8611米的乔格里峰相连，是驮队最难走的一段路。

陆振轩在日记中写道：“过西塞拉山口没有起风，眼前却白茫茫的一片，木沙说，这就是雪雾。冰川在光线的照射下发出刺人的白光，使人的眼睛涩涩发疼根本睁不开。行走在冰凌上，人的眼前不时出现黑晕，我们赶忙戴上了保护镜，驮工们也赶快用牦牛毛绑在眼镜上保护自己的眼睛。据说一些过此地被雪光刺伤眼睛的驮工，就得了‘雪盲’症，下山后就不能再做驮工了。驮马在冰川上行走，双腿打滑，马腿别在冰洞里很容易折断，在刺骨的寒风中，人被风吹得站不稳，驮马队不敢停留。”经验丰富的驮工对陆振轩说，在这里停留，人和马就会被冻僵，稍不留意就会被卷着雪花呼啸而过的狂风冻死。

在极度缺氧和极度的严寒中，一些驮工开始有丧失意识的感觉，出现幻听、幻觉，还有一些驮工在风雪中不知去向。沿路所看到的众多人马白骨就是以前的驮队“前赴后继”不知去向留下的遗迹。

陆振轩率领的驮队翻过西塞拉山口后经盘点，损失惨重，一下子死伤了60多匹驮马、数十个驮工。

接着，他们继续向前走，沿途白骨累累。驮工头领即把这些白骨当着向导路标，领着饥寒疲惫的驮队沿“之”字形盘山而上。一路上石片硌脚，脚上的鞋都被磨破了，露出了脚趾，脚上的血泡被冻得钻心般刺骨。这种煎熬，烙在脑海之中，一生无法忘怀。

当他们艰难地登上喀喇昆仑山口后，尽管海拔很高，缺氧、疲惫，但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们即将跨入国门。

同时也让陆振轩从亲眼看见中产生了万分的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走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自小父母双亡，依靠叔父长大，为了民族之兴旺，早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为了寻求救国之出路，我到法国求学。在国外我不愿意学外语，觉得那是做洋奴的材料，选学了铁路交通。今天在这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我们这些流亡学子不知家在何处，国在何方，今天在这昆仑雪域之巅，我没有看到中国的边防军人出现。这次驮队拉运抗战物资，木沙他



▲驮队艰难地行进中

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944年11月8日，驮队开始翻越桑株达坂。“西边乌云慢慢地压到了达坂上，刚刚还晴朗的天空，顿时开始变成黑压压的一片。看着半边乌云弥漫的天空和疲劳不堪的驮队，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袭来，结果一个让人最悲痛的意外发生了……”

就在这一天，陆振轩最倚重的驮工总领队木沙在攀爬第一个山梁时，由于高度缺氧和身体衰弱，年过50的他不幸摔倒在数米落差的岩石上，当场昏迷过去。陆振轩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抢救，但结果是回天无术，木沙再也没有醒过来。陆振轩非常悲痛，这时雪越下越大，前面催他们赶快下山，否则会发生更多意想不到的危险。陆振轩守着木沙的尸体，迟迟不肯离开，他告诫同伴：“假如我也倒下了，就算我为抗战做过最后的努力，但是轮胎一定要运出去，踏探纪录一定要带回去。”

最后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助，在这条死亡线上又跋涉了几十道河流险滩，走过了漫漫戈壁荒原，先后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将这批抗战物资安全运达新疆叶城。



▲从列城到叶城，驮队运输线路图

陆振轩带领的驮队，在日军严密封锁的最艰难时刻，自告奋勇，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不畏艰辛，徒步茫茫雪域、悬崖峭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开辟了一条人力运输通道，突破日军封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和奇迹。由他们徒步踏勘开辟的这条南道“丝路”，以后源

源不断将外援军用物资从印度运回中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先后为中国共运进了6600条轮胎、782包布匹、588件经济布装油袋、63捆呢料和多套汽车零部件和医疗器材等抗战紧缺物资。其中一部分运进了关内，一部分运给了驻扎在兰州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他们克服千难万险，在莽莽昆仑之巅，挑战极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抗战功臣 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

抗战胜利后，陆振轩曾任湘桂黔铁路局和粤汉铁路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留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

陆振轩受他伯父的教育和吴稚晖的影响，从小有报国之志，性格也十分活泼开朗。因为心直口快，其身份又是“留用人员”，所以在1957年也遭到不公正待遇。1958年从铁路局的领导岗位调出，去了广东机械学院机械系当了一名教师。至于后来在1965年调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其实也并非用了他的工科专长。这一切他从未耿耿于怀，只是在安排他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他看来，当初那么多的人为了民族解放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像他这样的幸存者已是幸运儿，这点挫折已算不了什么。后来落实政策，组织上给他分配住房，有山边的独栋复式小楼和三房一厅的公寓单元房可供挑选，他选择了后者，有人说他傻，可他却说住公寓楼可以接触更多的人，热闹。改革开放以后，他当了广东省政协委员，他的亲友中也有对他的事迹略知一二的，多少人劝他就抗战时期开辟印度到新疆的驮道并冒死转运抗战物资的经历书写回忆录，他就是不肯，并说做那些事都是凭良心做的，也是自愿做的，不值得宣扬。

20世纪80年代，陆振轩和他的夫人罗振英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十多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奖学金，（取他们夫妇俩名字中共同的一个字，命名为“双振奖”）。对于当时没有额外收入的教授来说，这已是他们所有的积蓄了。

1999年陆振轩教授逝世以后，他的亲友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他当年的日记，自此，那一段鲜为人知差点淹没在历史时空的传奇经历才得以发现。

（作者系武进区南宅实验学校教师）

一本族谱上的131名抗战先辈

黄浩璐 郑雨露 仇松强 王悦 尹清扬

“伯坤系孟城西门人，1907年生，1939年3月参加新四军，同年入党，1942年牺牲。”在《巢氏宗谱》第八版，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缅怀投军抗日的巢氏先辈。据统计，当年，毗陵巢氏共有131人投军抗日，其中17人在战斗中牺牲。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8月2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记者走访了位于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的巢文化园，聆听巢氏先辈的抗战故事，感受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回响。

忠烈辈出

西夏墅镇丽江社区居民巢苏福是毗陵巢氏第27世孙，他来自一个“全员抗日之家”。“我太爷爷巢梓培生育了10个儿子，其中6人先后参加新四军，另外4人协助做地下工作。”十兄弟中，排行第五的巢钧芳、第六的巢钧定最终将生命定格在战场上。

十兄弟中最小的巢凤翥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还专门撰写了回忆录。巢凤翥在回忆录中描述道：“日本兵入侵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各级政府的撤退，导致了社会上的混乱。”眼见

国家多难，原本在私塾当教师的巢凤翥毅然弃文从戎，加入管文蔚组织的抗日武装。“管文蔚和他领导的组织，不仅活动活跃，群众反响也很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巢凤翥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将巢钧芳、巢钧定两位烈士的孩子抚养成人。

抗战期间，孟河、西夏墅及周边地区的日寇活动比较频繁。面对严峻的形势，当地军民不畏强敌，机智勇敢地与日寇进行着殊死搏斗。

在巢氏家族中，“上阵父子兵”的抗日故事一个接一个。“我家共有4个人参加抗日战争，我的父亲巢中、叔叔巢正，以及两位哥哥。”今年78岁的巢克让回忆道，叔叔巢正面遭遇日寇，把藏在胸口的手榴弹掏出，和日寇同归于尽。当时，巢正才20多岁。

抗日之家，满门忠勇志士。“经统计，有131名毗陵巢氏宗亲参加抗日战争，并且都得到了史料印证。”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会长巢杏松说，在辽宁、浙江、广西各地都有巢氏先辈战斗的故事。

血脉赓续

家谱，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血脉赓续、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

在孟河，巢氏是大姓，孟河也因此有“巢半城”的雅称。常州巢氏发源于北宋末年，在定居生息中形成一个大家族，且名人



辈出。常州古称毗陵，常州和无锡江阴一带的巢氏也被称为毗陵巢氏。时至今日，毗陵巢氏仍是全国巢姓人口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014年，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着手修订第八版《巢氏宗谱》，并于2017年完成。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巢全庆告诉记者：“修族谱时，我们就注意到，有非常多的宗亲投军抗日。”

特殊的时间节点，总能唤起深沉的民族记忆。今年，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将重点放在了帮抗战英雄建档立传上。巢杏松说：“这是为了给后人保留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据统计，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毗陵巢氏有41名战士英勇牺牲。

“这些史料，是滚烫的血，是民族的魂。”巢全庆说，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出抗战英雄，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工作人员靠着“铁脚板”一家家跑；为了确保史料真实，工作人员在档案馆、图书馆，一项项求证。

根据收集到的珍贵素材，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制作了展板，陈列在研究会中。“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始终牢记先辈的抗战事迹，学习他们伟大的抗战精神。”巢杏松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那些家国情怀、峥嵘岁月，时至今日依然触动人心。巢苏福说，每当想到爷爷那一辈十兄弟齐抗战的事迹，心里总是既难过又自豪，“虽然他们只是历史中普通的一员，但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歌颂、传承。”

传承之路

巢家也是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以巢崇山、巢渭芳为代表，最早可追溯至隋朝太医博士巢元芳。

“从巢渭芳到其长子巢少芳、孙子巢念祖、孙女巢文瑾、曾孙巢重庆，4代人，都在家乡孟河从医，这是非常少见的。”巢全庆说。

“成己成人”“积德积善”，巢杏松至今仍记得，爷爷奶奶和父母亲从小就和他强调毗陵巢氏的家风家训。出生于1952年的他，历经打拼，成为中国药用玻璃行业领军人。半百之后，他跨界再出发，先后组建德尔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双峰中草药科技有限公司，只为弥补国内中草药市场的短板。

在双峰中草药科技有限公司孟河基地的实验室，不锈钢层架上摆着统一的小玻璃瓶，里头摆着各种培养的“草”，这些是团队研发的颇具价值的中草药种苗，有绞股蓝、茅苍术、丹参等多个品种。

“以丹参为例，团队花了10年时间做试验，光种质资源，就有100多号。”巢杏松说，最终培育出的优质丹参，有效成分是原有丹参的3倍。同时，团队还用10年时间成功育种中药材毛苍术，在中药材育种上实现了突破。

巢杏松还自掏腰包，在孟河镇投资建设了双峰中草药科普园，作为宣传、传承中医文化，普及、推广中草药知识的园地。更让巢杏松开心的是，他的中草药育苗团队中有多名毗陵巢氏的宗亲。“这是对毗陵巢氏光辉过往，尤其是族中先辈抗战精神的最好传承。”巢杏松说。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更是一支不灭的信仰火炬。它照亮过救亡图存的血泪征途，至今仍在照耀着毗陵巢氏子孙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谱写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发展之路。

（转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

在“南口战役纪念馆落成仪式”上的发言

孟建英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口战役纪念馆落成仪式”。这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一次庄重回望，也是对先烈英魂的崇高致敬。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刚刚共同见证了国家纪念抗战胜利的盛大阅兵仪式。那一刻，威武雄壮的受阅方阵、钢铁洪流般的现代装备，让我们无比自豪。同时我们更加清楚，今天的和平与强大，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南口战役，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在正面战场上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我爷爷，《大公报》战地记者孟秋江随部队进入战区，在炮火硝烟中记录战事，写

下了著名的战地通讯《南口迂回线上》。

1937年8月8日，日寇凭借优良于我军十倍的现代战争武器，趁我军阵地还未配置就绪，就发动主力总攻击。我军将士坚决抵抗，除了有重大牺牲外，阵地还是阵地，没有丝毫动摇。

狡猾的日寇采取更加毒辣的迂回战术，我军将士以死相搏。

孟秋江这样写道：“（无论）机关枪怎样准确向我军扫射，奋勇的十三军战士，没有一个想到枪弹会打进血肉来……短兵相接时，手榴弹是唯一可以对大炮报复一下的东西。掷手榴弹的战士，虽然一批一批地倒下来，第二批又跳出战壕去抵抗。”

“机枪连仅剩一个战斗兵，一个传令兵，一个伙夫了。战斗

兵、传令兵把住两挺机关枪，伙夫在中间向左右输送子弹，继续对二千敌军强烈反抗！”“太阳照临着整个的山谷，这三位作殊死战的英雄，最后含着光荣的微笑，躺在阳光中！”

这是壮士的悲歌，这是英烈的礼赞，这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写照。

南口战役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为全面抗战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共中央《解放》周刊这样评价：“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南口战役由此成为全面抗战初期的标志性战役，写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孟秋江“以笔为枪”，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讴歌了将士们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点燃了后方民众的斗志。孟秋江的战地通讯《南口迂回线上》当时被编入上海的中小学课本，成为千万青少年和广大市民的爱国主义教材。他以文字为证，留下了民族抗战的事实，为后世保存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南口战役，纪念抗战英烈，也感受到我爷爷孟秋江所著战地通讯的光辉，居庸



横岭城这座长边的古堡
实际与南口有同等历史价值！
——战地记者孟秋江题词

关矗立的这块石碑正在焕发着当年的墨香：“横岭城——这座长城边的古堡，它的光荣，不仅如此而已，实际与南口有同等历史价值！”当年的战地记者同样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之中。

历史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具体的人与事。那些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淬炼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在南口山谷中“含着光荣的微笑”倒下的无名英雄，那些如遇不测即把“横岭城作为坟墓”的指挥将领，那些肩扛弹药、雨夜攀援的战士，以及“以笔当枪”、以真相为刃的战地记者群体——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群像”。今天，我们把他们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请回，就是要让我们牢记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走来，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

八十八年前的南口，英烈们用生命死守家园；八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祖国强盛，山河

无恙。作为后人，我倍感自豪。因为有前辈们“以命守土”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以梦筑国”的幸福生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所说：“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写下的誓言，更是新时代我们共同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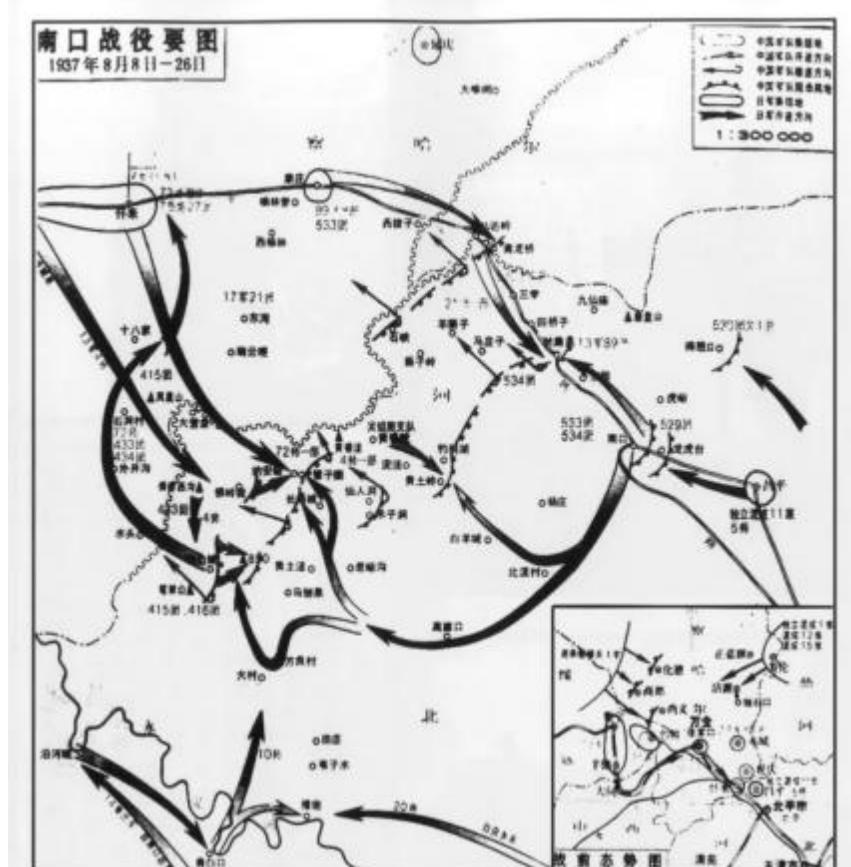
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以此为新的起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把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建设美好中国、守护人类和平。

（作者系孟秋江的侄孙女）

附：南口战役

南口自古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近代又是平绥铁

路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8月2日开始，就用飞机对南口，居庸关进行轮番轰炸。8月8日，日军集中火力发动总攻，南口战役打响。日军派出约7万人，并配备了大量的火炮、坦克、飞机参战。中国军队第13军6万将士，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战斗持续到8月26日，血战18天，日军伤亡1.5万人，使其“三月亡华”美梦破灭。在作战中，日军不顾国际公法，捍卫使用毒气弹，导致中国军队3万余人伤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盛赞：“将士的忠勇，不管在敌人炽烈的炮火和大规模使用毒气的进攻底下，他们名副其实的战斗到最后一人。”武进籍记者孟秋江多次深入前线，采访报导战斗情况。



和英雄群体名录。

诗苑新葩

秦大峰、莫金华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十周年

秦大峰

玉音激荡降书声，八秩烽烟东海倾。
血凝成史金瓯固，长照山河日月平。

(作于2025.8.15)

常州延陵季子故里宗亲联谊会纪念

日本无条件投降 80 周年

七律 · 铭记“八一五”

秦大峰

卢沟烽火起狼烟，敌寇侵凌岁月艰。
黑水白山燃赤焰，黄河翠岳护家园。
同仇敌忾驱倭虏，浴血拼搏十四年。
八秩春秋思旧事，和平永守谱新篇。

(2025年8月15日)

武进抗战英烈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莫金华

(一) 抗联名将冯仲云

中华危急请长缨，投笔从戎赤子情。
林海雪原驱虎豹，白山黑水铸峰嵘。
餐风露宿寒霜苦，弹雨枪林铁骨铮。
烽火烟消青史在，白桦着意刻君名。

注：冯仲云曾是清华学子，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三路军政委等，建国后曾获一级八一勋章。

(二) 胡发坚烈士

立马横刀把敌迎，智歼日寇播威名。
未酬壮志身先死，胜利凯歌耳畔萦。

注：胡发坚曾参加万里长征，1939年授命挺进江南，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兼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员，在武进无锡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新区，牺牲在武进洛阳，名列首批著名抗日英烈

(三) 李复烈士

誓复河山责任肩，抗倭转战历辛艰。
敌军围困千重急，殒命吊桥情动天。

注：李复曾是常州一美专校长，为抗日救国，他组织抗日义勇军，并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独立二团副团长，1940年在武进寨桥吊桥突围战中为掩护战友牺牲，名列著名抗日英烈群体名录。

(四) 钱立华烈士

漫云女子不英雄，救国拯民风雨中。
武进宜兴斗顽敌，一腔碧血化长虹。

注：钱立华曾任中共武南县委妇女部长，在武南和宜兴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反清乡斗争。1942年在闸口附近被日军包围，中弹牺牲在麦田。

(五) 张新华烈士

直面倭刀血染身，坚贞不屈壮昆仑。
铁军模范垂青史，助虐奸邪枉作人。

注：张新华生前被新四军军部授予“全军十大模范女战士”称号，曾任中共太滆工委青工队长、宜兴闸口区委书记。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途中，被伪自卫团汉奸出卖给日寇，受尽酷刑而不屈，牺牲在武进漕桥。

(六) “江抗”总指挥部旧址

江南树帜亮吴钩，不斩东洋誓不休。
壮士沙场展神勇，指挥若定瞿家头。

注：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旧址位于武进洛阳镇瞿家村

(七) 武进烈士陵园“御侮火光”展厅

救亡御侮卫山河，抗战经年铮骨多。
鬼子交枪白旗举，英雄碑耸永巍峨。

注：“御侮火光”展厅展示抗战期间新四军和武进军民英雄抗敌史实和抗日英烈事迹，其中包括对日伪军120多次的大规模战斗。

(八) 警钟长鸣

东洋犯我起狼烟，血雨腥风年复年。
国恨家仇长记省，高悬利剑紧弓弦。

季札后裔辛亥英杰吴殿英

庄琦玲

1911年10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由此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百多年前，神州大地上发生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人士参入其中，许多史料和史实证明，有一批常州武进籍人士，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无私奉献、爱国兴邦，他们是“辛亥常州英杰”。在辛亥革命中，常州武进籍人士赵凤昌、庄蕴宽、吴殿英、陈范、孟森、屠寄等，在舆论宣传、思想发动、训练新军、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抵御列强、反对复辟等创建民国的过程中皆做出了杰出贡献。

说到辛亥革命之武昌首义不能不提及湖北新军，而说到湖北新军不可不提及协助张之洞创办湖北新军的吴殿英。本文研究的对象即为在辛亥革命中创建和训练湖北新军，并为推翻清廷统治发挥重要作用的吴殿英。

一、家族世荣勋昌

据（清）道光《毗陵北渠吴氏宗谱》记载：吴氏一族为春秋时期季札后裔，明中期由宜兴闸口北渠里迁至常州城内，徙居迎春桥南洗马桥堍，世称“北渠吴氏”或“洗马桥吴氏”。明嘉靖年间进士吴性为洗马桥吴氏始迁祖。

宜兴北渠吴氏迁常至清末的380多年间，人才辈出。明有南京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以及他的儿子（进士）吴亮、吴元、吴允和武英殿大学士吴宗达等、清有经学大家吴士模、辛亥英杰吴殿英等。

吴殿英（1842—1907），名佑孙，字殿英，常



州人，光绪年间举人，辛亥革命英杰之一。吴殿英直系祖上曾出过17位文武进士，一名探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吴殿英十二世祖，曾执掌明朝南京翰林院的吴中行，吴中行曾经上“夺情疏”冒死弹劾名相张居正。此外，吴殿英十一世叔祖吴宗达，探花出身，为人正直，才华横溢，曾官居东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宰相，是位政声颇佳，深得朝臣、言官尊重的人物。吴殿英的曾祖父吴士模，是清朝常州经学派大家，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诗经申议》十卷、《四书文抄》四卷、《泽古斋语录》一卷等，载入《江苏艺文志·常州卷》中。

从吴中行、吴宗达至吴士模、吴殿英的数百年间，延陵吴氏以良好的文化和家风传承，为民请命，仗义执言，代代相传。

二、平湖办学，亲民厚民，办学育人

吴殿英光绪年间中举，于光绪十三年（1888）在浙江平湖任县令，人称“平湖公”。有“亲民、爱民、办学、育人”的口碑，在当地颇有威望。据《平湖县志》载，光绪十三年莅平湖任，至光绪二十一年卸任。地方应兴应革之事，靡不次第举行……清光绪十八年（1892）知县吴佑孙首助千金，与士绅朱之榛在小湖墩建瀛洲书院，专课朴学。更为通详立案，以垂久远。士子朝渐夕摩，根柢益后。辛壬癸甲邑人捷春秋闻者，指不胜屈，文风几为嘉郡冠。

因此，光绪废科举前，平湖城内有当湖、瀛洲，乍浦有观海（九峰），新仓有芦川，新埭有新溪等书院。这些书院能久盛不衰，除了有名望的人担任山长、讲席外，最根本的一条是有经费。据光绪十二年统计，当湖书院有学田319亩，九峰有学田165亩，芦川更多，有学田697亩。正如光绪《平湖县志》载，这些书院“会讲有堂、退息有室、逼庖器用、罔不毕备。”

《平湖县志》把吴殿英“亲民、爱民、办学、育人”的事迹载入史册，在平湖有很好的口碑。他不仅办实事，还积极兴办教育，说明吴殿英文武兼备，以办学名世，名扬江浙。

三、组建湖北新军，赴日考察，整顿、发轫武昌首义

1895年，吴殿英由浙江平湖知县调任候补知府署理钱塘，经由常州同乡、张之洞首席幕僚赵凤昌举荐，拜谒了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知悉吴

殿英在平湖的良好官声，赏识他拟办南瀛书院的计划，相互之间又有“练兵求强”的共识，遂诚邀吴殿英入幕僚备用，帮助筹建湖北武备学堂，编练新军。

1.组训江南自强军 精英进入湖北新军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朝野兴起“整军经武”“改革军制”的呼声。1895年，清朝政府在天津组建“定武军”，由袁世凯接任，改为新建陆军。同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京组建江南自强军，由德国军官负责训练。历史上成功帝王的治军之法，大都讲究“文治武功”。张之洞治军自然也不例外，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一支有文化有素养的军队。即需要聘请有文化的人来治军。吴殿英自然也就符合张之洞的选将标准。以文人治军，首要的就是办学。《张之洞全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近年新学日出，屡奉谕旨设立学堂，开设特科，故学校为当今要务，而武备又要中之要。”

1896年，张之洞返回任湖广总督，临行前从自强军中挑出500人，组建湖北护卫军，即湖北新军的前身。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同意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训新军军官。一时间，湖北与直隶成为各省军建设的榜样。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赴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赴湖北受训。湖北的新军建设及军事教育，影响远逾一省，实达全国。

张之洞委任文官出身的吴殿英在武备学堂担任都司衔监操官，那时他已54岁，本不愿前往，无奈赵凤昌以国家用人，力劝赴鄂。加之吴殿英之子吴稚英与赵凤昌亦是好友，与黎元洪同岁，并已先期被赵调去湖北为官。吴殿英难辞盛情，又对老帅张之洞十分敬仰，便在半百之年来到湖北，参与创建武备学堂，编练新军。从湖北新军的组建规程、训练方法、建立军事教育的初、中、高三等体制等全程参与。基于此，为日后湖北的正规军集体起义，推翻清朝埋下了伏笔。

2.赴日考察整顿

据《张之洞全集》卷一百二十九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十八日，“为扎委事。照得造就人才，为一切政治之根本，培植之法全在学校。日本国近三十年来，采用西法，设立各种学校，于武备一门进境尤速……兹特派委知府用候选：直隶州知州姚锡光、尽先游击张彪、都司衔尽

先守备吴殿英、五品顶戴黎元洪、东文翻译生翟世英，前往日本，将现设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责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

此为清朝甲午战败后，第一批湖北军事赴日考察团，在赴日考察过程中，时任都司衔尽先守备与武备学堂监操官的吴殿英坚决执行张之洞的指示。吴殿英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皆务详勿略。湖北新军的组建规程，训练之方，湖北军事教育的高等、中等、初等三级体制的建立，得益于吴殿英等人在日本的勤考实查。有此“籍资考统”，湖北新军才有可能成为清末的精锐之师，以武备学堂为例，以“储备将才”为目的，学制五年，课程分讲堂（功课有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等）、操场（功课有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等）两类。“讲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在主持新军教育过程中，吴殿英始终坚决贯彻张之洞积极开放的军事思想，选派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如吴禄贞、蓝天蔚、吴兆麟、孙武等。后来，这些人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武备学堂培养了这批精英，湖北新军才有可能成为后来的精锐之师。

张之洞编练新军，其重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清朝，反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由于清朝本身腐败，加上张之洞超前新思想的注入，使新军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如风过水，自然成纹”，为日后湖北新军起义在潜移默化中打下了基础。

3.成为精锐陆军名声大振，实行抬营主义对革命党同情

在具体执行教育的吴殿英等人精心操练下，着重对新军的特点和风格进行了培养，使湖北新军成为了清末与北洋新军并列的精锐陆军。清末举行过四次新军军事操演，湖北新军次次参加，尤其在1906年的河南彰德会操（时称“南北会操”）中，成绩与直隶新军（即北洋新军）平分秋色，湖北新军声名鹊起。

同为新军，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六镇是清廷的中央军，控制严格，对一切“异端”活动严加打击，因而北洋军中极少有革命党的活动空间，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较松弛，张之洞不是军阀式大臣，

加之新军助手吴殿英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党人，以“爱才”著称，实行“抬营主义”。何为“抬营主义”？“抬营主义”其实是一种革命战略思想，就是动员和选派部分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青年，入营当兵，扎根军营基层，形成强大的革命暗流。一旦时机成熟，举起义旗来，就能把政人的军营，一举“抬”了过来，变成为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所谓“抬营”之意，就是个概念。

吴殿英在湖北新军内部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新军中发现革命党人，也往往调离处理了事。所以在湖北新军中包容各种先进思想，书籍在新军中广泛流行。由于吴殿英对新军中下级官佐中有革命倾向者多有保护，终遭人忌恨。1906年，张之洞调职北京军机大臣时，吴殿英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并已积劳成疾，1907年2月，因吴殿英支持“戊戌变法”和革命党，清廷以“狂悖无法”为由将其撤职查办，逐渐失势，心境更加恶劣，其子吴稚英受其株连亦遭免职。郁郁寡欢之下，还患上了肠胃病，吴殿英于1907年抱憾离世，经受丧父与革职的双重打击，吴稚英也一病不起，于1913年随父而去。

4. 湖北新军发轫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的新军起事，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但为何只有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廷了呢？因为武昌的起义军主力是实行“抬营主义”精锐的湖北新军。他们有着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军事上、政治上均筹之有素，虽起事仓促，但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10月10日傍晚起义，经过一夜激战，便夺取湖北省城武昌，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职能的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所以决定了武昌起义与此前十余次反清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其发难者不再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旧式武装，而是一支从装备、编制到训练皆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军队，这支新军又在十年间受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成就了意义空前的国体、政体大变革。所以评议辛亥革命及其发轫武昌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更不可忽略为创立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吴殿英。

四、传家有方，再创家族荣耀辉煌

吴氏家族作为常武地区最大的官宦世家之一，历经数百年而长盛不衰，继辛亥英杰吴殿英、吴稚英之后，其家族血脉中又涌现出故宫博物院创办人

吴瀛、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著名书画家、作家吴欢等杰出人物。

1. 故宫博物院创办人：吴瀛

吴瀛，吴殿英之孙，吴稚英之子，是书画大家、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重要的人物之一。据吴氏家谱记载，“吴瀛，行二，原名杏，字景洲，生于光绪辛卯二月二十三日未时”。吴瀛幼年随在浙江做官的祖父吴殿英生活，在平湖书院打下了坚实的国学、诗文、书法、绘画基础。后跟随祖父来到湖北，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英文，成为中国最早的学院派少年大学生。1913年，父亲吴稚英不幸英年早逝，吴瀛和母亲被当时在京城当“都肃政史”的舅舅庄蕴宽接到北京生活。在舅舅的庇护和影响下，先后出任“中华民国京都市政公署”坐办和内务部警政司科长，负责处理京城日常行政事务。随后吴瀛参与了设立古物陈列所，建筑金蕴楼以及布置文华、武英二殿陈列等工作，亲历了大内古物公诸于世的第一次展览。怀着对文物的敬重，吴瀛亲历了“清室善后”，先后三次参与编纂古物陈列所文物和书画目录。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对外开放。

1928年10月，故宫博物院重新组建，吴瀛告别仕途，加入故宫管理团队，出任院长秘书。1931年，为免受战火侵扰，保护故宫瑰宝，吴瀛负责故宫南迁，数万件文物完好无损。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的10年间，从遏制军阀武夫染指国宝，到击碎清室旧臣裹盗文物，再到南迁重器延续国之文脉，吴瀛始终进行着与“故宫博物院”存亡攸关的斡旋和保护。1938年，吴瀛因受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牵连，被迁出故宫，后居上海。

吴瀛国学基础深厚，对西画、国画均有造诣，诗文、书画、篆刻皆精。其绘画擅山水兼工花鸟，其诗沉郁雄奇，慷慨悲怆。主要著作有《中国语文法》《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故宫盗宝案真相》，以及诗文《风劲楼诗草》《蜀西北纪行》，剧作《长生殿》《章台柳》等。

2. 著名剧作家、戏剧大师：吴祖光

吴瀛与妻子周琴绮共育有15个子女，4男7女长大成人，吴祖光为其长子。



吴祖光，又名吴召石、吴韶，1917年3月出生于北京。儿时被曾任江苏都督的舅公庄蕴宽以孙儿相待，幼年时接受传统国学教育，少年时进入孔德学校，常被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所吸引，1934年发表处女作《宫娥怨》。1935年考入中法大学文学院，同年开始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1936年，转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从事校长室秘书兼中国戏剧史和台词讲师。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吴祖光随学校内迁到重庆。在这里，他创作出了第一个轰动全国的剧本，根据东北抗日“少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被俘后英勇不屈的事迹编写的《凤凰城》。1938年初，《凤凰城》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上演，一夜轰动全国，随后几年，吴祖光又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剧作，名声大噪。

1946年，吴祖光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和《清明》杂志，创作了《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讽刺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落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后辗转至香港，与夏衍一起投身到香港的文化推广活动中。在港三年，吴祖光先后编导了《风雪夜归人》《莫负青春》《国魂》《山河泪》《春风秋雨》等多部影片。1949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吴祖光返回大陆，并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品《红旗歌》《除四害》等。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评剧舞台上的经典佳作。

2003年4月9日，86岁的吴祖光走完了自己的戏剧人生。他一生多才多艺，涉猎广泛，著作颇丰，有戏剧、散文、政论和书法集约50余部，传世之作包括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少年游》《花为媒》《三打陶三春》等。

3. 风流才子、著名书画家、作家：吴欢

1951年，经老舍介绍，吴祖光与评剧名家新凤霞结为伉俪，婚后育有两子一女。长子吴刚客居法国，是知名摄影家；女儿吴霜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为我国当代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其中，次子吴欢，幼年从父习文，随母学画，

后师从张正宇、张仃、黄永玉、尹瘦石等大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有“京城才子”“香江神笔”之称，以一身兼小说、戏剧、政论、诗词、书画名扬海外华人社会。主要著作有《驴唇马嘴集》《吴欢论坛》《西皮流水》《奇侠》，主要书画作品有《吴欢书画》《吴氏三代书画选》等。

五、结语

纵观吴殿英的一生，从亲民、爱民的平湖县令到组建、训练湖北新军，同情革命党，以至间接为日后湖北新军集体起义，辛亥革命的爆发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也正是由于吴殿英的为革命殉道，势必坚定了赵凤昌、庄蕴宽等常州英杰们的反清意志。创造历史的先贤不可忘却，建立湖北新军，身在一线的执行官吴殿英历经百年的尘封，应该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了。作为洗马桥吴氏的后裔，吴殿英一支将家族文脉代代传承，在书画、戏剧、文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党和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也更加激励吴氏后人努力报效社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 周新国.江苏英杰与辛亥革命.[J],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 (5) :82-85
 - 徐缨主编.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N],凤凰出版社,2011
 - 常州辛亥革命研究课题组.常州辛亥英杰. [N],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吴欢.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N],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 常州史志：吴殿英—湖北新军教头[EB/OL].
<http://changzhou.gov.cn/html/>, 2023-04-16/.
 - 寇建平.百年风雅—从吴瀛吴祖光到吴欢.[J],文化中国.2006 (4) : 85-90
 - 万辉.吴祖光及其先辈的家国情怀.[J],档案建设.2017 (10) : 45-48
 - 薛焕炳.洗马桥吴氏,朱炳国主编.常州名门望族.[N],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7
- [作者系常州市图书馆信息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副研究馆员]

中国网络之父：常州院士顾冠群

郑国强

当你坐在电脑前，用鼠标和键盘快速浏览新闻、查找知识、书写博客、欣赏音乐时，请你在心里默念这个人的名字：顾冠群。对这个人的名字，或许你感到很陌生，但正是这位老人，和我国计算机网络研究与教学的先驱们一道，开启了中国第一扇通向网络的大门……

顾冠群，1940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奔牛镇董墅村（现属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

顾冠群的父亲16岁时进常州城学手艺，经过多年努力，在城里安了家。顾冠群随父在常州西大街小学和常州市第一中学读毕业。1956年9月，顾冠群考入南京航空学院，1957年转至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的前身）学习，1962年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计算技术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研究室主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校长，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四、五、六届副主席、第七届主席，国家“863”高技术计划自动化领域CIMS主题第一、二、四届专家组成员和第三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专家顾问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职务。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网络之父”

在上世纪70年代，互联网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极度陌生的世界。从1976年开始，正是顾冠群和业界同仁锻造着一把打开中国计算机网络大门

的“钥匙”。顾冠群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颇具启蒙色彩的《计算机网络》统编教材，摆上了国内许多高校的书桌，这本书展示了一个陌生但有趣的世界。

顾冠群是我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及教育的科技工作者之一，更是中国工程院第一位计算机网络院士。有人尊称他为“中国网络之父”。可顾冠群从没接受过。他是个低调的人，对待荣誉，从不沾沾自喜。

自从他1960年至计算机专业深造，为日后从事计算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他东大毕业后留校从事计算机科研和教学工作，1963年他任东大计算机系主任，参加了国家晶体管数字积分机的研制。他夜以继日反复琢磨，从一个个小部件做起直到做计算机的大部件，困了他用冷水冲脸，饿了啃口冷馒头，累了靠墙壁打个盹，失败了汲取教训，成功了他总结经验，最后冲上了成功的峰巅，在1965年顾冠群的团队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晶体管数字积分机，使我国进入了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新时代，他率先开拓了数字积分计算机的应用，在计算机绘图和潜艇电子航迹仪这两个应用项目上，获得了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大奖。

1973年，我们常州的王铮将军主持四机部研制通用计算机，顾冠群参加了DJS-220通用计算机的工程设计工作，通用计算机试制成功后，获得了国防工业部技术进步一等奖。

七十年代后期，电子计算机应用在国内兴起，顾冠群积极研究国外计算机和通信的先进技术，他的团队在1975年又研制成功了具有通信功能的DJS-25计算机。

这时顾冠群又跨学科地研究起网络技术，并把网络技术作为他后来科研的主攻方向。1977年他编著了全国第一部的统编教材《计算机网络》，并在东大建起了网络数据实验室，他18年如一日地带领科研团队在网络领域不断进取。

七十年代末，国外LAN技术盛行，国内的局域网不断建起，但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顾冠群建议所有局域网都应按国际标准来掌握网络技术。

1983年至1985年间，顾冠群在国内率先研制出高级数据链路通信规程控制器和软件，为国家制定了军用数据通信规程标准，他的科研成果首先转让给家乡常州计算机厂进行生产，并推广应用到全军部队。当年他又获得了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1988年他率团队在我国率先研制出X25通信控制器，在北京电报局首先与国家CNPAC分组交换网相互连通，从此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和依靠进口的局面。顾冠群连任国家863/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专家组成员，和国家计算机学会网络委员会副主任，及国家教委计算机科学组要员。

无论在是高速网络协议，网络智能软件，CIMS网络他都走在同行业的前列，他从学术研究，技术攻关到组网应用推广，他一步步把学术成果推向实用化和产业化。

随着机算机应用领域的拓宽以及应用系统的日趋复杂，对集成的研究和实施日趋重要，顾冠群又把集成作为研究的主旨，经不断努力他又获得了成功。

七五计划期间他承担了国家标准化网络(os1)的验证，主持我国第一个市域(os1)网络，他又参加了江苏省南京市域异种大型机算机(os1)网络，这些项目的完成使我国(os1)网络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92年他又主持了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船舶货运(ED1)系统工程的研究，研制成功后该系统已在我国30多个港口在使用，节省了大量外汇。

1994年他参与筹建中国研研网与因特网的互连。

1997年他又主持研制了江苏省金融信息处理网。

2002年他与丁肇中教授共同研制了国际空间站使用的AMS项目，这是国际最前沿的科技攻关项目并



(丁肇中教授（左）和顾冠群院士（右）在东南大学AMS-C实验室交流)

取得了成功。

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8本，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省科技进步奖12项，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香港理工大学授他为杰出访问学者，台湾教育基金会授他研究杰出奖。

顾冠群名言：“一个国家要有名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一个大学要有朝气。”

顾冠群创造的第一：我国网络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晶体管数字积分机；

研制出国内第一台具有通信控制功能的台式计算机；

研制出国内第一个高级数据链路通信控制器及规程软件；

编著我国第一本《计算机网络》统编教材。

江苏第一位民选高校校长

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优秀的校长，遇到一位好校长，学校就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其履历经历，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缩影。东南大学前校长顾冠群，是中国网络领域的第一位院士，领导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1997年到2006年间担任东南大学校长，他在任期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却因

纯粹、真诚、随和、朴实而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

顾冠群院士从1957年进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在东南大学度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说，东大就是他的生命。他在做好科研工作的同时，逐渐走上了管理岗位。先担任东南大学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研究室主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在1997年，经全校师生推荐选举，并经原国家教委任命，57岁的顾冠群教授担任了东南大学校长，成为江苏高校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校长。

在上任伊始，顾冠群院士就统一了东南大学的发展理念。他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教学科研为两翼，队伍建设为主体”的思路，并提出使东南大学的综合实力有明显提高的目标。在顾校长任上，东南大学先后入选211工程，985工程院校建设，并成为中组部直管副部级建制高校。在那段历史时期，可以说是东南大学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1997年10月至2006年6月，在顾冠群院士担任东南大学校长的10年间，他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追求，没有放弃信念，执著地带着学校走出困境。

他是江苏高校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校长，他却将重点大学的校长角色定位为团长。他说，他看过很多解放战争的电影，每个电影里总要有一两个团长唱主角。《上甘岭》《英雄儿女》里面的团长都独立指挥打仗，他说，他这个校长要具有战略思想，集成意识的团长，是现代化、数字化的团长。

1999年，在国家公布的首批21所“央管高校”中，没有东南大学的名字。这给学校造成了非常巨大的震动。顾校长要求全校不要放弃追求。果然，在第二批入选名单中，东南大学的名次非常靠前。

在任期间，历经东南大学四校合并、百年校庆、“211”工程，“985”工程等关键节点，他在领导岗位上，重点抓学科建设、抓大项目、抓科学研究，使当时东南大学的科研项目及经费持续保持在江苏高校的前列，提高了东大的办学声誉，为如今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校长任上，他高瞻远瞩，领导推动九龙湖校区的建设，为东大未来发展奠定空间基础。带领师生坚决抵制省部方面给出的，和南大大学合并的建议，避免了东大被吞并的命运。

在“团长”的带领下，2002年，在东南大学的

百年校庆上，东南大学让世界刮目相看，著名科学家丁肇中经过一年的考察选择，把国际空间站AMS项目地面接收站放在了东大。当时的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左惟说，这是中国大学首次参与国际最前沿科学的研究与攻关。

顾冠群院士在自己的任内努力抓好东南大学的学科队伍建设，在任东南大学校长十年时间里，还培养了一大批计算机领域的领军人才。为东南大学迎来新的百年辉煌奠定基础，更为我国科技事业早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力行不辍。

生活朴实的普通人

据他的学生回忆，头发花白，衣着简朴，行色匆匆……这就是顾院士、顾校长、顾老师给大家的印象。他的步伐总是那么矫健，他总是很忙碌，可是，他也像平常人一样，也会在南京天桥下买烧饼吃。

他步行上下班，坐公交车到医院探望生病的妻子……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

他总是惦记着学生。每次出差，顾老师都会给大家带当地的特产。还清楚记得有法国的糖果，香港的小吃……

他关心着同学们的生活，关心着实验室的冷暖。每到假期，毕业生没有地方居住，他就会帮着安排；每次暑期加班他会问实验室的空调是否正常；每次开会临近结束，顾老师都会询问大家生活上的情况，食堂的饭菜是否可口，补助是否够用……只有安排妥当了，他才放心。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安心地生活才会安心地研究。

走进顾冠群位于东南大学院士楼的家，看不到一件像样的电器，以他的地位、身份，家里如此朴素的确令人震撼。那个朝南20多平方米的四四方方的客厅里，西墙一个电视机柜上摆放着顾冠群和夫人的像，里面除了两套长椅、茶几，客厅里再无其他装饰。朝北不大的饭厅里放了两张餐桌，显得很拥挤。“搬到新房后，子女们给他买了张新餐桌，可他却舍不得扔掉用了几十年的旧桌子。”

他儿子顾伯萱还从书房拿出一个发黑的铅笔盒，里面装满了笔和橡皮。他说，“这个铅笔盒是父亲上中学时用的。父亲一直舍不得丢，还夸它质量好，这么多年都没用坏。”

他自己省吃俭用，可是心 (下转第 79 页)

风骨常青

——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秦仁昌先生

秦大峰

每当我漫步于江南湿润的林下，目光总会被石阶旁、溪涧边那些从丛簇簇的蕨类植物所吸引。它们没有花的娇艳，没有树的挺拔，只是那样静默地、顽强地舒展着螺旋状的嫩叶，像是紧握着一个个来自远古的秘密。指尖拂过那带着细腻绒毛的叶背，触到的，是时光的纹理；嗅到的，是一股清苦而坚韧的生机。这生机，总让我想起一个名字——秦仁昌。那位与这些沉默生灵相伴一生，并让它们的名字在世界科学殿堂中响亮起来的“中国蕨类植物之父”。

先生的生命起点，是1898年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杨岐村一个寻常的农家。那一声婴啼，混着田野的稻花香与泥土气，再寻常不过。若非他骨子里那份与生俱来的勤勉与聪慧，命运的轨迹或许便是面朝黄土，春耕秋藏。然而，1914年，他走进了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这无疑是她人生第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校园里的苍翠林木，是知识的序章；而陈嵘校长、钱崇澍教授这样的启蒙恩师，则为他推开了一扇通往植物学宏大世界的大门。我想，青年秦仁昌一定是在那些看似枯燥的根、茎、叶中，窥见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关于生命秩序与演化的壮美诗篇。他立志于植物分类学，这选择，注定了他将与寂寞为伍，与精微相伴。

彼时之中国，现代植物学的根基尚浅，犹如一片亟待开垦的沃野。1927年，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才真正传入。年轻的秦仁昌很快便敏锐地触及到那个时代的痛点：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尤其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蕨类，它们的家族谱系却如同一团迷雾，零散、混杂，亟待梳理。这“不够全面”的缺憾，像一根细刺，扎在他求知的心头，隐隐作痛，催他前行。

于是在1929年，带着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与期



许，他远渡重洋，负笈千里，抵达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从东方的田畴到北欧的学府，这不仅是地理的跨越，更是学术视野的飞跃。在那些浩如烟海的标本与典籍中，他如饥似渴，汲取着世界的智慧，也锤炼着挑战权威的眼力与勇气。

四年后，学成的游子归国。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了他施展抱负的第一个舞台。而后，他的身影出现在江西庐山的云雾缭绕之中。1934年，他亲手创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那该是怎样一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景象？他仿佛一位绿色的统帅，在短短时间内，竟为七千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木，于此钟灵毓秀之地安下了家。山风林泉，松涛竹韵，都成了他麾下最和谐的乐章。也正是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净土上，他完成了那部三十万字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初露锋芒，声名鹊起。那时的他，心中想必怀抱着一个以科学滋养故土的、葱茏的梦想。

然而，时代的巨轮碾过，从不为个人的理想稍作停留。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席卷神州，宁静的庐山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先生不得不告别倾注心

血的家园，踏上辗转流亡的艰辛之路，最终抵达了烽火后方的云南昆明。

这流亡，是国难下的个人悲剧，却意外地，将他的学术生命与一片无与伦比的植物天堂紧密相连。云南，这片被誉为“植物王国”的土地，用它最原始的丰饶与壮美，拥抱了这位衣衫或许褴褛、但目光始终如炬的学者。命运的吊诡与慷慨，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外部世界在炮火中倾覆、文明遭受践踏之时，秦仁昌先生却将个人的颠沛，化作了对科学殿堂更虔诚的朝圣。他背起标本夹，拿起采集杖，走向了云南的千山万壑。从苍山洱海到丽江雪线，从热带雨林到高山草甸，他的足迹，深深印在这片红土地的每一处褶皱里。

我总试图在脑海中勾勒那样的画面：在密林的幽暗光线下，他俯下身，屏住呼吸，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片蕨叶背面的孢子囊群；在简陋的丽江工作站，煤油灯的光晕摇曳，映照着他伏案疾书的身影，窗外是呼啸的山风与动荡的时局，窗内，是一个正与世界科学巅峰对话的、沉静而强大的灵魂。这已不仅是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毁灭中坚持创造的壮举，是以最谦卑的姿势，践行着最崇高的文明守护。

所有的艰辛、积累与思考，终于在1940年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横空出世，如一道惊雷，震撼了世界蕨类植物学界。他以其深邃的洞察力，一举厘清了那个曾被西方学者视作庞杂无章的“水龙骨科”的混乱局面，揭示了其内在的、清晰的演化脉络。一个世界性的

难题，被一位在战乱困厄中的中国学者攻克了。

“秦仁昌系统”由此诞生，它不仅仅是一个分类方案，更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学者在国际植物学领域，赢得了无可争议的一席之地。他所获得的“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与其说是个人的荣誉，不如说是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在科学的星空中摘下的一颗璀璨星辰。正如美国蕨类学权威科波兰特所赞叹的那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新的地位。”此言读来，字字千钧，背后是多少不为人知的坚韧与孤寂！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选择留在这片成就了他的红土地，受聘为云南大学的教授，将毕生所学，倾囊授予下一代学子。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是祖国对他卓越功绩的肯定。人生的后半程，想必也非一帆风顺，但他一如他所钟爱的蕨类，生于幽僻，长于岩隙，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静默地积蓄，等待萌发。1978年，科学的春天再次降临，已是八十高龄的他，依然向世界奉献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为他毕生的研究，画上了一个厚重而圆满的句点。

1986年，先生与世长辞。而他身后的荣光，并未随之暗淡。他所获得的国家级科学大奖，是对他不朽功勋的追认与铭记。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今天，当我们翻阅精美的植物图鉴，当“秦仁昌系统”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被一再引用，当中国的植物学研究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位最初的拓荒者。他的

一生，仿佛一株最伟大的蕨类植物：根系，深扎于祖国苦难而肥沃的土壤；茎叶，顽强地穿透时代的阴霾与阻碍；而他的学术成果，则如那无数微小的孢子，乘风远扬，播撒在无垠的科学沃土上，生生不息。

此刻，我仿佛看见，在庐山植物园的苍翠间，在云南高原的云雾里，在每一片湿润荫蔽的角落，那些凤尾蕨、铁线蕨、卷柏……所有他曾为之倾注心血的绿色生灵，都在风中轻轻摇曳，以它们亿万年不变的沉默姿态，诉说着对一位智者的永恒怀念。

2025年9月上旬撰于抹云斋



航空元老包文进

包立本

包文进（1921—2004），名连法，字文进，以字行。武进县魏村乡仇家村（今属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人。

他出生于1921年2月12日，因为家贫，早年他寄养在乌龙庵72号孟家，由地质学家孟宪民的姐姐、我的太婆孟静宝（1895—1981）带大，两人的辈分相同，为叔嫂关系，但孟静宝比包文进大26岁，包文进既把孟静宝当嫂嫂，也把她当干妈。

包文进是一位传奇人物，1941年20岁时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新四军一师干部。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组织股长、师组织科长、师干部部副部长、航校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十二研究所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第三机械部第623研究所党委书记以及第628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授予大校军衔。

在包文进的人生历程中，有件事对他影响很大。

1946年7月13—15日，苏中自卫反击战第一仗宣泰战斗，我军歼灭宣家堡之敌和泰兴城之敌大部。7月18—23日，我军组织如（皋）南战斗。时任某营教导员的包文进，未能参加如（皋）南战斗，而奉团首长命令，带一个连部队，押训战俘300多名驻如皋城北三里路某村庄。23日传来好消息，我军取得如（皋）南战斗胜利。24日，敌人占领如皋城，于是包文进决定率连队押俘转移。路过柴湾时正巧碰上粟裕司令员在指挥部队向北转移。于是，包文进向粟司令员敬礼后即作了自我介绍，报告了正在执行押俘任务，并请示粟司令员，该连押俘将转移何地？粟司令员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本小本子和一支钢笔，就在本子上写了包文进所属部队



进军路线和驻地地址，然后从小本上把这一页撕下来交给包文进，并亲切地握了包文进的手说，你按我所写的路线和地址去找就到了。包文进即带着连队押送俘虏，按照司令写的路线地址快速行进，顺利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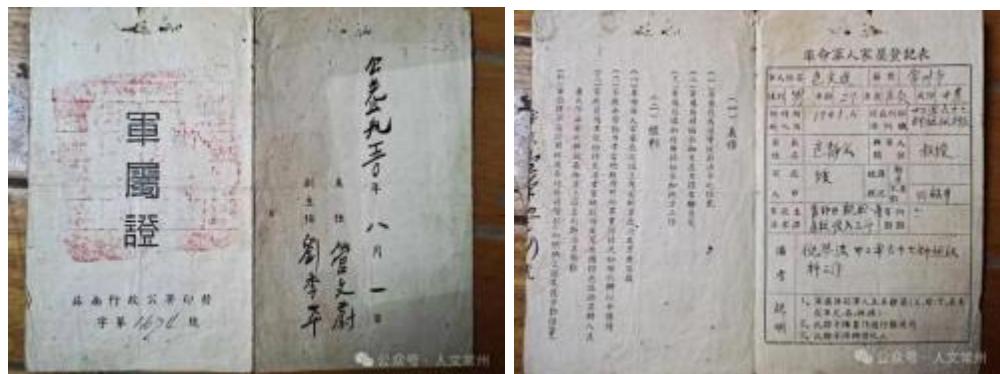
事后，包文进深有感触：啊，多么好的司令员！一点架子也没有，不但亲自讲解，还怕记不清，又亲自写了纸条并反复嘱咐按写的路线地址去找就到了。看，司令多么熟悉、关心部队！多么平易近人！多么负责的老首长！事情虽小，却让人一辈子心中难忘！

后来，包文进自己成为高干后，工作上从不以权势压人，生活上待人和蔼可亲。作为领导，本来可以分到航空航天部北京北苑大院大居室，可他换成了小居室。他说，把大居室分给更需要的人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多次回乌龙庵探望孟静宝。来地方上探亲，本来凭证可以享受火车软卧待遇，可他却乘硬座。我去北京拜谒包文进太爷，他的专车从不让我坐，每次让我自己从火车站乘公交车去他家。他的这些家规和坚持，显示了一位老革命的高风亮节。

包文进参加了新中国航空科研单位的筹建。

中央军委1960年12月27日决定组建航空等三个研究院，并自1961年1月18日起，正式筹建国防部第六（航空）研究院（以下简称六院）。

参与筹建工作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唐延杰、空军第16修理厂厂长许修明、武



包文进《革命军人家属证》

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吕鸿、空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曾绍敏、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后勤部部长周交臣和空军第10航校政治部主任包文进等领导。

2月6日，六院筹建组向总参呈报《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编制表》，院机关编制386人，其中，院首长6人，办公室22人，科学技术部95人，政治部56人，器材部42人，院务部165人，军官267人，职工和士兵119人。3月14日，总参批复同意，准予照此试行。

1961年2月23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唐延杰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

为了加速六院的筹建工作，空军遵照中央军委3月14日命令，组织接收小组（组长任学尧、副组长吕鸿、曾绍敏，组员包文进），于初夏赴广东汕头接收陆军守备22师师部及两个团部的人员，作为组建六院和航校的基础。接交工作于5月5日结束，并于同日正式编入空军建制。

从22师接收来的人员共有1299名。空军决定将该师师部及三团团部的人员585人调拨六院，作为组建六院院部及部分研究所的基础，其余人员留在空军组建航校。

空军党委6月2日决定，从空军各航校和军以上机关抽调40名技术业务干部到六院院部作为骨干；总政治部8月1日决定调配80名干部进入六院院部工作。

22师的人员200多名分两批于6月10日和15日先后到达北京西颐宾馆集结报到后，全国各地、各军事单位、军事院校调六院工作的干部也相继到达这里。

从4月份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防部陆续任命六院机关领导干部。

4月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包文进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干部部长。

在院部机关基本框架搭起来后，1961年6月12日至30日，就在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礼堂召开了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大会。六院成立大会后，建院筹备工作宣告完成，院机关正式开展工作。

另据《航空档案》总第253—254期《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第34页记载：“1965年4月4日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在陕西耀县正式成立，首任所长王兴华，政委包文进。”

1965年1月12日，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决定将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简称“六院”）第八研究所第六研究室（强度研究室）分出，建立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3月24日，批准了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编号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

究院十二所）在陕西省耀县苏家店进行建设。4月12日，正式批准了设计任务书，由此拉开了强度所建设的序幕。

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因为是在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时批准成立的，接续以前研究所的代号序列，定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第十二所。该所科研队伍，以八所强度研究室和其他相关主机厂所调入的强度研究人员为基础，首任所长王兴华、党委书记（政委）包文进、副总工程师魏信芳。

1968年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时，该所代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研究院第623研究所。1973年“第二次部院合并”后，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第623研究所。

建所之初，国家赋予强度所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飞机结构的静力、动力、疲劳与热强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编制有关技术文件和资料；研究飞机结构的静力、动力、疲劳与热强度的计算方法，并编制有关技术资料与文件；研究飞机在起飞、飞行和着陆时所受载荷，研究并编制强度规范；进行试制和成批生产的飞机或部件的静力、动力、疲劳与热强度方面的鉴定性试验。

当时，搞“三线建设”付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老一辈科研人员以“立足山沟胸怀祖国看世界，献身革命志在四方图创业”的豪迈气概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初创建设，白手起家边搞建设边抓科研。1966年底强度所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设施一流的1号静力试验厂房，并于1968年12月28日在该厂房圆满完成轰6飞机全机破坏试验，标志着我国飞机强度研究与验证进入了新的纪元，在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5年10月，强度所热强度研究室获批，选址在长安县和户县交界秦岭山下的祥峪口，1980年1月，改为623所长安分所。1982年3月23日，国防工办批复长安分所从623所划出，成为独立的研究所，名称为第三机械工业部飞机结构热强度研究所，代号629所。

在建所初期，强度所优质完成了轰6、水轰5、运8、运10、歼8等型号强度验证任务，研制了手动控制液压加载试验系统等一批重大仪器设备，发展了静强度、动强度、疲劳强度与断裂力学、热强度、强度规范、计算力学及软件等专业。

包文进为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一生致力于“教育向下扎根”

大志

他是民国“学霸天团”中的顶流，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门下的高徒，却常年一袭青衫布鞋；他本可跻身政界享受高官厚禄，却选择在战火中守护三尺讲台；他创办光华大学、执掌华东师大，却总说“教育的灯火，要先照亮工农大众”。

今天，让我们走近“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孟宪承，看这位“布衣教授”如何用一生践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又如何将民众教育的星火燃遍中国。

长衫立讲台，西学为中国

孟宪承，1894出生于武进县，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自小刻苦读书，曾就读于常州府学堂（今省常中），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学习，深得校长唐文治的器重，直接送入南洋公学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圣约翰大学外文系。圣约翰大学每年毕业率很低，入学时孟宪承班里有二十几人，但毕业并获文学学位的仅八人。凭借着读书期间“试必冠其曹，恒以退还学费为奖”的优异成绩，他在八人中拔得头筹。

由于大学学习那几年正值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动荡的历史时期，孟宪承目睹国家落后、民生凋敝，深切地认识到要挽救国家、拯救民族，必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因此，他立志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1916年，孟宪承应聘为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教员，与林语堂、马国骥等共事。曾为其学生的梁实秋多年后回忆，“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

孟宪承一面教书，一面进修学业，于1918年又考取公费留学，进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在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直接指导下，孟宪承学习和研究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博览各教育家的教育理论、教学观点和教学方法，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留学的经历让孟宪承亲身感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认识到教育改革的

巨大推动力，也更坚定了以教育为良方，推动祖国崛起和民族兴盛的信念。他在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在那里刻苦钻研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等。

多年来西方文化的熏陶，似乎并没有在孟宪承的生活习惯上留下太多印记。在清华上英语课，他坚持身穿青衫长袍。即便是出洋，外面套着西服，里面穿的也还是夫人为他手缝的粗布衣服。其孙孟蔚彦也曾记录下这样一则趣事：“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旁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1921年11月，因需供养家庭而中断学业的孟宪承回国，受到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聘请，担任国文部主任兼教授。他提倡新的教育理论，实施新的教学方法，深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 孟宪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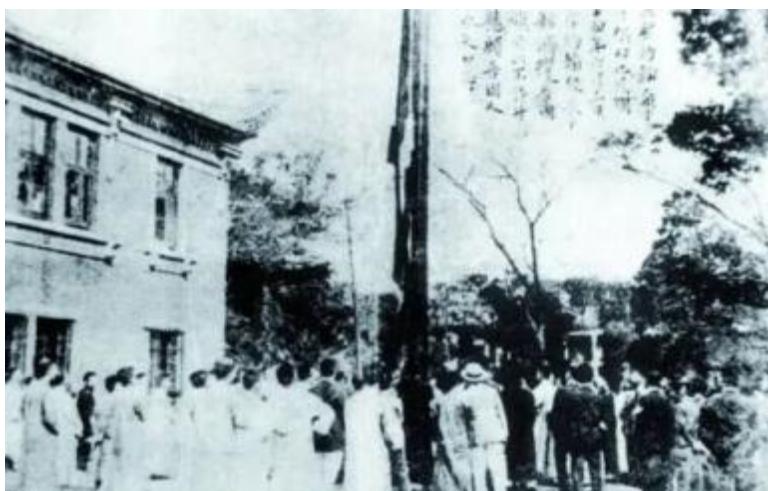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孟宪承是一位热爱教育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孟宪承目睹无辜的群众和学生被枪杀，倒



△ 圣约翰大学校门

在血泊之中，南京路巡捕房门前血流成河，这位富有爱国热忱的青年教授义愤填膺，不顾自己是在教会学校中工作的人，有着随时被解雇的危险，也不顾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师生情谊，6月1日，毅然以国文部主任身份，召开了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教授会。会上，他慷慨陈词，揭露了帝国主义无故屠杀中国人的罪行。他还激愤地指出：“假如作一般学生，只知道自己是圣约翰的学生，而不知道是中华国民，看着同胞被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阅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孟宪承的一席讲话，使到会的14位教授和附中一位教师一致表示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者无故屠杀我国同胞，要举行罢课游行、演讲等活动，声援五卅受害者及死难烈士的家属。



△ 圣约翰大学“六三事件”现场

当天晚上，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召开中外籍教授会，企图以教授会名义阻止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孟宪承等中国籍教授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高声发言，据理力争，认为应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美籍教授则极力反对，会上相持不下。最后，卜舫济校长用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企图以多数票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然而表决结果出乎卜舫济的意料，在50票中，以31票对19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学生可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这一结果大大鼓舞了全校师生爱国反帝的斗志。

6月3日早晨，孟宪承领导学生在操场上降半旗为死难者志哀，可卜舫济强迫学生降下中国国旗，蛮横地不准悬挂中国国旗，激起了全校学生的愤怒和反对，孟宪承走在师生前面，和卜舫济面对面讲理。虽然卜舫济是他的恩师，他到圣约翰大学任教是卜舫济邀请的，而且卜舫济在中美很有名气，但孟宪承想起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也想起了孔子“当仁不让于师”的训条，看到卜舫济欺侮中国人太甚，在和卜舫济无法继续讲理的情况下，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孟宪承大义凛然，声明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与卜舫济彻底决裂。受其感召，近20位中国教师率领500多名爱国学生走出圣约翰大学，以中国人民不可辱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地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为爱国的中国人树立了榜样。

孟宪承不为名利所惑，始终保持着进步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抗战前，国民党政府曾以高官厚禄笼络他，蒋介石提出授孟宪承少将军衔，当立法委员，送每月车马费三百银元，但孟宪承不为所动，毅然以养病为由，断然拒绝以出走了之。蒋介石见利诱不成，又施加压力，孟宪承毫无惧色，泰然处之。10多年间，孟宪承先后在光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由于他学识广博，教学认真，每到一地，都深得学生尊敬。

抗战胜利后，孟宪承应浙江大学聘请，担任该校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当时，杭州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



△ 光华大学举办第一次开学典礼

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军警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孟宪承总是竭力掩护和营救，与反动统治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进步学生的拥护和爱戴。

执掌华东师大，不追风口，只筑根基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6月6日，杭州市军管会进驻浙江大学，孟宪承等9人被任命为接管浙江大学小组组员。7月26日成立了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孟宪承等8人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浙江大学校务。1951年9月，孟宪承被调任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区教育部部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孟宪承从学校选址到师范生培养、课程建设等方面都作了慎重的思考，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建设考虑了50年的发展空间，以及远不止50年的发展方向。他强调大学应加强

基础教学，让学生掌握坚实、广博的基础知识，因此，不宜过早分专业，要培养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他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都事先制订了严密的计划，不随意抓课题，不随便发感想，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育，要求学生认真研读原著，在学术上讲民主，真正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孟宪承认为，研究教育史的主要目的不是批判，不是揭短，而是继承。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教育传统、先进的思想、合乎规律性的做法，比如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不光过去提倡，现在适用，以后还要延续。为了培养更多的合格高校师资，他亲自任青年教师进修研究生班的教学工作，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曾有学生这样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讲课有条理……再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他的旧学底子厚，儒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这个班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班，在孟宪承的带领下，华东师大后来成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重镇。



△ 1951年孟宪承校长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 1957年冬，孟宪承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研究院班学员合影。前排左起：张瑞璠、孟宪承、张惠芬、旁听青年教师、后排左起：江铭、孙培青、郑登云、李国钧

(来源：孟宪承家属孟冰纹提供)

教育普及，让知识照亮最朴素的灯火

孟宪承精通英语、法语，晚年还系统地学习俄语，运用多种外语和渊博的知识，精心研究中外教育理论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受中外学者和专家的推崇和尊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理论，在中外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论文，著有《教育概论》《教育通信》《教育史》《大学教育》《教育与文化》等60多部著作，还翻译了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等多部专著，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认为“大学是最高学府，应包括知识的创获、品性的润溶和民族社会的发展”，其办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甚至还拓展到大学之外。



△ 1956年孟宪承校长与助手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孟宪承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他最大的成就是开创了我国民众教育之先河。他在《民众教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讲，民众就是工农大众，是全国人民中的大多数，搞教育，就要面向大多数，使大多数人能识字，有文化，有知识。这样，中华才能有望，才能振兴。如果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工农大众不识字，没文化，中国就会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就会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孟宪承明确指出了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发展民众教育。为此，早在浙江大学任职期间，他就在杭州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和民众教育馆，躬亲教务，总结办学经验，发表了许多文章，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

比如，同样是教民众识字读书，他觉得“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教民众维持生计，他的办法是走职业教育的路，举办民众职业补习学校，“乡村注重农业补习，县市注重商业补习”。而如何让闲暇的时光更有意义，他主张“用艺术的手腕”，在北夏实验区设立民众茶园和俱乐部，组织戏剧、曲艺、国技和民众音乐会，以及图书阅览室、巡回电影放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担任上海华东师大校长时，他还积极主张办好函授教育和广播教学，制订《华东师范大学分科结业制函授教育试办广播教学简说明》，鼓励自学者参加函授学习，进一步扩大民众教育面，为基层培养和提高师资队伍教学水平提供了新的学习机遇。

1976年，孟宪承病逝，这位总说“教育要向下扎根”的先生，最终活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棵常青树。

如今，华东师大闵行校区的孟宪承·刘佛年教育成就陈列室里，静静陈列着孟宪承丰硕的学术著作。玻璃展柜外，每天都有年轻学子驻足——那些他毕生倡导的“民众教育”“师范精神”，正通过新时代的青年，继续书写着未完的篇章。

资料来源：《武进名贤》“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文江学人”微信公众号

中国风工程事业开拓者孙天风

同济风工程团队

人物简介：

孙天风(1920—2010)，江苏省武进县人。流体力学家。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1948至1956年赴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学习，从事超声速和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期间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哲学博士学位。

学位。1957年回国后，组织上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安排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先后被聘为数学力学系、力学系副教授、教授，流体力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和科学工作40余年。他先后担任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工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北京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以及《力学学报》和《空气动力学学报》副主编等职。上世纪70年代后，顺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我国开拓和倡导了风工程（英文WindEngineering，是60年代由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当时称工业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在中国科学协会和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的支持下，筹备和组织了中国风工程协会。进而大气边界层的风洞实验模拟、工业和民用建筑的风载实验研究以及钝体空气动力学基础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中国的风工程事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孙天风教授于2010年11月24日在美国加州逝世，享年90岁。

成长历程

孙天风教授，1920年8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漕桥镇。1932年进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学习。七七事变后，随家人逃难到贵州铜仁，遂入铜仁国立第三中学继续求学。在父亲影响下，孙天风勤奋学习，成绩优秀，于1938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化学系学习。他身在昆明，耳闻目睹日军飞机在我国到处狂轰滥炸的状况，在全国军民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精神鼓舞下，他立志要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增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能力而献身，他毅然于第二年（1939年）由化学系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航空工程。1943年于航空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随校迁回北京在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

1948年孙天风公费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学习。他师从国际著名空气动力学家W. R. Sears，潜心研究超声速流动以及激波的反射与衍射，做出了突出成绩，相继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康奈尔大学做研究工作至1956年。孙天风在美留学期间无时不在关心祖国所发生的一切，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成长感到十分鼓舞，对国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伟大建设事业更是感到兴奋，总想将自己的



William Rees Sears

一份力量贡献给祖国。1955年日内瓦中美谈判，促使美国政府允许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此消息传出后，孙天风振奋不已，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美国移民局要他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建议，不惜绕道欧洲寻求回国之路。他达到伯尔尼后，与我国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经使馆周密安排，于1957年2月6日回到北京。

开创我国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教学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正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处于兴起和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孙天风教授选择了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从事教育和研究工

作。北京大学的力学专业是由周培源教授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力学专业，它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力学人才与开展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使命。孙天风除讲授流体力学专业基础课外，还开设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课程，主持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讨论班，培养研究生。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开辟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科研方向。1958年，他和其他同事一起设计并建造了国内最早的方形截面（ $5\text{cm} \times 5\text{cm}$ ）激波管，在该设备上做了大量的教学和科学实验，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激波绕射实验研究，获得了系列成果。

开拓我国风工程研究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孙天风教授仍然关注着世界上流体力学的发展动向。他敏锐地注意到在发达国家兴起的工业空气动力学，即风工程（WindEngineering）研究，已成为空气动力学研究重要方向。他预见到，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将会提出大量的风工程学科的课题需要研究解决，因此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将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向重点转向了风工程学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为此，他在系内积极组织研究队伍的同时，积极与国内工程设计部门、研究院所协作，从实际需要出发，承担工程实际中提出的有关结构物风荷载紧迫性研究课题，利用学校的实验设备和技术进行实验，参加现场实测等方法开展研究工作。

风工程学科是一门由经典的空气动力学同气象学、气候学、结构动力学和建筑工程、以及环境、人文和社会等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在大气边界层中风与人类活动及其劳动产物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成立了国际学术组织——国际风工程协会；和相应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国际风工程学术会议。

1980年5月，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即目前的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成立，孙天风被选为常务理事。在他的倡导下，工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于同年11月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任主任委员。多年来，孙天风教授为发展我国的风工程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专业委员会开展了多种学术活动，每四年举行一次全国风工程与工业空气动力学学术会议，举办各类专题学术讨论会，诸如“风工程试验设备、试验技术及其应用”“结构风效应”、“车船气动力”“大气

扩散”、“体育流体力学”等，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国内风工程学科研究的学术交流。

为了普及和规范国内风工程学科的研究，充分利用国外已经获得的成果，孙天风教授组织和主持了后来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汉风工程与工业空气动力学词汇》的编辑工作。此外，他还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活动。1983年，孙天风教授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风工程学术会议，并被选为国际风工程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我国风工程研究的进展和成果；1987年起又兼任该委员会的亚太地区秘书。1989年他联合广电部设计院与美国国家标准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开展对在建的沈阳电视塔进行现场实测和风洞模拟实验，开创了中美风工程研究合作的先河，遗憾的是由于其他特殊原因，该国际合作项目没有完全实施。特别是1989年，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届亚太地区风工程会议，为我国风工程研究正式跻身国际主要舞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一）在国内开创性进行大型双曲线型冷却塔风荷载研究

孙天风教授主张科学的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主持并亲自参加在北京大学Φ2.25m大型低速航空风洞中进行了大气边界层气流模拟实验，这项实验在国内尚属首次。在此基础上，就大型双曲线型自然通风冷却塔的风荷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实验研究结果与全尺寸塔的现场实测结果相配合，提出了国际上光滑塔面双曲线型自然通风冷却塔的第一条风压分布曲线，这一研究成果被国内相关部门列入了设计规范，并引起了国际同行专家的关注，为国际风工程权威性著作所引用（参见附注）。在上述风洞模拟实验中，其雷诺数远小于设计风速下全尺寸塔雷诺数，为增大模型实验的雷诺数，他提出了在光滑塔表面经向均匀粘贴丝线，增加冷却塔模型表面粗糙度，以增大模型实验雷诺数的方法，来解决两种状态下雷诺数大小悬殊的问题，并获得成功，这使得风洞模拟实验研究结果可以直接应用到全尺寸的工程设计中去。继之，他又主持并亲自参加对其他一系列类型的冷却塔，例如横流塔、加肋塔等，以及塔与附近建筑物的影响等具体的工程项目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工作。为了使风洞模拟研究更具科学依据，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主持实施

了多项现场实测工作，将实测数据和风洞实验数据详细对比分析归纳，获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代表当时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家电力公司的支持下，又系统地开展了大型冷却塔塔群的风荷载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各种几何参数排列的冷却塔风荷载系统的风洞模拟实验，以及将北京石景山电厂新建两座120m高冷却塔工程项目作为实例，分别进行了风荷载风洞模拟实验和现场实测研究。冷却塔风荷载现场实测工作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北京的大风通常发生在冬、春季节，天气寒冷，虽然具体的实测工作由协作单位当时的电力部西安热工所负责实施，但孙天风教授一样给予极大的关注，从实验仪器的布置到相关的操作步骤，从数据的采集到分析处理无不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特别到大风来临时，他都亲赴现场，和同事们一起分析解决现场测量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使实测工作顺利进行。之后，将获得的现场实测结果和风洞模拟实验结果作了对比分析，其结果在国际风工程学术会议上发表后，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有关成果也被应用在国内有关规范中。

附注：

在1973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冷却塔首次在山东辛店电厂举建，要求达到90.0m高度，在此之前建造的冷却塔大部分为60m~70m高。在1973年以前，中国、民主德国以及苏联大部分的冷却塔通风筒设计计算采用平均风压分布的罗比锡公式，而在英美各国大部分采用Batch-Hopley平均风压分布曲线。从1973年开始，北京大学以孙天风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利用当时辛店冷却塔原型的1:100缩尺模型进行风洞试验，为了模拟雷诺数相似，在模型上沿母线贴了32根丝线，得到了一个新的风压分布，此分布被称为北大32项拟合式。1981年和1982年北京大学与西安热工所对河北马头和广东茂名（90.0m高度）两座冷却塔原型上，实测平均风压分布与北大32项拟合式吻合较好。1989年，原水电部对冷却塔平均风压实测结果组织了鉴定和评审，形成了我国较早的火力发电厂水工设计冷却塔风荷载条款，即NDGJ5-88技术规定。

（二）柱和柱群的风荷载研究

孙天风教授在风工程应用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在应用性基础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比如，柱群绕流问题研究，涉及到流体力学的

许多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价值。同时，在实际工程中又有许多柱群，其柱之间存在互相干扰的重大工程问题，例如，电站大型冷却塔群（其横截面为圆形的双曲线桶形结构），石油和化工中的管道系统、架空电缆和缆索等，在强风作用下都会产生相互干扰的问题，严重时会导致结构物的破坏，造成重大损失。例如上世纪60年代英国渡桥电站冷却塔群倒塌事故。所以该项研究又是交叉学科风工程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作为经典的钝体空气动力学问题，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公认权威M. M. Zdravkovich等对圆柱和圆柱群的绕流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并且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具有权威性的综述性文章，然而，却主要是集中在亚临界雷诺数范围内。而现实中的风工程问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超临界或高超临界雷诺数、来流为大湍流度的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在实验设备和研究技术上都有相当的难度，国际上这类的研究结果也很少。

基于从具有我国特色的表面无肋冷却塔群风荷载相互干扰的机理研究出发，在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气动中心等相关单位支持下，孙天风教授和他领导的课题组对圆柱和圆柱群在高亚临界、超临界和来流大湍流度条件下的的绕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揭示了一类复杂流动现象的本质，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对认识绕群体流动引起的相互干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相应的一类工程问题也具有潜在的重要指导意义。该项课题研究获得的奖励，包括：《结构物的风荷载》（1987）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表彰；《结构物群的风荷载》获国家教委（1997）科技进步三等奖；《柱群相互干扰研究》获得（2004）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详细的科学技术成果：

1) 在高亚临界雷诺数下斜列双圆柱的相互干扰

在国外通常的研究研究中，双圆柱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一般用L/D和T/D来表示，其中L和T分别是两个圆柱的横向和纵向距离，D是圆柱的直径。这涉及到了研究思想。由于双圆柱绕流相互干扰的复杂性，采用上述方法往往会丢失一些及其重要状态的复杂流动现象。孙天风教授提出了用N和b两个参数来刻画双圆柱之间的相对几何位置，其中N和b分别是两个圆柱之间的距离和两个圆柱的连线和来流的夹角。以此设想安排双柱位置进行了实验研究，终于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现象。发现了两个斜列布

置的双圆柱的相互干扰问题应该划分为邻近干扰、剪切层干扰和尾流干扰三种性质完全不同干扰机制区域。特别发现了在创新性提出的剪切层干扰分类下出现的非定常极端空气动力载荷和双稳态特殊现象。通过实验结果给出了不同流形的分类，双圆柱间距比变化的影响，雷诺数的影响，小间距比的影响，双稳态切换现象机理的深入研究结果，双圆柱总体升力和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等等。国际同行在多次引用该项成果的同时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们的论文中明确指出：该项成果扩展了国际权威 M. M. Zdravkovich对双圆柱绕流相互干扰的分类；揭示了相对复杂的流体动力学现象；更深入、细致的揭示了柱体间相互干扰内在本质。

2) 在超临界雷诺数、高湍流度下双圆柱的绕流特性

首先在超临界雷诺数、高湍流度下获得了绕单圆柱流动的特点，特别是在首次得到了表面脉动压力的分布随雷诺数和来流湍流度大小的变化。进而，系统进行了串列、并列和斜列布置双圆柱在不同间距比下的平均和脉动压力分布随间距比的变化和规律。获得了双圆柱在上述各种状态下系统的空气动力特性。

在超临界雷诺数下，串列双圆柱在不同间距比下，前、后柱的压力分布特点和空气动力特性，提出了4种不同干扰机制的分类。并列双圆柱在不同间距比下，左右柱压力分布特点和空气动力特性，提出了3种不同干扰机制的分类。给出了斜列布置下的双圆柱压力分布和空气动力特性，并首次发现了斜列布置的双圆柱在超临界雷诺数下也会发生独特的流动切换现象及其相应的压力分布切换。

3)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双圆柱表面脉动压力测量

脉动压力测量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包括数据采集和测量系统的频率效应等，孙天风和他领导的课题组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双圆柱表面脉动压力测量，获得了许多新的结果内容包括不同间距比的串列双圆柱、并列双圆柱和斜列双圆柱。分别在亚临界雷诺数和超临界雷诺数下获得了系统的新结果，被M. M. Zdravkovich2003年由英国OXFORDUniversityPress出版的专著《Flowaroundcircularcylinders, Vol. 2: Applications》大量引用。

为人师表、兢兢业业培养人才

孙天风教授热爱教育事业，他认为青年学生思

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青年人在一起，教师的身心和学术思想会永远年轻。他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认认真真做好教学工作，无论是讲授课程，带讨论班，还是指导学生作毕业论文，都应将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1978年，力学系随原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迁回北京后，招收了“文化大革命”后的首届学生。年近60的他，为讲授流体力学这门重要的基础课，他日夜准备教材写讲稿。孙天风教授曾患扁桃体上皮癌，大剂量放射化疗使他严重缺乏唾液，说话非常困难，但他全然不顾这些，再次走上讲台授课。讲完每堂课，他都唇焦口赤，难以忍受，在座听课的教员和学生都为之感动。流体力学课程他讲授过多遍，但他还与其他教员一次次讨论和修改教学大纲和讲稿。每次讲课前都要查找相关文献，将国内外相关的最新发展的信息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

孙天风教授在教学上的严谨学风也充分反映在他的科学的研究中。风工程研究的主要环节是风洞实验，所以他对他课题的实验方案，实验仪器设备的准备和实验过程与数据采集都十分重视。实验方案都是他和同事们共同讨论、亲手制订的，实验仪器设备的准备和实验过程的操作要求做到准确到位。80年代后，孙天风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还是经常参与现场实验；为保证实验的准确性，他对每一个实验细节、每一个数据，都很重视，发现操作有不到位时则要求重做，一丝不苟从不含糊。1988至1990年期间，为完成国家重大项目海洋工程中的力学问题的子课题——柱和柱群的风荷载的研究任务，他连续三年亲赴四川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试验基地指导风洞实验工作。风洞实验往往安排在晚间进行，每次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指导，坚持工作到次日清晨实验结束。白天还要及时分析实验数据和结果，调整下一次的实验方案。孙天风教授十分重视实验基地和设备的建设，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北大成立了环境流体力学实验室，并自筹资金筹建了风工程研究的专用风洞，为研究生培养和科研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自己多年从事风工程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国际上风工程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为研究生开设和亲自讲授了《建筑空气动力学》课程。孙天风教授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科学研究中的新思路新方法，追求新结果的科学作风，给研究组每个成员，给他的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战火砥砺的青春

——记离休老干部何志新

谢达山

何志新同志是中共湖塘镇党委老干部支部的离休干部，是支部里数位高龄党员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军人。

何志新原名树新，1925年10月出生于湖塘桥南何留墅村，祖辈务农，父亲何长海曾在鸣凰集镇开布店，日伪时期因屡遭蹂躏生意难继，不得已将小店迁徙到小河乡的石桥。日伪军常来袭扰，多次进村烧杀，残害无辜群众。面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时尚年少的何树新义愤填膺却无能为力。新四军锄奸杀敌的事迹激励着近地的热血青年，1945年4月，应抗日民主政府召唤，当年20岁的何老毅然投身新四军队伍——丹北独立团3连（5月编为苏中五分区特务第1团），为避免连累家人，何树新入伍后改名何志新。“2015年到北京参加大阅兵的新四军代表郑竹波，当时就是我们团的政治处副主任。”——谈起刚参加革命的这段历史，何老自豪地说。

在日伪时期何树新就多次参战。“入伍不久，我就参加了扬中公济桥保卫战。”何老回忆说。据《扬中县志》记载：1945年6月28日凌晨4时，日军70余人分乘3条木船，由夹江进思议港，在港南端闸口处登陆东岸，企图北进抢占八桥镇东跨思议港的公济桥，偷袭驻镇西的中共县机关，途中被我警戒哨发现并交火。听到枪声，扬中县警卫营和分区特务1团立即投入战斗，先在公济桥阻击，敌退后又尾追到镇东北的唐家桥（今永安桥）围歼敌残部。激战至傍晚，日军丢下25具尸体和1名俘虏仓皇逃逸（志称“两桥激战痛歼日军”）。“这一仗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和20多支步枪，警卫营2排4班打得最出色，第二天就召开庆功大会表彰了他们。”何老绘声绘色地叙述了那一仗的大概经过。

1945年11月，分区特务1团整编为华中军区2分区4团（俗称“老4团”），何老被编到2营5连3排9班。“团长叶克守（兼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正军待遇离休），政委张玉辉。抗战时武北入伍的大



都在这个团，1营长项林荣是奔牛西蒋村人，入伍后我分配在1营营部通信班。”何老的邻居、离休干部邹坤度（原籍武进安家舍）回忆说：“何志新和我是同时期入伍的，都在4团，他在2营5连，我们是到部队后才认识的。”

对日军的最后一战，是1945年12月下旬的高邮战役，分区部队配合主力歼灭拒不投降的日军1100余人、伪军4000余人。“在战场上我经常是冲在前面的，8班长殷本善是共产党员，1946年4月由他推荐介绍，组织发展我为预备党员。”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苏皖地区成为蒋军主攻方向之一，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发起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敌5万多，粉碎了汤恩伯

所率5个整编师12万余人的进攻，其中最激烈的是第六战——邵伯保卫战。“参加这次战斗的是华中军区第2分区4团和5团，以及我们华野10纵的82、84、87、89团。”时任89团政委黄烽同志（沙家浜36伤病员之一，累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邵伯的防御主阵地是运河大堤、洋桥和西寺大王庙，其中争夺最为惨烈的是运河大堤正面防御阵地，坚守这一段的是4团2营。”

8月23日拂晓，黄百韬部108旅和40旅向我4团2营阵地疯狂进攻，曾连续越过几道障碍接近5连阵地前沿。“我们充分利用战前与支前民工和当地群众一起挖掘修筑的战壕、防炮掩体和多座碉堡，在3连、4连配合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多次架设浮桥渡河的企图。”何老含着泪花回忆说：“25日，敌人不但出动了坦克飞机，还调动了高邮湖上的炮艇配合，2营在1营和3营配合下，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冲锋，5连1排全部牺牲，连长吴增富率领我们与敌拼刺肉搏，他头部受伤仍坚持战斗，直到夺回一度被敌人攻占的阵地，他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阵地上。敌机又来轰炸，一颗炸弹在我身后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了我的后背，我顿时鲜血直冒倒在战壕边，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爬起来。班长看到后，马上喊来支前民工，用担架将我抬到城隍庙附近的战地医院救治。”

在千疮百孔的运河大堤难以再坚守的关键时刻，援军10纵89团到了，于是我军在26日组织了多次反击，敌主力伤亡殆尽。经过4天的浴血奋战，我军终于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黄烽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邵伯保卫战胜利的捷报传到野战军指挥部时，谭震林政委称赞说：“他们打得好啊！飞机、大炮、炮艇都顶住了，杀伤敌人2000人，打得黄百韬夹着尾巴逃走了。”

何老年少时进过私塾，还读了几年小学。伤愈归队后，何老转为正式党员，并被派到连部当文书。不久又先后给军分区副政委吴嘉民（1955年授少将）、政委惠浴宇（累任江苏省省长）两位首长当警卫员。

解放战争中，何老多次在战斗中受奖立功，其中在胡家庄伏击战中荣立三等功。据《兴化县志》记载：“1947年2月4日（农历丁亥年正月十四）上午9时，驻县城国民党军乘炮艇、登陆艇各一艘，木

船30余艘，沿海沟河进至吉成庄登陆，到胡家庄、老舍一带抢粮、抓人。平旺、海河两区队配合华中2分区4团伏击来犯之敌……。下午4时，敌人从胡家庄成一路纵队沿大路行进，进入伏击圈。分区部队及海河区队立即发起攻击，战至下午6时许，共歼敌海军参谋、保安中队长及以下40余人，俘炮艇艇长及以下80余人、还乡团5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步枪87支。此战以极小代价，获得较大战果，创水网地区作战范例，华中军区传令嘉奖。”“1947年我还参加了奔袭穆家堡、收复盐城、收复樊川等战斗，被分区司令部授予二等功，奖励一条被单。”

1948年4月，2分区4团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1纵33旅97团，时任旅长梁灵光（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政委吴嘉民。时任旅政治部文书的何老，亲历了8月6日由梁旅长指挥的启东汇龙镇袭扰战，有效牵制了企图合击苏北解放区的蒋军。

1949年2月，华野11纵33旅改编为第3野战军10兵团29军87师，何老任师炮兵连副指导员。渡江战役前夕，兵团领导选派87师260团团长李干（1982年正军职离休）等偷渡过江，配合江阴要塞地下党成功举行了战场起义。“我带领的1排，装备了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战防炮（反坦克炮），从江阴东段顺利渡过长江，经无锡、苏州进军上海。在上海外围战中，我们1排的两门炮，打掉了蒋军两辆坦克，其中一辆让它带伤跑了。”何老有些遗憾地说。其后，何老随队参加了福建战役，解放漳、厦之后到福州军区第14步兵学校学习。1952年9月，何老任福州军区后勤训练二队指导员，继后分别到解放军第92医院、第103医院工作。

1958年3月，何老转业到地方，参加了筹建福建三明化工厂的工作并在该厂任职。1984年8月，何老以行政19级营职干部身份离休，安置到故乡武进县湖塘乡何留大队（今属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何留社区）。如今，何老于湖塘镇花园社区安居，参加中共湖塘镇党委湖塘老干部支部活动。

何老当年的战友、发妻郭佩芳（福建省福安人）已过世多年，何老现由孝儿仁杰伴居照料日常，虽年逾耄耋，仍行动稳健，着装时宜，不减军人风采。近些年来，看到祖国在改革开放中日益繁荣富强，何老动情地说：“我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感到欣慰。三明化工厂、老家的领导和乡亲们，对我这个老兵都很好，满足了！”

女外交官毛娅平

包立本

提到当代常州武进籍女外交官，首先大家会想到袁晓园。实际上，常州还有一位女外交官，也相当优秀，她就是毛娅平，她的先生就是外交部原副部长武大伟。

毛娅平出生于1946年，而且与我家颇有渊源：20世纪50—80年代，从她父亲毛凤，到她女儿武黛，毛氏三代人曾经在乌龙庵72号孟宅借居了近30年。我和她女儿是在一个大院里一同长大的玩伴。她先生武大伟来常看望丈人、丈母娘，也在乌龙庵孟宅住过。

武大伟出生于1946年12月，黑龙江省海伦市人。大学毕业后，于1973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职员、随员，国务院办公厅副处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二秘、一秘，外交部亚洲司处长、参赞，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中国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2004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洲地区事务、条约法律工作。曾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毛娅平由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学习，后到外交部工作，担任参赞。

武大伟夫妇对常州充满了感情。当年，凡是常州有政府工作人员去外交部办事，武大伟夫妇总会安排时间会见大家，没有一点架子。20世纪90年代初，在常州市和日本所泽市缔结为友好城市过程中，其时，武大伟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他们夫妇出了大力，积极促成此事。至今，红梅公园内还有国际友谊林，见证了这段历史。

2000年，常州某校的学生代表团访问韩国时，不慎将护照丢失了。时值星期五，学生周六就要回



毛娅平（左一）、武大伟（左三）与友人

国，无奈之下，有人去电驻韩国大使馆找武大使和夫人毛娅平参赞，听说是来自家乡常州的学生，他们二话不说，跑前跑后，在他们的帮助下，为学生代表团补办了手续，得以按时回国。

2001年8月中旬，时任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溢涛等刚从欧洲出访回国，他和市外事办副主任李兴坤，省常中校长、外国语学校董事长韩涛等一起商量，准备为刚成立的常州外国语学校聘请顾问（后来改为名誉校长）。期间，李兴坤提议，由于武大伟的夫人是常州人，而且是从省常中毕业的，所以聘请武大伟担任顾问更有意义。

武大伟接到聘请函后，一口应允。2002年1月上旬，武大伟回国述职，来常探亲（时任驻日本大使）。1月11日下午，他到常州外国语学校和省常中听取了学校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出席了授予他为外国语学校名誉校长的仪式。仪式结束后，武大伟还参观了外国语学校的校舍，和师生们进行了亲切交流。

（下转第85页）

劳模型修志专家 学者型人民公仆

——祝贺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在常州设立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

黄海国

2025年11月1日，“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在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挂牌。

按照省委老干部局统一部署要求，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研究同意，在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设立“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这是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首个(批)以共产党员个人名字命名的老党员工作室。

为什么是张尚金同志？

张尚金，1939年1月15日，生于江苏武进县何留乡第十保（今属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永安社区）外塘河村，明末解元、进士张玮后裔。1956年在江苏省常州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中师毕业后参加工作。1960年5月，张尚金出席江苏省文教群英会，被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省长惠浴宇授予“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江苏省劳动模范）。

曾任孟城初级中学代校长、党支部书记，共青团武进县委书记，中共武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党史办主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县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县广播电视台局长、党组书记。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处长等职。2007年办理退休手续回到家乡，至今一直坚持每天上班，编史修志，义务负责多个研究会日常工作。

张尚金 1994年被列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重点条目方志学者。《中国地方志年鉴2018》人物选介之五。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他在入党为民69载，“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修志44年的劳模型修志专家，学者型人民公仆。

一、自学成才的好学生。 1945年—1957年，先后在武进县黄岕小学、常州市第一初级中学和江苏省常州师范学校完成学业，被多次评为“优秀学生”“优秀团员”。1966年2月—8月，曾在中央团

校学习。一直坚持自学。1986年，从南京大学和省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党政干部基础科大专毕业；1990年，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专业大专毕业，获上述两专业优秀毕业生称号。至今他仍坚持每天记学习和生活、工作日记，近几年除学习习近平讲话、党章、宪法、法律外，还重新学习《论语》《唐诗三百首》《国学经典名句》等，张尚金把学习的体会形成自己喜欢的格言100条编入公开出版的《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书上。这些由他整理撰编的格言，有7条被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人生格言经典》入录。有8条被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优秀格言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人格言》录用。其余分别被编入在北京召开的《共庆中华民族大团结，同贺新春佳节大拜年》会刊（2002年2月3日—2月4日）和《年鉴学浅议》（方志出版社出版）。

二、省政府表彰的好教师。 从1957年起，分别在武进县丫河中心小学、小河中学、孟城初级中学、政平中学等学校任教，曾任小学教师，中学团委书记、代校长、校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1960年5月，张尚金表彰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20世纪90年代，作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曾多次为该校承办的全国或全省地方志和年鉴人员培训（研讨）班讲课。著名方志研究学者、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奈夫为张尚金、杨汉平合作编著的《年鉴学浅议》（其中有张专著《年鉴学简明讲义》）所写的序言中称：“这个讲义对年鉴学的基本理论、历史发展、技术方法三大部分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力求做到简明、通俗、实用，并有所创新。”对张尚金先生在年鉴学方面的创见给予了较高评价。此书曾一度作为江苏省以及西藏等地

年鉴培训的教材，至今仍有不少人把此书作为编纂年鉴的入门参考书。2006年，日本广岛大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日本广岛历史学会海外评议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后任副会长）王卫平在《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集》序二称“尤其张尚金先生为人谦和，于学问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开拓实干的好干部。 1956年12月16日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5月26日常州师范党支部大会通过他入党，因不满18足岁，到满十八周岁生日一天，正式批准，后查家谱是生于1939年1月15日。）历任共青团武进县委书记、夏溪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党史办、方志办主任，《武进县志》总纂，常州市武进县革命斗争史编委办公室副主任，常州市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武进年鉴》编委副主任，县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县广播电视台局长、党组书记，县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恽代英研究会常务理事，县地方史志协会名誉会长等。1992年2月调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任市县指导处处长，还任《江苏省志·人物志》副主编，中国年鉴研究会地方年鉴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年鉴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出版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志》编委会成员，《泗洪县志》以及《泰州志》的顾问，无锡吴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在武进县方志办、广电局及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期间，与人合作，主持或参与做了十件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事。（一）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进县志》是省志办首次召开全省审稿会，正式验收批准的第一部县志，是全国首届修志最早正式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新县志。（二）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进年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省最早公开出版的县级综合年鉴。（三）1985年，武进县志办发起的苏锡常三市所辖县（市）志协作交流会在武进县召开，这是江苏省首创的县志交流协作模式。（四）1986年7月协助省志办，在武进举办江苏省第一次地方志训练班，顾秀莲省长在大会上直接听取朱锡通、李明、薛奇达、张尚金、王鹤

分别代表所在单位所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五）在第一届（1982—1988）修志中，武进共编印乡镇志66部、县专业志（史）39部，为当时全省乃至全国编印乡镇志和专业志最多的县（市）。

（六）1989年—1992年间创建武进县广播电视台干部学校、县广播电视台科技研究所、武进有线电视台（试播），都为江苏省县级局（站）之首创；创建武进县调频广播电台，积极建议县政府正式建立武进电视台，为武进广电中心正式建成开播做了一定的贡献。（七）1992年成立武进县地方史志协会，这是江苏首创的县级研究地方史志的协会。（八）1992年9月，江苏省首次年鉴协作会在武进召开（至2002年共召开九次）。1999年张尚金执笔，由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颁发的《关于加强市、县地方综合年鉴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是全国县级地方志系统最早出台的管理性文件，至2000年底，全省76%的市、县（市）出版综合年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九）按省政府第一轮要求编修的11部省辖市志和64部县（市）志全部公开出版发行，名列全国前茅。由张尚金起草，经省政府办公厅于1997年发出的《关于全面开展省辖市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是全国各省、市、区中由省政府把区志纳入首轮修志任务的先例之一。后全省省辖市区志全部出版。（十）1998年，与吉祥合写的《续修地方志要解决修志机构的法制化、规范化问题一对第一轮修志机构改革中修志机构设置的思考和建议》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张尚金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被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表彰为省修志先进工作者，被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表彰为“优秀党员”。

四、江苏省有影响的方志学者和修志专家。

1981年至2025年3月，四十四年来，张尚金一直坚守修志岗位，从事专兼职编纂地方史、志、鉴、谱工作，曾主编（总纂）、编著、参与撰稿（含与人合作）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武进县志》获1993年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最高奖）、《武进编史修志文论集》《江苏名村志》（获1994年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最高奖）），《年鉴学浅议》《南京市鼓楼区志》《南京市志》（原称《南京通志》）、《江苏省志·人物志》《武进志（1986—2007）》《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集》《毗陵前文荡张氏宗谱》《齐梁故里

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吴稚晖》《院士风采》《延陵季子研究文集》《延陵季子史料集》《武进辞典》《吴稚晖学术研究文集》《武进人物》《武进图书馆馆藏宗谱萃编》《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续集》《蒲公英丛书博物馆教育读本·龙城风情》(名人卷、民俗卷、博物卷)、《武进史稿》《常州市志(1986—2010)》《季札躬耕地舜过山吴下里》《广义方志文集》(含《广义方志简明讲义》《阳湖·文献大讲堂讲稿》《武进图书馆藏谱序编》《江苏常州庄氏名人志》等)《星火横山》《亚邦志》《常州城市管理志》《武进检察志》《共青团武进志》《郑陆镇查家村志》《洛阳镇汤墅村志》《新北区罗溪镇温寺村志》《新北区罗溪镇鸦鹊村志》《常州院士Ⅱ》《季子文化研究第一辑》(含《季札辞国论衡》《华夏仰风》《季子庙考释》)《上店历史文化文集》(含《上店乡志》《上店史话》《上店记忆》)等40多部书籍。由张尚金担任主编,从2009年创刊《常武文史研究》内刊(正式批准)至2025年9月共出50期,约980万字【全部登录中华延陵季子网(正式批准)】,在省及省以上刊物(含公开出版的书籍)发表文章300多篇。直接参与编纂、审核、校正的省、市、县、乡各类地方(专业)史、志、鉴、谱、录约340多本(含主编、编著、撰稿的40多部),约一亿字以上(其中120多本是退休后完成的)。

五、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张尚金被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收录2500余名学者)作为200名重点学者条目介绍。个人传略被《世界名人录》《当代群英》《世界华人艺术界名人录》《中外名人辞典》《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中国人才世纪献辞》《世界华人英才录》《中国专家大辞典》(当代卷)、《中国专家人才库》《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中华名人大典》(当代卷)、《中华张氏大辞典》等十多部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录入。他的数十条格言被公开出版的三部书籍录用。

2007年办理退休手续回到家乡至2025年,有关媒体、书稿发表对张尚金的评价文章有:2007年11月14日《常州日报》、2007年12月20日《武进日报》登载《盛世修志结硕果,锲而不舍得真经—喜读〈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集〉》(记

者陈富大撰)。2008年3月常州市武进区总工会编《劳模风采》入录张尚金事迹。2009年《江苏地方志》第一期、201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续集》上登载方志专家:苟德麟撰写的《一部特色鲜明的方志文论集—读〈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集〉》。201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续集》上登载《前文荡张氏宗亲联谊会公布首批族尊之一张尚金族尊简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卞杏英《简述“文论集”的精华—读张尚金〈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一书》(该文原载《武进文史研究》2013年总第十期)。《常州日报》2013年7月10日(A4 常州新闻特写:综合)登载《30多年,300多部(卷)著作,近2000万字—张尚金:编史修志是荣幸》(本报记者)谢雪梅 实习生王慧文。家庭文摘报发表《中国编史修志专家张尚金》。2015年12月总第18期《晚霞清影·冬之情》(中共常州市委老干部局主办)登载《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记退休干部张尚金》(离休干部赵逸轩撰)。2016年11月6日《武进日报》载《在武进,有这么一群挖掘地方文化的老人》。其中记:“张尚金:人生如朝露,价值在贡献。”(记者张军撰)。2017年2月在公开出版的两本书上载《心血书史志 健笔写春秋—记60年代省劳模张尚金》(江苏省“五一”奖章获得者黄海国撰)。2021年11月《常州日报》文笔搭载《实事求是的社科小工—记收入《中国地方志年鉴》的方志专家张尚金》(老鱼文、邵耀忠摄)。2022年2月26日《国际城市名人》发表程协润撰《研究与编辑地方志辞典著名学者—记收入《中国地方志年鉴》的方志专家张尚金》。2022年5月15日武进日报登载《85后张总编执笔记录城市青春40余年300余部(卷)著作超2000万字》。

六、广义方志学的创立者。张尚金编纂、审核、校正过的地方志(史)地方年鉴(部、册、卷、篇)甚多。他审视修志历程,探索方志学说理论,提出的“开创广义方志学”及“年鉴学”方面创见,在全国颇有影响,并获史志同行广泛认可。2002年,张尚金和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戴午林、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吉祥等方志学者,共同探讨了一个学术观点,即广义方志学。同年,《江苏地方志》责任编辑吉文成将张尚金撰写

的广义方志学论文，编辑定名为《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发表在该刊（增刊）上。该刊还同时发表了戴午林撰的《刍议创立广义方志学的必要性》一文，这是在全国方志学界首次亮出了“广义方志学”的学术观点。《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一文还曾获2004年中国经济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优秀论文获奖文库》特等奖并载入该文库第一卷。2007年6月，张尚金的70余篇、40余万言的《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集》公开出版。他还和杨汉平先生合作出版《年鉴学浅议》。十年后的2017年11月，他又将2007年及以后撰写的90多篇近50万字学术论文《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续集》公开出版。2024年12月28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义方志文集》赠书仪式在武进新苑宾馆会场举行。凡与会者均获赠《广义方志文集》一套。这套文集包括《广义方志学简明讲义》《阳湖文献大讲堂讲稿》《武进图书馆藏谱序编》《江苏常州庄氏名人志》等。《广义方志文集》的出版发行，是常武地方文献史上的大事，更是江苏史志界的盛事。标志“广义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正式建立（荀德麟）。《广义方志学简明讲义》说是“简明讲义”，实际上就是一部广义方志学理论创新、体例完备、可学可用的教科书。这本著作成功构建起了广义方志学的学科体系（吉光）。张尚金先生创立的广义方志学，是方志理论和修志实践结合上的理论创新，是对新方志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大）贡献的人。在此意义上看，张尚金无疑仍是广义方志学的第一人，创立者。但是张尚金是个求实、谦逊的人，他在《广义方志简明讲义》的后记中称：还要感谢审读本书初稿全国知名方志学者欧阳发先生，他指出：“确立某一新兴学科，首先要从理论上解决五个问题：（1）学科对象问题；（2）概念体系问题；（3）研究领域问题；（4）学科性质问题；（5）学科发展史。”值得我们深思。经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理论探讨，这次编著《广义方志学简明讲义》十五讲，抛砖引玉，力求为正式形成《广义方志学》这一学科体系作出贡献。

七、常州市社科联表彰的优秀社团工作者。

2007年4月，张尚金退休回常后，曾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常州市地方志年鉴学会学术委员，武进图书馆学术顾问，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会长（2020年后任名誉会长、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

常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顾问，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顾问，常州市名人研究会顾问、冯仲云研究分会副会长（2019年改任名誉会长），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2020年后改任名誉会长、文化学术委员会主任），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20年后改任名誉会长、文化学术委员会主任），毗陵前文荡张氏宗亲会名誉会长、《张氏家园宗谊年刊》主编，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名人研究院研究员，常州市政协文史委特约研究员，江苏省少先队储宁玲名辅工作室资深顾问，南风词社名誉会长，常州市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研究员，常州市武进区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常州市武进区（后改天宁区）舜文化研究会顾问，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季子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常州市延陵季子研究会季子京剧演唱队顾问，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董亦湘研究委员会顾问，武进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武进诗联家协会副主席，常州市武进区城南书院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苏南张氏宗亲联谊会名誉会长（后任顾问），武进家谱文化研究会顾问，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顾问，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顾问，常州市庄子文化研究会顾问，《武进文史研究》主编，中华延陵季子网站站长，延陵季子文化公众号顾问，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馆长（改后首席馆长），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领衔人等35个公益义务性职务。至2025年10月31日为止，张尚金以延陵季子和地方文献两研究会（合署办公）为基地，16年来坚持以延陵季子文化为开端引领的常武地区七大历史特色文化（春秋延陵季子文化、南朝齐梁萧氏文化、隋唐常州运河文化、两宋书院科举文化、元明辨惑求实文化、清代六大学派文化（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毗陵诗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共和常武经世文化）研究。做到六个坚持：坚持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季子诞辰日举办（与其他单位合作）季札公祭、诚信日活动，2009—2025年已举办17次；坚持办好《常武文史研究》（已印发50期）和中华延陵季子网（2012年创办）及延陵季子文化公众号（2024年7月15日创办，至2025年10月31日已刊登65期）；坚持办好延陵季子京剧演唱队（2015年成立）至今已公演29次；坚持办好阳湖地方文献大讲堂（2013年开讲以来，已讲54讲）；坚持办好传承延陵季子文化学术活动（2012年举办

中国·延陵季子高层论坛，至今已办十次传承季子文化学术主题活动）；坚持办好武进地方文献展览馆（2008年1月8日开馆，办成武进史志文库、武进历史名人文库、武进人著作文库、武进谱牒文库）及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2020年11月1日开馆）。已逐步形成“共和常武经世文化·文献流派‘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三创’（创新、创优、创业），经世致用、注重考证、全精特美、和清诚慎做人治学的二十字风格，至今已公开出版以延陵季子文化为引领的地方文献书籍58部。

张尚金常说：我是一名“社科小工”。而大家说他是“最忠诚的社科小工”。说他是季子研究的主要倡导者，诚信文化的率先践行者，广义方志学的首席创立者，“常武七大特色文化”推广传播者是很恰当的。

2018年，曾任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江苏省志》副总纂、江苏省地方志学会会长、中国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的汪文超，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张尚金文论续集》写代序《修志战线一位实干家》。该代序称：“张尚金同志的开拓、创新精神，还表现在2007年退休回常后所做的许多地方文化、文献资料等工作上。他对地方文化、文献资料等工作极为重视，为此付出艰苦努力，做出很大成绩”。

张尚金积极参与中共党史和地方史的研究。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他参与《星火横山》（由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编审工作，2015年中共武进区委党史工委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武进历史》，他参与审稿……。近年来，他对党史（革命史）人物研究花了大量精力，先后在报刊及出版的书籍和电视节目中上发表《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四位武进英烈——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董亦湘》《中共武进县（市、区）委历任书记和主要负责人名录》、冯铉、恽逸群、徐伯昕、王玉如、张致祥、陈涵奎等专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常武地区三大诚信人物（季札、恽代英、冯仲云）之一——恽代英烈士》（载华中师范大学、共青团湖北省委主编的《纪念恽代英诞辰120周年学术研究论文集》。《亲历董亦湘冤案平反昭雪始末》（《恽代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载入

《炎黄春秋》杂志。）

他对编修家谱也很倾情尽力。2007年6月至2010年4月，他紧张编修《武进志》的同时，挤出节假日，以主修兼主编身份，与族人合作，编成《毗陵前文荡张氏宗谱》，这是常武地区至今唯一公开出版的家谱。在修谱工作中，他提出团结修谱、廉洁修谱、精心（后改为精准）修谱诸多新颖的修谱学术观点，如科学民主修谱，不用族长体制；严守宪法法规，慎处敏感问题；男女入谱平等，公夏历精换算；古文标点注释，末卷设大事记；适应时代需要，选用彩照图表；新式横排版面，降低印刷成本；专家复审把关，尽力消灭差错；撩开隐私面纱，新谱公开出版等等。后又指导续修王氏、蒋氏、许氏、马氏等多部家谱。与人合作参与主编、编纂的《武进图书馆馆藏家谱萃编》，也于2017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指导编修由张汉忠主编的《常州东门街兰林公支·张氏家谱》，因未见祖谱，开创敬立一世的宗谱模式，可供至今找不到祖（前）谱的家族参考，张尚金为此谱审稿并写《慎终追远，创新之作——拜读汉忠主编的张氏新谱有感》的代序。这谱为当代谱牒学增添了一枝绚丽多姿的鲜花。

他积极提倡开展季子文化的研究。2009年，他参与创建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吴华生任会长，张任常务副会长），张尚金主持的研究会已参与编审出版九部有关延陵季子的著作，即《延陵季子研究文集》（主编 沈建钢）《延陵季子》（连环画）（主编周晓东）《延陵季子史料集》（主编 沈建钢、撰著 谢达茂）《季子评传》（周群编著）《季子的故事》（沈建钢、单松著）《季札躬耕舜过山吴下里文集》（沈建钢主编）《季子文化研究第一辑》（三本书）（谢达茂著）《季札传》（吴林华编著），并拍摄放映《延陵季子》四集电视文献片。对季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做了充分肯定。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见解，可供研究春秋文化、孔子、季子的学者参考。2019年12月第6期《江苏地方志》（封面标题）刊登《论季子的贡献和文化影响》（吴鎔、张尚金、吴建国合作）。从2009年5月12日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成立起始，逐步扩展到全市、全省，促成了2020年，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成立（首任会长吴林华）。2019年7月3日，由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

究会和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成员吴榕、沈宝祥、张尚金、吴建国，和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吉祥发起，以及常武地区的老干部、学者、乡贤薛锋、赵忠和、秦志法、陆惠根、谢达茂、沈建钢、顾相才、吴林华、周建春、刘灿方等参与申报的“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于2022年6月18日成立（首任会长周群）。16年来，武进延陵季子研究活动影响力、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成果的发布、基础性研究书刊的结集出版等，为江苏季子研究社团的增加、层级的提升、学者队伍的壮大，研究力量的集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张老所发挥的作用，所做的工作，大家都是清楚的。

他积极创办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是著名学者，也是1948年成立的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对于这样的知名历史人士，张尚金也主张予以文化学术研究。张尚金（自费）买了一套《中华民国史》。并对该书记述的吴稚晖内容作了摘记。其中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905—1949）记述吴稚晖（敬恒）的172条大事和66件涉及吴稚晖的重要史实。为研究吴稚晖提供重要史料。2010年，张尚金担任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会长，在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二次较高层次的常台吴稚晖文化学术研讨会，还多次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拍摄放映了《吴稚晖的家国情怀》《孙中山与吴稚晖》等电视文献片。他参与主编、编审并公开出版《吴稚晖法书集》（秦耕海编纂）《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吴稚晖》（主编陈毓敏、副主编张尚金、执行副主编许本源）《吴稚晖学术研究文集》（主编赵贤德、徐霞梅、张尚金），还积极支持参与《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徐霞梅著）《吴稚晖学术思想研究》（冯寿忠著）《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注：吴稚晖、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赵贤德著）等三本书公开出版。

2020年11月1日在吴稚晖故居（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在地、江苏省首批传统村落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雪西村创建民办的《武进院士博物馆》（张尚金为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名誉会长兼馆长）。2024年11月1日，常州院士展示馆开馆，常州院士展示馆全称为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是集中展示常州籍院士群

体风采的重要场馆，也是常州市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开馆当日，由张尚金任顾问、亲自为组织编撰工作奔波、张罗的《常州院士Ⅱ》（主编程中伟）同步举行赠书仪式、“弘扬科学家精神工程”启动仪式及“阳湖·文献大讲堂”第51讲等活动，馆内陈列了117位常州籍院士的珍贵资料（包括手稿、照片、科研成果模型等），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其他院士”五大篇章，通过展板、文字说明等形式，系统展示院士们的生平事迹、家国情怀及在各领域的杰出贡献。该馆在2025年11月1日，又举办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成立五周年活动暨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由江苏省科协、省社科联、省科技厅、中科院南京分院、省国防科工委联合公布）。

张尚金对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的研究已有四十多年。2008年参与在北京、常州举办的纪念冯仲云诞辰100周年活动，并在当年发起参与筹建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冯仲云研究分会（会长钱世康，张尚金任副会长、2019年改任名誉会长），坚持每年开展纪念或研讨活动。先后撰写有关冯仲云（含薛雯、冯铉等）十多篇文章，并编《常武文史研究》二期《冯仲云专辑》。其中：《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的传奇故事—纪念冯仲云诞辰100周年》，载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刊物《世纪风采》并作封面标题，《清华园走出来的抗日将军》，载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日报》。他又积极建议把横林中心小学改名冯仲云小学。至2021年已由当地党委政府承办，在冯仲云的母校—冯仲云小学内筹建冯仲云德育教育基地—冯仲云将军生平馆，张尚金参与筹建工作。

他还积极协助武进图书馆举办“阳湖大讲堂·地方文献系列”讲座，至2025年10月已举办54讲。并将其文稿汇编成册，列入《广义方志文集》公开出版。张尚金并在多种场合主讲《常武地区三大诚信人物——季札、恽代英、冯仲云》《浅论春秋延陵邑—清末民国时武进县的人文荟萃特色》《纪念中国国际共运专家、外交活动家冯铉逝世30周年》《今常州市中共第一个支部—横山桥支部和中共早期武进县委书记王玉如烈士》等讲座。

同时，他热情创办延陵季子京剧演唱队，开展唱响“爱常州”主旋律，汇聚“爱敬诚善”正能量系列活动。2015年5月30日，（农历四月十三日季子逝世2500周年纪念日）成立以来，已坚持为社团、学校，季子诚信日活动场所演出29场。张尚金自编自拉自唱的《仲云颂》（唱词：常州抗日（倭）两将军，载入史册威名震，抗倭英雄唐荆川，抗联名将冯仲云。季札、代英、冯仲云，三大诚信名贤人）已多次演出。

张尚金退休回常近十四年来，他担任常州市或武进区近30多个社团的名誉会长、顾问或研究员，由于成绩显著，2018年3月和5月，分别被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表彰为“2017年度优秀社团工作者”“2013—2017年度社团工作先进个人”。

汪文超在代序中称“张尚金同志从事地方志工作近四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工作，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他的工作精神、工作实绩难道还不值得说一说、夸一夸、赞一赞吗？

因此，我要大声地夸他，赞他！”“张尚金同志是个工作狂，是修志战线的老黄牛，是一棵不老松，也是修志战线的一代楷模，是我们身边一位真正的优秀共产党员！他的事迹应当得到传扬”。张尚金诚待“青年朋友”“教书育人”为师；诚结“同行朋友”，史志成果丰硕；诚邀“社会朋友”，研究历史人物，推动了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被誉为“劳模型修志专家”“学者型人民公仆”。在社科领域，他是“优秀社团工作者”“全国方志系统作出贡献的方志学者”。88岁的他，仍不知疲倦的为宣传季札、深耕地方文化、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而努力奋斗。他在2025年11月1日演讲中宣布，张尚金江苏地方志老党员工作室，将补修出版《常州府志（1694—1911）》，认真办好《常州院士展示馆》，指导编修《郑陆镇黄天荡志》《洛阳镇马鞍村志》作为近二年的工作任务。他是一棵“常青树”“不老松”、精力充沛“老黄牛”。

（2025年11月2日整理）

桑榆霞满照汗青

——张尚金先生修志四十四载赋赠

秦大峰

四秩躬耕史笔擎，丹心皓首续峥嵘。
钩沉史海销冤狱，辑录乡章集凤鸣。
百卷琳琅凝碧血，五秋风雨筑琼英。
伏枥犹驰千里志，桑榆霞满鉴精诚。

2025年11月11日撰于吴地书院

慈善初心不改，奔牛公益典范的邵山涛

邵永乐

据邵氏宗谱记载，在明代万历七年即 1579 年先祖就已迁居邑西巨镇奔牛了，祖先在奔牛 400 多年间，开店，置田，酿酒办糟坊，到父亲邵山涛这一辈已成为奔牛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邵家有着奔牛半条街的美誉，所酿美酒清初诗人吴梅春在作园园曲中就有“不吃奔牛酒，枉在江湖走的美言”。家父邵山涛（1890—1975），继承祖产糟坊，他平素乐意慷慨助人而深得人心，深受民国政府器重。民国 16 年（1927 年）废安西乡董事会（奔牛镇属武进安西乡）立安西乡行政局时，由商人一跃成为地方上的政界人士，先后任安西乡行政局长、农政区区长、奔牛镇镇长、江苏农民银行奔牛办事处主任、武丹联防会主任、奔牛商会会长、奔牛树人中学董事会主席、武进县公款公产主计员等。刘国钧在奔牛经商十四年离不开父亲的支持而成为好友。刘国钧曾与父亲商议准备在奔牛镇西建一个大型纱厂，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办成。刘国钧曾大力支持家父创办奔牛树人中学，和奔牛老公园。家父从不追名逐利，一生都扑在公益事业上，本着为百姓做实事的情怀做公益事业，造福一方百姓，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斥资筹办奔牛救火会、农民银行、禁烟禁毒所。他对培养人材颇为关心，亲自创办了奔牛树人中学。为了地方百姓有个憩息和文化学习的场所，集资创办了奔牛老公园和武进县图书馆，他曾在 1928 年在省交通厅和武进县长章列的命令下招民工配合国军三师共筑镇澄公路奔牛段。1931 年在上级命令下招集民工，任开浚大运河和孟河两河奔牛工程段主任。武进解放后家父任武进县第一、第二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武进中苏友协会员。1952 参加武进县庆祝国庆筹备会。送儿参军，我们成了光荣人家。因时间久远，时间可能有些出入，只能凭记忆和家父日记来简述他所做的公益事业。

1926 年创办奔牛救火会。奔牛古镇历次都经过战争的兵燹，家家都在废墟上一次次地重建家园，所建的沿街房屋大都是砖木结构带木质阁楼的房屋，稍不注意极易引起火灾。民国 15 年（1926 年）奔



牛镇商会改选父亲任商会主任。父亲募集资金去上海购置了两部救火洋龙，以及全套的救火工具，成立奔牛救火会，家父任会长。救火队员从商户中选择热心公益事业的青壮年担任，订立了简章和消防制度。会址设在水陆交通和取水都很方便的临街大运河处。救火队员是义务的不取分文报酬，家父常组织救火队员进行演练，如遇商户失火第一要紧的是，值班救火队员紧急敲响救火铜锣，锣声震天响很是急促，救火队员听到锣声立刻奔赴设在街上的两处救火会，队员们推动洋龙，带上装备急奔火场，失火处的近邻也会拿着面盆、木桶等加入救火队伍。灭火结束后要轻敲三下回声锣，再把救火设备推回各自的救火会，并及时修整晾晒以备下次再用。为了防止特大火灾，遇到奔牛两个救火会都难以扑灭的大火灾时，家父联系常州救火会进行合作，成立常州奔牛联合救火会。从此再也没发生过以前奔牛乾丰泰钱庄失火烧死七人的悲惨事。

1928 年创办江苏农民银行奔牛办事处。奔牛是水陆交通的重要码头，三里长街的商店一家连着一

家，与这配套的钱庄也很多，有句俗语叫坐着借债，跪着索债。有个别无良心者用伪造的地契作贷款抵押，等借款一到，人便如泥牛入海毫无音信了。所以钱庄都雇用跑街人，他们 5 天或 10 天就向借贷人索取利息，有的钱庄还放印子钱索取高利息。家父为了整治这种乱象，决定创办银行。他联系了江苏农民银行得到了允许。家父在中街府庙门口，有两个大石狮子的地方，全资开办了武进乡镇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江苏农民银行奔牛办事处。借贷利息要远低于钱庄，并且还进行粮食储押，经营质押业务。武进解放后钱庄的历史告终，江苏农民银行奔牛办事处有新政府接收，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奔牛办事处。现遗址还在，并在运河边挂有匾额来介绍此银行的前世今生。

1931 年开浚大运河、孟河两河奔牛段工程处主任。奔牛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大运河、孟河两河串镇而过，也给奔牛带来了繁荣。但由于河道狭窄，长江的泥沙常常淤堵航道，历朝历代都要多次开浚。1931 年初春，武进县长吴德耀任命家父为疏浚大运河、孟河两河奔牛段的分局长。两河疏浚工程共招六千名民工，经费有武进县出资。大运河疏浚奔牛段是奔牛至连江桥，疏浚工程较为顺利。疏浚孟河也分为四段分别是奔牛，罗墅湾，石桥，小河，疏浚不久遇到春水早发，大水从石桥段倒灌进未完工的孟河全境，疏浚总工程师庄敬宣布暂时停工之后，不久孟河全境也疏浚完工。审计各段账目时，发现小河段的四联单的骑缝章系伪造，有贪污工程款迹象。这时武进县长侯厚宗，召集各工程分局长开会，派人核查各段账目，发现小河段四联单是伪造，过后将小河段分局长王季康和会计朱蕴山逮捕法办。

1932 年成立禁烟，禁赌，禁娼协会。民国时期奔牛是常州西乡巨镇，交通发达商铺林立。但黄赌毒盛行，三里长街有商住旅馆 6 家。房间总数有 2 百多间，当时有许多妇女因生活所迫，来镇上找工作，来到客栈不少人被老板逼良为娼，奔牛的淫风可谓盛矣。镇上的赌博也是盛行，赌博主要在茶馆店进行，全镇有大小茶馆 20 多家，堪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赌博种类也五花八门，有麻将、牌九、扑克等，下的赌注还相当大。赌徒们通宵达旦地赌，都想一夜之间能发横财，但最后都输个精光。为了翻本就去借高利贷或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后继续赌。那时穷人赌，富人赌，男人赌，女人赌，真是十人九赌呀！赌风吹遍了整个古镇。繁华的奔牛古镇有大

小烟馆 63 家，全镇吸鸦片的烟民要占到全镇人口的三分之一，镇上烟民随处可见，三人行必有瘾君子。烟鬼们个个脸色灰暗，双颊深陷，瘦骨伶仃，眼神呆滞，形同鬼魅，烟瘾上来床上打滚地上打滚。烟鬼们燃尽了自己的田地房产商店，使其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父面对镇上的黄赌毒决定成立禁烟、禁赌、禁娼协会，协会成立后先发布告示，然后再联系武进县警察局长周道南，派警员来镇上封关烟馆，去除娼妓、赌馆，并日夜巡查将查获的鸦片、烟枪、烟灯，集中在奔牛中街后的灵官庙围墙内分三次当众焚燬。家父也得罪了许多开烟馆之人，断了他们的财路怀恨在心。有个开烟馆的人半夜起来用纸张浸上煤油点燃后，塞进邵公记沿街的店面房内，常有邻居半夜起来小便看见火光，他用力撞开排门在火势将要蔓延之际，将火扑灭才未造成大祸。

1933 年创建奔牛树人中学。筹建中学从 1932 年就开始了。当时家父看到奔牛古镇教育落后，镇上只有几所小学，小学毕业后要上中学必须去常州、苏州等地，多有不便。他早就想创办一所中学，经过与镇上大户和旅外教师商议后，大家一致同意马上筹款建一所当地的中学，并成立校董事会，筹款 1 千大洋的为校董事。父亲筹 1 万大洋，大家公推家父为校董事会主席。旅外教师有浙江大学教授朱福炘，复旦大学教师姚祖训，以及本地临平小学校长张孝庭。董事会有本镇大户共 15 人，筹建中学也得到武进县教育会长薛迪功和省党部书记王振先的大力支持。建中学有家父亲自操作，首先要选个清静之地，家父看中了镇西能仁寺有一大片寺田是个理想的办学场所。当时能仁寺主持不肯，他还去镇江的中国佛教协会江苏分会告状，江苏分会的住持和秘书赶来奔牛能仁寺对父亲宣布说：侵占寺产按律要处三年徒刑。家父不惧势力与他们讲明办中学的重要性，后又请天宁寺方丈下来共同商议后，最后高价买下寺田，再利用能仁寺旁的节孝祠堂 12 间房子，填没了西庙沟建了十间校舍，聘用高学历的教师 6 人，招收了一个班。又去省教育厅备案注册，教育厅规定私立学校不能用地方名，只能把原先定好的校名私立奔牛初级中学改名为私立武进树人中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办学第二年名声大振，附近乡镇的子弟都要来奔牛上中学。要扩招校舍已不够，再叫其董事出资也不是办法，家父就去常州找事业已很发达的好友刘国钧商议，要求他资助办学，刘国钧在奔牛 14 年经商曾得到家父的大力支持，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好友为公益事业办中学当鼎力相助，当即支援 1 万 5 千大洋，父亲增设刘国钧为校董事会名誉主席。回来后又增建了 10 间校舍，以及仪器室、图书室、厨房和整修运动操场等，并设立助学金补助贫苦学生。抗战爆发后树人中学停学两年，后罗溪中学併入树人中学改名为丽江中学。1947 年一家人逃难重庆回来后，接收丽江中学并重新改名私立奔牛树人中学。1956 年政府接收私立树人中学并增设了高中部，改名为奔牛中学。后人改名为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成为知名的中学，现已在运河南岸建起了新的省奔中，旧的奔牛中学已变成奔牛航空技术学校。为纪念家父创办奔牛中学之恩，旧学校有家父名字命名的山涛图书馆，山涛教学楼，和 3 个主要创办人的铜像。新的省奔中也有家父的塑像和山涛教学楼。

1947 年创办奔牛公园。1947 年，全家从逃难的重庆回到家乡奔牛，看到家乡这样一个大镇却没有一座公园，家父热爱故土热爱公益事业的初心不改，他与商会和大户商议后决定开始筹建奔牛公园。凡是出资多的都在筹建公园的功德牌上石刻上名字，父亲出资最多功德牌上名字第一位。首先父亲把镇上的公产田与公园内的田主进行更换，公园东起老孟河，西至姚家弄后的北大路，南到浦沟，北靠镇澄公路。先是平地开河，利用天然地形来布置。东边靠孟河有一土山，山高 3 丈在山坡上遍植梅树，山顶处和公路旁各设石台石凳，供游人坐憩。土山下筑有篮球场，周围遍植棕榈。平地开挖的小河上南北各架有木桥，北边的平桥染成朱色叫红桥，桥头栽上葡萄，它攀悬在桥顶的架子上。南边呈三湾的叫曲桥。小河两岸栽满西湖柳和夹竹桃。小河中有金鱼，小河西端是连着时满荷花的池塘，塘边有草亭。在公园西侧建有一西式洋房共五间，周围有观景廊道。洋房内设奔牛文化站，内供各种图书、画报、书刊。1956 年武进县文化局看中了奔牛文化站，把它建成了武进图书馆。对着图书馆的浦沟边建有高大却古色古香的六角涉圮亭。在公园中有许多用冬青树围成的花圃内种四季花卉，公园内树木参天，郁郁葱葱，走在砖铺小路上是鸟语花香蝉鸣虫唱，人在画中。1960 年武进图书馆迁去了湖塘，图书馆旁的功德碑已不知去向。现浦沟填没，老公园建起了民房变成了奔牛公园新村。

1949 年处理打死伤兵事件。1949 年解放军已取

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残兵败将退守到长江南岸，此时部分败退下来的伤兵在奔牛镇西的能仁寺和镇东的三里庵建有伤兵医院，共有伤兵一百多人。他们常在街上游逛，以荣军自居耀武扬威，对镇上商户无端挑衅和敲诈，连镇上维护商户利益的保安队也不放在眼里。这些伤兵买东西常不付款，商户见到伤兵视如虎狼，镇上保安队见这些伤兵在自己的地盘上横行霸道很有怨气。1949 年 1 月 30 号是农历大年初二，许多商号还没营业，东街卖日用品的恒泰祥小店却开门营业了。这时一行数个伤兵去恒泰祥买牙膏，新年新岁的不肯付钱而发生口角，还要动手打店主。在他隔壁的镇公所值班保安闻声前去观望和劝阻，伤兵反而要拿枪动武，这时住镇公所的保安队长兼镇长的叶沛霖，听到回队保安员的诉说后大为光火。叶沛霖本是国军新六军少校团长，脾气燥回奔牛后任奔牛镇长和保安队长。他平时对这些伤兵就有怨气，此时他一触即发，怒气冲冲他立即集合队员架设机枪，对准镇公所大门。此时伤兵还在吵闹着，还要对刚才劝阻的保安队员算账，见伤兵来者不善，叶沛霖下令对伤兵开火，霎时枪声大作当场击毙伤兵 3 人，其余伤兵见势不妙掉头就跑。叶为防伤兵集积后来报复，命令保安队从镇公所后门撤走，刚出后门又见一部分伤兵自东边而来，其实这些伤兵是刚从东街浴室洗澡刚出来，叶以为是伤兵报复来了，先下手为强又是一阵枪弹射出，又击毙伤兵 2 人。这一会儿共击毙伤兵 5 人。伤兵医院的团长知道后表示要血洗奔牛镇，奔牛全镇处于极度危险中。家父知道后找到叶沛霖，说他们虽是伤兵但人多，他们手中武器可不是烧火棍，为避免伤兵血拚，你带保安队去我家祖田的沿贤村上，那儿有两间看坟人的茅屋，你们暂时去那儿躲一躲，伤兵事件我来处理。家人知道后不让家父去能仁寺与伤兵团长谈判，说有生命危险。家父为避伤兵血洗奔牛镇，不顾个人安危，就去了能仁寺伤兵医院，与团长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次讨价还价，在农历二月初三终于谈成，对死亡伤兵给予优厚抚恤金，对死者予以厚殓，各备大寿材一口，用白绸包尸入殓，每口棺材内放上好香烟十条，镇上负担死亡伤兵所有丧葬费和抚恤金，并给伤兵团长一定好处。伤兵葬在孟河埂上（现奔牛农贸市场处）。这一笔巨大的费用有镇公所折价处理一批房屋，其余款项有镇商户摊派，伤兵事件使奔牛全镇商户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编者按：2009年创刊的《常武文史研究》（注：创刊时称《延陵季子研究》，第二期称《武进文史研究》后又改为《常武文史研究》）编委会副主任王敏其，是五洋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和他的父亲王和中不但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传承“创新争先、务实担当、崇德向善，重义守信”的延陵（常州）人文精神的好人。现特发《从小皮匠到企业家——记王和中的创业人生》供文友们阅读，让王和中“乐喜好施”的精神造福桑梓，该文在《延陵季子文化》公众号发表后已有9114人阅读，现再在《常武文史研究》刊登。

从小皮匠到企业家

——记王和中的创业人生

蒋茹芬

在武进湖塘有一家企业，四十年来，如日中天，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上百人，再到如今五百多人。年销售额也从百万千万，一路飙升至如今的数亿元，一举成为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中型优秀企业。连续四届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和中国工信部认定的“双针床经编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目前，它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理事单位、中国针织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纺机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入选企业。说到这家企业的成功，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是谁？他就是五洋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敏其的父亲王和中。

一、为人正直，以“技”立身

王和中于1938年7月出生在武进县何留墅乡碾砣坝村（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浒路村委碾砣坝村民小组）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是家中长子，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九口人挤在四十多平方米的低矮土坯房里。随着年月增长，孩子逐渐长大，土坯房实在住不下了，几个兄弟就借住在邻居家里，靠父母耕种几分薄田来维持生计。由于家境贫寒，时常食不果腹，出于无奈，父母将四弟送给了人家。王和中也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便被迫辍学回家，努力帮助父母干活，养家糊口。

作为老大，王和中早早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瘦弱的肩膀，开始分担父母的忧愁，他拾过柴、搓过草绳，任何能换回一点口粮的零活，他都抢着去做。在农村流行一句俗语：荒年饿不死手艺人。13岁时，王和中去街上一家皮匠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水、生火、准备工具，然后开始学习鞣皮、制革等工作。锋利的刀具常常割破他的手指，但他

从不吭声，只是默默地包扎好，继续干活。学徒期满后想为父母减轻生活压力，但因家庭贫寒没钱开店，就只能自己上街摆摊，为街上人修补擦拭皮鞋，每天都是风里来雨里去，让每一位客人满意。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带回炒菜和米饭，并将微薄的工钱悉数交给母亲，看着弟妹们吃上一口他带回的饭菜，他便觉得一切值得。他对家庭的贡献重大，为人诚信，乐于助人，经常为村民做实事、善事，逐渐赢得了好的名声。由于他个子矮小，修鞋技术精湛、信誉好，所以，被湖塘街上的居民戏称为“小皮匠”。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动脑能力，还为他提供了商业方面的启蒙。

岁月流转，王和中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结婚时，他借同村一位名叫“天喜”家的矮房作为婚房，新婚之夜，他对妻子承诺：“我现在给不了你好日子，但我一定会拼，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家。”

二、在厂练“兵”，提升素质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当年的王和中就崭露出过人的胆识和目光，怀揣着改变自己改变大队的一腔热血，1978年王和中向浒路大队书记王进生提出申请要求进入大队五金厂工作，并表示自己曾在做皮匠时认识一些制药机械厂的老师傅，可以帮助大队发展制药机械的制造，王书记看到侄子坚毅的表情，也非常支持王和中的梦想。当时的大队工厂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只有一家普通的打铁加工厂，平时生产一些简易的农具产品，只能艰难维持经营。

为了让村民们都有饭吃，王和中等人商量着一点点把铁工厂改为机械厂，在吴浩昌厂长的带领下，开始生产有科技含量的制药机械，并正式将村办企

业更名为“湖塘前进药械厂”。王和中肩负起供销科长的职务，对于只有皮匠经验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不畏艰辛，义无反顾地一头扎了进去。“不懂就学，没什么困难能难倒我”，这是王和中的座右铭。没有技术，他就去请教常州制药机械厂、武进第二无线电厂的老师傅们，以及常州客车厂的工程师们，为了去成都的一家制药机械厂攻关，足足在成都厂待了一个多月，期间主动帮成都厂的老师傅们干活和做各种服务工作，后来，成都工厂终于被王和中的诚意所打动，免费给其提供了一份制药机械的图纸，王和中带回图纸后，在几位厂领导的合作努力下顺利生产出了第一台药械设备，当时，作为供销科长的他深知企业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主动出击，把设备销售出去。那时出差没有火车卧铺，更没有快捷的高铁，绿皮火车成了他的“移动办公室”。王和中不畏艰辛，带着张惠进、吴汉大、王仁方等人跑新疆跑广东，常常是连夜赶路，车厢里人挤人，行李塞满过道，困极了就钻到硬座底下躺一会，闷热、嘈杂、颠簸，这些都没有阻挡他的脚步。到达目的地后，他就找了个简易的旅馆住下，然后依靠着买来的黄页电话簿，一页页查找着使用制药机械相关的客户单位信息，然后就给各相关企业领导写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工厂生产的设备规格尺寸，产品性能等。当客户收到信后立即与王和中所住的旅馆取得联系，上门沟通洽谈业务。正是这份坚韧，让厂里的割圆机和灌封机逐渐打开了全国市场。80年代初，王和中作为工厂负责人之一，与领导班子一起带领湖塘前进药械厂的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队工厂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老百姓口中的“小日本企业”，整个浒路大队也变成了湖塘较富裕的村。

1982年，前进药械厂因内部某些领导为抢权夺利，而遇到了困难。在湖塘乡领导的协调安排下，起用王和中为浒路大队村主任兼厂长。王和中上任后通过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开发纺机装备，经过几位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开始正式生产纺织机械、塑料机械等装备。产品研制出来后，需要销售出去，王和中又主动挑起了销售的大梁。于是，他就带着产品样本不断寻找客户，凭着不知疲倦的精神，以及真诚与热情跟客户单位沟通介绍产品性能。他曾睡过车站码头，啃过冷馒头，受过无数冷眼和拒绝，但却从未想过放弃。有一次，为了争取一个重要客户，他在对方厂门口连续等了三天，最终用诚意打

动了对方，拿到了第一笔订单。就这样，开始一步步走上正轨，工厂持续发展稳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并在整个湖塘乡再度提升了知名度，乡里主要领导对王和中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湖塘前进药械厂逐步发展壮大后，村委和工厂内部产生了一些经营理念的分歧，王和中为了浒路村委经济能更好地发展，主动辞去了相关职务。此后，最强的浒路村发展逐步停滞，王和中辞职后，也曾消极了一段时间，后经家人劝阻后又再度振作起来。

三、自主创业、“筚路蓝缕”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产科技还非常落后，很多高端的纺织机械都是进口国外的。当时，湖塘乡政府领导闵国祥、谢惠娟、王林兴等人为了让王和中这颗金子更发光，请他到罗溪成立罗溪纺机厂，他一开始就租用唐家水利站的二间房作为车间，生产纺织配件，另外在湖塘桥堍的小旅馆租了一间房，即作为办公又作为销售配件的门市部。当时，王和中经常说一句话：“外国人能生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出来！”这句铿锵有力的话，鼓舞了罗溪纺机厂员工的心。王和中带着儿子和几位老师傅一起钻研技术，开发新型的纺织机械。自此，王和中的创业之路开始一路辉煌。后来，企业也越做越大，很多人评价他：“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本地纺机行业的发展。”工人们更爱戴他：“那个忙碌的背影里，装着小家的温情，也承载着大家的担当。”王和中在罗溪纺机厂辛苦奋斗了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纺机技术经验，也给溪南村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86年初，王和中与湖塘镇广播站合作成立了湖塘纺织机械厂，租用了陈家村委王家村的三间仓库，筹集了6400元资金开始创业，从此开启了五洋纺机前身的光辉历程。并在简陋的厂房门口挂上了“湖塘纺织机械厂”的牌子。斑驳的水泥墙、二手的车床、借来的资金，构成了这家初创企业的全部家当。谁曾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开端，将织就一段跨越时代的创业传奇。王和中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和实业，王和中带领着两个儿子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王和中负责在外跑销售，生产管理等具体事务交由两个儿子打理。他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努力要把五洋纺机发展壮大。工厂规模大了，王和中的想法更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应客户的要求，带领员工自主研发了渔网机和渔网整经机。当时，没有技术图纸，他就一遍遍拆解研究国外进口的类似设备，在王和中的带领下，他

们创办的企业蒸蒸日上。在新的纺机行业领域里，他坚信“诚信和质量是根本”。有一次，一批产品发现细微瑕疵，他毅然决定全部召回，尽管这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他说：损失钱可以再赚，损失了信誉，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正是这种近乎固执的坚持，让他的企业赢得了市场的广泛信赖。渔网经编机不断迭代更新，畅销全国，并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王家父子经过不断努力，将厂房由3间扩大至13间。为王氏家族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大道，也让五洋纺机成为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9年后，王家父子经过再次努力拼搏，终于得以凭借自身实力征地，在何留墅买了2.9亩地建设新厂区，陆续建设了三十多间标准化的厂房，主要生产的产品：纺机配件、无结网整经机、打纬机、整经机、落筒机等。湖塘纺织机械厂开始正式更名为“武进五洋纺织机械厂”，开始规模化生产纺织机械。为了能将企业带入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瞅准当时少有人涉足的经编领域，带领技术团队积极研发经编机技术。随之，遮阳网机、网眼袋机，半刚性网格基布经编机也是相继研发成功。随着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公司发展也越来越大，产品远销海内外市场，企业从小作坊发展成为现代化高科技企业，让“中国制造”在国际经编装备领域崭露头角。这不仅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历程，更是一个民族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见证。

四、乐善好施，造福桑梓

中国自古就有助人为乐的传统，有句话叫“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人在帮助他人时会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信心满满，做什么事都充满干劲，因而事业也蒸蒸日上。所以，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大都乐于帮助人，自己也会得到很好的回报。命运特别眷顾行善的人，而王和中就是其中一例。

若要富，先筑路。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和中在村办厂工作时，他看到自己的村庄位置偏僻，武宜公路虽近在咫尺，但也有2里多，因泥泞土路和河道阻隔，运输也极其不便。他毅然决定要修建一条村庄直达大路的水泥大道，当时这条路的建设涉及到二个生产大队三个自然村的田地，想要修建这条路必须征得其他村的同意，为了造福村民们，他积极与其他生产大队领导沟通交谈，在大队工厂多位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修建了通往武宜路的一条宽敞的运输大道，并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前进

桥”。从此，货车能直接开进厂区，产品能顺畅运往市场。路通桥通，财源也随之畅通。村民们说：“这条路，这座桥，是我们走向富裕的起点。”在他的带领下，医药设备厂成为当地的优秀企业，许多村民进厂工作，学到了技术，增加了收入。昔日贫困的村庄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最终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他常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在21世纪社会和谐与家族文化的传承下，王和中以深厚的智慧肩负起关爱青少年成长的重任。他言传身教，悉心辅导，传递知识，塑造品格，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美德得到了升华。同时，王和中主动承揽并捐资为王氏家族修撰家谱这一文化工程，以此延续敬老爱幼的良好家风。王和中在家族长辈们的带领下，孜孜不倦搜寻历史碎片，连接血脉脉络，让分散的亲人重拾根源认同，凝聚了家族力量，使敬老爱幼不再仅是口号，更是传承了孝亲敬长、家族和睦的宝贵祖训与家风。

为帮扶贫困家庭，王和中积极推动公益事业，成立百万光彩基金工程，支持教育发展，奖励优秀学子，帮助老龄群体，改善养老条件，建立一座连接“护幼”与“尊老”的爱心桥梁。王和中将尊老爱幼的精神转化为强大的社会行动力，其必将被长久铭记。

五、病榻坚守，意志坚强

2025年，王和中已是耄耋之年，岁月的风霜和常年的操劳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他病倒在床，饱受病痛折磨，但即使在病榻上，他的精神依然矍铄，靠着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如今，他时常想起曾经那个白手起家的自己，从家庭小爱到社会大爱，从谋生手段到产业报国，他用自己的双爱人生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他心系企业，每天都在关心着“五洋”公司的发展，他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叮嘱儿子和孙子：“企业走到今天不容易，要守住良心，要看好未来”，他将一生的智慧和坚韧，化作了对企业未来的最后筹划。

从“小皮匠”到数亿规模的企业，王和中的创业经历彰显了他坚韧不屈的品质与卓越的战略眼光。他在企业中所展现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为无数后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该文经陈富大、盛锡金修改）



吴稚晖

吴中行

薛伯青

汤德胜

中国常州武进籍四位摄影名家

——吴稚晖、吴中行、薛伯青、汤德胜

张尚金

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院正式公布达盖尔摄影法（银版摄影法），摄影史就以这一天作为摄影术诞生的纪念日。摄影是近现代新兴的文化事业。根据史志资料记载，常州武进籍至少有四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摄影名家，现分别摘编如下：

中国摄影的探路人 吴稚晖

201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稚晖学术研究文集》124—134页，由无锡市历史学会会长汤可可撰写了《中国摄影的探路人——吴稚晖与摄影述略》一文中指出：吴稚晖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或许算不上是摄影家。但他爱好摄影，是中国较早接触摄影，从事摄影的人之一，并且一途“如发疯然”沉迷于摄影，对中国早期摄影事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中国摄影》曾有专文评述，称他为“百年前中国摄影的探路人”。该文一、在英伦学习照相：吴稚晖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04年3月。在伦敦，他在印刷厂做排字工人，维持生计，同时补习英文，进入丽景街的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写真铜板。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照相和制版。根据其日记载，自1906年3月起，吴稚晖开始学习照相术。随着技艺的进步，初学摄影的激情转淡。又因为极大的精

力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活动。1908年起摄影不再进入吴稚晖的日记。但这项爱好他一直没有放弃。……1935年，为应对磨刀霍霍的日本军国主义，年届古稀的吴稚晖奉命前往西南地区，考察地形、交通、物产、人文。3月，他与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乘民生公司轮船进入四川。在成都《建设报》记者偶遇正在暑袜街九龙巷口小餐馆用餐的吴稚晖，立即入座采访。事后报导说：“吴氏现年七十晋一，红光满面，身体健强，行路极快，恐青年尚不及。手中常提蓝布口袋，内装照相机一具，及成都街图一纸，与普通人无异，毫无官僚习气，诚令人佩服。”二、以照相传播科学民主。1906年，就在痴迷摄影和制版的时候，他与同在巴黎的张静江、李石曾一起，不遗余力地宣传“人无分平富，国无分界限”的无政府主义，借以抨击清政府的专制腐败，鼓吹民主革命，当时被称为“巴黎三剑客”。1907年初，三人在巴黎达侯街创设世界社，在健康街开办中华印字局，着手编印《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由吴稚晖主持社务，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周刊旗帜鲜明，文字犀利，对清皇朝的倒行逆施痛加针砭，对社会革命和民主政治热情讴歌。同时配发各类图片，介

绍欧美革命的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在海外华人圈产生广泛的影响，与汪精卫在日本创办的《民报》相呼应，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宣传的两大喉舌。其中很多照片为吴稚晖所摄或翻拍。《世界》画报增刊《近代世界 60 名人》，简介世界名人的生平业绩和思想，附有精美的图片，在国内受到热烈追捧。画报配图精当，印制精细，反映了吴稚晖对照相制版技术的掌握。这不仅在中国属于首创，而且技艺水平优于日本，为亚洲画报的鼻祖。三、面向大众的照相叙事 1907 年 1 月，在参观巴黎博物馆之后，吴稚晖与友人们一起讨论城市建设、公共教育、科技进步等，就有了写作的冲动，想把他在留学欧洲期间接触到的天文、地理、理化、生物等等一系列新知识介绍给国人，“拟先作照相书”。以后，他以 1900 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为背景，托名已故的朋友王英冕（曼卿）及其次女王蕖（继英）和已故的外甥冯伯始（王蕖的家庭教师）为书中人物，在从北京到天津再坐轮船“海晏号”逃往南方的路上，相互讲述、争辩有关科学和文化问题，写成一部章回体科学小说《上下古今谈》。这本书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进程的形象描述，起到提创科学和工艺的作用，旨在唤起国人关注科学新知的觉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作者徐霞梅在《吴稚晖与新文化》一文中称《上下古今谈》是一本浅显风趣、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1911 年 6 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白话小说，比 1918 年 5 月 15 日鲁迅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早了七年。编者注此小说比 1913 年在《小说月报》上刊登的鲁迅（周树人）第一篇小说《怀旧》早两年。〕《上下古今谈》的第八回“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通过“海晏号”上一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潮州籍水手老郭的讲述，以及老郭转述他在美国旧金山开照相馆的表兄的说法，介绍照相术的发明经过以及传入中国后的情形，澄清国人对照相的一系列误解，对照相作一个科普性的介绍。这是国内最早对照相进行通俗介绍的科普作品。四、与几位摄影师的交往 吴稚晖热衷于照相，但保留下那些摄影作品，目前无法确认。这是因为，吴稚晖只是把照相作为其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并不打算去当一个摄影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太太小姐们学习针线，并不都是要去做裁缝，所以他并没有编印自己的摄影作品集。另外，他 60 年间积

存的个人资料计 100 多箱，仅有 7 箱于 1949 年初运往台湾。其余“除行前焚毁少部分之外”，均已散失。但他常把自己拍摄的好照片加印了分送朋友，所以与他交往的亲朋好友和摄影家朋友的资料中，或许可以找到他的作品。与吴稚晖相善的摄影界人士，主要有这样几位：赵鸿雪（1870—1915），江苏无锡人。孙鸿哲（1876—1937），江苏无锡人。郎静山（1892—1995），浙江兰溪人，著名摄影家。1934 年 6 月，吴稚晖与郎静山、张善孖、张大千等在黄山相遇，对他们以黄山为题材的绘画、摄影很是赞同，与他们一起登天都峰，访文殊院，还为他们题写多幅黄山诗联，广事宣扬。以后，郎静山的一位朋友盛学明在黄山祥符寺旁开设一家照相馆，吴稚晖也给予不少帮助和指点，还与郎静山一起帮他在上海购买投币自动照相机。抗战中，郎静山携家眷避居重庆，在北温泉公园见到吴稚晖，吴稚晖建议他，不妨将拍摄的照片，“拣些风景美好的，出售若干，以贴补成本”。听从他的建议，郎静山举办了首次个人摄影作品展，其中西南风景每帧订价 10 元，一下子拍卖出有 400 张之多，以此项收入出版了《静山摄影集》画册和《集锦摄影概要》一书，由此跻身英国皇家摄影学会。晚年的郎静山曾写下《稚老与我一段因缘》一文纪念与吴稚晖的交往。文中说：“稚老一生不做官，善诙谐，平民化，待人接物，诚恳和谐。对后生小辈尤其爱护，视同家人子弟。”

驰名中外的摄影家 吴中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1998 年版《武进县志》942 页载：吴中行（1899—1976），县城（今常州市区）人。青少年时代就喜爱摄影艺术。早年曾在上海加入中国早期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兰社，并任黑白影社理事。30 年代，他的摄影作品就驰名中外，在英国、法国、美国和瑞士等国参加国际摄影展览，曾被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聘为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画院举行个人摄影展览及出售照片的全部收入捐赠给汉口受灾难民。解放后，积极拍摄反映新中国山河新貌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照片，曾出版《吴中行摄影艺术选》《吴中行摄影艺术选辑》《吴中行摄影艺术集》。出席过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摄影大师 薛伯青

2016 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武进人物》780 页载：薛伯青（1910—1989.05.27）武进横林镇余巷村人。中国电影技术的开创者之一。17 岁在上海学摄影。20 岁进入电影界，胜任电影摄影、洗印、美工、化妆等多项业务。1936 年（民国 25 年）冬赴绥远前线拍摄抗日纪录片《百灵庙大捷》，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1937 年 11 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利用合法身份，长期从事地下斗争，曾先后 4 次前往淮北抗日根据地，采访拍摄《彭雪枫师长追悼会》《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等新闻片。1946 年，拍摄《上海反内战大游行》，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曾把这一组影片在中外记者会上放映，有力地驳斥国民党当局的诬蔑和谎言。1949 年 1 月，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坚强不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担任华东海军摄影队队长，参加拍摄《南昌舰起义》《一江山战斗及剿匪》等多种重要资料片。1952 年参加八一电影制片厂组建工作，为建厂奠基人之一。1953 年赴朝鲜前线参加《钢铁运输线》等纪录片的拍摄，时间长达两年。回国后，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 37 年之久，参加拍摄的《激战前夜》《黑山阻击战》《狼牙山五壮士》《永不消失的电波》《二泉映月》《东方红》《在长征的道路上》等 10 多部影片，在国内外均有广泛影响。他一生参加拍摄 105 部影片，是中国电影技术的开创者之一。1979 年他以 69 岁的高龄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他曾任八一电影制品厂摄影总技师，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二、四、五届理事。生前关心家乡编史修志工作，热情接待到北京搜集资料的工作人员。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 汤德胜

汤德胜（1947—2025.9.8）武进圩塘（今属常

州市新北区）人，汉族，台眷，中共党员，大专毕业。国家一级美术师职称，曾任武进县（市）文化局副局长、武进市文联主席；常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理事等职。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心装群众，情系百姓，收获了许多精品佳作：“公社幼儿园”等 100 多幅摄影作品入选历届国展和国际大展，并在国际、国内的多次摄影作品展中获得过金、银、铜牌奖。中国摄影出版社从 1989 年至今出版了《留住历史》（抗洪救灾摄影作品专集）、《江南风情》《汤德胜眼中的外国人》《狂野非洲》《情系红河》等 5 部作品集，这些影集分别由郎静山、李可染、冯其庸、袁毅平、程十发、杨恩璞、吴常云、翁庭华等大师提笔作序。由于汤德胜业务政绩突出，先后被授予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晋升工资两级、常州市政府分别给他记大功一次和记三等功一次）、江苏省文化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优秀文艺工作者；由于领导群众文化工作突出，被评为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工作者和 1991 年全国抗洪救灾先进工作者。

1983—2002 年，中央电视台、江苏卫视、上海电视台都分别拍摄、播放过《摄影家汤德胜》的专题片，《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摄影天地》和《中国文化报》等都作了专题介绍。

汤德胜为 1988 年版《武进县志》〔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最高奖）〕，拍摄影照 70 幅（杨汉平、刘建中协助拍摄）。为武进地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2003 年获“江苏艺术家”称号。2007 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摄影工作者。2008 年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30 多幅抗震救灾作品入选省和全国影展，6 幅作品被省和中央档案馆收藏。2016 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武进文化志》和南京大学出版的《武进人物》都将汤德胜列入了人物名录。

奚伯浩：从病魔中爬出的电子专家

奚金芳

研制工程师奚伯浩，青少年时，曾经是一位身患肺结核的病人，卧床四年。后来竟然战胜疾病，获得大学文凭，晋升总工程师。研制军用固态通信机，完成定型鉴定，批量生产。他是怎样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呢？还得从他求学说起。

战胜病魔取得文凭。奚伯浩，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青年时立志报效祖国。他17岁那年，就读私立常州中学（今常州市二中），高中一学期土木科，学习成绩优良。读高二时，刚刚读了一学期就得肺结核病。当时，肺结核被诊断为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只有靠鱼肝油维持。凭着坚强的意志，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四年。康复后，他参加了工作，并继续学习深造。1960年至1966年，在职就读函授高校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全班20余人，只有奚伯浩一人坚持到最后。他坚持6年的业余学习，成绩优良，拿到了本科毕业文凭。系统学习了无线电技术理论，一心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担任主持工程师，研制军用电子管收发机。1961年4月，奚伯浩在南京714厂总厂设计科二室，参加收发报机的试制工作。随即，调往常州，创建无线电厂。研制仿苏军晶电子管短波接收机，担任主持工程师。1964年完成定型鉴定，连续生产15年，正式列为军用级通讯装备，累计完成产值1千万元。

担任主持结构设计师，研制军用固态收发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半导体发展，晶体管体积小，重量轻。奚伯浩带领团队，研制晶体管产品。1966年至1967年，厂里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任务，研制全晶体管通讯机，奚伯浩担任主持结构设计师。历经四年，完成定型鉴定工作，并且转入批量生产。后来，奚伯浩晋升为总工程师。经过评定，批准为军用级通讯机。连续生产近20年，累计产值1500万余元以上。

研制常州市第一台磁带录音机。1973年至1975年，奚伯浩带领团队，研制成功了常州市第一台磁带录音机。当时，全国尚处于录音技术萌芽状态，只有上海录音器材厂能够批量生产。奚伯浩克服困

难，带领技术人员掌握关键技术制造工艺。成套批量生产，质量稳定，年产值达180万以上。

研制盒式磁带录音机。1979年至1984年，奚伯浩带领团队，研制盒式磁带录音机。经过四次重大技术攻关，研制机芯获得成功。经过生产考核，性能指标符合中国四机部制定的技术要求。该机累计产量达25000台，当时产值达百万余元。

附：

纪念浩哥

一生奉献于常州，无线电厂工程师。自己有病顾厂里，一身顶梁总承揽。研制银河收录机，小巧灵便人人喜。全国闻名有名气。民品加持做军品，部队使用到今天。

聪明勤奋一辈子，努力学习六年整，工研不误又读书，南工文聘一人持。一代人杰甚为喜！病魔不断来找你，肺病整整躺四年。南京总厂结鸾俦，孝顺母亲列先。

三个女儿要培养，担子不轻身无闲，老大秀兰入大学，不负长辈一片心，奔赴德国创业成。老二老三相继去，瑞士德国事有成。可怜天下父母心，长期不见梦里见。

战胜疫情更危险，同针同药不相见。讲究自律管住嘴，糖尿病痛照样控，严格管理无大碍，闻关成功九十过，越来越老抖巍巍，地动山摇根不坏。

哥哥啊，有你我有娘家在，你走兄妹生别离。我心必念你恩情，结婚是你办嫁妆，大橱直用七十年。前天你走整一月，天天点香拜拜你。

哥哥呀，今天读完你手笔，深深折服你：“常州之星翼门秀”，光耀门楣眼前亮，至今军品还用你！五七之前念念经，超度升天只有你！

愚妹金芳 妹婿宗华率女东兰 黄群

同祭典于2024年12月8日浩哥逝世“五七”纪念日

（该文经许国裕编辑）

前粟茅峰觅英踪

陈东夫

1977年5月24日，天气阴。我和陆涛声等去镇江采访俞迺章。俞是我们武进老乡，原籍郑陆桥蔡家头。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6月入党，历任澄西县副县长、兴化县长、武进县长。他家住平屋，屋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种着蔬菜和花草，鲜嫩可喜，小洼塘里则养着几条金鱼，惹人喜爱。进门时只见他手里捏着两只硕大的铁弹子在健身。

60岁出头的他，五短身材、光头圆脸、眼似铜铃、炯炯有神。见来了老乡，忙招呼家人泡水、沏茶。我们请俞老介绍他与陈毅司令员的过往。

老人兴致来了，他说：“陈毅司令员了不起啊！是我军的一员虎将，且是儒将。他会下棋、唱歌、作诗、作对联、游泳、打球……做起群众工作来，从大道理讲到家长里短，无不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俞讲起1940年5、6月间，他带着短枪护送陈毅去澄西，这天来到江阴县璜土地界上的前粟山，山上有一座较大规模的庙宇，庙宇里没有一个和尚，却有150多名中学生。原来当地没有中学，一位姓周的先生拿出了自己全部的资产，在这里办学。陈毅上山后与之交谈，周先生谈到办学缺少资金的窘况。陈毅在支队经费匮乏的情况下，拿出500块大洋捐赠给学校。周先生又惊又喜，从来只见兵匪抢劫钱财，想不到新四军初来乍到竟支持办学，当即召集全体师生请陈司令员训导。陈毅是演讲高手，他从国际反法西斯大势谈到中国抗日救国形势，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到当下青年学生努力的方向，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爱国学生要积极投身抗日战场奉献青春。他有情有理、慷慨激昂的演讲使全体师生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鼓励，当场就有30多名学生要求参加新四军。听了俞老讲的故事，我们都觉得很能体现陈毅同志贯彻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的精神，陆涛声当场请缨，由他来写这个故事。

6月7日，陆涛声在写陈毅在前粟山故事的过



程中，表示没有亲自到过前粟山，缺少现场感，因此决定进行实地采访。前粟山，名为山，实为一大丘，高约30米，占地约200亩，位于江阴璜土北面，离镇区3里许。山上庙宇建于明崇祯年间，依山势而筑，共四进：现第一进、第四进（三茅殿）已拆迁至南山脚下，建起了粟山中学新校舍；第三进（万佛楼）实为危房，勉为部分教室和办公所用；第二进（大殿）即陈毅同志演讲遗址，是当地群众和师生一致主张保留下来的。

前粟山所在的五大队李金坤老支书告诉我们：璜土是平原地区，前粟山虽然不高，但登高四望，方圆十里，尽收眼底，桃花港环山而流，好似护城河。东南西北，分别有东桥头、德安桥、夏庄桥、北闸桥，难进易守，在军事上有独特的优势。

陈毅在此演讲后，这里成了澄西的一座红色堡垒，一支队所属的老二团时常来此设营、住宿、休整；往来于苏南、苏北的新四军干部也常来此落脚、中转。

茅山亦有抗日故事。茅山是苏南地区的主要山脉，它北起镇江、经丹阳、句容、金坛等市、县，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10公里，总面积约254平方公里，这里是陈毅同志坚持苏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也是中国六大山区抗日根据地之一。

要撰写茅山抗日斗争故事，对于茅山的历史须有了解，通过一个月的采访，我们接触到的老同志都谈到了茅山，心中虽有一些概念，但对茅山的地形、

地物，头脑里还是比较空洞，为此县里宣传部决定让我和张焕良到实地去进行体验和了解。

6月5日早晨6时，我们乘车来到南镇街，这是茅山脚下的乡村小镇。常州4000余名知青在此开辟了“东进林场”，对这里的衣着、饮食、风俗、文化改变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原计划下午4时上山，我俩在林场总部找到了常州七·二一新闻学校的吕雪芳同学，想请她当向导。她说到农场政工科丁科长是我的家乡芙蓉郭家大队丁家村人，这让我们欣喜异常，我们一直谈到傍晚6时。

6月6日清晨，广播里的《东方红》乐曲唤醒了我们。早饭后，我们带了干粮，背上水壶就上山了。茅山主峰约372米，看上去不算高，但却比较陡。从山腰向上爬，仅有一条小路，路旁的茅草长得很旺，几乎侵占了道路。我们就在这草丛中弯着腰曲折地往上走，40分钟后，我们登上了茅山主峰。

茅峰上原有九霄万福宫、乾元观，有房舍九十九间半。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倒坍了，里面杂物也无人管理，仅大殿和靠西有几间较完整的房屋，其余皆断壁残垣，杂草丛生，侧厢房有一石砌小池，甚是清凉。据说，任你天旱人干，山下河塘朝天，这小池里的水永远都浅不了。残存的破观里有2个老人住着，近几天又来了30多名南京抗大附中的师生，他们在这里度暑假和搞宣传，大部分不

(上接第45页) 里总想着别人。2006年11月27日，顾冠群在病重住院期间，将自己的多年积蓄捐献给学校，向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八万元人民币，并以其夫人、东南大学校友章玉琴女士的名义设立“章玉琴奖学金”。该奖学金将面向全校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该基金拟每年资助五名学生，资助额度为每人2000元。

2007年5月30日，是送别东南大学老校长顾冠群院士的日子。早上6点，东大四牌楼校区的大礼堂门前就聚集了众多在此候车的学生，他们亲手为顾校长折的千纸鹤装了整整3个塑料袋。“心里装着东大、装着东大学子的老校长本不会孤独，有了纸鹤的陪伴，他更不会孤独！”

8点，从四牌楼出发的10辆大客车，坐满了师生。想去石子岗送别的师生远不止这么多，由于人太多，在学校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派上了院系的学生代表。于是，他们在校园内点上了蜡烛、在网上设立了灵堂，改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老

满20岁，个个劲抖抖的，每天下山到各工区和知青们搞联欢。

在大殿前，我们和留守的教师及看观的老人闲聊了一小时，对观的古往今来有了新的了解。此观的观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山上我们还觅得一本由观里撰写的《茅山革命斗争史》，俩人欣喜万分连说不虚此行。

下了山，我们原计划立刻赶往安中大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前身）。那是溧阳旧县公社靠西的一个大队，离旧县有6里路，但因为交通不便，只得住了下来。

6月7日早晨，我们来到安中，这是一个地势较高的村庄。是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据安中大队李书记母亲口述：当年这个村子比较大，仅一个叫李永西的地主家就有房子100间，因为新四军常来居住，后在鬼子扫荡中基本被毁了。当年，陈司令员转移到水西村后，曾组织人员拿物资前来慰问。她也得到了一条毯子。在她的印象中，陈毅高大、帅气、待人和气。新四军战士纪律严明，晚上搁的门板第二天都上好了，交班时一样东西也不少。村上由于遭受鬼子火烧，当年遗物甚少，仅剩新四军驴子驮的两只竹篓。

校长的不舍和怀念。

9点，石子岗殡仪馆内，哀乐低回。站在老校长的遗体前，许多人都在默默流泪。本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实在是太忙了，希望顾老师、顾院士、顾校长在另一个世界好好休息……

顾冠群院士“走”了，他才67岁。他是中国网络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有人尊称他为“中国网络之父”。顾冠群的儿子顾伯萱说，“如果说，父亲对中国的网络还有贡献的话，你们可称他为中国网络先行者之一。”

顾院士一生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特别是在计算机网络方面的研究，贡献甚巨。除了科学上的成就，顾院士还是一位教育家，学习和工作在东大，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他虽然行政事务较多，但坚持为学生讲课，坚持以实验室为家，治学严谨。他品德高尚，深受大家的敬仰和爱戴。

消失的上店古镇，不逝的浓浓乡愁

恽仲坤

上店是镇，历史悠久，数百公尺内有春秋时代伍子胥屯兵点将台遗址（胥城寺），有宋代常州知州杨万里创办的城南书院。寿山是村，这一镇一村之间相距不足一里路，且都是恽姓世居之地，由是，对于出生在寿山村的我来说，有关上店古镇、寿山老村以及故土的点点往事常常萦怀于心，时至今日，渐入耄耋之年亦难以忘却。

寻访：刻在古镇的岁月痕迹

上店古镇不大，但店铺林立，颇为兴旺。设有邮局、米行、肉墩头、理发店、茶馆、豆腐坊等店铺，还有鱼行、中药店、诊所以及银器店、棺材铺、冥香坊，染坊、石匠店、木器店、竹器店、铁匠铺、皮匠店等，是常州南门外热闹繁华的小集镇。

20世纪80年代，我常与上店街上的郑洪大、徐耀大、徐柏清、恽道源和陈友耕等老人攀谈闲聊，他们告诉我，上店街共有各种店铺58家。

先说说茶馆店。上店有大小茶馆3家，这里是民众议论时政、社会见闻的重要场所，是信息的集散地，一早就坐满了人，每桌都有谈笑风生的高谈阔论者。伙计举着开水壶为茶客添加茶水，穿梭忙碌，吆喝声此起彼落，茶室热气腾腾，常常笑声满堂。临上店桥北堍不远处的一爿茶馆，经常请苏州的艺人来说唱评弹。说书者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把折扇，门前有一张小桌，桌上有方

“惊堂木”，说的都是《三国演义》《水浒》《龙凤再生缘》《庵堂相会》等老戏。弹唱一般是一男一女，也有唱独角戏的。唱滩簧的多从常州来的戏班子，戏班子有十几个人，剧目多是《双推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一唱十天半月，几乎场场爆满，走



△ 上店老街（丁仲元摄于20世纪70年代，原载《记忆龙城——百年常州旧影集》）

廊和门口经常站满了踮起脚板头，伸长颈脖看戏的人。茶室内添加茶水，递热毛巾给茶客擦脸擦手的师傅忙碌不堪，亦见有托着盘子收钱的。

上店有杏生、庆生、正东、聚金、林华等6家剃头店。剃头师傅上午在街上的店面理发，下午到



△ 旧事小镇茶馆，每天早晨聚集一众人，“海阔天空”聊上数小时，然后回家干活或烧饭，顺便捎条鱼回家做中午菜（唐锡勇摄，原载《记忆龙城——百年常州旧影集》）

附近村庄转村头（到乡村做买卖），剃一个头一角钱。经常给我理发的是聚金和庄林华。林华师傅理发颇为讲究。常用烧红的铁钳给人做发型。将铁钳在煤球炉子里烧红，然后把火红的钳头卷夹头发，左腾右挪，卷放自如，“滋滋”的烧灼声中，不时冒出几缕青烟，还有满屋子的焦糊味，场面吓人，却很是受用。这般手艺，如今已无处寻觅。

古街上的饭馆、熟菜店、馄饨店、面店、麻糕店的生意也都很好，印象中有爿豆腐汤店人气特别旺。豆腐汤用少许山芋淀粉勾芡，放入白雀豇粉做的豆爻（斋）饼、猪血条、油生腐和百叶丝，舀上一海碗，上面撒些青蒜叶末，热腾腾的一大碗只需5分钱。桌子上有酱油、醋、辣酱，各取所需。至今想来，依然垂涎欲滴。到了寒冬腊月天，这家豆腐汤店在临街的店门口又增设一只大铁锅，经营牛杂汤。上好的牛杂料如心肝肺等，在大锅里煮熬翻滚，香气扑鼻，路过者驻足良久，免不了进店吃上一碗暖暖身子再走，周边村庄专程赶来吃牛杂汤的回头客也不少。

上店街有十几家南货店，价格公平，老少无欺，待人和蔼。我听大人们讲，生意做得最好的是北街汪福祥开的南货店。原因是他的货架上品种最多，加之汪福祥夫妇对来客都是笑面相迎，主动介绍实惠的商品，无论新老客户都供茶水。南街有个供销社，锅碗瓢盆勺布，油盐酱醋茶，草纸、洋火（火柴）、瓜子、糖果、烟、酒，样样有。街上还有收购兔毛、黄狼皮、旧书、废铜、旧铁和供应煤炭、化肥农药的部门。北街许银春开的“泰成”染坊，其染成各色纱布，晒遍上店西侧西桥坟区域，大红大绿，蔚为壮观，所染之布质量上乘，远近闻名。



△ 上店古桥

去龙潭庵读书的路

龙潭庵小学就是后来的上店小学。小时候去龙潭庵读书，常走的有两条路。晴好天气抄近路走，从村东头的谢家浜出发，经过恽泰来（又名兆冈，谱名毓思，太学生，因暴打私盐贩子而闻名乡里）祖莹的石牌坊，再横穿武南中学（后为上店中学）操场就快到芦沟河边，到了芦沟河也就到学校了。

若遇上雨雪天，这条比较近的土路泥泞不堪，就沿着大人到镇上的大路走。大路用青砖铺砌而成，由著名新闻学家恽逸群祖父恽凤仪和恽坎生父亲恽松林斥资完成。这条路沿兴隆河边而筑，经过天灯湾、西桥坟、桥北村前的恽氏石牌坊石柱旁、恽氏南分宗祠大码头和上店桥北堍增锡房屋的山墙边（墙上镶有《重修上垫桥记》石碑）就进入了上店北街。印象中，西桥坟的坟墩头高大，四周围有半人高的土墙，坐北朝南，有看坟屋数间，是南分恽氏第十世番阳公之墓，墓前立有一块大墓碑。由于年代久远，常年磨蚀，雨雪天走在青砖路上其实也十分艰难，稍不注意就会滑倒。为了免遭厄运临头，我与小伙伴们常常卷起裤脚管，鞋子往腋肢窝里一夹，赤着脚，脚趾头紧贴青砖表面，恨不得像螺丝钉一样钉在上面，一摇一晃，缓慢前行。即使如此，有时还免不了发生“狗吃屎”或朝天跟头。家里条件好些的，穿上防滑的钉鞋或套鞋就要好些。西堰、大房村、萧家塘、宣庄等村上人来上街也都从这里走。当然，更有南来北往的旅客也在青砖路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今，这些足迹连同那青砖路都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中。

怀念：记忆犹新的童年野趣

煨野火

“煨野火”是过去乡下孩子都会干的事。不是馋，而是好白相，是一种自己动手吃到时鲜美食的尝试。因为需要弄火，怕被大人看到，小伙伴们总是在离村不远低洼处的河滩上，或者杆棵岗里煨野火。煨野火的搭档基本是老人马（原班人马），分工也基本不变，如煨甜饭（甜粥），我负责带煨罐、水壶、勺等器具以及糯米和猪油，红糖和其它配料如红枣、赤豆等轮流提供。记得有一次德荣带了点桂花放在甜粥里，真香。岳定、岳高负责挖灶膛，德群拾干树枝做柴火，淘米、加水都是德荣的

事，岳听负责放哨。我和岳定是不离开灶头的，有时突然下雨，几个人就会脱下衣服遮雨。

煨蚕豆相对简单，剥出豆子放入罐内加点水放点盐，煮熟就可以吃了。蚕豆都是自家田埂边上种的，从来不取别人家的蚕豆。煨田鸡（青蛙）就比较麻烦，要剁头、剥皮、去内肠，然后一一清洗干净，煨出的田鸡肉，原汁原味，味道鲜美。

套野兔闸黄鼠狼

“兔子不吃窝边草”。兔子总喜欢跑到别处觅食，并爱走熟路。所以每次下兔套前，必须先找到兔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还有它走过的路。有次我看到深沟河杆棵岗边种的黄豆叶子被兔子吃过，那是我家的自留地，从河滩进杆棵岗到黄豆地有条不太明显的“兔道”，野草有被踩踏的痕迹，一棵野菊花上还有几根兔毛，于是就在“兔道”上接装了几个兔套。第二天去看，果然有野兔被套住了。岳明、岳定、岳兴、岳高比我年长数岁，他们的最爱是用弓闸捕黄鼠狼。弓闸用毛竹制作，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拉开闸口。每年秋冬季节，他们几个会在河滩、河浜等处挖个三角形的洞，洞里放条小鱼，弓闸放置洞口，黄鼠狼进洞吃鱼，碰到弓闸的机关，弓闸紧闭就能夹住黄鼠狼。逮到了黄鼠狼，将整张皮剥下，里面塞满稻壳，卖给供销社。那时，一只上好的黄鼠狼皮能换回3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黄鼠狼一年能吃300多只老鼠、2000多只青蛙，最喜欢的当然是吃鸡。它的天敌是鹅，脚碰到鹅粪，就会溃烂不愈。如今，黄鼠狼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了。

重温：承载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年猪

过去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猪可以积肥，也可以卖钱，还能在过年过节时吃到猪肉。

能吃能睡能长肉，这是猪的特性。一头小猪仔，如果养得好，半年左右可长到100多斤，如果需要，就可“出圈”，也就是卖掉换钱补贴家用。猪食用的饲料相当广泛，比如大麦、小麦的麸皮，山芋、胡萝卜，油菜、黄豆榨油后的油渣，都是上好的猪饲料。田野里的灰条掌草、大薊、小薊等野草以及菜边皮等，猪也都爱吃。村上有人家专门养猪婆产小猪仔卖钱。开春过后，很多人家会去节场或街上买一只小猪仔，养到100多斤“出圈”，卖

给供销社或外地“收猪佬”，然后再捉一只小猪在家饲养，到年底差不多又是头大肥猪，宰了过年，这就叫“年猪”。每天早上天不亮，母亲起床后要烧一大锅猪食。等猪食半热后舀到猪食桶，再一勺一勺舀到猪槽喂猪，这是父亲的事。对于父亲来说，喂猪是件极慎重的事，不容别人插手。印象中，他脱掉外衣，衬衣袖管撸到腋肢窝，把手伸进猪食桶里摸来摸去，捏来捏去，怕猪食里有铁钉碎石子之类吃到猪肚里。

过了腊月半，乡下人家开始准备杀年猪了。年猪多半得请人杀，俗称“杀猪佬”。宣庄村上的徐玉坤是寿山村上最有名望的杀猪佬，好多人家的年猪都由他宰杀。杀猪是件力气活，更是技术活，杀一头猪一块钱，但猪毛要留给他，洗干净晒干后，大概也能卖些钱。

年猪宰杀后，父亲早已计划好如何处理这一堆白肉：猪头、猪尾巴，还有心、肝、肠等“猪下水”，再有十几斤肉，家里过年用；一条猪腿和十几斤后臀肉，连同大年糕和实心的、青菜肉馅的、萝卜丝猪油渣馅的各色团子，满满一担，挑到常州城送给小姑娘家，姑娘总会给不少馒头和一些给祖父母吃的糕点带回来；浦岸里的老亲眷王春大孤身一人，也总要送点猪肉和年货去；剩下的一条腿，父亲会制作火腿，其余的猪肉，将骨头剔出，切成一二十公分的条块状，用粗盐反复涂擦后放入大瓮头坛子里“腌咸肉”。平时想吃，从瓮头里取出切成小块，在饭锅里蒸蒸。竹笋上市后，咸肉煨竹笋是一道上好的大菜，蛮好吃格。咸肉差不多要吃到麦收季节，此时，又一头年猪也将开始饲养了……

业余文工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中专学校院系也随之做了调整，不少毕业生回原籍待分配。我亦在其列。

回乡后，我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在大华大队担任共青团组织委员，组织青年学习时事，开展社会活动，积极发展团员，同时注意物识文艺人才，与徐浩元、华炳兴、赵杏大、吴坤大等，筹建了“武进县大华业余文工团”。徐浩元担任团长，赵杏大和我任副团长，吴坤大为总务，恽琴观为保管，华炳兴、徐友梅为委员，舞台设计和布景制作由我兼任。



△ 大华大队业余文工团演出人员合影。前排右起：恽兰芳、恽菊芳、恽亚华、恽琴观（小孩：恽国强、恽兰萍）、赵杏大（小孩：恽兰英）、恽琴华（小孩：华亚静）、恽听珍、恽小如、周留大；二排右起：恽忆新、恽元方、恽惠中、恽德荣、徐友梅、恽德群、华仁海、吴铁民、史兰华、恽福萍；三排右起：华炳兴、华焕大、恽东海、周春大、恽岳听、吴坤大、徐浩元、恽南春、恽仲坤。

《母亲》

角色	演员	角色	演员
张指导员	恽仲坤（后为华炳兴）	陈洪元	徐玉春
小 陈	恽德群	群众	周留大、吴坤大
小波	恽浩大	刘彬	华仁海
公安员甲乙	恽岳听、华焕大	赵俊	恽惠中
张老汉	恽东海	匪特甲乙	吴铁民、徐友梅
张小琴	恽亚华	乐器	恽锡大、恽元方、周春大、徐玉春
张立德	恽才兴		

《海滨擒敌》

角色	演员	角色	演员
母亲	赵杏大	老张	恽东海
华芳	恽忆新	杏娘	恽琴观
魏平	华炳兴	素芳	史兰华
专员	恽德荣	李芳	恽听珍
东生	徐友梅	特务甲乙丙	恽惠中、恽南春、华仁海
小王	恽仲坤	伪中央记者	恽仲坤
老刘	恽德群	乐器	恽锡大、恽元方、周春大、徐玉春

△ 大华大队业余文工团排演《母亲》《海滨擒敌》两部戏的演职人员表

文工团成立后，先后排演了《母亲》《海滨擒敌》《兄妹俩》和《大麦黄》等剧目，并到上店小学操场、上店中学操场及庙桥等乡镇演出，杏大、炳兴、忆新等他们的唱腔、演艺都很出色，受到广泛好评。上店南街的业余文工团，早在1956年就名噪一时。我记得他们排演的《花木兰》，由赵玉秀饰花木兰，恽兆祥饰番王，姜纪法、庄玲芳分别饰花木兰父母，演出大获成功。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九华大队业余文工团演出的《拜月亭》等剧目

同样非常精彩。宋长庚、徐盘娣、杨听凤等主演的水平不亚于专业剧团，几乎场场爆满，百看不厌。

话说恽釜门前的石柱

恽釜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进士，是上店恽氏13位进士中第一个登甲的。曾任温州知府，在其自营墓地立有狻猊、石羊、石马，在上店桥北村故居门前数十米处有牌坊。牌坊有4根石柱，上店和上店周边地区老年人都称其为恽釜进士牌坊的石柱。该高大的石柱与胥城（龙潭庵）、上店古桥、恽南田墓是上店的主要历史遗存，2010年上店因规划被拆前尚存石柱一根。

近年，有人认为该石柱是从上店南街南阳公祠牌坊（俗称恽绍芳进士牌坊、恽南田故居牌坊）搬过来的，又说是上店桥北村恽氏宗祠（1949年改为上店中学）的牌坊，我认为非也。

据《恽氏家乘》记载，上店南街的牌坊石柱（俗称恽南田故居牌坊石柱）民国前就仅存两根。2010年上店被拆后的2017年这两根石柱已移存“叶园”。

寿山村的人总是走隆河边的一条青砖竖铺的砖路去上店的，恽釜进士牌坊石柱就在兴隆河北岸不足10米处，我每次去上店首先看到的是这里的石柱。上世纪50年代见有4根，1986年我从新疆调回原籍工作时，看到只剩一根了。恽釜嫡系、桥北村队长恽清兴说：“在正对门的石柱原有4根，其中一根是上世纪70年代上店陆家巷一艘水泥船沉入河中，船工用铁索链套在石柱上拉，把石柱拉断了。另外两根是其兄造新屋时排墙脚用了。仅剩的一根是2010年拆上店时被渣土机撞断，现已埋入土下。”

桥北村恽氏宗祠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在祠内设务本小学，1949年建武南中学（即上店中学），恽氏宗祠门口有照墙，並有大道直通兴隆河大码头，而牌坊石柱在宗祠（上店中学）的西南方。从方位上看，石柱与祠堂无关。

牌坊（石柱）在恽釜故居正南方，世称恽釜进士牌坊。

我为“金鸡路”题名

一段联结千年文脉与城市新生的记忆

肖 飞

每当驱车经过常州城区与武进区湖塘镇接壤的金鸡路，看着车流穿梭、两侧楼宇林立的景象，我总会想起三十年前为这条路题名时的点点滴滴。那条承载着地方千年文脉的路名，不仅是一个地理标识，更像是一根纽带，将金鸡墩的古老传说、史前文明与武进的城市发展紧紧系在了一起。

20世纪90年代初，武进正处在撤县设市的关键节点，新县城建设如火如荼。1994年，县政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城区主干道路名，其中一条连接常州城区与湖塘镇区的交通要道，因地处两区接壤的核心位置，路名既要体现地域特色，又要契合城市发展愿景，成了征集工作的重点。

当时，我深耕地名研究多年，对武进各地的历史文化遗址颇有了解，看到征集公告后，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附近那处曾辉煌一时、却已淹没在时光里的金鸡墩古遗址。

初识金鸡墩，是在翻阅地方史料时。据《湖塘镇志》记载，金鸡墩原位于湖塘镇桥北街西首池塘村前，是一座高约 20 米、宽 50 米，占地近 10 亩的土墩。别看它外形普通，却是距今约 5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常州许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数千年。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有柄石刀、夹砂红陶片，有汉代的蒜头状釉陶壶、釉陶马蹄金、五铢钱，还有宋代的穿孔石斧。这些文物如今分别陈列在江苏省博物院和武进区博物馆，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存在的人类活动痕迹。

更让我着迷的，是金鸡墩那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在江南水乡的语境里，“金鸡”本就是祥瑞与生命力的象征，而金鸡墩的传说更是为这份祥瑞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老人们常说，墩内藏着一对神奇的金鸡，每天破晓时分就会跳上土墩啼叫。听到

鸡鸣的人能招财进宝，看到金鸡的人会交大运，捉到金鸡的人更是能心想事成。可从来没人真正见过金鸡，鸡鸣声也只有清晨睡梦中才能隐约听到。后来有个外地来的挑担换糖小贩，动了贪念。他在深夜用铜盘装着米花糖，在墩前用文火加热，再敲着小锣引诱金鸡。最终，金鸡被融化的糖粘住脚，被小贩捉走。从此，当地的好运仿佛也随之消散，乡亲们的日子渐渐变穷。直到十多年后，人们又在凌晨听到了熟悉的鸡鸣。原来小贩发财后天天提心吊胆，身体越来越差，临死前让儿子把金鸡送了回来，还在墩前树上挂了布条，写着“小人发财如受罪，送回金鸡保平安”。

这个传说里，既有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藏着“贪心不可取”的朴素道理，早已融入了湖塘人的集体记忆。可这样一处兼具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的遗址，却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消失。

1956年，金鸡墩被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湖塘镇政府还计划将其整修绿化，辟为金鸡公园，供人休憩游览。遗憾的是，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遗址遭到破坏；1970年初，湖塘公社又组织劳动力削平剩余土丘，将其改造成耕地；后来随着新村规划推进，这里盖起了房屋，千年遗址最终变得面目全非，地面痕迹彻底消失。每次想起这段历史，我都觉得十分惋惜，这么珍贵的文化遗产，怎能就这么被遗忘在时光里呢！

所以当看到道路命名征集公告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让金鸡墩“重生”的一次绝佳机会。我连夜整理资料，写下以“金鸡路”命名的提议，核心原因有三点：一是为了文化传承，金鸡墩是常武地区重要的历史符号，承载着当地的人文根脉，用“金鸡”给道路命名，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强化地域文化认同；二是考虑到谐音双关，“金鸡”与“经济”发音相近，当时武进正筹备撤县设

市，迫切需要一个能呼应经济腾飞诉求的符号，同时“金鸡报晓”的寓意也契合城市向上发展的愿景；三是基于地理关联，金鸡路的规划走向本就靠近金鸡墩遗址，这种空间上的联系能让路名更具合理性，也让遗址的记忆有了具体的承载。

提交提议后，我心里其实有些忐忑，毕竟路名要经过多方论证，还要通过县人大常委会决定。这次征集路名活动先后收到来信197封，共提出2000余条路名建议。其中，每条路名都有多人提议，唯有“金鸡路”是我的唯一命名建议。

我的提议得到了多位领导和规划专家的认可，大家都觉得“金鸡路”既保留了历史记忆，又充满了时代活力。时任武进县政协副主席的毛有翔先生评价：“这是常武地区最有文化内涵的路名。”最终，武进县人大常委会采纳了这个提议，县政府还以武政复（1994）212号文件正式确定了“金鸡路”的名称。

其后，沿线部分新建小区命名为“金鸡花园”“金鸡南苑”“金鸡社区”以及金鸡墩综合市场、“金鸡路”连锁店，或以“金鸡啼晓”为主

题设计雕塑，或在步道地砖上刻“金鸡”纹样，使其成为地域文化的可视化表达。多处直接以“金鸡”命名，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住在金鸡旁，知其历史源”的认知。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金鸡路早已成为常武地区的交通要道，路上的车流量越来越大，周边的商圈、社区也越来越繁华。偶尔会有年轻人问我，这条路为什么叫“金鸡路”，我总会把金鸡墩的传说、遗址的历史和当年命名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看着他们眼里的好奇与惊叹，我就觉得当初的坚持没有白费。

路名或许只是一个符号，但它背后的文化与记忆，却能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递下去。金鸡墩的地面上遗址虽已不在，但“金鸡路”就像它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带着千年的文脉，陪伴着城市不断发展。每当我走过这条路，都仿佛能听到远古的鸡鸣，看到那些出土的文物，感受到这片土地上从未断过的生命力。这或许就是地名的意义，它不仅标记着空间，更承载着历史，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上接第60页）

2003年12月24日，武大伟夫妇回常探亲。12月26日上午，他再次来到常州外国语学校，听取了戚保华校长的情况介绍，并和师生们座谈交流。

2011年，常州外国语学校举行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工作关系，武大伟夫妇不能来常参加盛会，但武大伟欣然动笔为学校题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娅平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2011年，曾被评为“资深翻译家”。她翻译的图书主要有《太平正芳传》《自民党战国史》《自民党战国史续篇》等，受到了读者好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匮乏，都要凭票供应，但武大伟、毛娅平夫妇热情、厚道，每次回常，都要带点小礼品送给周围邻居，感谢大家对他们家的照顾。由于我太婆与毛家关系融洽，同

在大院中，共在屋檐下，一直相互走动，我家如果包了馄饨会送一碗毛家，毛家假如买了西瓜，也会送一块我家。平时老人人们在一起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开开心心笑一笑，真是“不是亲戚胜似亲戚”。

武大伟、毛娅平女儿武黛小我一岁，小名红红，聪明伶俐，小巧可爱，一直叫我哥哥，喜欢和我一起做功课、过家家、拜摩摩、看小人书。成绩优异的她，先后考取常州市一中、北京理工大学。去北京上大学临行时与我告别，相互共勉，要学好知识回报社会。后来，我们还一直有书信往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太婆去世，毛家搬出了乌龙庵孟宅，迁到朝阳新村新居。

桃李芬芳忆往昔 校园重聚暖重阳

——记常州市东方小学退休教师重阳节特别活动

赵小萍

岁岁重阳，秋阳送暖。2025年10月22日，常州市东方小学以“桃李芬芳忆往昔，校园重聚暖重阳”为主题的重阳节特别活动温情启幕。退休老教师、在职教职工与学生代表欢聚一堂，在熟悉的校园里共忆往昔岁月，共话师生情谊，共度美好时光。

一、光影映朝暮，校话承初心

活动伊始，东方小学的少先队员们纷纷为老教师们戴上红领巾，那鲜艳的红领巾在老教师们的胸前飘扬，仿佛将他们带回了曾经在讲台上挥洒汗水、培育桃李的青春岁月。

在场师生与退休老教师共同观看了学校宣传视频。一帧帧鲜活的画面闪现，镜头下的每一处变迁都镌刻着学校的发展足迹，也唤醒了在场者心中共同的校园记忆。

视频播放完毕，现场响起阵阵掌声，老教师们不时驻足凝视，眼中满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与对学校发展的欣慰。

随后，谢佩君校长致辞。她先向退休教师致以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接着详细阐述了学校少年军校项目近年来的丰硕成果，并勾勒出学校未来的发展愿景。谢校长强调，学校的一步步成长离不开老教师们昔日的无私奉献与默默耕耘，她诚挚邀请老教师们常回校走走，继续为学校发展贡献智慧。

二、少年展风采，薪火永相传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少年军校的同学们身着整齐制服，精神抖擞地登上舞台，借来

经典节目《少年中国说》。他们以昂扬的姿态、洪亮的声音诠释着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激昂的旋律感染了在场每一位观众，也让老教师们不禁想起自己教过的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们，眼中泛起欣慰的笑容。

紧接着，钟爱学校六年级的同学们带着纯真的笑容登场，用稚嫩的动作演绎手势舞《祖国祖国我们爱您》。孩子们认真的模样、真诚的表达，将对祖国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氛围愈发温馨，不少老教师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可爱的瞬间。

三、前辈绽芳华，岁月映峥嵘

少年们的表演结束后，退休教师赵小萍成为舞台的主角。化身“戏曲名角”，用婉转的唱腔、精湛的表演演绎了经典戏曲片段，字正腔圆的演唱、韵味十足的身段，让在场者沉浸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

94岁高龄的刘淑静老师为大家带来钢琴独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

大家纷纷表示，老教师们的表演不仅精彩，更传递出对生活的热忱与坚持，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四、合影定格暖，重阳情绵长

欢乐的时光悄然流逝，为定格这份珍贵的相聚，活动进入合影留念环节。退休老教师、校领导与师生代表纷纷移步校园操场，在相机的“咔嚓”声中，一张张笑脸被永久记录，将这份跨越岁月的师生情、校友情定格成永恒。

点亮常州：常州电力发展简史

杜宇伟

篦梁灯火放异彩

常州，别名“龙城”，北依长江，南濒太湖，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居上海、南京两大城市之中，与苏州、无锡联袂，属中国最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全市下辖钟楼、天宁、新北、武进、金坛和溧阳5区1市，总面积4385平方公里，截止2021年底，常住人口527万余人。

常州，古称延陵，因春秋时季札受封于延陵而得名，季子三让其

国的故事深入人心，厚德重信成为常州重要的文化特质。常州古时以“三吴重镇，八邑名都”著称，出过15名状元，2920名进士，既有着诗书传家的温良斯文，又有着“纸城铁人”的慷慨悲壮。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屡受欺凌的现状，激发出常州一大批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既涌现出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为代表的无数革命英烈，也培育出李公朴、史良等著名爱国人士和刘海粟、华罗庚等一众名家巨匠，刘国钧、祝大椿、杨廷栋等一批志在实业救国的工商业人士也因他们的开明睿智和励精图治，为常州城市的繁荣和转型崛起作出重要的贡献而名垂青史。

二十世纪初期，电力工业初露萌芽，就显露出无限生机，有没有电灯，成为进步与落后的标志，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不认识电的背景下，电力，这束现代文明之光和动力之源，就被祝大椿等一些有识之士较早地引入常州。1914年5月，武进电灯公司在小南门运河边上亮起的第一盏电灯，让渐趋暗淡的篦梁灯火重放异彩，耀眼的电光照亮的不仅是陈旧斑驳的街道，更是照亮了常州这座古老的城市向着现代化起步前进的光明大道。

十年过后，当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与蒸汽化时



代更新交替之际，由于施肇曾、杨廷栋两位民族资本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魄力，把握住了城市发展的历史机遇。1921年兴建、1924年初建成投产的震华电厂，两台3200千瓦发电机同时发电，成为江苏省当时最大的发电厂，发电容量全国排名第七，实足成为当时一座电力“巨无霸”，创造了全国第一个“一厂两市”跨市供电电网、全省第一条（全国第二条）当时省内电压等级最高的33千伏输电线路、全省第一个33千伏变电站、全国第一座农村电力灌溉站等多个第一。“电力先行”，充足的电能保障了以纺织、粮食加工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快速发展，使常州这座江南小城，一个华丽的转身，实现了从漕运带动起来的米业、豆业、木业等传统商业到现代纺织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化城市的转型，迅速崛起为中等城市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伴随着电力的发展，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光明种子也播散进了常州这座城市、播散进常州电力人的心中。东门变电所里成立了江苏电力行业第一个党支部，王寿生等一批电力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将红色基因深深地植入了江苏电力的血液里，激励着一代代苏电人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不懈奋斗。



震华电厂创第一

常州的第一盏电灯点亮后的第10年，1924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在常州东郊约10公里的大运河畔，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发电厂——震华电厂竣工投产了，强大的电流沿着两条33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奔腾而去，为常州、无锡这两座正在蓬勃兴起的近代工业城市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

一、强国梦，催生“万物工厂”

常州等苏南一带城市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明末清初以来，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常州西门外米市河、豆市河紧傍着大运河，岸边米行、豆行商铺林立，粮仓一座挨着一座，鸦片战争后，农村蚕桑业迅速发展，茧市、丝市也盛极一时。大运河上浆声依呀，船来船往，商业的繁荣为发展工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江南文化昌盛，读书人心中饱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一批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在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的惨痛教训中，睁眼向世界，深刻认识到我国与西方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巨大的差距，掀起了实业救国、实业强国的热潮。

常州得长江、太湖和大运河交通之利，尤其是当时“得海上风气之先”的上海，属于江苏省管辖，当地的富商士绅，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后，到上海可以朝发夕至，信息非常灵通，促使常州的纺织、制造、粮食等各类工厂接二连三办起来，

作为现代文明之光的电力，也于1914年点亮了大运河畔的这座古老的城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这给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民族工业以极好的发展机遇，在这大好形势面前，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问题，深感“电气事业，年内已见发达，但所用电气机械设备却依赖国外进口，长此以往，不但仅得外溢，且阻碍技术进步，为国贫民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晚清举人、时任常州纱厂常务董事兼厂长杨廷栋，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过交通部秘书长，极具世界眼光，认识到电气时代将迅速到来，而当时常州的振生电灯公司两台发电机只有280千瓦，无锡的耀明电灯公司4台直流发电机仅320千瓦，仅供照明都尚不足，发展工业所需电力根本无从谈起，电力的不足将严重制约江南诸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于是他首先在上海与西门子洋行买办管趾卿商议，拟在“鱼米之乡”创办电机制造工业，兼营电力，这个想法得到了曾任北洋政府沪杭铁路督办施肇曾的赞同。

民国9年（1920年），施肇曾和杨廷栋赴德国考察。当时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后，国内经济一片萧条，急需扩展市场，施、杨抓住这个契机，经过谈判后，不仅办厂得到了西门子公司的同意，并且订立了特别约定：“凡德国西门子总公司已发明及今后新发明之经验、商标等利益，允许本厂完全享受。”当时国内报界高度评价，赞许此项特约的签订为“中国电业发达之最大机会”[1]。



施肇曾（左）和杨廷栋（右）

震华电厂的建设，历尽艰难。民国10年（1921年）2月，北洋政府批准成立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由于规模庞大，被老百姓称为“万物工厂”。工厂筹建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后来得到西门子公司的援助，挂名资本银250万元，实收150万元。震华所有设备材料及工程设施，大都由西门子公司洋行垫款代购，并由该洋行出面向浙江实业银行借贷银50万元。在筹建的过程中，由于政局动荡，招股不足等种种原因，迫使办厂规模压缩，由制造电机兼营电力，改为专营电气事业，厂名简称“震华电厂”，实为中德合资企业，这在当时，实属无奈之举。

二、规模超前，创造多个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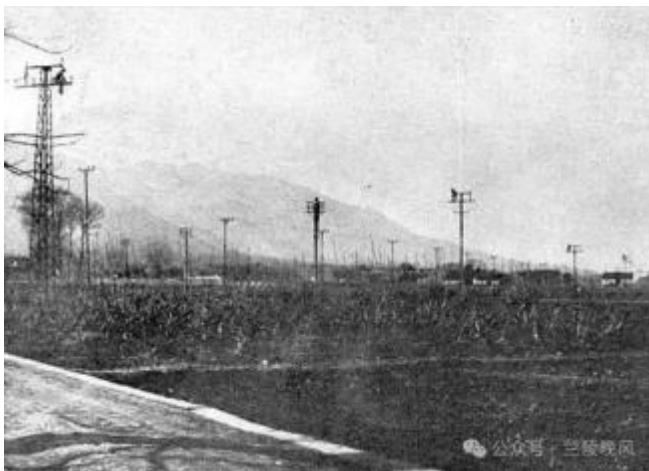
震华电厂一期投产就有两台3200千瓦的汽轮机组，不仅规模大（装机容量当时全国排名第七），而且技术、装备先进，堪称全国一流。要知道在1924年，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没用上电，电力工业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常州的武进电气公司装机才520千瓦，无锡的耀华电灯公司装机736千瓦、镇江的大照电厂装机1140千瓦、苏州的苏州电气公司装机3375千瓦，即使南京的下关发电厂，装机才1656千瓦，因此不论无锡、常州、镇江，甚至苏州、南京，沪宁线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消纳震华电厂这只“电力巨无霸”的发电能力，许多人为此担心，而杨廷栋早有远见：蒸汽时代很快将被电气时代所替代，工业大发展即将到来，电力必须超前，大电厂运行稳定，效率高，将电厂建在两座城市中间，一肩挑两头，再向两边发展，西连镇江、南京，东接苏州、上海，实现苏南联网供电！

要说震华电厂落户常州，纯属塞翁失马的意外所得。施、杨两人从德国考察回国后，这两位同出苏州吴县的老乡，原计划将厂设在苏州、无锡之间的吴县望亭，谁知这一造福乡里的美好愿望，不被乡亲们理解。民国10年（1921年）征地时，望亭农民和吴县田业会以破坏风水为由，竭力反对，随后决定移到常州的戚墅堰镇西。起初常州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愿卖地，因有很多祖坟，认为破坏风水，后来找到地方士绅江湛（字上达）出面，才做通工作，征得300余亩土地。

象这种由于迷信观念或者利益冲突造成的阻扰，严重影响震华电厂的建设进度。民国12年（1923年）6月12日，武进电气公司派人阻碍震华

电厂线路施工，引起双方冲突，挖好了杆洞，电线杆子立不起来，被迫停止施工作业。此事一直闹到省上和军事当局，16日，督军和江苏省分别致电武进县知县，下令保护，震华电厂工程才得以进行。

江苏省第一条33千伏输电线路。克服各种困难，比原计划推迟半年后，震华电厂终于建成投运。一座高高矗立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两台德国西门子和克虏伯工厂合作制造的汽轮发电机组发出巨大的轰鸣，两条33千伏输电线路，一条命名为戚常1号线，沿京杭大运河北岸西行，至常州东门变电所，全长9.47公里。1922年立杆，1924年2月11日投运。全线采用进口的10.28米高钢杆和9.8米高的钢筋混凝土杆。导线采用英规7股14号铜线，绝缘子采用德国西门子厂生产的针式绝缘子，线路平均档距75米（1926年，戚常1号线延伸至新建的南门变电所）。这是当时关内电压等级最高、江苏省第一条（全国第二条）33千伏输电线路。



第一条33千伏线路(来源：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另一条33千伏线路命名为戚锡2线，1923年开始架设，1924年6月投运。线路从震华电厂出线，沿京杭大运河南岸，东至无锡外吊桥变电所，全长29.36公里。为中国（关内）最长的33千伏输电线路。

建立全国最早的输电线路运行巡视制度。1928年开始，设专职巡线人员，每天分段巡视，此外，每隔一月，另派专人全线检查。巡线人员每周将巡线情况报告电务课。33千伏常戚线，巡线人员从常州东门变出发，至戚墅堰发电厂，由电厂盖印证明，作为巡线回单。

一厂供两市，开创了中国电力发展史上跨市供

电的先例。戚常1号线接常州市33千伏东门变电所、南门变电所，戚锡2号线接无锡市外吊桥变电所、惠工桥变电所等，分别向常州（武进）和无锡两市供电，形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33千伏区域电网。

开创了中国农村电力灌溉之先河。1924年6月，震华电厂在武进县定西乡蒋湾桥、吉三垛两处试办电力灌溉成功，灌田3000多亩，蒋湾桥电灌站成为中国农村电灌第一站被载入史册。



1934年戚墅堰电厂输电系统图

与电厂同步投运的震华电厂东门变电所，为江苏省第一座33千伏电压等级的变电所。占地330平方米，建有生产楼一幢，安装33-2.3千伏主变压器2台，容量分别为1500千伏安和1000千伏安，2.3千伏3条，供常州南门外、小南门外民丰纱厂等工厂的用电，并向湖塘桥一带农村延伸供电。

成立江苏省电力行业第一个党支部。东门变电所为震华电厂向常州供电的总变电所，座落在千年古刹天宁禅寺的后林园中。1926年3月，上海杨树浦电厂的工人，年仅20岁的共产党员王寿生，受中共江浙区委指派，只身来到常州，以东门变电所值班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1927年初，在东门变电所这个隐秘的小楼里，成立了常州产业工人联合党支部，王寿生任支部书记。这是江苏电力行业第一个党支部，为北伐胜利和常州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江苏电力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日军侵略，苏南联网功亏一篑

由于震华电厂与无锡耀明电灯公司矛盾冲突不断，连年官司不断，1928年8月，震华电厂竟然发生停电风潮。经武进、无锡两地公众团体及用户强

烈要求，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依照行政院议决的《收管商办公用事业法案》，于同年10月1日，将震华电厂收归国有，易名为“建设委员会戚墅堰电厂”，简称“戚电厂”。

收归国有后，电厂即进行整顿，统一常锡地区的电力营业，清理原震华电厂的账务。民国19年起，工厂进行扩建，分别于民国20年（1931年）8月和民国24年（1935年）4月，先后安装3200千瓦及7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各一台，发电总容量达到1.71万千瓦，被誉为沪宁线上的动力心脏。

与此同时，戚电厂于1930年建成33千伏戚锡新线，1936年建成33千伏戚常2号线，直达常州南门变电所，原东门、南门变电所之间的线路改为联络线，形成双回路跨区供电网络，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大大增加。同年（1936年），从常州东门变电所引出一条33千伏武丹线延伸至丹阳变电所，这条线路长46.32公里，是当时省内最长、也是省内最长的33千伏输电线路。

武丹线按66千伏设计，建成后以33千伏运行，意欲继续西行，与1936年建成的江苏第一条66千伏京龙（南京至龙潭）线迎头而上，南京电网与戚常电网牵手相连指日可待。遗憾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京龙线毁于战火，武丹线也屡遭破坏，建设大电网的美好梦想破灭，一直到16年以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南京至常州的66千伏宁常线建成，苏南联网的梦想才得以实现。日寇的侵略战争打断了我国的电力发展进程，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财产的严重损失。

电力先行。强大的发电能力、富裕的电能、江南城市的区域特点，以及施肇曾、杨廷栋等的雄才大略和前瞻性规划，促使震华电厂创造了江苏省乃至中国电力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同时也创造了常州、无锡两座城市现代化飞跃发展的奇迹。

农电事业开先河

江南，自古鱼米之乡，有谚语：“苏常熟，天下足。”意思是苏州、常州丰收的年头，天下粮食就充足。可那说的是风调雨顺的年景，若是遇上旱涝灾害，靠天吃饭的农民们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不仅疲于抗旱排涝，而且收成必定大减，闹起饥荒来，更加苦不堪言。1924年，就是一个大旱之年，江南秋熟大面积歉收，唯独常州武进县定西乡

(现属湖塘镇)蒋湾桥、吉三垛二处种植的2000多亩稻子却喜获丰收，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这两个村庄的农民们破天荒地用上了电力戽水(戽水，吸水灌田，以下用灌溉)，电闸一合，白花花的水哗哗直流，不费吹灰之力，大片干旱的稻田用水无忧，这在全国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开创了农村电力灌溉的先河。

而要说起当时这件了不起的创举，得从蒋湾桥往东走上二十多里地，运河边新建的震华电厂说起。

一、电力富余找出路，蒋湾桥建电灌站

这一年(1924年)的春天，经过3年多筹建的震华电厂终于竣工发电了，一期工程投入运行就有两台3200千瓦的发电机，装机总容量6400千瓦，全国排名第七，这可是当时的一个电力“巨无霸”，不但发电能力强，而且技术先进，装备可靠，把厂址选在常州与无锡中间，就考虑跨区域向这两座现代工商业蓬勃兴起的城市同时供电，却没想到一上来就与常州、无锡原有的两家电灯公司因为供电营业区的事发生矛盾，东西两个方向都受到了阻碍，由于电力有富余，即寻求开拓农村的电力市场。



武进县在湖塘蒋湾桥最早建设的电力戽水站
(来源：《武进县电力工业志》)

震华电厂有位副厂长，兼常州办事处经理，叫江湛(字上达)，武进湖塘桥人，银号职员出身，为开办纱厂，出国考察到过日本、英国，视野

开阔，办事干练，他有个同胞兄弟叫江澄(字上悟)，在定西乡做乡董(相当于乡长)，于是江副厂长找到哥哥江乡长商洽，希望开通至湖塘的线路，试办电力灌溉。双赢之举，一拍即合。经过仔细商量和现场踏勘，选中蒋湾桥及吉三垛两处进行试办，灌田2000余亩，涉及田主约500户。这蒋湾桥为南宋著名大儒周敦颐嫡传后人聚居之地，村上建有“爱莲堂”，民风淳朴，思想开放，对新鲜事物比较容易接受。为便于管理，由江澄和他的表弟杨挺葆等组织成立了一个“利民农事合作社”，杨挺葆担任董事长，着手建立电灌站。

厂方随即派出工程师沈嗣芳到湖塘洽谈业务，并签订合同。沈嗣芳毕业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五四运动高潮期间，曾担任学生会书记，在组织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是一个以改造中国、挽救危亡为己任的热血青年。杨挺葆是湖塘桥上街人，读过几年私塾，从小跟着父亲做粮食生意，精明能干，随机应变能力强，虽然他不种田，但经常下乡收稻，深知种田之苦。种田之苦，最苦莫过于车水，稻田上水的日子，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三、四个精壮的男人，趴在一横木上，双脚踩着沉重的水车，吱呀吱呀，一刻不得停歇，往往白天黑夜连轴转，辛苦劳累得跟牛一样。于是他常常琢磨，有没有一种现代机器，能够取代这种繁重的劳动呢？他从电的威力中感受到无限的商机。两个人的结合可说是黄金搭档。

根据协议，所有电力灌溉设备，均为震华电厂采办安装，统一租借给利民农事合作社。震华电厂建设一条从东门变电所至湖塘桥，电压为2.3千伏的高压线路，供蒋湾桥、吉三垛两个电力灌溉站用电。站内装设水泵两台，其中一台系德国制造，用27匹马力(合19.8千瓦)电动机带动，另一台为国产水泵，用35匹马力(合25.7千瓦)电动机带动。沈嗣芳主要负责电力线路和配电装置以及电力灌溉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杨挺葆则主要负责与地方、农户、田主的沟通协调，规划灌溉网络，开挖渠道。

配电线路由木杆、裸铜线、铁横担、蝴蝶瓷瓶等组成，在水网密布的田野中穿行，沉重的设备、材料和施工机械都要靠人工搬运，条件十分艰难，但更艰难的是做通人的工作，最要紧的是要动员说服水渠沿线的田主同意电力灌溉，这方面杨挺葆充分运

用他的地方优势和交际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电龙灌水威力大，大旱之年夺丰收

经过长达半年的努力，终于赶在黄梅雨季前夕，完成所有的电力线路和机电灌溉设备安装，以及水利设施工程施工，7月10日，开机试灌那一天，四邻八乡的农民纷纷赶来看“西洋镜”，渠道两旁站满了人，热闹得赛过赶节。时辰一到，闸门轻轻一合，随着轰的一声，一股白色的水柱“呼”的一下，从粗大的水管中喷射而出，围观的人群发出一片欢呼，强劲的水流象个调皮的孩子，在翻耕好的田里跑着飞快，不到一个时辰，十来亩田里就灌满了清水，围观的人们惊喜地瞪大了眼睛，七嘴八舌，叫好不断。

在7月8日到9月18日的两个多月中，电灌站开机42个昼夜。蒋湾桥一带地势虽高，却大旱大丰收。当时电力灌溉实行“包打水”，每亩田全年灌溉交费只需1.2元，还不到人工“车水”一天的工资，省力省钱，同时，高地稻田，采用电灌后，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每亩原来生产4石的，可增至6石。产量提高了，地价也水涨船高，原为低价的农田，有涨3—4倍的。乡下人喜欢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电力灌溉的优越性，为当地农民所叹服，电灌设备被誉为“电龙”，抽上来的水叫“龙王水”。

当年秋收后，杨挺葆又在湖塘镇上试办电力碾米，安装了两部碾米机，用27匹马力（合19.8千瓦）的电动机拖动，每小时可碾米40石，深受农民欢迎。地方报刊报道：“乡人之负稻束者，可立待携米而归，风声所播，十里之内，农民咸集挂号，挨次而进，每每日以继夜”。这也是武进地区乡镇将电力用于粮食加工业的开端，促进了农村用电的起步和发展，形成了“电跟水走”的发展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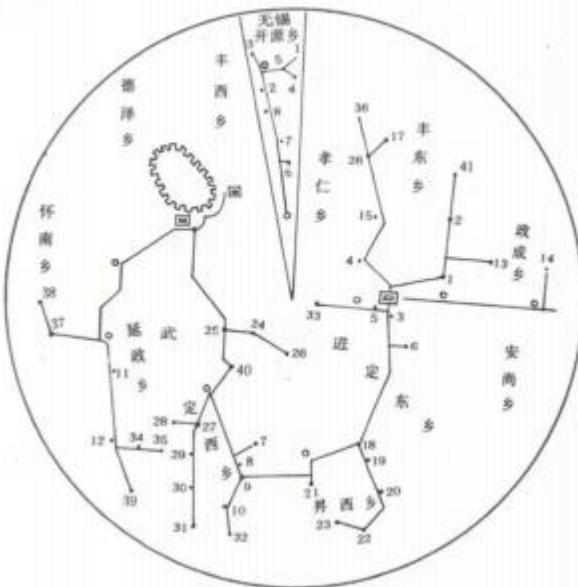
三、全国首创作示范，农电事业开先河

第二年（1925年），要求架线通电，设机灌溉的农户接踵而来，从定西乡扩大到了丰东、政成、延政、定东等五个乡，电力灌溉面积9830亩。另有12处还在申请设置电力灌溉站。电力灌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地方官署也出面支持。针对故意损坏渠道、恶意截水、漏水破坏行为，2015年4月28日武进知事公署发出了“定西乡推广电力戽水，示禁妨碍水道”的布告，使震华电厂的电力灌溉事业受到政府的保护，既发展了电力灌溉事

业，又开拓了震华电厂在农村地区的供电营业。

1926年（民国15年），无锡县乡区闻风而动，先后在开源等乡建设电力灌溉站，苏州电气厂在浒墅关一带也试行电力灌溉。该年7月间，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黄炎培在江上达陪同下，专程赶赴蒋湾桥等处实地视察，称赞此举为“全国首创”，并建议在国内推广。

武进无锡电力戽水比较图



1928年武进无锡电力戽水比较图（来源：《戚墅堰发电厂志》）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一片凋敝破败，除政治原因之外，主要是“水利不兴”，国民政府负责全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机构之一的建委会为推动农业进步，“拟于各省选择相当地点，分别设立模范灌溉区，凡提工闸坝沟渠戽水发电等，一本科学方法，人事设备，以广观摩，而资提倡。……于我国农业前途，实有无穷之希望。”而1928年10月，震华电厂被建设委员会接收（改称戚墅堰发电厂），其在武进农村成功开展电力灌溉的实践，恰好为建委会建设模范灌溉区提供了现成的样板。

1929年1月，受聘于建委会顾问的美国电力工程师亚诺乐尔在《建设》第二期上发表文章《利用电力灌泄以发展戚厂附近农电之计划》，阐述中国发展电力灌溉的重要性与建委会在电力灌溉事业中所负的责任。亚诺尔在文章中说：“现在戚墅堰电厂附近已实施电力灌溉，效果良好，农民获益甚多，那么，在戚墅堰电厂的附近区域之外，中国农

田与之相类者，十倍于斯。如能应用电力以图发展，则交通便利，收获较富，原料价廉，中国人民之生活与幸福，可因之增高也。”亚诺尔的文章基本表达了建委会发展电力灌溉的愿望，专门的电力灌溉管理部门也就应运而生。

1929年10月26日下午2时，由建委会电气处、水利处召集，会同首都电厂厂长陆法曾、戚墅堰电厂厂长吴玉麟、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张自立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参加的建委会“计划发展电力灌溉”会议在建委会礼堂召开。由于首都电厂发电不足，“已无余力”向农村供电，主要由戚墅堰电厂吴玉麟作了推广电力灌溉试点的工作报告。

1929年（民国18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第一区灌溉委员会，同时任命戚电厂总工程师吴新炳为第一区灌溉委员会电工股主任，戚电厂常州办事处工程师谭友岭为副主任，以建设委员会的名义公布了电力岸水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电力灌溉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性制度。

1931年（民国20年）4月，建委会改组第一灌溉委员会为模范灌溉武锡区办事处，电力灌溉发展更为迅速，这一年所建电灌站“武进境内者49站，无锡境内者13站，共计62站，设备专用杆线150余里，利用电力1400千瓦。”考虑到各个电灌站“散于乡间，路途遥远，交通迟滞，管理通讯，均感不便”，于1931年为各个电灌站敷设电话线，分布于20余站。这年武进、无锡地区电力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增加到4万亩，到1933年更是超过了5万亩。

震华电厂在武进蒋湾桥建设了中国第一座电力灌溉站，首创农村电力灌溉事业，是继内燃机抽水灌溉之后农业生产技术的一次革命性进步，同时开农电事业之先河，为全国推广电力灌溉作出了示范，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繁荣农村经济，减灾防灾，将亿万中国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谐发展出奇迹

古人言：“一山容不得两虎。”又说：“两虎两争，必有一伤。”电力，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当一个供电区域内突然冒出另外一家电力公司，就好似一片山林里，突然窜过来另一只老虎，还是只力大无穷的猛虎时，情形会是如何呢？

常州的电力事业，在振生电灯公司发电十年

后，就出现了这样两虎相争的危机局面。

1924年的年初七，东边戚墅堰镇上的震华电厂发电了。电厂的创办人杨廷栋、施肇曾超前意识到电气化代替蒸汽机的时代迅速到来，电力先行跨大步，震华电厂一期工程就2台3200千瓦的发电机同时投产，分别经33千伏戚常线、戚锡线向常州、无锡两市供电。

当时的振生电灯公司经过近10年的苦心经营，效益颇丰。2015年时振生电灯公司已经盈利5700元，1919年振生电灯公司看形势大好，又在原址增加1台日本造的容量为100千瓦的煤气发电机组，紧接着1920年又增加了一台英国造的容量为240千瓦的蒸汽发电机组，振生电灯公司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520千瓦。

1923年5月，经江苏省省长公署批准，振生电灯公司改名为武进电气厂股份有限公司，兼营电力，开始发行股票、购买新地、在大北门外殷家桥北石人嘴另建立了新的厂房，并向瑞士订购1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套。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面对震华电厂这个电力“巨无霸”，装机容量仅520千瓦的振生电灯公司好似拳击赛场上轻量级对重量级，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怎么办？

看看线路架设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武进电气公司暗地里派人到震华电厂的线路施工现场捣乱，意图阻挠施工，三句不合动了手。双方都不买账，一纸诉状告到了江苏省督军那里，督军知道震华电厂来头很大，“重点工程不得延误”，一通电令，责成武进县政府加强对震华电厂的施工保护，武进电气公司虽然败了诉，但也抓着了理——当初振生电灯公司创办时，与武进市董事会合订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着：“第三条：以市区为限，如须于市区以外，由本公司随时与乡公所一律商办。第四条：本公司经官厅及市公所立案建设后，于二十年间所有传电区域不得再有其他人经营同一事业。”

前面说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武进电气公司与震华电厂一味争斗下去，势必两败俱伤。常州自古斯文之地，深受季子三让其国的影响，民风淳厚，在武进县府和商会的协调下，武进电气公司与震华电厂经过友好协商，订立供电协议，约定以东门新丰街和关河为界，城区由武进电气公司供电，城厢及农村地区由震华电厂供电，并且针对两厂之中任何一厂因设备检修、发生事故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供

电不足的情况，达成由另一厂给予转供电支援的协议，在城市东、南、北三个方向的2.3千伏线路上装设联络开关，互为备用，被称为“互助供电”。

妥善解决了供电营业区域之争，“两只老虎”从此相安无事，常武地区（即后来的常州市、武进县、丹阳县）形成了两个电厂分区经营、互助供电的良好格局，促进了武进电气公司和震华电厂的和谐发展。

常州有电之始，振生电灯公司每天傍晚发电，至12时停机，只在上半夜供电。随着电灯照明的推广普及，特别是工业动力用户的增加，1925年6月15日，武进电气公司开始日夜供电。翌年春天，1926年3月13日，武进电气公司北门发电所新安装的1500千瓦发电机组开机发电，同时，横兴桥老厂停止发电，原有的3台发电机分别出售给溧阳振亨电灯公司、扬州振扬电灯公司和泰县姜堰电厂。

电力，这个光明之源、动力之源，如强劲的东风催得百花盛开一样，常州市里的电灯一盏盏亮起来，工厂企业也一家家冒出来。1928年，常武地区共有电力用户90家，其中武进电气公司供电18家，震华电厂供电72家。工业用电以纺织、碾米、油饼、铁工为大宗，年用电量约490万千瓦时，占总用电量的一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高潮。常州城内也兴起了办厂的热潮。“本市的纱布事业，顿见畅旺，土布棉布商，以本业日见销畅，群起集资，购机置地，建屋装备，开机出货，成为染织厂者，东、南、西、北四门皆满，城内集中东下塘、椿桂坊、陶沙巷、乌衣巷、荆溪村一带，真如雨后春笋，兴盛无量矣。更有面粉厂、碾米厂、制油厂、毛巾袜厂等多家，亦在本市城内外，先后兴建。开机生产。”

也就在1931年，武进电气公司盈利有余，董事会决定再装新机。1933年，向德国购买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套，向英国购买蒸发量为11.32吨1小时的锅炉1台，翌年发电，至此，武进电气公司装机容量达到3500千瓦，发供电业务进入全盛时期。

震华电厂在常州的供电业务绕城发展，并利用富余电力向农村扩展。开办初期，由于负荷不足，以及与无锡耀明公司的连年讼争，经受了连年亏损的挫折。1928年10月1日，震华电厂收归国有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将电力营销乡镇代理制

电力驱动的新型纺织机械



一律取消，改为电厂直接营业，并将空置不用的数十台大小电动机以廉价（每月仅收租费5角）租赁的形式，大力推广小工业电力用户。经过整顿，电厂面貌焕然一新，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时常州新兴的现代工业企业，如大成纺织公司等很多工厂建在城外，用电需求促使电厂不断扩建，1931年3号机组（3200千瓦）、1935年4号发电机组（7500千瓦）分别建成投产，电厂发电总输出力达到1.71dnv千瓦。设备不断扩建，服务广受欢迎，戚墅堰发电厂成为当时工程技术先进、管理制度严密、营业兴旺、年盈余多的公营电厂之一。电力用户争先恐后求购戚墅堰电厂的电力，电厂营业范围不断扩大，效益突显。

城里、城外电网连成一片，武进电气公司与戚电厂互助供电，和谐发展，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为常州这座现代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强大动力。从1928年至1937年，电力用户从90户发展到了300多家。大成纺织公司在1930至1937年的8年中，无论是设备还是资金，均增长了8倍，创造了“大成奇迹[]”，纺织工业成为第一支柱产业，连带效应也使其他近代工业随之发展，最终完成了从传统漕运城市向近代轻工业城市的转型，当年施肇曾、杨廷栋等电厂创始人电力先行的远见卓识终于梦想成真。

常州，从此以一个工业明星城市的姿态站上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大舞台。

（作者系国网常州供电公司高级工程师、江苏省电力公司安全巡查专家。参与编纂《中国电力工业史》《点亮中国》《点亮江苏（大型纪录片）》《常州市电力工业志（第二部）》等）

《南朝齐梁趣谈》正式出版

齐梁文化研究领域再添重要成果——由常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齐梁文化研究丛书》主编薛锋所著的《南朝齐梁趣谈》，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作为《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计收录65篇文章，约24.1万字，为读者打开了了解南朝齐梁历史文化的新窗口。

据悉，在我国南北朝(420—589年)历史进程中，齐、梁两朝虽国祚不足百年，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个王朝的创立者齐高帝萧道成与梁武帝萧衍，均出自南兰陵萧氏家族。齐、梁时期大力开发江南，推动经济发展，促使我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扭转了“南贫北富”的传统格局；文化领域更是迎

来春秋战国后的又一“黄金时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两朝的兴衰更迭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南朝齐梁趣谈》精选齐梁时期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知名历史人物及经典典籍掌故，以“一事一议、一人一说”的形式进行解读。全书内容均源自正史，摒弃野史与小说传闻，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学术性。同时，书中采用浅显通俗的文字表达，并搭配图画辅助阅读，助力读者轻松领略齐梁历史文化的魅力，深化对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认知。

(张军 葛小林)

《伟哉，南兰陵萧氏》出版



日前，常州储佩成教授遗著《伟哉，南兰陵萧氏》出版！

储佩成，男，江苏金坛人。1958年入贵州省师专学习。1962年毕业于贵州工学院，在贵州担任高中语文教师。1985年调入常州工学院担任学报主编并授课，是该校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等，并与薛锋先生一起主编出版《齐梁文化研究丛书》。自中学时代起，已发表出版文学著作、学术著作近五十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并多次获省部级大奖。

(张军)

一部兼具思想性、文学性与可读性的佳作

——浅评《冯仲云抗倭记》

金 平

在众多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冯仲云抗倭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卓越的文学性和强大的可读性脱颖而出，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冯仲云这位抗日英雄波澜壮阔的一生，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一、深刻的思想性：传承抗联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冯仲云抗倭记》具有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核心在于对“抗联精神”的生动诠释与大力弘扬。冯仲云身处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毅然投身抗日洪流，他所展现出的坚定信仰、顽强意志和无私奉献精神，是抗联精神的集中体现。书中通过描绘冯仲云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种种经历，如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战斗，生动地揭示了“一息尚存，誓死抗日”的革命精神真谛。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冯仲云个人的品质，更是整个东北抗联群体，乃至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时所展现出的伟大精神力量的象征。

作品对于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成为了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宝贵载体。在和平年代，我们不能忘却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们。《冯仲云抗倭记》让读者深刻认识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无论何时何地，当国家面临危机时，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当挺身而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这种精神激励着当代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卓越的文学性：多维度刻画，还原历史现场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冯仲云抗倭记》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作者运用了丰富多样且细腻入微的描写手法，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

的塑造。冯仲云在书中被刻画得有血有肉，他不仅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将领，能够精准分析敌我态势，制定巧妙的作战策略，带领部队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同时，他还是一位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关心下属的领导者，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战士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们奋勇杀敌。例如，书中描写冯仲云在冰天雪地中与战士们一同忍饥挨饿，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这一细节生动地展现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作品在场景描写方面也堪称一绝，作者以生动的笔触，为读者再现了东北抗日战场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以及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通过对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地、硝烟弥漫的战场、简陋破旧的营地等场景的细致描绘，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能够深刻体会到抗联战士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挑战，以及他们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顽强抗争的英勇无畏。比如对一场激烈战斗的描写，作者通过对枪炮声、喊杀声、战士们的冲锋姿态以及敌人的狼狈逃窜等细节的刻画，将战斗的紧张与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现场，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三、强大的可读性：情节引人入胜，语言通俗易懂

《冯仲云抗倭记》在可读性方面表现出色，其情节设置巧妙，充满了张力和吸引力。作者精心编排冯仲云的抗日历程，将一系列战斗故事和生活片段有机地串联起来，使整个作品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从冯仲云最初投身抗日的坚定决心，到他在战斗中遭遇的重重困难和挫折，再到他带领部队取得的一次次胜利，每一个情节都紧紧抓住读者的眼球，让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接下来的发展。例如，在描述一次突围行动时，作者通过设置悬念、营造紧张氛围，如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部

肖飞新作《冯仲云抗倭记》出版

2025年7月30日，由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武进季子文化研究会顾问、知名作家肖飞创作的纪实文学《冯仲云抗倭记》正式出版，这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也是肖飞的第18部专著。

冯仲云是江苏武进人，于1908年3月23日出生，抗联名将。192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在此期间研读马列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5月，冯仲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0月，他前往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彻底击碎了他“科学救国”的幻想。看着东北同胞在日军铁蹄下的苦难，这位本可以在数学领域深耕的青年，毅然放下了演算纸和圆规，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决心以利剑为笔，以热血为墨，书写壮丽的14年抗战篇章。

为真实还原家乡抗联名将冯仲云的抗日历程，肖飞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追寻之旅：他深入历史档案馆、烈士纪念馆与抗联事迹陈列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卷宗中拂去时光尘埃，从泛黄的史料里捡拾历史碎片；走访英雄后代、战友亲属及知情者，聆听被岁月尘封的记忆，将零散的故事串联成完整的历史长卷。

(接上页)

队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等，让读者为抗联战士们的命运捏一把汗，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作品的语言风格通俗易懂，朴实无华，却又饱含深情。作者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叙述故事，让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能够轻松理解。同时，在字里行间，作者又融入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深刻感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无论是对抗日战斗的描述，还是对冯仲云内心世界的剖析，作者都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却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这种语言风格使得作品

历时一年多，肖飞撰写及修改20余稿，《冯仲云抗倭记》在今年7月出版。《冯仲云抗倭记》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翔实且生动展现武进籍抗联名将冯仲云浴血抗日历程的文学作品，通过22万字和数十幅珍贵图片资料，描述了冯仲云率领东北抗联将士数十次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及感人肺腑的英勇事迹，揭示了“一息尚存，誓死抗日”的革命精神。书中不仅详尽展现了冯仲云在军事指挥与战略决策中的卓越才能，更深入挖掘其在文化宣传、群众组织等领域的重要贡献，以全方位、立体化的笔触，勾勒出这位抗日英雄的光辉形象。

《冯仲云抗倭记》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卓越的文学性和极强的可读性脱颖而出，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不仅为人们展现了冯仲云这位抗日英雄波澜壮阔的一生，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冯仲云抗倭记》问世，为人们深入研究抗战历史、学习抗战英雄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可成为广大青少年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的乡土教材，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吴振达)

更易于被广大读者接受和喜爱。

《冯仲云抗倭记》是一部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性完美融合的优秀纪实文学作品。它通过对冯仲云抗日事迹的生动叙述，让我们深刻领略到了抗联精神的伟大力量，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学盛宴。这部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是对当代社会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和精神引领作用。它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省庄记忆 · 时代华章

——《省庄村志》首发仪式

金秋送爽，硕果盈枝；文脉传承，载誉启航。2025年10月11日，横山桥镇省庄村“省庄记忆 · 时代华章——《省庄村志》首发仪式”圆满落幕，120余位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载入省庄史册的文化盛事。作为常州经开区首部公开出版的村级志书，《省庄村志》历时三载精心编纂，凝聚着全体省庄人的心血与期盼。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处处长臧素雅、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处副处长胡昊、常州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徐铭、横山桥镇党委副书记冯越超、横山桥镇宣传委员周杰、横山桥镇人武部长向飞等领导出席活动，村志主编及编纂团队、爱心捐赠企业家、心系桑梓的乡贤、历届村干部及村民代表一道，共赴这场乡愁之约、文化之宴。仪式在《蝶变，这里是省庄》专题视频中拉开帷幕，光影流转间，省庄村的历史变迁、发展成就与崭新面貌徐徐铺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省庄村党总支书记韩亚伟致欢迎辞，向各界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肯定了村志对“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激发奋进动力”的深远意义。他表示这本村志是省庄人心中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图腾”，只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根脉与传统，才会懂得珍惜与守护，才能激发更多人共建美丽家园的热情，为省庄村乡村振兴助力。

主编徐瑞清深情回顾三年编纂历程，分享寻史料、访耆老、实地勘查的点滴感动；现场还为助力村志出版的16家爱心企业颁发捐赠证书，致敬其反哺乡梓的善举。

“一志载千秋，乡魂永流传！”在“我与省庄的故事”主题访谈环节，不同年代的嘉宾代表用朴



实话语讲述与省庄的深厚情缘，道出“讲好省庄故事、助推乡村振兴”的共同心愿。

随着臧素雅处长等六位嘉宾共同触摸启动屏，《省庄村志》正式发布，现场掌声雷动，气氛达到高潮。随后，省庄村党委书记韩亚伟、副书记陈小琳向乡贤及各界代表赠书，以志为纽带，让省庄故事代代相传。

仪式最后，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处处长臧素雅在寄语中充分肯定编纂成果，祝愿省庄文脉永续，并表示将做好志书“后半篇文章”，推动其开发利用，让静态的志书“活”起来。《省庄村志》的首发，是省庄村文化建设的里程碑，更是迈向未来的新起点。全体省庄人将以志为鉴、以史为励，传承前辈拼搏精神，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时代华章，让省庄的记忆与荣光，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韩碧英)

《常郡八邑艺文志》献疑

张军

艺文志，是中国历代纪传体史书、政书、方志等，将历代或当代有关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谓之“艺文志”。方志中编辑收录的诗文，亦多称“艺文志”。艺文志，一般情况下，规定了地域，那就要以地域为原则，比如《常郡八邑艺文志》。常州明代辖武进、无锡、江阴、宜兴、靖江五县；清雍正年间，从武进分出阳湖，从无锡分出金匱、从宜兴分出荆溪，辖县增至八个，史称“常郡八邑”。八邑时期的常州府没能留下一部府志，但留下来一部《常郡八邑艺文志》，全文收录了上述八县的重要诗文，是非常珍贵的地方史料。

既然是常郡八邑，那应以常郡八邑为基本地理范围，收入写常郡八邑事、写常郡八邑人、写常郡八邑景的文章、诗词。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有所延伸，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常郡八邑艺文志》收录的文章，能否包括到当时在镇江府的内容呢？这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唐代以来，常州（府）管辖范围基本固定，变化不是很大。变化大的是唐代以前，尤其是所谓“晋陵郡”“南兰陵郡”的时代。其中，晋陵郡范围包括到如今的镇江地域，晋陵郡郡治在京口、丹徒一百多年，但我未能从《常郡八邑艺文志》里找到关于京口、丹徒的详细内容描写。

宋代及宋代以后，毗陵、延陵、晋陵混用者多，除丹阳的“延陵季子庙”“季子庙”等与延陵有所关联外，一般指代常州。镇江境内的延陵县，设立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至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此后，延陵县被废除，改为延陵镇，并一直隶属于丹阳至今。也就是说，西晋太康二年至北宋熙宁五年这个时间段，政府公文里都以延陵县称之。

不过，与常州（府）基本无行政联系的丹阳县（含延陵县），因延陵季子庙这个“IP”而与常州产生了奇妙的缘分。清代人在编《常郡八邑艺文志》时，出于种种原因将有关丹阳季子庙的内容也收了进来。

在宋代以前有关延陵季子庙的文章，基本上叙述的是今丹阳延陵镇的延陵季子庙。同时，“沸井”是丹阳延陵季子庙与江阴、常州季子庙相区别的最重要特征，只要文章中描写到了沸井，那么该文写的一定是丹阳延陵季子庙。笔者注意到，《常郡八邑艺文志》中，有8篇文章直接描写季子（庙、祠墓），其中3处在丹阳；另有12篇诗词描写延陵季子（庙、祠墓），其中3处在丹阳。

丹阳延陵季子庙，在古代官方认可的季子庙序列中也叫“西庙”，与之对应的还有“北庙”（武进傅落城）、“南庙”（在晋陵东郭外，今属常州市中心城区）。而《常郡八邑艺文志》收录的第一篇关于延陵季子的文章，是时任润州知州的杨杰写的《元祐戊辰六月知润州奏》。奏，始于秦朝，是臣僚上于皇帝，陈述政事的上奏文体之一。这篇文章讲述的就是丹阳延陵季子庙，但是彼时该处地方在行政上与常州（府）没啥关联了。至于为何要收录，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季子文化有所传承、弘扬的缘故吧，毕竟，常州人以延陵季子为人文始祖，至今在常州红梅公园内有一座砖木结构黄柱黑瓦飞檐戗角的大牌坊——嘉贤坊，去年还新建了季子文化中心以资纪念呢。

《元祐戊辰六月知润州奏》这样表述：窃见管下延陵镇吴季子冢庙，载在图经，祠祷有应……

这篇文章显示，“延陵镇吴季子冢庙”在润州“管下”，并记载在“图经”，也就是当时的地方志上。此外，文中有“庙中有孔子所题十字碑，本朝太宗皇帝尝以其字载之法帖，以信万世”等句，据了解，现存宋太宗时期《淳化秘阁法帖》里所谓的“十字碑”法书实为12字，与现存丹阳延陵季子庙所存者不同，其中究竟是何原因，待考。

另一篇是润州刺史萧定的《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此碑文记录的是唐大历年间，重修吴延陵季子庙的盛事。但是书中删去了当（下转第116页）

诚信求实 争创一流——常州（延陵）人文精神

2025年8月17日在毗陵谢氏奖学金颁发仪式上的发言
张尚金

尊敬的谢氏宗亲会文友们：

（一）

2024年8月11日我曾参加你们的盛会，隔了一年又来参加你们的活动。去年的讲话稿，如果有兴趣可查《科普小作家公众号》，有《张尚金在毗陵（常州）谢氏宗亲会优秀大学生奖励活动时的讲话稿》。今天只重复讲其中的一段话：毗陵（常州）谢氏家训严、家风好、值得本人学习，常州谢氏很可能是当代编修谱牒最认真、研究学风最严谨、树碑建馆最朴实，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姓氏之一。以我认识的众多文友来讲，谢达茂是常武地区近二十年来“讲真话、求真理、办实事、出成果、育人才”的在民间影响很大的地方文献学者之一。以谢应芳为代表的元明辨惑求实文化，为形成常州（延陵）“诚信求实、争创一流”的人文精神，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出自内心的表示向谢氏宗亲会学习！

（二）

纵观常州武进地区，有文字记载历史是周灵王二十五年、吴王余祭元年（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封季札于延陵邑，迄今2500余年，仅以文化领域而言，形成了以延陵季子文化为开端引领的七大特色文化：春秋延陵季子文化、南朝齐梁萧氏文化、隋唐常州运河文化、两宋书院科举文化、元明辨惑求实文化、清代五大学派文化、共和常武经世文化。由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素质逐步形成常州武进人的人文精神。早在1991年中共武进县委提出了“团结奋进、勇于开拓、实干兴业、争创一流”的武进精神。2007年又充实了“创新、创业、创优”的三创精神，2008年3月，江苏城市论坛又称：“事事当争第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的常州市民精神。2013年1月，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和武进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武进文史研究》〔（后改《常武文史研究》）。（2012中国武进南风词学论坛专辑）〕总第九期，曾登载王定元的文章《当事事为第一流》，文中称，张公（即张惠言）《送恽子居（敬）序》云：

“始予居之语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尝忘也。”（《茗柯文稿》初稿）。该刊总第十一期还登载了张克强《下笔成珍挥毫可范》一文。其“耻为天下第二手”一章中称：恽寿平画，善山水，力肩复古，及见王翚，度不能过，则谓之曰“是道让兄独步，格妄耻为天下第二手。”张惠言是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的创始人之一，恽南田为毗陵（常州）画派的创始人，当代有人将“事事当争第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两句话合起来称为阳湖精神。这个阳湖不是简单的时间、地域概念〔清代的阳湖县是雍正四年（1726年）至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1月9日）间存在的，从武进县析出再并入武进县，历时共186年时间〕，而是作为常武地区历史文化的首创精神存在的，实质上就是当代的“三创”精神。“创新”即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创优”，新的事物出现，只有优秀的作品，优良的产品，才有发展前途；“创新”“创优”，只有创业，即创立基业（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下），三者统一，才能形成完整的概念。2013年3月2日，中共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费高云在武进调研时要求，武进要进一步发扬“事事当第一流”的阳湖精神。2017年6月，常州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发出的《常州市民文化手册》，提出常州市民精神：勤学习、重诚信、敢拼搏、勇创业。

2008年出版的《江苏省志·人物志》指出，“吴王余祭元年（前547年），封季札于延陵（今江苏常州武进、江阴、丹阳一带），他是常州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第一人。”2009年5月12日，由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主办的“纪念延陵季子诞辰2585年暨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区文化局长郝建成作了“传承季子文化、建设诚信武进”的讲话。这是民国5年（1916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二）纪念先贤季子的会，相隔93年重新开始常州武进公祭季子及第一个诚信日活动。2010年9月，由时任中

共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缨任主编，常宁文、袁雪珍、吴爽任责任编辑的凤凰出版社出版《影响中国的常州人》一书，书中由纪玲妹撰写了“中国诚信第一人——常州人文始祖季札”。2014年5月16日在纪念延陵季子诞辰2590周年大会暨第六个诚信日活动时，著名学者吴榕提出“诚信是季子文化的核心”。2020年4月14日至16日三天，由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举办《常州市城市形象宣传用语、标识公示投票》。王承鹏撰的宣传用语“季子故里信义常州”，获得46347票为第一名；此宣传用语获入围奖（30名）第五名。季札是获奖36条宣传用语中提到的唯一常州历史大名人。此后季札是“中华诚信第一人”“古延陵人文始祖”成为常州人的共识，“传承季子诚信基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季子诚信文化，建设道德风尚高地”“季子故里、齐梁故里，三杰故里，毗陵我里”成为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公共场所发布的宣传用语。

2022年7月2日《常州日报》文笔塔刊登笔者《常武地区元明辨惑求实文化的旗手“江南孔子”谢应芳》。文中指出谢应芳一是“志在辨惑思想家”，《中国全史》（百卷本）《元代思想史》指出《辨惑编》是当时一部系统全面反对和清算神学封建迷信，充满无神论思想的著作，对后来的无神论思想有相当的影响。谢应芳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不仅惠及当时社会，乃至其《辨惑论》所列十五目愚俗还部分存在的今天，更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季札是春秋晚期的思想家，谢应芳不愧为元明年间全国一流的无神论思想家；二是求实爱民实干家，他经过吴江时游览“三高祠”，对祠中祭祀“三高”（西晋文学家张翰，唐道学家陆龟蒙、春秋晚期越国宰相范蠡）之一的范蠡一事大为震惊，吴地怎可崇范蠡为先贤。随即写《过吴江三高祠》诗一首，历数范蠡种种劣迹，以表心中不平，又写给吴江县尹（知县）《论吴人不当祀范蠡书》，后经反复论证书实，终被官方采纳，三高祠改祀吴国的开国者太伯，继任的吴君仲雍，三让王位的季札。他不怕结怨代民言。时人戏称谢应芳是无冕无衡的监察御史；三是教书育人教育家，其97年的人生历程，坐馆授学时间长达80余年，90岁时，陈济、陈洽求学龟巢书院为其门生。陈济后称“两脚书橱”，担任《永乐大典》（原称《文献大成》）都总裁。全书22930卷，图书七八千种。英国《不

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陈洽官至兵部尚书，后在征战黎利（越南）中殉国沙场，谢应芳倡议重修的武进县学儒学宫（亦称文庙）和龟巢书院，见证了他献身于家乡教育事业的不朽功勋。谢应芳和2009年公开出版的《中国必知的2300个中国名人》所载常州唯一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吴稚晖，可并誉为两位影响最大的教育家。谢应芳和他的学生陈济不愧为元明辨惑求实文化的旗手。谢应芳以教育为业，多育英才，故有“儒林雅望”之号。所以有学者论其为“江南孔子”。四是著书立说大学者，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不朽的理想。他82岁高龄常年奔波于常州和横山桥之间，受聘主编、编纂完成《毗陵续志》10卷，著作颇多；以布衣载入《明史·儒林传》。新编《武进人物谢应芳传》，以“一生治学著书，一生教书育人，一生关爱民生，一生无视权贵，一生布衣不仕，一生清贫高洁”这六个一生，给予他很高评价。

2024年，中共武进区委又提出了“崇尚实干，争创一流”作为武进人文精神。笔者认为纵观2500多年常武地区〔有过延陵、毗陵、毗坛、晋陵、武进、兰陵、永定、京陵、阳湖、常州等县（市）地名；延陵邑、毗陵典农校尉、毗陵郡、晋陵郡、常州、常州路、常州府、常州专区、常州市（地级）等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延陵邑至今常州市（辖民国时的武进、金坛、溧阳三县地域）的人文精神，说法较多，官方和民间有不同说法，笔者认为：常州市民精神最起码“诚信”两字不能少，常州在全国全世界最有影响的特色文化和名人，应是“中华诚信第一人——季札”。季子文化的核心用两个字表达是诚信，更展开一点讲：是诚信、善让、守礼、和谐、清廉、致用。

元明辨惑求实文化的旗手谢应芳，是传承季子文化的最优秀的名人之一，他反对迷信，崇高科学，求真务实。“求实”两字是常州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性格。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争创一流，创新、创优、创业，不是唯我独尊，而是真正的在“天时、地理、人和”条件下，谋略取胜。

我建议，把常州（也可称延陵）精神，概括为：诚信求实，争创一流。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以上拙见，欢迎批评指教！

毗陵刘村毛氏宗祠落成暨毛宪纪念馆与红色文化纪念馆开馆

张尚金 秦大峰

毗陵毛氏宗祠落成双馆同启传承文脉

2025年10月3日上午，常州礼嘉镇西仪庄村隆重举行毗陵刘村毛氏宗祠落成典礼暨毛宪纪念馆、红色文化纪念馆开馆仪式。各地毛氏宗亲、文化学者与村民500余人齐聚一堂，共襄这场融合家族记忆与红色基因的文化盛典。

庆典在主持人毛玮的介绍中拉开帷幕。毗陵刘村毛氏宗亲会会长毛青率先致欢迎辞，强调宗祠与纪念馆建设对传承家风、弘扬先贤精神的意义。名誉会长毛卫成回顾家族奋斗历程，秘书长毛文波系统汇报毛氏源流与建馆历程。江苏毛氏宗亲会会长毛文洪、全国毛氏联谊会副会长毛方平、韶山东方红联谊会执行会长毛友良等嘉宾先后致辞，肯定刘村毛氏在文化传承中的贡献。地方文化学者张戬炜、张尚金也从史学角度评价了项目对保护地方文脉的积极意义。

活动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仪式：表彰十名中、高考优秀学子，向两位十九世长辈及西仪小学教师献花，体现崇文重教、尊老敬贤之风；主席像捐赠、宗祠与三馆揭牌及“道南讲堂”启动同步进行，辅以班簋、古董公文集、勋章等珍贵物品捐赠，彰显深厚历史积淀。嘉宾随后分组参观各展馆，感受毛氏家族的文化底蕴。

广场文艺表演为庆典注入欢庆氛围，歌舞戏曲轮番登场。活动最终在全体嘉宾共聚的庆典午宴中圆满落幕。

此次宗祠与纪念馆的落成，不仅为毛氏宗亲构建了精神家园，更打造了集家族历史、传统文化与红色教育于一体的文化平台，为地方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刘村毛氏家风家训十则

一永言孝思，思孝惟则；二诗书礼仪，世代传承；三读书明理，修身养性；四先学做人，再学做事；五正直做人，务实做事；六与人为善，严己宽



人；七谦让为贵，诚信为本；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九出身无贵贱，行行出状元；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方志学者张尚金发言

尊敬的来自全国有关省市及本地的毛氏文友，先生们，女士们：

大家上午好！首先让我以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和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延陵季子网站站长的身份，热烈祝贺刘村毛氏宗祠落成暨毛宪纪念馆与红色文化纪念馆开馆庆典活动成功举办！

据毛氏宗谱记载，毛姓源姬姓，周文王封其第八子叔郑于毛，为公爵毛国，故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子孙以国为氏，以叔郑为得姓始祖，已有3200多年历史。毗陵毛氏，从古至今，崇德向善，名人众多。最新出版的《常州历史名人大辞典》载有九位名人（毛玉，毛宪，毛雠，毛协恭，毛汝乾，毛吟槎，毛仲倬，毛留邺，毛燧传）。载入新编《武进县志》《武进人物》就有九名进士（毛逢，毛玉，毛汝乾，毛宪，毛毓祥，毛协恭，毛羽皇，毛爱亨，毛应藻）。载入《武进人物》的革命烈士有毛久如，毛忠，毛兴春，毛定华，毛祖兴，毛松大，毛和尚，毛腊苟，毛真明，毛伯峰，毛保连，毛福如，毛建飞等十三人，作为名人。《武进人物》载毛祖兴（1916—1943、08）又名斌，礼

《常州前黄世恩堂张氏宗谱》宏发

2025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八，黄道吉日。前黄世恩堂张氏举行续修宗谱颁谱仪式。上午9点28分，首先在前黄享艾礼宴酒店后面大草坪举行祭祖仪式，以告慰祖灵。祭台上方悬挂先祖九皋公（唐宰相张九龄弟、节度使）、宣公（宋理学大师张栻）、尚宜公（迁前黄始祖）像。祭台摆放鲜果及新修宗谱。大家列队鸣放礼花。由宗谱主修张少华、张建和首先上香，随后宗亲们依次上前向祖宗上香叩拜。慎终追远，不忘祖恩、传承家风，庇荫后人。

10点30分，发谱仪式在享艾礼宴酒店宴会厅举行。主席台就坐人员有原前黄镇党委书记、武进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宗谱主修张少华，常州市武进和成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宗谱主修张建和，原武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地方志张尚金老党员工作室领衔人、宗谱编修顾问张尚金，以及宗谱编修顾问张祥海、张立山。会议由张建和主持，张少华、张尚金先后作了简短而意义深刻的讲话。宗亲们分批依次上前领谱合影。130多位宗亲参加了这次发谱仪式。仪式简朴而庄重。然后欢聚一堂举杯祝贺宗谱续修玉成。



前黄世恩堂张氏源自殷薛宗祠，分属大洪张家祠堂。尚宜公始迁前黄大成村。数百年来，瓜绵椒衍，人丁兴旺，宗亲分散宜兴等地。1947年修谱至今已有70多年。张少华退休后，遂萌生续谱之事，他多次到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寻找宗谱资料，并得到研究会张尚金、张祥海以及殷薛张氏张桥支谱编委张立山的指导，编委们辛勤上门收集资料，认真编写世系世表，反复校对审核，历时三年，终于续修告竣，值得庆贺！

（武文献）

（接上页）嘉西仪庄人。1939年（民国2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组长、新四军旅教队学员，武南县二大队指导员，锡西交通联络总站长。1943年8月日军“扫荡”，因叛徒出卖被俘至常州惨遭杀害”。新编《武进志》《武进人物》还记载毛善珊（1871—1933）名彬年，号枕陶，武进礼嘉毛家桥人。五代世医。自小聪明，能诗善文，15岁中秀才，立志从医，闭门攻读三年，医理渐精。善于引用前人经验，处方用药有创新，闻名于武进、宜兴、无锡等地。著有《毛氏湿温治验》，已佚。还有毛有翔（1951—2006、02）曾任武进区政协副主席。

但由于志书编撰时，生不列传。还有不少毗陵（常州）毛人名人未入志。

清光绪五年（1879）未修成的《武进县志》终于在1988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次修志的五位总纂（张尚金，毛文辉，吴之光，杨堤，毛学勤）就有

毛家桥乡贤毛文辉、毛学勤两位，他俩是编纂县志造福桑梓的编史修志名人。

特别值得提的是毛卫成先生，他是当代常州集发展经济慈善公益事业的大名人。

常州毛氏族人是传承“诚信求实，争创一流”延陵季子文化的优秀宗亲，一定能成为“创新争先，务实担当，崇德向善，重义守信”常州人文精神发扬光大者！

衷心希望，常州毛氏族人成为当代民间补修《常州府志（1694—1911）》的积极支持者！衷心祝贺刘村毛氏宗祠成为中国及全球毛氏名人展示馆。可让《辞海》上的名闻国内外的毛氏名人进馆展示。

祝毛氏及与会文友做到五靠，靠道德立家，靠文化兴家，靠法律护家，靠信息富家，靠勤俭持家！

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全家幸福！

三河口梧岗敦復堂清康熙《张氏新建祠堂记》碑

徐永宣 文 奚世明 点校

祖庙之设，上自天子，下及官师而止；庶人祭于寝，于礼从简，无论门堂户牖，不敢备制。即合食之典，亦有志而不获展焉。俭也，礼也，自后世相习成风。享堂之建，贵贱通行为律，今之所不禁，亦以报本追远，睦族展亲，于先王教孝之旨隐有合。故相沿不废，此亦亡（通“无”）于礼者之礼耳。（合食，受祭时和祖先共享祭品。）

然而实意寢微，虚文何补？每见世禄之家，裘马翩翩，仆从如云，春秋主祭，顾盼自喜。伯叔昆弟而不得邀其色笑者，比比而然，于其亲亲之义安在？若夫水源木本，真意流行，养老益孤泽被族。如范文正之广设义田，晏平仲之禄及三党，此实三代以后之仅事。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而得古人之意，以仿佛古之万一者，已足挽颓风而高流俗矣。

城东张公君甫，其庶几乎！公少遭家难，茕茕在疚，鱼樵樵而尾翛翛，人方以为危。而公立志亢宗，日以承先启后【原“后”应“後”】为己【原“已”误】任，专一之至。造物亦从而相之，不过二三十年，而规模气象洒然变矣。仆隶成群，田庐乡井。城东父老咸啧啧称叹曰：“某某有子，某某为不亡矣！”吁！此与显亲扬名者何异？

而张公终以不得养其先人为恨，因创一公祠，附考妣于其中，以寓白云亲舍之意。因捐金数百，卜地于室庐之东。山环水匝，秀气钟【原“鐘”应“鍾”】焉。而族之好义者亦慷慨施，共成胜事。门堂寝室，黝垩丹漆，无不入法。昭穆俨然，子姓以时献爵于其侧。祭既毕，张公扶杖顾众而嘱曰：“凡我宗，岁时伏腊，必躬必亲。”又嘱曰：“凡我同宗，

耕者耕，读者读，无游手而好闲，无恃强而陵独。”子姓昆弟咸拱手听命，曰：“敢不早自爱，以成公之志！”于是城东父老又啧啧称叹，诫子孙以张公敦本睦族为法。吁！较之身都通显，高大门闾，而族之人不其门而入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何如也？

公之子熊祥与余善，故知其事为最详。熊详，好礼士也。既已身游太学，名登仕版，而恂恂如雅，不类素封，良贾深藏，得老子之教。容貌若愚，有君子之风。由此观之，张氏之福盖未艾也。

余不能文，又不喜谀言以欺世，略书所见，以卜张氏之必昌，庶使庭前玉树封植维勤，不负肯堂肯構（同“构”）之意焉，则几矣。

赐进士出身候补主事同里徐永宣撰
康熙岁次壬辰孟春穀旦

创建宗祠，九世裔孙廷佐同男文瀚捐银叁佰【原“伯”误】馀两。

协赞起建，拾世裔孙茂如、耀奎、文彬、耀才、（济如、太如、乐和、德如）既通族共捐银百馀两。

附注：

1. 简本将落款日期调前，后为碑记附录。
2. 附录中“济如、太如、乐和、德如”四人，推为碑记成文刻录后插入，并非单独成两列，故用括号。
3. 蓉湖古谷夫于2025年8月14日释文完稿。

（原碑现立于新建祠堂里）

西盖赵氏始迁祖赵孟堙记

赵德明

西盖赵氏是常武地区赵氏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族群，至今居住地有几十处，人口上万，名人辈出，项领相望。溯其源流，可追溯到北宋宗室迁常始祖赵孟堙，今年是赵孟堙来武进横林定居700周年。赵孟堙虽非高官贵胄，但亦为一方名士，除宗谱上墓志铭中记载来常隐居的确切时间外，在当地也流传着许多轶闻趣事。同时他本人也有文章留世，这些都对研究赵孟堙的身世行迹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赵孟堙，字体坤，浙江临安（今杭州）人。他生于南宋晚期。到成年时已为元人天下，虽聪颖好学，文笔兼优，但并不为当局所重。因家庭生活所迫，不得不屈从权贵当局从事底层文案牍事宜。直到四十多岁才谋得高邮州录事一职，仍为低品小吏。元泰定二年（1325），年已六十，转任新安（今徽州）司法。由于家在临安，他乘舟船经大运河南下，准备先回家中，再取浙皖古道赴任，谁知在横林之处竟迎来他人生的巨大转变。

墓志铭中称他于“泰定二年乙丑转新安司法，还渐道经常州路吉晋陵县，离城东三十里有栖真庵。庵有栖真居士彭道玄者，龄几及百，善吐纳养生术，曾受故宋国师吴景鸾堪舆秘旨。先是栖真庵北去里许有金国不花丞相墓，不花丞相者，金之浑源州翠屏人也。宋高宗建炎四年春，兀术南侵，不花丞相从为副帅，入常州以疾卒葬此地遂名不花墩，越数十年为旷地。栖真居士目之于心久，及录事公散步庵中留连数日，见其仁厚豁达有古人风，大悦之。因曰吾有宝相赠，遂策杖偕行指不花墩曰此是矣。君百岁后进前平洋凝受处下一穴，其发福最长，细图穴法示之。公幸逢居士，倾盖定交，因筑一亭于庵中名倾盖自为记。即于是地卜阴阳二宅，时由西还浙，故又号其阳居之地为西盖。以录事致仕而新安之任不果赴焉，盖泰定二年乙丑八月



也。有族祖赵世延为公撰南还卜居记，而公之世系次序具载见云。公配辛宜人侍御史辛炳女。子二，长由彰，登乙卯张起岩榜进士；次由俊，登壬午陈祖仁榜进士。公生于故宋咸淳三年（1267）丁卯夏四月十二日，歿于元至顺二年（1331）辛未，享年六十有五。今上皇帝御极之初十一月戊申，由彰、由俊葬公于不花墩为晋陵赵氏迁祖之始。

墓志铭并附有云铭曰：

宋有令昆，讳曰孟堙，出自江浙，历仕高邮。
晋陵之东，庵有异翁，与君倾盖，指点吉龙。
于焉卜葬，世世协从，体魄归藏，琴鹤清风，
刊铭于石，天水之宗。

赵孟堙墓志铭由时为监察御史陈思谦撰写。陈思谦（1285—1353），字景让，河北宁晋人。他幼年丧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尤其精通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对名物制度、典章律例多有研究，一生中担任过监察御史、刑部尚书、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御史中丞等职，政绩卓著，晚年被追封鲁国公，谥号“通敏”。

赵孟堙在易地任职途中，为何会突然辞官不就“新安之任不果赴焉”，这既有遇到栖真庵高人

彭道玄的偶然性，但更有其发生的必然性，是元代汉族文人仕大夫和元代当局“不合作”态度的具体表现，虽然属于无奈的选择，但反映出特殊时代被扭曲形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个侧面。

元代时期，朝廷对汉族文人仕大夫极度不重视不信任，不仅中断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达数十年之久，后来即使在元文宗即位后恢复科举，其科举制度也极为不公平不合理。首先是在录取名额上，分成左、右榜，元人、色目人和北、南汉人各取一半。其次总人数最多为一百人，多数时期还只少不多，这就大大降低了汉人的录取率。再次在对科举进士的使用上，大部分充当府州县学的教授教谕，即使少数进入朝廷衙门，也多为主簿之类从事具体行政工作，很少能进入决策高层。这和明清时期只有进士才能参与社会管理各个要害部门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科举制度对于蒙元统治者来说，本质上还是一种点缀和粉饰。因此，大多数原来企图通过科举而改变命运的汉族文人士大夫，只能或僧或道，或医或艺，浪迹江湖，行走天下。作为从骨子里就具有文人气质的赵孟堙不会不受此影响，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事后他在自传“倾盖亭记”一文中有关于黄粱梦事，祇令人慨世局如棋，长安非昔。得此了悟，顿然身世皆空，更不作宦情想，愧不早似栖真之隐为高蹈也……始信浙可无还，东南西北皆可居也，奚必眷眷于故土耶。因筑是亭于庵，题名倾盖，固所以识千里会逢之胜也”。因社会环境所致，他只能如此委婉表达，但他的行动已经足够说明了。

栖真庵位于横林镇运河北岸，初建于北宋，先后名保宁寺、接待院（禅寺），明清时期大加扩展，成为一方名寺。民国肇始，改建为政成中学，现为横林初级中学，至今校内仍存原“接待禅寺”的石质寺额及其它遗存。

清代道光《武阳合志》祠庙章中也有相关记载：保宁寺，在横林镇北，北宋太平兴国开建，名接待院（禅寺），庆元间改今额。内有倾盖亭，元高邮州录事赵孟堙与道人彭道玄一言定交，遂卜居



焉。以身自西来，倾盖与此，因名所居里曰西盖。倾盖亭今已圯，元末寺废，明洪武十五年重建，正统间始建佛殿，其僧庐丈室亦次第修复。

有必要说明的是，西盖地名随后在明清地图中一直沿用，直到上世纪末才消失于行政机构改革中，正式改名为赵家塘。至今此处保存有“永思堂”赵氏宗祠及不花墩“赵孟堙墓地”，均已成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西盖《赵氏宗谱》上接《宋史》宗室世系太祖派德昭（赵匡胤之子），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下联赵孟堙以下各支系子孙最长已达30世。宗谱首修于明代宣德五年（1430），至今已为十修。另外西盖赵氏迁徙常武各地的分脉支派，也都各自分建宗祠、分修宗谱，近年新建重建宗祠有“冬日堂”“怀德堂”“永思堂”三座。至今西盖赵氏共有各支派宗谱十部，已经续修的有六部。

赵孟堙隐居西盖，尊师重教，启迪民风，故受一方仰重。特别是其子赵由彰，赵由俊相继科举取士，从此家族儒风蔚然，文脉贲张。明清两代，簪缨鹊起，科甲联第，共出状元1名，探花1名，进士20名，举人34名，成为常武地区的著姓大族。其中赵申乔、赵熊诏、赵翼、赵怀玉、赵烈文、赵凤昌、赵元任等更是成为影响一方以致全国的名士大家，从而为深厚博大的常武地区人文历史增添一份亮丽。

“常州”名称探微

李亚雄

开皇元年（581）建隋朝，开皇三年“罢天下郡，以州统县”，开皇九年，平陈，罢晋陵郡，置常州，¹常州从此得名。常州境域，古为延陵地。春秋时，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封札于延陵”，²始有“延陵”。此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称“毗陵”，西晋改“晋陵”。在隋之前千年间，常州几经改名，但始终保留地貌特征“陵”字。开皇九年，突然改名“常州”，虽“常”字富有美好寓意，但从文化延承看，似乎有些突兀。

当年，隋文帝平定江南，为重塑地方秩序、强化中央集权，把江南各地都重新改名，吴郡成“苏州”、建康成“蒋州”、南徐州成“润州”、钱唐成“杭州”等。这些地方，虽“新名与旧称”有明显跳跃，但总体仍有依据，“苏”来自姑苏山、“蒋”来自蒋山（钟山），“润”来自润浦。唯独“常”字，仿佛“飞来之物”。

当然，理由还是有的。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咸淳毗陵志》记载：“隋平陈，郡废，乃于常熟县置常州。”³意指常州之“常”源自“常熟”。不过特别要注意，此段记载竟在该志的“考异”表中，意思是“有此说，但不确定”。志书还注解：“非惟隋唐史不载，杜佑《通典》亦不书。”即：正史与《通典》都没记载。注解还说，“或曰常州置于常熟县”。一个“或”字，表示“存疑”。看来是“曾有此说，考异留之”。于是，志书正文“今不书之”。⁴既然事关常熟，那么苏州、常熟的古志文献该有记载。这毕竟是“建置沿革、府属州治”的“地方顶级大事”。然而，查阅苏州现存最早的三部志书：唐《吴地记》、宋《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宋《绍定吴郡志》，在其相关常熟的条目中居然均未记载，现存宋代常熟旧志《宝祐琴川志》也未提及。直至明《洪武苏州府志》才言明“于常熟置常州，因县为名”。⁵但此后

《弘治常熟县志》却又说“废晋陵郡，分置常州，以常熟隶”。不仅未标明“州治常熟”，反倒强调“以常熟隶苏州”。⁶明《嘉靖常熟县志》再次确认“州治”确在常熟，⁷可《康熙苏州府志》再度“模糊”：“又废晋陵郡，置常州，常熟割入苏州”。⁸《同治苏州府志》再扳回来“于县置常州”“后割常熟属苏州，移常州治晋陵县”。⁹就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苏州市志》，在其相关记述中也是“开皇九年，废吴郡，改吴州为苏州，领吴、常熟、昆山三县”，¹⁰意指这一年，常熟仍属苏州。可见，对这一问题的“摇摆”古今一直存在。如今的态度还比较一致。2016版《常熟市志》认定“开皇九年，以常熟县置常州，设常州理。旋移常州理于晋陵县。常熟复为县，隶属于苏州”；¹¹1995版《常州市志》载明“常州治所先在常熟，后还晋陵”；¹²1988版《武进县志》写明“废郡置州，于今常熟县置常州，晋陵属之”。¹³这算是各方一致将“疑说”修正为“定见”。

正史回避、方志存疑、州治还跨郡域，像这种表述的摇摆与模糊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然而，事出必有因，且史籍如此隐晦，其间更有隐情。隐情源自历史，必须到历史中去找回。

6 [明] 杨子器，《弘治常熟县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52册，P122

7 [明] 冯汝弼，《嘉靖常熟县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53册，P385；注：《嘉靖常熟县志》原文：“开皇九年，置苏州，统县五，常熟属焉。”“又废晋陵郡，分常熟地置常州，以常熟隶苏州，移常州治于晋陵县。”

8 [清] 宁云鹏等，《康熙苏州府志》，广陵书社，2024年6月第一版，卷第一，常熟县，P52

9 [清] 李铭皖等，《同治苏州府志》，凤凰出版社，2025年6月第一版，卷二，疆域，常熟县，P94

10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第一册，大事记，P15

11 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熟市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上册，大事记，P12；注：在常熟首轮志书《常熟市志》中表述为：“开皇九年，废晋陵郡，在常熟设常州治，旋移常州治于晋陵县”，见《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第一编，建置区域，P77

12 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州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一册，建置，P207

13 武进县志编纂委员会，《武进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大事记，P12

1 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州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P207

2 [宋]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广陵书社，2005年3月第一版，卷一，P2

3 [宋]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广陵书社，2005年3月第一版，卷一，P7

4 [宋]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广陵书社，2005年3月第一版，卷一，P7

5 [唐] 卢熊，《洪武苏州府志》，广陵书社，2022年6月第一版，卷第一，望常熟县，P41

史料记载，开皇元年，隋取代“北周”立国。三年“废郡置州”。其实，当时江南还未统一，仍处于南方政权陈朝。开皇九年，隋伐陈，平定江南。《隋书》记载：“开皇初，高祖潜有吞并江南之志”，¹⁴于是委将“大举伐陈”。但平定江南并不简单。由于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南北陷入近300年的长期分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南方经东晋和南朝政权，形成了独特的“江南文化圈”，在制度、习俗上与北方有显著差异；长期的分裂还导致南北民心隔阂，南方甚至视北方为“外族”。加之隋灭陈，实行了一系列操之过急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民间还讹言隋将把江南人“欲尽徙之入关”，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开皇九年隋灭陈后，第二年江南即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隋唐五代史》写到“平陈之明年，江南复乱，遍今浙东西、皖南、闽、赣之地。”¹⁵《资治通鉴》记载“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¹⁶《隋书》更记载：“贼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据京口”“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与其都督鲍迁等复来拒战”，还有“无锡贼帅叶略”“吴郡沈玄愬、沈杰”“黟歙贼帅沈雪、沈能”，更有“浙江贼帅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船舰千艘，屯据要害”“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据东阳”。¹⁷在双方对立中，甚至出现“杀害长吏”，将隋朝官员“抽肠食肉”。《资治通鉴》记载“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¹⁸于是，隋文帝“二次平定江南”，“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寻便瓦散，俘虏诛翦三十余万”。¹⁹

南北如此对立，使得北方政权频频祭出“狠招”。一是对江南各郡改名，消除前朝政治符号。“建康”借蒋山改名“蒋州”，“吴郡”以姑苏山改名“苏州”，京口以润浦改名“润州”，东阳郡改“婺州”，南康郡改“虔州”等，强迫各地淡化历史记忆。二是对前朝官员“牧民者尽更变之”，²⁰全面替换北方官员，

14 [唐]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卷五十二，列传第十七，韩擒虎传，P895

15 蓝文徵，《隋唐五代史》，商务印书馆，1970年4月第二版

16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23年5月第一版，第一七七卷，隋纪一，P2134-2135

17 [唐]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杨素，P855

18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23年5月第一版，第一七七卷，隋纪一，P2134-2135

19 [唐]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释真观传》

20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23年5月第一

与前朝“划清界限”。三是平荡旧城、迁建新郭。江南各郡城多为南朝士族豪强的聚居地，隋采取“迁建新郭、空其旧城”政策，强制迁徙人口、人为摧毁旧聚落，彻底瓦解地方势力根基。宋齐梁陈四朝都城“建康”尤为惨烈。隋文帝下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²¹把旧都城的城池宫殿全部夷为平地，清空旧城，辟作农田。另外在“石头城”建新城，抹去历史记忆和政治符号。苏州也同样。开皇十一年，杨素解苏州之围，即“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西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²²建新郭，目的是“盖欲空其旧城耳”。²³杭州亦然。开皇十一年，杨素“移州治于柳浦西，依山筑城”等。²⁴

“空其旧城”之残酷在于，其不仅对旧城城池、宫殿、官署进行系统性破坏，还通过强制旧城居民迁出，使旧城失去人口支撑，沦为荒地或农田；同时通过“重置治所”直接削弱旧城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则瘫痪原有经济中心，商铺关闭、作坊停摆、产业链断裂，大量民间资产被废弃或损毁。

当时常州与江南许多城市一样，也处于“风暴中心”。平陈初期，有后梁萧氏宗室与陈朝永新侯陈君范“并军合势”²⁵抵御隋军；二次平定中，又有“晋陵顾世兴”“都督鲍迁”“无锡贼帅叶略”等²⁶举旗反隋。史载，“晋陵一战”被杨素“逆击破之”“虏三千馀人”。²⁷由此看，作为“重要反抗者”的常州，在当时同样背景下被同样“改名”和“空城”就不足为奇了。

要改名，有历史传承的“延、毗、晋”等字，

版，第一七七卷，隋纪一，P2134，原文为“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

21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23年5月第一版，第一七七卷，隋纪一，P2129

22 [宋] 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一册，P29

23 [宋] 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一册，P55，原文为：“隋文帝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之，追击至苏州，移郡邑于横山下，盖欲空其旧城耳。”

24 郭晔旻：隋唐时代的杭州，如何崛起为“东南第一州”，《国家人文历史》杂志2023年第18期

25 [唐]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卷六一，宇文述传，P1464

26 [唐]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杨素，P855

27 [唐]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杨素，P855

显然不会再用。而“新州治”也会另择他处。杭州新州治从“钱唐”迁到“余杭”，²⁸“新常州”该迁何方？无锡有“贼帅叶略”，江阴、义兴“平陈”后，才“废郡来属”。²⁹而把隶属苏州、毗邻常州的“常熟”分置出来，变得顺理成章。更何况，常熟之于“晋陵郡”还有历史渊源。《宝祐琴川志》记载，“成帝咸康七年，分海虞置南沙县，属晋陵郡”。³⁰《绍定吴郡志》也写明，常熟“旧为毗陵郡南沙县”。³¹而常熟本身就是“上腴沃壤，衣冠鳞集，甲兵云萃”³²之地，早在梁代就有“常熟”之称，以此地为“新州治”确有现实的条件和可能。

可以肯定，隋朝这种人为、过急的政策和做法，有些是违反常识和规律的。像苏州新郭，到唐武德末年又重回旧址，“复其旧，盖知地势之不可迁也”；³³像南京，开皇九年于石头城置蒋州，开皇十年又将治所移至冶城。³⁴隋炀帝“接班”更在大业三年（607）将江南各“州”改回“郡”名、恢复原称。常熟也在大业六年重回苏州，《绍定吴郡志》记载：“大业六年，复为吴州，领县五”。³⁵大业十二年，隋炀帝大兴土木，在常州修建“毗陵宫”。《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³⁶由此看来，郡治可能在大业三年

28 郭晔旻：隋唐时代的杭州，如何崛起为“东南第一州”，《国家人文历史》杂志2023年第18期

29 [唐]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志，P596

30 [宋] 孙应时《宝祐琴川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51册，P447

31 [宋] 范成大《绍定吴郡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一册，卷三十八，县记，P264

32 [宋] 范成大《绍定吴郡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一册，卷三十八，县记，P264

33 [宋] 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一册，P29

34 [清]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直隶二，应天府，江宁城，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P934，原文：隋开皇十年移于冶城，自是故城遂废。

35 [宋] 范成大，《绍定吴郡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苏州府部，第一册，卷一，沿革，P87

36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隋纪七，炀皇帝下，中华书局，2023年5月第一版，P2202

就重回晋陵了，前后19年。《咸淳毗陵志》又载，“唐武德三年，复改毗陵郡为常州”，这对隋朝此前“折腾”完成了“轮回清算”。当然，隋政权的政策也非一无是处，那只是另话。

隋代的“轮回变故”落到地方“设州置治”的短期反复，毕竟是“不太愉快”的断痕。“惟隋唐史不载，杜佑《通典》亦不书”³⁷也能理解；宋代地方志书对远在680年前的“可能事实”保持“谨慎存疑”也解释得通；而且“存疑”态度既是史家的一贯严谨，也是对后世的“尽责”交代。明清志书“左右摇摆”来续写“旧史”，也是史家“前承后继的接力式交代”。如今，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隋平江南”的政策选择看，尤其结合南京、苏州、杭州等大部分江南城市的类似情况看，常州之“常”源于“常熟”，并曾短暂移“州治”于常熟，还是具有历史可信的。况且唐代专志《元和郡县图志》也言之凿凿地肯定：“隋开皇九年，平陈，废郡，于常熟县置常州，因县为名。后割常熟县入苏州，移常州理于晋陵县”，³⁸表述不仅明确，而且时间早于宋代。只是当时地方志书因其“非为隋唐正史”而不予采纳而已。

常州冠以“常熟”之“常”，从未辜负过“常稔、常熟”的美好寓意，而且一千多年来坚定高举“常”字大旗，不断赋予更多更深的内涵与光彩。常州在唐代已为全国“十望之州”，宋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集散地之一，明为“全国33个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之一，清为“缀冕云兴，接閑列宅，帆樯川鹜，芥聚绳縻”的“衣冠都会”，³⁹近代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现在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⁴⁰而根据南唐徐铉篆体集成的“常州”两字，不但增添了“金钟罩六龙”的传说，而且放大了常州的“龙城”雅号。如果说，延陵、毗陵、晋陵还是基于地理形貌之特征，如今的“常”早已从最初“借名”淬炼成“东南无与常匹俦”的地域符号。

37 [宋]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广陵书社，2005年3月第一版，卷一，P7

38 [唐]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常州

39 《常州史稿》，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古代卷，P353

40 国务院关于《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2025年1月16日）

奔牛名称由来有“新”说

李亚雄

奔牛是大运河常州段的璀璨明珠，宋代就与万岁、青城、横林并称武进四大重镇，是常州的邑西门户和商贸大镇。历史上，奔牛因“路当孔道”居“四达之冲”成为大运河重要交通节点，又因特殊地理形态和水利形势“设堰置闸”成为重要水利枢纽。早在齐梁之前，就开埠通商，是牧贡戎贽、四方赋输、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的必经之地。历代文人名士在此留下诸多诗文，苏东坡有“仰看古堰横奔牛”，杨万里有“聚船久住下河湾，等待船齐不教放”，明代史鉴有“下河水低上河漫，春雷吼闸奔流悍”，乾隆南巡也留下御诗“舣棹河滨早，抨弦弓手调”，陆游更是写出“苏常熟，天下足”的名篇《重修奔牛闸记》。

奔牛与许多名镇一样，地名“由来”也极富传奇和志异色彩。流传最广的有两说：一是“金牛说”。宋《咸淳毗陵志》引南朝梁《舆地志》记载：“汉时，有金牛出山东石池，到曲阿，入栅断其道，牛因骤奔，故名。”二是“铜牛说”。唐《四蕃志》记载：“万策湖中有铜牛，人逐之，奔，上东山，入土，掘之，走至此栅，故川有‘栅口’及‘牛堰’之名。”清代知名学者朱筠曾有诗“奔牛复何说，汉池牛出告。奔奔黄金色，栅断曲阿到。又云逐铜牛，入土土人謞”。他在诗中认可和复述了相关志记。2010年出版的官方志书《奔牛镇志》也采纳了这两种说法。

不过，最近偶读清初名士余怀的《三吴游览志》，竟然又发现“第三说”。此书记载：“初三。晴。舟抵奔牛。《镇记》称，梁武掘蒋山，得一僧于土中，趺坐不动。以问释宝志。志云：‘此僧方入定耳。以磬击之，则自出。’武乃以磬击于耳旁，僧惊奔。武使人追之，至此化为牛。”

余怀是明末清初学识渊博、“文名震南都”的文化名士，原籍福建莆田，长期寓居南京。清顺治七年（1650），他从南京出发，经句容、奔牛、无锡，到苏州、松江、太仓一带，览美景、会文友。其间

“触目所经、随手辄记”，写下这本记录78天行程，兼融文、史、旅见闻的“旅行日志”。船到奔牛时，他即时写下这段“行程日记”。值得关注的是，这段日记不仅“冒出”奔牛名称由来“第三说”，而且还“凿凿有据”表明“此说根据《镇记》”。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奈何反复翻搜，均“查无此记”。不过顺藤摸瓜，却找到其资料的“可能来源”，即与作者生活年代相近的三本书：《刘氏鸿书》，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宣城刘仲达纂辑；《五杂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谢肇淛所著；《卮林》，明崇祯十三年（1640）周婴所撰。其中成书最早的《刘氏鸿书》，在书中原本本记述：“梁武帝时，有人于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遂奏于帝，帝问志公，志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于其旁击磬，则出定矣。帝命试之，果开目。”再查看《五杂组》，此书在基本眷抄《刘氏鸿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细节，包括地点为“奔牛坝”，故事情节发展为“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为牛，故因以名也”。第三本书《卮林》与前两书不同，是一本纠正群书及其注疏讹误的著作，它在引用《五杂组》原文基础上，添加了严肃的纠正讹误的论据与结论。那这三本书的源头又在哪？再往前溯，有学者认为，它们来自同为南宋的《景定建康志》和《六朝事迹编类》，但翻阅原作并无相关记载。对于“第三说”，王继宗的《奔牛史记》收录并关注了这一点，同时也认同《卮林》纠误的观点。当然，纯粹从“仅为传说”“确有文献”的角度看，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奔牛“多此一说又何妨”。

然而，学者张戬炜认为，此外还有“第四说”。他认为，更为可靠的由来应该是“畜力说”。即奔牛取名应该直接来源于作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动物畜力”——盘坝之牛。因为所有美好的神话传说“终究属于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境像反映，是夸张加想象的超现实叙事”。而通常意义上，自然地理和生产生活等“质朴元素与特征”，才可能是大

多数地名命名的直接推动因素。对奔牛而言，“牛”应该就是它最为“质朴”的特征和早期最“显著”的地方标识。

其一，奔牛地名应该早于最早出现“金牛说”的汉代，甚至可能与“古江南运河”一样古老。陆游在《重修奔牛闸记》中说：“自创为是运河时……闸已具矣。”而奔牛筑坝建闸，就是因为“盖无之则水不能节，水不能节则朝溢暮涸”。他进一步说，无坝无闸“安在其为运也”？意思是说，坝闸在“创为运河时”就有了，坝闸是“运河成其为河”的前提。那“创为运河”又在何时？据史料，时间可前溯到春秋时期。“自望亭入无锡县界，流经郡治西北，抵奔牛镇，达于孟河”的“古江南运河”，当代地理学家褚绍唐研究后认为其开凿于春秋时期。“早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就开凿了自苏州经望亭至孟河的通长江的河道。”由此可见，奔牛地名的出现，不仅早于《舆地志》和《南齐书》（《卮林》所依据）的成书时间——南朝梁代，而且早于“金牛说”发生的汉代。奔牛取名或许与“古江南运河”一样古老。

其二，“牛”应该是早期奔牛“最为显要”的特征与标识。宁镇及常府西部，地理形势为“地倾东南”，必须“筑坝置闸”，这带来了船只越堰过坝的难度。据史料，宋代之前奔牛就有“盘坝”记载。当时人们用牛、缆绳、绞盘，依托力学结构和原理，把船从下河拖曳过坝到上河，或从上河拖曳到下河。明代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也记载：“堰上治牵路，亦用竹缆以逆挽之，挽一船，人奚（gū）”“聚人奚牛只以待船”“百余人，牛则十余头。”也就是说，牛是越堰盘坝的主要“畜力”，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牛”显然是当地最为显著的标志和特征。

其三，在奔牛，“盘坝用牛”的数量和实际场面还很壮观。宋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奔牛堰“盘坝”时，“左右各有辘轳五，以水牛十六头，左右各八头”“卯时越堰”“辰时过”。意思是当时完成一次曳船盘坝，要用 16 头牛协同作业，需约 2 个小时，不仅费力，而且费时。

奔牛作为运河“必经之孔道”，过境船只的数量和规模应不在小数。“南人北人千百舟，争车夺缆塞堰道”“一行二十四楼船，相随过闸如鱼贯。”还有史料记载，繁忙时甚至还有“连夜盘坝”的情形。崔溥记载“至奔牛大坝，牵舟上岸，才渡坝限，日曙矣”。每班 16 头牛，牛也需休息换班，加上后备的小牛，奔牛坝的牛群当有数百头之多。“盘坝主力”之牛，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奔牛“代名词”。

另外，奔牛的“奔”，其古字作“犇”。从字形来看，也是一个“牛群”意象。《正字通·牛部》对“犇”字的解说是“牛骇群走也”，意思是牛群受惊后奔跑。如果单从字形看，“犇牛”二字，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牛团队”。由此看来，“畜力说”最有可能是奔牛在金牛传说之前，较为合理的名称由来。在本质上，它来源于最基础和质朴的生产生活实践。

当然，奔牛同时拥有“一说、二说、三说、四说”并不矛盾。历史上，越是有影响力的地方，越容易引发话题；话题越是神奇诡异，越能证明这个地方地位和影响的显著与重要。通常，一个地方最初取名，首先会抓住当地的自然地理和生产生活特征。而后，当地方的物质和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影响力提升到一定高度，人们会为顺应文化与精神的需求，通过一些“超自然的神话传说”为其渲染和烘托，会用一些“另有来头、许有奇道、惊为名门”的传奇故事来演绎出超乎寻常的传奇和神秘。至少在名字和传说中加个“值钱”的“金银名头”，如金牛、铜牛之类；如果还有帝王或神仙“加盟助演”，那就更证实“此非一般之所”，兴许是“龙兴之地”。

回过头来，从《舆地志》《四蕃志》《咸淳毗陵志》《刘氏鸿书》《五杂组》《卮林》《三吴游览志》等史籍的成书时间看，正好对应江南历史发展最好的几个朝代：齐梁、唐、宋、明、清等，这也恰恰是奔牛一路上升和繁盛的“黄金年代”。齐梁前建“闸”，唐成“集”，宋设“务”，明成“市”，清置“镇”。这也最终印证“地名及其背后的故事，就是一个地方深度蕴藏在苍茫岁月里的文明密码”。

（作者系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孟河惜字洲地名的来历

程协润

惜字洲村位于常州孟河镇东北长江边上，东面紧靠魏村镇，原是长江南岸一片汪洋的滩涂。其名称的由来还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在清朝初期，传说人们还只能见到这里长江南岸边的江水茫茫一片，后来年复一年，这里出现了潮涨潮落的浅水滩涂，但滩涂并不见它明显增高。渔民们经常划着渔船到这里来撒网捕鱼，江水虽然一点不深，但常常是一无所获。于是他们渴望这里能长出沙洲，如能成为一片耕地该有多好，让他们这些渔民们有一个容身之处。

这些渔民们曾经听说有宝贝会变幻至万物之精灵的传奇故事。也就联想到能否将这里来个沉缸成洲，但他们现在一个个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渔民，那里还有什么缸可沉呢？所以，他们也只能将沉缸成洲的愿望当作一种笑话说说而已了。这时，一位聪明的老渔民，笑了笑说：“这有什么难啊，要缸的话这里到处都有”。没过多久，他就将那些想沉缸成洲的渔民们召集了起来，先叫他们敲锣打鼓，一边开着渔船对渔民们说要珍惜文字，将那些有字的纸屑收集起来，统统送到惜字炉缸里焚化。只要化满了一定数量的纸屑灰后，就将这些纸屑灰装入一个个大缸坛里，再沉到江边那一片白茫茫的浅水滩涂之中，长此以往就能长出沙洲，变成耕地。

这些急于想要安家的渔民们，想想也对，他们就按照这位老渔民的说法认真地去做。就这样日积累月，年复一年，一共收集到了10多大缸坛的纸屑灰，这时那位聪明的老渔民，又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准备将这10多大缸坛的纸屑灰搬到一条破船上，并用两只好船和铁链条绑住这条破船，趁着涨大潮的功夫，将船开到他们希望沉缸成洲的地方去，再解

开铁链条，将那条装满10多大缸坛纸屑灰破船沉到江边的浅水滩涂之中。

这些沉缸成洲的渔民们，一个个站在两条好船上，看着那条装满10多大缸坛纸屑灰的破船慢慢地沉到了浅水滩涂下面，然后，才划着船离开。还有那些站在江岸边的老少渔民们，都想看着这次沉缸成洲浅水滩涂的地方能马上就涨出绿洲来。经过渔民们好几年不断的沉缸后，随着一天天的潮汐起落，果然，不久那些沉缸的地方就慢慢地长出了一片浅滩涂，并长出了一些绿草，渔民们一看激动了。他们坚持如法炮制再连续干好几年后，这些破船沉缸的地方果然慢慢地长出了一片片的新滩涂，渔民们一见高兴的不得了，就在新滩涂那上面种裁了芦苇，后来，发展到筑堤围圩，垦荒种植，这里的渔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

渔民们高兴之余都感到好奇怪啊，就急忙找到那一位聪明的老渔民想问个究竟，他说长江里每天潮起潮落都有大量的泥沙冲积后沉淀下来，这些装有纸屑灰缸坛的破船对长江上游流淌下来的，泥沙逐一被拦截后，沉淀下来变成了滩涂，而滩涂就慢慢地长出水面变成了绿洲，而滩涂上的水草的生长起到了一个肥沃的作用，从而使水草生长的更快与更茂盛，同时，也起到了固沙成田的作用。再说一字值千斤，文字不就是宝吗，这一缸坛又一缸坛的纸屑灰该有多少文字，我们这几年已收集了这么多纸屑灰的文字宝，难道这还不能成精灵，变出一块块宝地吗？渔民们就把这位沉船变成绿洲的渔民拥为村长。由于，这个绿洲是有纸与字一起化成灰而形成的，所以，这里的人们就把这个绿洲叫惜字洲了。

魏村青城曾是武进的四大名镇之一

郭重威

一、前言

魏村镇的青城村，在当今看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但你是否知道这个村庄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经济很繁荣，文化很深厚的集镇，它不仅是武进县的四大名镇之一，还是齐梁两朝祭天的地方。

经对魏村镇青城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民间调查和田野考察，这个位于武进古城东十五里的青城是齐朝祭天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应视青城是齐梁故里的一部分。

青城村是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下辖 23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5200 人，位于常州市西北，是齐梁故里的一部分，它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在创建美丽乡村的当代，就应理清青城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炼出它的优质部分，通过建设美丽乡村而得到表述，使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由此使我写出了这篇有关青城的文章。

二、青城的历史文化

青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历史文化丰厚的乡镇，经对这段浩瀚历史粗略的梳理，归纳出下列几个方面的特殊点。

1. “青城”名称内含的意义 青城这个地名内涵的意义非常深厚，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是高贵之色的象征 在自然界的色彩中，青色是处于蓝色与绿色之间的一种色彩，俗语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是自然界的高贵之色；(2)，是生命的象征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五行五色学说中，东方为木，显青阳之气，它象征着生命，因东方属木，在五行的生克中，木生火，火又是“丹”色的。“青”字就由“生”、“丹”两字叠加合成改形而成。青色



化龙寺 @孟河郭重威

由此成为“生命的象征”；③，是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从青城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齐梁皇帝祖居地孟河万绥的东方，使它具备了被称为青城的理由。由此可知，这座青色的城是一座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高貴之城。

2. 青城是齐梁故里的组成部分

(1) 自古就有一座“祭天坛”《咸淳毗陵志》卷 27 “古迹”中有关青城的记录：青城，在县西北六十里万岁镇。南有圆坛，高丈余，广十亩。西有方坛，高不盈尺，广七八丈。旧传为“圆丘”、“方泽”。又有东郭门。今酒务东巷南有两石龟，莫详所自。

《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史为乐所写的《对南兰陵治所的探索》一文中确认了青城祭天坛的客观存在。

这个祭天坛建在何时，现还未能从历史资料中找到准确的答案，但从史书中记录的齐朝齐高帝萧道成曾来此祭天的史实就可说明，它存在的历史至少有 1500 年。

(2) 齐高帝曾在此祭天 《南齐书》载：齐朝

开朝皇帝萧道成曾到青城祭天坛祭天，并发布告天文书。此后，齐梁两朝的一些皇帝也曾到此来郊祭，由此可看出，在历史上青城和被史学家称为齐梁故里的孟河万绥关系密切。（3）寺庙林立，有帝皇的家庙 这里不仅有皇家的家庙，还曾有许多齐梁时代的文化精英到此处活动过的一些故事，最典型的是“二十四史”《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青城曾有齐朝皇室的家庙，古代青城的宗教很发达，青城在最鼎盛的时期，有儒、道、释的各种宫、馆、寺庙十余座，其中就有皇帝的家庙。

3. 青城曾是武进四大名镇之一

青城是武进的一座古镇，在明清时代，武进（指武进与阳湖分治之时）的四大名镇中就有青城（其它三座为孟城、万绥、奔牛）。

4. 城曾设“榷酒办”

自宋朝对制酒业实行管制始，武进的四大“榷酒办（管理酒的酿造、销售、税务的官府）”就设在这四个镇上，青城也就成了当时制酒、销酒的中心，酒文化相当发达，市场非常繁荣。以上4点就足以表述青城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

三、历史文化的表述

历史文化是古老的，是过去式的，是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的，这一点在青城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名镇经千余年的历史洗刷，特别是经过了两次战争的摧残，已成为了一个小村，过去的那种车马人流、莺歌燕舞早已荡存。为此，可见当代传承这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是属于一种抢救式的修复，可结合当代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文化旅游，有计划的对它修复，打造成文旅景点。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1. 在原址上修复祭天坛 祭天坛是青城历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通过修建把它保存下去，并把它的历史通过复古式的展示和融入现代化元素后进行展示，适度的介绍，如有可能还可把古代祭天的整个流程通过艺术表演推出，从而使它成为文旅事业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亮点。

2. 修复“酒务东巷” 在《咸淳毗陵志》上出现的“酒务东巷”是青城的又一处有历史记录的遗址，这里是酒务官的办公处，酿酒中心，“榷酒”制下的

主店所在处，也是顾客饮酒处，是青城最繁华之处。

“榷酒”制度自唐末始发展到民国，在政治、经济上，在酒的制造史、发展史和酒文化史中都有其特殊的意义。研究它，并通过在遗址上复建“榷酒官府”，它下属的酿酒坊、酒吧等一系列建筑，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酒文化的宏景。它的价值在于，一是用于研究这段历史，二是研究弘扬酒文化，三是形成酒产业和酒文化旅游景点。

3. 修复皇帝的家庙 家庙文化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种代表“天人合一”的文化，通过家庙可再现和弘扬这种文化，提倡和发扬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核。

4. 新建青城历史文化展馆 历史文化展馆展示的是文化，纵观青城的历史，可发现在青城的历史中蕴含了宗教文化、皇家文化、齐梁文化、酒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通过努力把青城的文旅事业纳入新北区的，常州市的文旅圈中去，从而发展繁荣青城。

5. 适当的建一些文旅基础实设 在进行设计时就有必要考虑在村内建筑一些文旅的基础设施。

四、要注意文化定位和建筑风格

若把青城定为文旅区，就必须考虑它的文化定位和建筑风格。

1. 文化定位 我认为青城应定位在以魏晋南北朝文化为主的多种文化互动的范畴中，还应考虑它和美丽乡村中的现代建设的融合，使它自然和谐，绝对不能产生对立感，这些都是应注意的。

2. 建筑风格 它的建筑风格应该是以南朝的建筑特色为主，以农村野舍的自然农家风格为依托。

五、借机开发旅游商品

旅游商品的开发是很有必要的，开拓地方特色食品和其它一些产业，建美食及其它商品一条街。特别要突出它“酒文化”的特征，为了更好的、更确切的挖掘酒文化的历史，成立酒文化研究会，深化对历史上的酒文化的研究，在研究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新的史料，要收集一些有价值的名酒的情况，复制它的酿造，研穷酒的销售，酒市场的管理，力促酒文化与其它文化的融合，以利更好的展示历史上的酒文化，打造以酒文化，酒商品为主体的旅游文化市场。

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

程协润

常州孟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满载着许多美丽传说与历史人文故事，有人、有景、有物。还有像孟河兰陵“罗妃豆腐”的佳肴，它是“常州新北区一桌菜”名菜之一。这常州孟河“罗妃豆腐”之名既贵气又霸气，它是南朝梁武帝萧衍赐名罗妃烧制的豆腐为“玛瑙玉印统天下”，这一美丽的传说饱含齐梁人文风韵的美食典故也在民间传开。

御口亲赐名 罗妃豆腐菜

在公元502年4月上旬，萧衍率领朝廷百官，在建康（今南京）的南郊登坛祭天，同时改国号为天监元年，史称萧衍为梁武帝。39岁的萧衍，刚完成登基大业，正勤于各种政务。一日傍晚，梁武帝处理完一日政务后，就回后宫到丁娘娘处休息，吃晚饭时，丁皇妃就对梁武帝说：“陛下已完成继大统，切不可忘记故乡的祖宗以及宗亲及乡民们，应早一点安排时间回故乡祭祖，同时不要把罗淑珍妹妹忘了，祭祖完也可将罗妹妹接到宫中。”丁皇妃的一席话说到萧衍的心上，第二天萧衍就颁圣旨，将罗淑珍册封为贵妃，并诏告南兰陵郡，定于当年10月间回故乡老宅祭祖。

南兰陵郡令接到圣旨后，就立即赶到罗贵妃居住区，与她一起商讨如何接驾梁武帝萧衍等事宜，并一再恳请罗贵妃娘娘一定要将家里的山珍海味拿出来，以迎合梁武帝萧衍的口味。这罗贵妃娘娘与萧衍从小在一起长大，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她不但非常麻理料理一些农事，还精于自制农家酱油，并烧得一手好菜，是个贤惠的女子。她深知山珍海味对梁武帝萧衍来说，不是什么稀罕的食物。而由于他多年征战在外，家乡味道才是他心中的一种想念。于是，罗贵妃娘娘叫南兰陵郡令吩咐手下的一些地方官员，到时只要与她准备好一些猪肉、老豆腐和盐卤即可。

等到梁武帝萧衍归乡那日，回老宅祭祖后，梁武帝萧衍便邀罗贵妃娘娘一同进午膳。罗贵妃娘娘谢恩后，就言道：“陛下久离故乡，待臣妾下厨为皇上做一道家乡菜吧。”她对梁武帝萧衍皇上说完

后，就立即下厨房去操持烧菜了。只见罗贵妃娘娘将早已准备好的老豆腐、盐卤、猪肉下锅烹调，并用自制的酱油作调味。这一会儿工夫，一盆色香味俱全的农家菜肴进献到了梁武帝萧衍的面前。

细看这道菜，9块方寸的块肉，以3乘3的序列装在圆盘子的中间，外层紧挨16块相同大小的豆腐，呈正方形状装在圆盘中，底座有个江南方形土灶的造型，旁边角上竖着烟囱，梁武帝萧衍一看心中感到有些奇特。就问罗贵妃娘娘，这有什么说法，罗贵妃娘娘回答道：“启奏陛下，此菜是恭祝皇上继大统的兆头菜。9块红肉表示天子乃九五之尊，16块方豆腐表示一路顺发。圆盘加上正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土灶为底座有民以食为天之意，烟囱乃祝愿皇上早日一统（烟囱的谐音）天下，红肉白边，象征皇上的玛瑙白玉印。”梁武帝萧衍听罢龙心大悦，御口亲封这道菜为“玛瑙玉印统天下”，还赐名罗贵妃娘娘自制的这道菜肴为“罗妃豆腐”。从此这道菜便从民间正式传入梁武帝的宫廷之中。但我们孟河民间却一直称它为“罗妃豆腐”。

千年失传佳肴 重新回到餐桌

历史在不断发展，常州孟河罗妃豆腐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其实在孟河早已失传了，后人只能从典故的一些字里行间了解到这一美名，也只能想像出它的模样与味道了。那是在四五年前，这道仅靠典故文字描述的美味豆腐，终于带着罗妃的特有“香味”走上了餐桌。小黄山齐梁生态园厨师通过穿越1600多年历史时空，在不断挖掘与反复研究和实践下，将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复原的“失传佳肴”制作后端上了现代人的餐桌。

这几年齐梁生态园不断邀请一些食客来品味舌尖，得到广大食客的肯定与赞许，使这一失传千年的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又回到了人们的餐桌。这道菜如同典故中所述一样，用料朴实，做法家常。孟河当地手工制作盐卤豆腐分别切成1公分厚X3公分宽块片，将二花脸黑猪肉切成片，平底锅中放入上等豆油，用文火慢慢地将豆腐煎到两面微黄，然后放入炒好的黑猪肉片，再浇上二三两罗妃

酱油，再加一些水煮炖豆腐全部入味，要趁热将豆腐出锅装盘食用。

这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吃起来豆香浓郁，黑猪肉肥而不腻，尽显齐梁故里农家特色菜品的美肴风味，“罗妃豆腐”曾获常州乡村美食节大赛金奖。2018年4月27日，“新北一桌菜”在2018新北区江鲜美食文化旅游节上正式揭开面纱，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也入选其中。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依托齐梁文化的典故为菜肴增添了人文色彩。

现在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作为新北一桌菜名菜之一，自2018年在新北推出以来，身受广大食客的欢迎。对此，新北区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潘国庆表示，每个乡村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菜，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依托齐梁文化的典故为菜肴增添了人文色彩。吃一道常州孟河兰陵“罗妃豆腐”，不仅是品尝了美食，更了解到一些齐梁文化的特色，这道菜无疑在突出乡土菜肴品质方面，可进一步提高与丰富老百姓生活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常州美食家的一致好评。

(上接第 99 页)

时萧定的身份——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守、润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新拜尚书户部侍郎等头衔。此举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可以查到萧定的身份，是“润州刺史”，而非“常州刺史”。

还有一篇是刘宰的《重修嘉贤庙十字碑亭记》。刘宰是金坛人，离丹阳延陵季子庙很近。此文作于其隐居之时。

而在诗词中，南朝陈的文学家张正见也曾吟咏过季子庙。《常郡八邑艺文志》选用了他的《行经季子庙诗》：“延州高让远，传芳世祀移。地绝遗金路，松悲悬剑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湿苔碑。别有观风处，乐奏无人知。”此文引用了季子三让王位、路不拾金、徐墓挂剑等典故，以此表达对先贤至德诚信的赞颂，其中，“沸井”的景象可谓惨，野藤已经缠绕了沸井。碑上也有了苔，看来是乏人看护的缘故。

《常郡八邑艺文志》还有一篇喻凫《送卫尉之延陵》，其中这样写“乳滴茅君洞，鸦鸣季子祠”。据考，喻凫，唐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人。开成五年（840）登进士第，官终乌程县令。有诗名。此处的“延陵”，应是唐代的延陵县，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丹阳南部、



齐梁生态园是新北区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之一，他们认为，探索并挖掘齐梁特色菜肴文化，开发孟河饮食文化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他作为新北餐饮人，很想把孟河本地历史典故以及民间失传的菜肴统统挖掘出来，使它能鲜活地呈现在食客面前，这也是继承和弘扬齐梁地方饮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希望通过开发与丰富孟河地方美食，为提高孟河特色餐饮知名度，扩大孟河旅游文化的影响力贡献一份力量。

金坛西北部一带，所以会有“茅君洞”“季子祠”对应。也由此可见，唐代时，人们对毗陵和延陵的区分还是知道的，不然不会写《送卫尉之延陵》，而是写《送卫尉之毗陵》了。

《常郡八邑艺文志》收录元·萨都刺的《季子庙》有这样的描述“沸原尚有千年井，古篆犹存十字碑”，里面提到了沸井，这也是写的丹阳延陵季子庙。而末后的“李家兄弟一朝暮，羞见延陵季子祠”，其中“李家兄弟”，疑似揶揄唐朝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毕竟，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诛杀兄弟，历史影响极坏，几乎不亚于司马懿的所谓“洛水之盟”，如非李世民政绩尚可，李唐传了近 300 年，估计李世民的风评也不会太好。

宋代崇宁年间，常州知州朱彦参考《太史公书》、历代地志、《通典》、图经，将江阴申港一座大土墩加以考证，认定为季子墓，并建庙宇供奉后，关于申港季子墓的诗文渐渐多了起来。关于江阴申港季子墓的诗词，第一篇还是北宋诗人、官员、宛陵先生梅尧臣写的。此后，关于该地季子墓的诗词，渐渐多了起来。

太子报恩百渡村

何晓华 智化

常州武进太湖湾畔，水波浩渺，芦苇苍苍，藏着一个名叫百渡的村落。村子依水而建，青石板路蜿蜒曲折，老人们坐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总爱讲起那个关于“狸猫换太子”与三杆大旗的故事。

相传北宋年间，皇宫里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宋真宗的李宸妃诞下皇子，却被心狠手辣的刘皇后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调包，诬陷李宸妃生下妖孽。真宗震怒，将李宸妃打入冷宫，而真正的皇子则被忠心的太监陈琳偷偷抱出皇宫，一路南下，只为躲避刘皇后的追杀。

皇子尚在襁褓之中，陈琳抱着他昼夜奔走，几经辗转，行至太湖湾附近。陈琳看到湖边有一艘正在捕鱼的小船，船上一对夫妇正弯腰整理渔网。陈琳来不及多想，抱着皇子冲到船边，“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颤抖：“大哥大嫂，求你们救救这孩子！他是……他是忠良之后，若落入恶人之手，必遭不测！”船上的夫妇便是“百渡村”的王采和他的妻子张氏。

王采三十多岁，面色黝黑，是个老实本分的渔民，却有着太湖汉子的侠义心肠；张氏心地善良，见陈琳神情恳切，怀里的孩子小脸通红，正哇哇大哭，顿时心生怜悯。虽不知这孩子的真实身份，但见他可怜，便点了点头。

陈琳大喜，将皇子小心翼翼地递给张氏，又从怀中掏出一块刻着龙纹的玉佩，塞到王采手中：“这玉佩可作信物，若他日有机缘，凭此玉佩，定能让孩子认祖归宗。”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王采夫妇抱着皇子回到村里，给孩子取名“阿贞”，寄意其成长为品性正直之人，对外只说这是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父母双亡，便接来抚养。百渡村的村民都淳朴善良，也没人多问。

张氏待阿贞如同亲生，每天都会做他爱吃的鱼羹，冬天怕他冻着，连夜缝棉衣；夏天怕他热着，扇着蒲扇守在他床边。王采则常常带着阿贞去湖边

捕鱼，教他辨认水性，告诉他太湖的故事。阿贞也十分懂事，小小年纪就会帮着夫妇俩做家务，晚上还会给他们捶背揉肩，一家三口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刘皇后派来的暗探就找到了百渡村。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村里四处打听，专问有没有外来的孩童。王采夫妇心里一紧，知道是冲着阿贞来的，赶紧将阿贞藏到村后芦苇荡深处的柴房里。暗探在村里搜了两天，没找到线索，却注意到王采行迹反常。他每天都会绕远路去芦苇荡，身上还带着给孩子的吃食。

第三天夜里，月色朦胧，王采像往常一样提着食篮去柴房。刚走到柴房门口，就被三个暗探拦住了去路。“你这汉子，天天往这荒郊野岭跑，藏的什么人？”为首的暗探眼神阴鸷，伸手就要夺王采的食篮。王采紧紧护住食篮，厉声喝道：“不过是给看芦苇的老人送点吃的，与你们何干！”

暗探哪里肯信，上前就要动手搜查柴房。王采知道，柴房里的阿贞一旦被发现，必定性命难保。他猛地将食篮朝暗探砸去，趁着对方躲闪的间隙，转身就往芦苇荡深处跑，一边跑一边喊：“阿贞，快跑！别出来！”暗探以为王采要去报信，立刻追了上去。太湖边的芦苇荡密密麻麻，夜色中更是难辨方向，

在一处湖边浅滩，王采被暗探围住，身上被砍了数刀，鲜血染红了湖水。王采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死死抱住为首暗探的腿，不让他们再前进一步。直到张氏带着村民赶来，暗探才怕事情闹大，仓皇逃走，而王采却已倒在血泊中，永远闭上了眼睛。张氏抱着王采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村民们也都红了眼眶，暗暗发誓，一定要帮王采守住这个秘密，护住这个孩子。

从那以后，张氏更加小心，她带着阿贞搬到了村东头的破旧渔船里，白天靠织渔网为生，晚上

偷偷教阿贞读书，村民们也时常接济她们，帮着留意外来的陌生人。阿贞渐渐长大，到了十几岁的年纪，已经出落得眉清目秀，气度不凡。

这一年，宋真宗病重，刘皇后企图独揽大权，可朝中大臣们却都在暗中寻找当年失踪的皇子。原来，陈琳当年虽被追兵围困，但侥幸逃脱，这些年一直隐姓埋名，暗中联络忠良之臣，等待时机。他记得当年将皇子托付给了太湖湾百渡村的王采夫妇，便派护卫老将史成乔装成商人，前往百渡村寻找。

史成历经波折，终于在村东头的渔船里找到了张氏和阿贞。当史成看到阿贞身上的龙纹玉佩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跪倒在地：“殿下！老奴终于找到您了！”阿贞愣住了，张氏也红了眼眶，她拉着阿贞的手，哽咽着将当年陈琳托付孩子、王采舍命护主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阿贞听完，泪水夺眶而出，他跑到王采的墓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磕出了血：“老爹爹，您的恩情，阿贞会牢记一辈子！”随后，在大臣的护送下，阿贞告别了张氏和村民，踏上了返回京城的路。离别时，张氏哭得撕心裂肺，村民们也都来送行，阿贞一步三回头，对着百渡村的方向深深鞠躬：“等我回来，一定报答大家的恩情！”

回到京城后，阿贞在陈琳等大臣的帮助下，揭露了刘皇后的阴谋，还了李宸妃清白。不久，宋真宗驾崩，阿贞登基为帝，更名为祯，便是宋仁宗。仁宗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旨派人前往百渡村，接张氏进京享福，还要封赏所有帮助过他的村民。

可张氏在百渡村住惯了，她舍不得王采的坟墓，也舍不得这里的山水和村民，便婉言谢绝了：“陛下能平安归来，执掌朝政，老身就心满意足了。你老爹埋在这里，我想陪着他，也想守着这个救过陛下的村子。”村民们也纷纷表示，不求封赏，只愿陛下能做个好皇帝，让百姓安居乐业。

仁宗知道他们的心意，也不再强求，但心中的感激之情却愈发浓烈。他于是下旨，将“百渡村”改名为“百渎村”，“渎”取“水脉相通、恩情相连”之意，既纪念这里依太湖而居的地理，也象征着他与百渎村百姓之间，跨越皇权与平民的深厚情

谊，如同太湖的水脉，永远相连。

同时，仁宗还派工匠前往百渎村，在王采的墓前和张氏的住处之间，竖起三杆大旗：第一杆旗绣着“忠良之家”，表彰王采舍命护主的忠义；第二杆旗绣着“养育之恩”，感恩张氏十几年的含辛茹苦；第三杆旗绣着“太湖遗爱”，铭记百渎村百姓的善良与庇护。

念及百渎村依太湖而居，村民多以捕鱼为生，却常受湖水涨落不定、渔船出入不便之扰，仁宗又心生一计。他召来工部大臣，郑重下令：“百渎村百姓曾于朕有再造之恩，朕命你们即刻调派工匠，在百渎村东西两侧各挖一条小河，让两条河贯通太湖，既能方便村民出行捕鱼，又能在湖水泛滥时疏导水流，保护村落安宁。这条河，就命名为‘护村渎’，以此守护这片曾庇护过朕的土地和百姓。”

数月后，两条小河顺利完工。河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着贯通太湖，村民们的渔船可以轻松从村口驶入太湖，再也不用受湖水涨落的困扰；遇到多雨季节，多余的湖水也能通过小河顺利排出，村子再也不用担心被淹。“护村渎”不仅守护着百渎村的安宁，更将阿贞与百渎村百姓的情谊，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上。

后来，张氏在百渎村安详去世。仁宗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特意下旨为她修建陵墓，与王采的墓并排而立，还派工匠雕刻了石人石马立在墓前，规格如同皇家陵寝。他还亲自写下祭文，派人送到百渎村，祭文写道：“朕本孤弱，流落民间，得王采舍命相护，张氏含辛养育，百渎百姓庇佑，方有今日。此恩如太湖之水，浩浩荡荡，朕永世不忘。”

如今，千年过去，百渎村的那三杆大旗早已在岁月中消散，王采与张氏的陵墓及墓前的石人石马，也被整理土地时深埋。每当太湖的风吹过遗址之处，仿佛还能看到王采当年护主的身影，听到当年仁宗感恩的心声。村里的老人们依旧会给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善良终有回报，忠义永载史册，感恩要刻在心里。而百渎村，也因为这个传说，成为了太湖湾畔一个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地方。

编者按：为开展“齐梁文化”“齐梁故里”的学术探讨，现转载二篇学术论文供关心“齐梁文化”的文友们阅读。一是2009年刊登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编的《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一书及《江苏地方志》刊物由张尚金撰写的《浅论武进县（今常州西北）为齐梁故里》。二是最近由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初级中学唐立锋老师撰写的《齐梁故里之争中的武进地望与县志辨析》，欢迎文友们各抒己见，批评指正，达到存真求实的目的。

浅论武进县（今常州西北）为齐梁故里

张尚金

摘要：根据史志记载，武进县（今常州市西北）为齐梁故里，它是齐梁两朝萧氏19位皇帝的故乡，具体地点是武进万绥，即“东城里”。但近年来，丹阳提出曲阿（丹阳）也有“东城里”，因而有了争议。本文依据史书与志书，作了考证分析，并依据自己的见解，认为齐梁故里应在今常州西北一带。至于有不同看法，可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武进县；南兰陵；曲阿县；东城里；齐梁故里

《江南通志》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分置武进县，县治设万绥一带。1988年新编《武进县志》第118—122页载：“奔牛区，万绥镇早年称阜通镇，后改兰陵，称‘齐梁故里’。”“万绥乡，这里是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故宅所在，因名万岁镇，绥与岁谐音，后遂名万绥。”《二十四史》的《南史·齐本纪》载：“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姓萧氏。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故复为兰陵郡人。中朝丧乱，皇高祖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291年为毗陵郡，311年为晋陵郡）武进县之东城里，寓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502年晋陵郡武进县改为兰陵郡兰陵县）人也。”笔者认为，按中国对出生籍贯的习惯算法，一般以祖父的籍贯或出生地作为本人的籍贯。以此推算，齐高帝萧道成（427—482）的籍贯应是武进县，祖籍为兰陵县。而梁武帝萧衍（464—549）是齐高帝的族侄，虽出生地在秣陵（今南京），但他的籍贯仍可算武进县。

笔者认为，“齐梁故里”即齐梁两朝、萧氏19位皇帝的故乡，也是他们的籍贯或出生地。“齐梁

故里”的地域有大中小的范围：大范围是属毗陵郡、晋陵郡、兰陵郡；中范围为武进县、兰陵县；小范围是武进县东城里。目前史志、出版界对“齐梁故里”的大、中地域范围认识比较统一，而在小范围的概念上存在争议，这值得在二轮修志时认真考证。

南朝齐梁时的武进县东城里在何处？史志界目前有多种说法：

一是武进万绥即“东城”

《万绥乡志》第1页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齐本纪》中朝之乱，萧整自兰陵过江，居‘武进故城’之东城里，故称东城。齐高帝萧道成的住处，就在东城天子路，相传秦皇所游，遂呼为‘天子路’。因此万绥又称‘东城’。”但万绥乡（现属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已找不到一个“东城里”的地名。持此说者仍可对齐梁时的万绥（东城附近为县治的武进（兰陵）县域范围作进一步的考证。据栾广高《千年龙飞地，两朝帝王乡——（南）兰陵地望辨析》一文中称：“萧梁之兰陵县当不出三山、黄墟、陵口（处萧梁河入江南运河河口），窦庄、小河至夹江范围，而‘东城里’这一面积不可能太大的基层政区则位于其县域的中南部。”笔者认为：“窦庄与小河至夹江之间，即今常州市新北区的孟城、万绥、小河、魏村、西夏墅等地”，此说与武进万绥即“东城”一说较接近。

二是曲阿有“东城里”

新编《丹阳古今·人物春秋》载：“萧道成（427—482）字绍伯，小名斗将。南兰陵（丹阳）人，为南朝齐高帝。他家住曲阿东城里。”此说不知有何根据。萧道成一生55年中，这里都属晋陵郡武进县行政区域，南兰陵是502年至589年的县名。齐梁时的丹阳、曲阿两个县名和萧道成无关。笔（下转第125页）

齐梁故里之争中的武进地望与县治辨析

唐立峰

曾经轰轰烈烈的“齐梁故里之争”早已落下帷幕，但是关于南朝武进县地望与县治却仍旧没有“准确答案”，成为齐梁故里研究的遗憾。

东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域变更尤为频繁，连南朝人沈约也在《宋书·州郡志》中感叹：“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加之历史的久远、史籍记载的简约乃至混乱，为揭开历史谜团，带来了重重困难。

“齐梁故里之争”追求的是历史真相。无论是丹阳还是常州，研究历史、公布真相，才是齐梁历史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石。笔者不才，抛砖引玉，以求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与共鸣，推动齐梁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共识。

一、历史上的第一个武进

三国东吴嘉禾三年（234），诸葛亮由斜谷出兵，遣使约东吴同时举兵，合围曹魏。是年五月，孙权兵分三路北伐，策应蜀汉。为此，孙权取意“以武为进”，将丹徒改名，武进一名由此而来。这一武进称为“丹徒武进”，使用了47年。

很多人认为“丹徒武进”与现在的常州地域上没有任何关系。但有学者考证，古丹徒与曲阿（丹阳）晋代以前北边是以水经山、嘉山至孟河小黄山一线的丘陵为界。丘陵往北至长江是古丹徒东部地域，也就是现在的镇江新区、丹阳丹北镇一带（当时扬中还未形成）。这一地区在当时大都是沙滩，滩上长着茂密的芦苇和牧草，是养马的好地方。三国时期丹阳埤城一带称卑林，是孙权牧马之地。

二、历史上的第二个武进

南朝《宋书·州郡志》：“太康二年（281），复武进为丹徒县，云阳为曲阿县，分丹徒、曲阿置武进县，无锡、毗陵置暨阳县。”第二个武进县主要是由曲阿县划出，可称“曲阿武进”，也可称东晋南朝武进县（下文统一按南朝武进县表述）。

南朝武进县地处丹徒至江阴的沿江地区，多滩涂、荒地，是东晋南朝北方流民大量流入之地。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晋陵郡接受的移民数量较多，侨郡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这是曲阿武进县及一



系列侨置郡县在这里设立的原因所在。

1. 南朝武进县的西部边界在丹徒东

地方志记载，分丹徒、曲阿以东地另置武进县。因此武进县的西部区域一定在丹徒东。

《晋书·列传》第四十六载：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阙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陈书·高祖纪》：永定二年（558）一月，梁州刺史张立表称，“乙亥岁八月，丹徒、兰陵二县界遗山侧，一旦因涛水涌生，沙涨，周旋千余顷，并膏腴，堪垦殖。”遗山为丹徒、兰陵二县的界山，且当为兰陵县的西北界。符合“涛水涌生，沙涨”条件的“遗山”必在江边。“遗山”者，孤立之山也，今丹徒东北之圌山，正是早年孤立江中、四周有水的写意式命名。

因此，南朝武进县的西部边界在今天丹徒区新丰镇一带；西北在今天镇江新区圌山一带。

2. 南朝武进的南部边界在陵口、罗溪

梁《南齐书》载：“敬则至武进陵口，恸哭乘肩举而前…”。

《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浙西观察使润州丹阳县条载：“庱亭垒，在县东四十七里。本苏峻将

管商攻略晋陵，郗道徽以此地东据要略，北当武进，故遣督护李闳筑此据之。”这里的“苏峻之乱”发生在东晋时期（327--329），《宋书》卷七十九载：“元嘉三十年（453）劭遣将华钦、庾导东讨，与彬之弟相逢于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狭，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军人多负篮屐，于菰葑中夹射之，钦等大败。”

唐神龙元年地券“郭东二十五里东城村……”。

《元和郡县志》中的“北当武进”是指北界为武进县地域。据上述材料分析，南朝武进县的南部边界在曲阿县城北（约10-15里处）、丹阳陵口（北部）、常州罗溪一带，吕城、奔牛属曲阿县。

3. 南朝武进县的东部边界在江阴利港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江阴军”载：江阴县，本汉曲阿县之地，属会稽郡。晋武帝于曲阿立武进县，属毗陵郡。梁改武进为兰陵县。《琴川三志补记》载：“利城，宋元嘉中迁治武进之利浦”。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从武进县东置利城县（县治今江阴璜土镇利城村一带）。589年隋灭陈，兰陵县并入曲阿县。因此，现在江阴澄西地区旧属南朝武进县，这也解释了澄西地区深入常州腹地的原因所在。

4. 曲阿武进（大部分）在今丹阳东北的说法对吗？

根据上文可知，南朝武进县域的大致范围，跨今天的镇江市区东、丹阳东北、常州新北区、江阴澄西等地区。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各自的面积。

南朝武进县在镇江市区主要包括今天丹徒区的新丰镇、镇江新区的姚桥镇、大路镇、丁港镇一带，面积约为150平方千米。

南朝武进县在丹阳主要包括今天曲阿街道的北部、丹北镇、界牌镇、访仙镇、陵口镇北部、吕城镇原运河乡等地，面积约为300平方千米。

南朝武进县在常州新北区主要包括今天的孟河镇、西夏墅镇、罗溪镇、魏村街道、春江街道、新桥街道、龙虎塘街道等地，面积约为350平方千米。

南朝武进县在江阴地区主要包括今天澄西地区的璜土镇、利港镇、申港镇等地，可能还包括今天常州天宁区的郑陆镇、青龙街道等地。面积约为200平方千米。

南朝武进县的总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千米。当然，曲阿县北部是长江，当时很多地方还未形成陆地。比如，丹阳市界牌镇在明朝中叶才与陆地相连；扬中理论上属于南朝武进县，但是形成可以住人的

较大沙洲是在唐宋时期。因此，无论是从面积上看，还是从南朝武进县县治（很可能在今天常州万绥一带，下文将进行论述）上看，武断的表述南朝武进县在今丹阳东北是不准确的。

5. 第三、第四个武进县与南朝武进（兰陵）县有关吗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将武进县改名为兰陵县，第二个武进县存在了221年。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武进，望。（唐）武德三年（620）以故兰陵县地置，贞观八年（应为武德八年，625）省入晋陵。垂拱二年（686）复置。

唐初，第三个武进县是“以故兰陵县地置”，只存在了5年。这次区划调整竟然只是划入了原曲阿武进（兰陵）县的东部地区，包括东城里在内的西部并未划入留在了曲阿（丹阳）。这种情况明显违反了朝廷旨意，当时的常州刺史、武进县令肯定也不会同意。那么只可能是：一、保留了武进（兰陵）县城，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把县城保留就符合了朝廷的旨意；二，出现了土地置换，这样常州刺史、武进县令才能接受这种区划调整。这次“土地置换”很可能将离曲阿（丹阳）县城较近的地区（即丹阳东北部）留下，而将与常州接壤的曲阿（丹阳）县西南地区划入唐初的武进县。可能包括今天的常州新北区奔牛镇、钟楼区邹区镇、武进区的嘉泽镇、湟里镇等地区。这些地区的面积约为300平方千米，与留在曲阿（丹阳）县境内的东北部地区面积相当。从此，丹阳与常州的边界就此定型。《三国志》载：“东汉兴平元年（194）秋，诸葛瑾奉继母，携妻女，避江东，定居曲阿。”今天在常州连江桥、湟里都留有关于诸葛瑾墓的遗存。这就说明，常武地区的西部都曾隶属于曲阿（丹阳）。

唐垂拱年间的第四个武进县，是“复置”。《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载，唐“垂拱二年（686）分割晋陵（县）西三十六乡又置”。常州地方志载，唐垂拱二年析晋陵西界立武进县于州治。武进县衙在垂拱二年迁至常州城内，第四个武进县东界移至常州城内。至此，唐宋元之晋陵与武进、清之武进与阳湖的分界基本定型。

唐以后的武进县，西南地区约300平方千米曾属于曲阿县，西北约350平方千米的土地曾属于南朝武进（兰陵）县。因此，唐以后的武进县与南朝武进（兰陵）县、与曲阿（丹阳）县没有任何关系显然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东城里不再属于唐以后的

武进县）。今天，常州市区与丹阳交界处的乡镇在语言、风俗、饮食、姓氏等都很接近，历史文化趋同。

三、南朝武进县县治考

由于正史一般不会记载县治在哪里，加之历史久远、六朝时期行政区划又极为复杂多变，因此关于南朝武进县县治所在地，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关于南朝武进县治所主要有 6 种说法。

1. 丹阳吕城说

南宋《嘉定镇江志》卷一《地理》引称：“唐《元和郡县图志》于常州武进县则曰晋武别置武进县于丹阳县东五十里，梁武改武进为兰陵……南兰陵治所，以《元和志》里数计之，在丹阳县东吕城镇上下。”

因此由人因“吕城”望文生义，认为南朝武进县治所在吕城。上文《元和郡县志》中关于“废亭垒”的记载，明确告知东晋时期吕城属于曲阿县，北边才是武进县。因此，吕城不可能是南朝武进县治所。

2. 奔牛九里说

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丹阳县条载：“废(cheng)亭垒，在县东四十七里”。《太平寰宇记》卷九二江南东道常州武进县条称：“庆（废）亭浦在县西五十里，与丹阳县分界。”

据现有的考古探查，废亭的中心位置约在吕城镇东北两公里，今河北行政村谭家塘自然村一带。谭家塘往东三里已到吕城与九里（九里乡现已并入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交界处。

在常州、丹阳一带有 2 个“九里”地名。丹阳九里地名，据成学远《丹阳延陵“九里”地名的来源》一文探析，“九里”原为延陵县“旧治”，为避唐高宗李治讳更名“旧理”，后讹为“九里”。因此，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认为，奔牛九里很可能是南朝武进（兰陵）县治所在地。但是奔牛九里位于吕城（废亭）东偏南方向与《元和郡县志》中的“北当武进”相矛盾，且与《宋书》载“曲阿之奔牛塘”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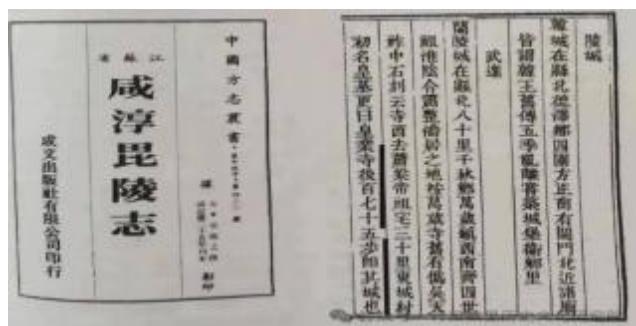
3. 丹阳东城说

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在《“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兼论“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的地望》一文中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晋武帝复改武进为丹徒，别置武进县于丹阳县东五十里”，文中的“丹阳”置换成“丹徒”，既符合西晋时期的政区概念，又能够疏通文意。

陈朝地理志《舆地志》（辑本）把丹阳东城里别名雅称为“兰陵”，而常州最早地志《咸淳毗陵志》

把东城里，美其名曰“兰陵城”。“东城里”可能因位于“兰陵城”东边而得名。如此，太康二年（281）以后的武进（兰陵）县治则位于丹徒县（治今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东五十里，按魏晋时期的里数计算，应该就在东城里和齐梁帝陵所在区域即今天的曲阿街道北（原胡桥乡一带）。

公元 317 年，淮阴令萧整为避“八王之乱”，率族人南迁至武进县东城里，安家结寨，以家乡地名美誉为“兰陵城”。这个“兰陵城”早在梁武帝出生前就有了，因此不可能是梁武帝称帝后改武进县为兰陵县的县城所在地。



4. 丹阳埠城、丹徒黄墟说

栾广高在《两朝帝王乡，千年龙飞地》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说，兰陵故城与万岁镇均在武进县西北九十里。如二者为一，行文必定点明：万岁镇即兰陵故城。二者不是一地，则兰陵故城又在何处？如按“大辞典”所说的方向里程量算“兰陵”故城可在丹阳埠城或丹徒黄墟附近。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九十里”应该既不是“唐里”，也不是“清里”，更不是“南朝里”（具体见下文计算方法），因此“武进县西北九十里”应折算为 45 公里，约为常州城至丹阳东城里的距离，不可能是丹阳埠城或丹徒黄墟。

5. 常州万绥说

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常州·武进县》记载：晋武帝于丹阳东五十里置武进县。梁武帝改武进为兰陵，入晋陵。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武进，望。（唐）武德三年（620）以故兰陵县地置。

宋《咸淳毗陵志》载：“武进（六朝武进）兰陵城，在县（唐后武进）北八十里千秋乡万岁镇西。”

明《永乐常州府志·古迹》载：武进故城位于“府西北七十里之千秋乡”。

清《光绪武阳合志》载：“武进故城在古之千秋

乡，今之通江乡，去今县西八十里。晋太康中析曲阿、丹徒二县地置。”

以上材料都指明：南朝武进县县治在今天常州万绥一带。

6. 丹阳访仙说

《元和郡县志》中的“北当武进”，《元和郡县图志》中的“丹阳东五十里”指明武进（兰陵）县治应该在今天吕城北部的访仙、万绥一带。

宋《咸淳毗陵志》《大清一统志·武进县》关于南朝武进（兰陵）县治所距常州城的距离有“七十里”“八十里”两种说法。因此，有人认为，南朝武进（兰陵）县治所在访仙，唐初才迁至万绥。后人将两个武进县治所混淆，导致了“七十里”“八十里”两种说法。

史上，“七十里”“八十里”是因为“唐宋里”是1里约等于450米；“明清里”是1里约等于550米。“唐宋八十里”约为36千米；“明清七十里”约为38.5千米；因此出现了“七十里”“八十里”。后人抄写旧志书时，一会儿是用“唐里”，一会儿用“清里”，导致数据混乱，而不是有两个“武进（兰陵）城”；后人将万绥街与“武进（兰陵）城”等等同于一地，导致了约2.5公里的数据差，其实是“武进（兰陵）城”在“千秋乡万岁镇西”。有学者现场考察后认为，“武进（兰陵）城”可能在今万绥镇西白兔墩、鹏程墩一带，即今天万绥与丹阳访仙交界处。

《咸淳毗陵志》在“智宝禅院”的条目下以“按”语的方式说：“万岁寺”（智宝禅院的宋代名称）旧有伪吴天祚间石刻：寺西去萧梁帝祖宅三十里东城村，初名皇基，更曰皇业。

唐神龙元年地券“郭东二十五里东城村……”。

同时，也有人指出：万绥距东城里三十里，东城里距丹阳县城二十五里，因此，万绥距丹阳城五十五里，不符合“丹阳东五十里”，因此，应该在万绥西访仙镇境内。但是，从地图上丹阳县城、东城里、万绥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一带也是平原，不需要从丹阳绕行东城里再到万绥。从地图上看，丹阳城直线到万绥的距离在五十里（唐里）左右。因此，正如上文所述，“武进（兰陵）城”可能在今天万绥与丹阳访仙交界处，因此“访仙说”就是“万绥说”。

综合上述史料分析（除非史料记载出现错误），南朝武进县县治明确指向了常州万绥镇西，即今天

丹阳访仙与常州万绥交界处。

（唐）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重置武进县，保留了县治和东部县域，这在“法理”上将“兰陵”一词保留在了常州名下（曲阿包括了今天金坛、常州、江阴、句容等地，但曲阿治所在今天丹阳境内，所以丹阳继承了曲阿之名）。丹阳只有曲阿、凤美、云阳、简州等古称，古籍中从没有“丹阳兰陵”“曲阿兰陵”的名称。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寄题常州东山亭》云：“不使兰陵风月闲”；对镇江、常州历史颇为熟悉的王安石在《送沈康知常州》云：“作客兰陵迹已陈”；这可以说是将兰陵与常州的关系进行了盖棺定论。

今天，东城里留在了丹阳，兰陵一名留在常州，“齐梁故里之争”的历史根源如果用一句表述，大概如此吧。

令人唏嘘的是，今天的万绥早已不是南朝武进（兰陵）县治所（甚至沦为一个普通的村落）；当年的南朝武进（兰陵）县也早已不复存在。“兰陵城”早已成为一个历史记忆，诚然，这个记忆还会继续传承下去。

三、齐梁故里之争的“句号”

齐梁皇室的桑梓地——在今天丹阳市曲阿街道张巷村委东城村一带，其帝陵就在其北部的原胡桥乡一带，这已成为学界共识。“齐梁故里之争”看似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但实际上这个的“句号”并不“完美”。

故里即故乡，可具体填写至乡、村，也可简写为县，因此南朝武进（兰陵）县也是故里（当然这个县现已经不存在，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历史学者就应该、也值得研究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由于齐梁故里之争中的“武进地望与县治之争”，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导致常州、丹阳的一些学者因为种种原因，表述了一些并不符合史实的观点，误导了很多历史爱好者和萧氏族人，造成了不良影响。笔者认为，丹阳、常州的齐梁学者秉着求同存异、求真务实的态度和胸怀，结合南大、复旦等高校学者的力量，早日给“齐梁故里之争”画上一个“完美句号”。

齐梁故里之争的“完美句号”就是有一幅丹阳、常州乃至历史学界都公认的南朝武进（兰陵）县地图，跃然于东城巷和万绥村。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对齐梁故里严谨考证

郭重威

关于武进古城的有无，建城的地点和时间的争论很大，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古籍上又说得含糊，面对这种情况，只能以考古发现结合“田间调”来说明了。

近几年，考古报告中详细的说了考古的遗物和分布带的情况，由此确认了在现孟河地区的万绥村为中心的一个纵横各十余里的地下古代遗物圈，现介绍如下。

一、发现遗物的范围

以现万绥的东岳庙为中心，南至吉祥寺南，东至城头东的刘家墩，北至东山，西至西山的约 25 平方千米的范围中的几十个文物点都有发现。

二、地下遗物所代表的历史年代

1. 史前遗物

75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劳作工具，武器，生产器物，骨骼，壕沟，质坑，种子等。

2. 史后遗物

从汉直至清，遗物最多的朝代是汉，晋，南朝，隋，唐。

三、考古的发现

1. 万绥南的吉祥寺为中心的一大片汉，晋，南朝的许多遗存物，还在吉祥寺北发现了汉代的一个造船厂（遗物送检，C14 检测为 2500 年），还发现了一条很长的城下壕沟。

2. 遗存带从那里开始向东北方延伸到现孟河的东山和西山，在蒋家墩遗存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器皿，在东山西山和山下的地方也发现了晋，齐梁时代规模很大的名人坟墓，在万绥东也发现了晋，齐梁时代的遗物。

四、考古说明的问题

1. 由这些遗物推导，从汉代起这里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镇（城）市。

2. 考古结论依规依矩，不作推导。只说这里有较大的镇或城。

五、推导出的结论

历史的规律是，当某个地区人口集中，经济发

达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必须要建城设郡县，以利管理和平安。在万绥考古发现这一大连续遗迹的地方，必须是有一个城镇。

再回到史籍，史籍上记载了（不管真假），在这个地区历史上先后有四个城，即武进古城，兰陵古城，傅洛城，孟城城。

孟城城建在明朝，傅洛城建在长江边，这两个城和以上考古无关上。只要考虑武进古城和兰陵古城这两个城到底是那一个了。

历史告诉我们 -- 建城的时间是在晋划地域立武进县时，很明显，西晋时代，兰陵人还未“衣锦南渡”，那有兰陵城呢，这考古中发现的城就只能是武进城了。

六、我田间调查的情况

我对家乡的调查从小孩时的听家人，老人讲故事就开始了，我不自夸，我是了解孟河民情，民意，民事，故事，传说，风俗，习惯最多的人了，要让我讲要讲上几年，今天只说我了解的有关万绥齐梁的情况。

1. 吉祥寺，是萧整的住宅，这是许多老人的共识，最详细的情况是来自守庙的萧家人。我的一个好友丁才兴（现 90 岁），他在办在吉祥寺中的孔村小学读书时和那个看庙的萧姓老人很好，他讲了许多这个庙的情况，他说这庙是老祖宗萧整住的，他带来了千把人，来了没房子住，就先建了石巷里为基地沿一条路建了许多房子，祖上做了皇帝后就决定要老祖宗（整）的直系一代选一个人来看庙，祭祖，他已是 73 代了，他讲了许多萧家人的故事，丁老师有空就讲给我听，丁老师的爸爸妈妈都是里正和后来的村长，他们知道的很多。

2. 吉祥寺的四边的田野中，老百姓常常拾到（锄到，挖到）“宝贝”。

3. 附近有许多老百姓称之为“皇坟”的高大的土墩。最大的一个就只离庙 200 米，看庙人说这是齐高帝的墓，后被人挖掘，镇江博物馆来收缴了许多文物，还发告示让老百姓交出，老百姓不肯交，

就逮捕了两个人。才收邀了一些。这个地方叫彭（鹏）城墩，后查史料萧道成葬武进县鹏城山，我们就为它立了一个皇坟遗址的碑，背面把那古籍的文字刻下。

4. 坟前有个很大的池塘，名“马池”，马池向西北是千余亩的平地，老百姓称是萧道成的炼兵场，马池是洗马的地方

七、结论

考古和民调的相吻合说明了下列三点

1. 武进城在万绥，晋时建武进行政中心时只能选这里做县城，若有人不同意，那就请他从考古中去寻找一处比万绥考古遗证多的地方为据

2. 武进古城在万绥，武进东城里一定在万绥，所有的史籍上都称武进东城里，这东城里绝对不会是山野荒地上的东城村，东城里，而一定是武进城东的某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逻辑推理存在着，历史上记载着，

“永嘉南渡”并不是难民逃难，而是当时西晋有计划的撤移，并根据不同级别的家族的迁徙池作了严格的规范，豪门大户迁省府地，二级家族迁入郡府，三级宋族迁到县府所在地。当时的萧家是三级家族，只能迁县城，还指定是武进县，再加萧宋南迁的带头是淮阴县令萧整，他所带领的团队一定只会迁到武进县城的东城里了，绝对不会到荒山郊野的什么东城村的。当然也会有一此零星族人的痛永住到其它他方去的。

3. 由此可知万绥是齐梁故里的核心地区，整个的武进县，整个的从南京始的江南沿江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地区都是齐梁故里。

这许多问题在考古的问津下，都找到了答案了考古资料和民调情况，相向融合，使历史真象浮出了水面。所以我们要至诚的感谢考古队员的辛勤劳作，它使我们从千年的争论中走了出来看到了历史真象。

（上接第 119 页）

者查找 1992 年出版的《丹阳县志》也找不到“东城里”的地名。只是有个近似的地名，即 82 页 1985 年《丹阳县各乡镇所辖行政村、自然村一览表》中的折柳乡东城行政村，有一个“东城巷”自然村。地名不能有一字之差，东城巷是否就是东城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是武进东城里在南兰陵（今常州西北）

1978 年出版的《辞海》594 页载：“萧道成（472—482）即齐高帝，南朝齐建立者。公元 479—482 年在位。字绍伯，祖先为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迁居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辞海》1309 页载：“梁武帝（464—549）即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 502—549 年在位，字叔达，南兰陵（今常州西北）人。”笔者认为此说法比较恰当，但不完善，还需对常州西北的地域范围作进一步阐明。

四是笔者的见解

即以 2008 年江苏省行政区域的地理范围向上推算，齐梁故里应是南朝齐时的武进县。梁时的兰陵县（可称南兰陵），今属常州西北，即常州市新北区孟城镇万绥周围及丹阳市东北部的有关乡镇，简称武进县（常州西北）为齐梁故里。笔者认为齐梁故里的地域范围应属南朝齐（479—502）和梁（502—

557）共 78 年间（实际年数）的南东海郡武进和兰陵郡兰陵县。因公元 557 年前还没有常州的地名、兰陵并没有并入曲阿（即今丹阳市）。^①

综上所述，“齐梁故里”确切的地域概念还可作进一步探讨，建议常州市新北区和丹阳市联合对万绥周边的分属常州、丹阳两市有关的村庄、墓葬、碑刻、民间传说、史志记载作进一步考证，并可请历史地理专家参与，让常州、丹阳两地共享齐梁文化的熏陶。

作者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原处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首任会长、《常武文史研究》主编、中华延陵季子网站站长（法定代表人）、延陵季子文化公众号顾问、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馆长。

^①注：隋开皇九年（589 年）并兰陵于曲阿，废郡置州，于今常熟县置常州，晋陵属之。后移常州治于晋陵，隋大业初又废州置郡，常州复名毗陵郡。到唐武德三年（620 年）吴王杜伏威平李子通归唐，改毗陵为常州，以故兰陵地复置武进县，属常州。是时常州领晋陵、武进、无锡、义兴四县。

关于开发建设江南运河第一河口的思考与建议

高 平

一、第一河口的历史与现状

江南运河第一河口位于奔牛镇大运河与孟渎（俗称老孟河）交汇处。据东汉《越绝书·吴地传》、清《江南通志》《武进水利志》等文献记载，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为与齐国和晋国争霸中原，号令开凿江南运河，由苏州望亭经无锡达常州奔牛，再折北开通孟渎而出长江，全长170公里，孟渎即是当初南接江南运河、北达长江的唯一通江干流。自此孟渎口成为江南运河（通江）第一河口。

江南运河第一河口是开启奔牛文化发展之源，她见证了奔牛集镇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随着江南运河和孟渎拓浚及驰道修筑，齐梁之前始设奔牛堰、闸，于是带来商机，催生集镇开埠。自隋朝大运河南北贯通后，商埠藉河、渎漕运便利条件，致商市渐兴，随之产生商道文化，进而哺育出了众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助推了办学兴教，兴建了许多名胜古迹，形成了运、孟河畔富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奔牛古镇特色风情。

江南运河第一河口是促进奔牛商埠兴盛之源。自齐梁始至唐宋，奔牛集镇日趋繁荣，舟楫往来，车马奔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业已成为名噪江南的“邑西巨镇”。宋时，苏轼、陆游、杨万里等众多文人墨客曾驻足停留奔牛，并留下褒赞奔牛的不朽诗篇，如：苏东坡过奔牛赴杭州任职时，曾咏叹“东来六月井无水，卧看古堰横奔牛”；陆游著有《重修奔牛闸记》；杨万里写有《过奔牛闸诗》。清代，古镇的繁华受到了帝王的青睐。康熙第二次南巡时曾在奔牛登岸，回朝后即诏令全国绘画能手和宫廷画师，绘制而成宫廷画卷《康熙南巡图·常州府与奔牛镇》，再现了皇帝南巡途经奔牛的盛景，彰显了奔牛商埠的重要地位。

江南运河第一河口是涵养奔牛人文荟萃之源。春秋知音典故源自古运河畔伯牙琴渎。明清时期，奔牛腾蛟起凤，曾涌现出19位才华超群、志向高远的进士举人。江南佳丽陈圆圆乃金牛里人，“冲冠一怒为红颜”影响了中华一代历史。在近现代以至当代，奔牛更是人才辈出：有南洋公学（上海交大）首任校长何嗣焜，

江南中医名家张聿青，著名实业家刘国钧，一代“杠王”吴玉崑，工程院院士顾冠群，中央保健局专家邵永孚，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中天钢铁集团总裁董才平等社会各界翘楚，从古镇出发，享誉国内外。与此同时，奔牛文化遗产丰富。在历史遗存中，位于第一河口的万缘桥堪称常州原生态古桥之最，是现今奔牛保存最好、历史价值最高的一座桥梁，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常州桥文化的代表作。该桥始建于宋代，清光绪四年重建，因众多民众捐资助建，故取万户化缘之意为桥名。

江南运河第一河口是中国大运河常州段沿线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丰富内涵，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景观和旅游价值，因而受到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江苏历史文化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贺云翱教授高度评价和点赞，提议建成江苏唯一的“第一河口公园”（含老孟河境内岸线、万缘古桥和老街区的开放式公园），以凸显“第一河口”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重要历史节点和奔牛运河文化的特色亮点。

二、开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省市关于把大运河江苏段和常州段建设成为高颜值的生态长廊、高品味的文化长廊、高效益的经济长廊的目标要求，结合奔牛实际情况，对江南运河第一河口进行开发建设，笔者以为有着下列价值与意义：

（一）生态价值与意义

以“水环境整治”为要务，还生态自然美景。从运河至老孟河交汇处向北经万缘桥过北虹桥达惠宁桥，全长4.1公里。通过清淤、疏浚、驳岸、重塑河岸线等工程，增强河水自净能力，为水生生物和沿岸植被重建栖息地，阻止并逆转生态退化，恢复水道的自然水文功能，将“死水”变成“活景”，将“生态负资产”转化为“水利正资产”，让流动的水体活化该区域生态

系统，提升环境品质，呈现“水清、岸绿、桥美、街古”的整体风貌，构成一副绝佳的江南水乡风景画。

（二）文旅价值与意义

第一河口积淀着 2000 多年的漕运过往和人文历史，老孟河承载着当地人们童年记忆和乡愁。通过开发建设，可唤醒和延续民众的乡愁乡绪乡情和文化记忆，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幸福感。围绕源点河口和古渎，扩大人文历史宣传内容，如流传千年的知音典故、奔牛古堰故事、民俗趣闻等，同时展示老街风貌和市井文化，彰显又一条颇具烟火气的“休闲生态廊道”，满足民众逛街购物社交闲聊的需求，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观赏打卡，使之形成大运河文化研究实践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常州市文旅生态旅游的又一个目的地。

（三）经济民生价值与意义

通过文旅产业导入，实现从“沉睡的遗产”到“活态的资产”的转变，有效影响千年古镇奔牛的整体复兴，从而激活历史街区，撬动餐饮、民宿、零售业复苏，形成新的业态带动旅游经济消费，招揽游客光顾，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和创意产业回归，提升土地与房产价值，促进产业融合，如“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教育+旅游”，与创意产业、康养产业相结合，创新多元化经济生态，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惠及民生。

三、项目实施的策划与建议

江南运河第一河口公园建设项目曾于 2018 年底由奔牛镇人民政府委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编制规划，规划面积 19.5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区范围为“L”形，规划面积约 9.36 公顷。项目范围内共有各类物质文化遗产 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 处，省级文保单位 1 处，市级文保单位 2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1 处，项目建设期限 3-5 年，计划投资 3.5 亿元。资金来源：地方政府自筹部分，引进社会资本筹集部分，该项目被列入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项目库。按照“保护原住民、兼容老民房、减少拆迁量、降低建设难度”的建设原则和“因地制宜、特色创新，公园敞开、通幽曲径，绿树多植、民房绿荫，园中设景、亭阁留影，景中有房、房景交映，点面结合、耳目一新”的设计理念，通过政府主导、规划引领、社会参与的模式，将核心保护区打造成为集运河游览、文化展示、活动体验于一体且能展现古韵新风的开敞式滨河公园。

在江南运河第一河口公园项目范围，现有空置地块 40 余亩和国家公房存量 3 处，其中空地可用来打造集“奔牛古镇”牌坊和“历史文化展览馆”“运河记忆馆”于一体的运河文化休闲广场；散见于街巷处的国家公

房存量可用来置换建设用地，打造景观节点。

基于上述原有规划，从奔牛现实状况出发，笔者建议：若立项开发建设江南运河第一河口公园，可优先围绕江南运河第一河口周围区域和老孟河境内岸线着眼入手，重点策划“三境”，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开发建设坚持“微改造，精提升，深体验”方针。

第一境：河口源始境

（1）考古与展示。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明确源点河口等遗址位置。采用地上标识，探坑展示，透明玻璃覆盖，虚拟复原等多种方式，让游客直观感受第一河口遗址奇迹。（2）河口桥闸博物馆。将河口、万缘桥、虹桥及其周边环境连成一体打造露天博物馆，设节点解说系统，讲述河口与桥闸在漕运史上的功能与故事，以追寻源点，对话千年。（3）老孟河疏浚与水上体验。通过清理淤塞，恢复万缘桥向北至惠宁桥之间的河道，开通摇橹船、电动小船观光航线，线路连接古桥和古镇码头平台口，提供“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经典江南水乡体验。（4）沉浸式导览。开发小程序或提供 AR 设备，扫描遗址或桥体，手机屏幕上即可复原古代舟楫穿梭、漕工拉纤的动态场景。

第二境：古镇烟火境

（1）对毗邻河口的老街民国建筑进行“绣花”式的修缮“微改造”，避免推倒重建，保持原有的建筑肌理、材质和格局，显示岁月痕迹，对民房结构加固，更新内部基础设施，适应现代商业和民居要求。（2）复兴原有市井文化现象（含特色餐饮小吃、杂货铺、民宿等）。（3）保留原住民生活原样，展示历史街区“烟火气”。

第三境：生态休闲境

（1）滨水步道与绿廊。沿疏浚后的老孟河两岸建设连续的驳岸邻水步道（仿古纤道）、骑行道和生态绿化带，种植本土植物，设置码头、休息廊亭和观景平台。

（2）湿地净化与科普。在河道边缘建设小型人工湿地，既净化水质，又显科普教育点和生态景观。（3）文化节事与夜间经济。利用现有的滨水空间，举办运河文化带、水上集市、户外艺术展等活动。设计优雅的夜间照明系统，点亮河口源点、古桥、古街和水面点位，开发“夜游运河源点”项目，延长游客停留休闲时光。

总之，随着该项目的立项推进，可以预期，江南运河第一河口公园必将被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一颗璀璨的“千年运河明珠”而熠熠生辉，为常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争光添彩。

2025 年 9 月

（作者系《奔牛镇志》主编，奔牛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文史顾问）

论淹城研学旅游始于乐园青铜大门

冯士彦

淹城春秋乐园的研学旅游，最好从其大门开始，试论之。

这个雄伟、壮观，全国独一无二的青铜艺术大门上，高度凝聚和准确表现了春秋轴心文化的三大要素。

青铜艺术大门高端东首，雕铸矗立着秦大篆“春秋五霸”国号：齐（黄河之尾）、晋（黄河上游）、楚（长江中游）、吴、越（同在长江之尾）。突出了世界东方最古老的城堡遗址——淹城血色火焰的历史背景。

在延政大道与长江路（淹城路）交叉口，面西的淹城宣传碑牌之一，浅刻浮雕的“春秋五霸”，与青铜大门上的“五霸”三同而二异：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换成了宋襄公、秦穆公。碑牌之四，结尾云：“公元前五一四年，勾吴国二十四代君王阖闾，建都于今武进雪堰（即阖闾城），并在伍子胥和孙武的辅佐下，攻越伐楚入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就在浮雕的“五霸”之外，多出了“一霸”。类此自相矛盾的笑话，不该有。

《辞海》“春秋五霸”词条，有四种说法。其中之一，无越王勾践，却有吴王夫差。总之，“春秋五霸”，只能是“五霸”，而不能是“六霸”“七霸”。

淹城采用了青铜大门上的“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也就不能再采用碑牌浮雕上的“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相比较而论，春秋乐园青铜大门上采用的“春秋五霸”，是最合理的。碑牌所列“春秋五霸”中宋襄公、秦穆公的“霸主”资格，经历史鉴定，应予淘汰。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邀集齐、楚等国在孟（河南睢县）集会，想自为盟主称霸，被楚国拘留后释放。次年，宋楚交战，宋国大败。苏东坡《宋襄公论》一针见血，指出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抓住小国之君鄫子去祭社神，就像杀一条狗、一只猪。一

次会盟，虐杀两个国家的君主（另一受害者，即滕宣公）。《左传》记载，宋国良将子鱼，劝阻宋襄公施暴，而不被重用。苏东坡说：“自古以来，失道之君，多得不可胜数，可再没有像这个宋襄公欺世盗名，留给后世那么大的坏影响了！他想成为霸主，完全是空想。”虽然有人称赞宋襄公具有“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的贵族精神”，但那是“仁义”的假像，被毛泽东讥笑为“蠢猪”。不必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决，从“春秋五霸”中汰除身败名裂的宋襄公，是理所当然的。

秦穆公呢？司马迁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扩疆拓土，秦穆公“遂霸西戎”，可以。做东方霸主，难矣。当今改写中华史的学者，易中天先生分析说，论能力和水平，秦穆公不在宋襄公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犯了大错（类似反人类罪）。宋襄公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公杀活人做殉葬品。秦穆公死，殉葬的人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有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当时的时事评论员发表长篇大论，认为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理所当然。以人为本，毕竟是周文明的精髓。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秦穆公，只能与霸主无缘。（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文公六年》。秦景公大墓殉葬一百八十六人，足见秦制之酷虐）。

淹城，嬴秦先民，殷商故里。周旋于吴、越、楚汹涌狂澜、旋涡之间，确实享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我们辨析了春秋文化要素之一“春秋五霸”，该精心保护，精细研学，精确判别和阐释其点滴成果。

青铜艺术大门中间，偌大一块巨眼大嘴的面具形饕餮头像，狰狞、神秘，是春秋文化的要素“青铜时代象征物”。传说禹铸九鼎，中国很早进入青铜时代。商、周盛行铜锡合金，有了文字，农业、手

工业相当发达。

饕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常见饰物。有三说：蚩尤的形象；北方一民族的族名；食人的狗鴟。又说是羊身人面、牛身人面、虎身人面……的动物。还有人说它，并非“有首无身”，只是身体图案化了，仔细观察，可见其尾和足，及背上的肉翅。

《吕氏春秋》认为饕餮有首无身，吃人来不及下咽，噎死了，告诫人们别贪得无厌，招致毁灭。《左传》认为饕餮纹，有抵御魑魅魍魎的辟邪功用。美学家李泽厚认为，饕餮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祯祥意义。（见李著《美的历程》）

我们的共识：饕餮神兽，戒贪，辟邪，在春秋乐园大门口担任警卫，审视、护佑和欢迎八方游客。

饕餮像往昔，大门上春秋文化的另一要素，是诸子百家。以孔子54字阳文大篆语录为代表：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字如像形画，古色古香。圣人名言，沦为纯粹装饰图案。初读，未能全识，愧对大门，我伫立默思。

这段语录，是孔子教诲学生子路的。“蔽”通弊，弊病。孔子问：“仲由！你听说有六种品德，便会有六种弊病吗？”子路答：“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仁德，却不爱学问，那种弊病就是容易被人愚弄；爱要聪明，却不爱学问，那种弊病就是放荡而无基础；爱诚实，却不爱学问，那种弊病就是（容易被人利用，反而）害了自己；爱直率，却不爱学问，那种弊病就是说话尖刻，刺痛人心；爱勇敢，却不爱学问，那种弊病就是捣乱闯祸；

爱刚强，却不爱学问，那种弊病就是胆大妄为。”

其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贼”是什么意思？是指风气道德或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诚实是好品质，但不爱学习，不明事理，不懂是非，只知承诺必须兑现，说到就要做到，往往轻身殉人，像那些刺客游侠。儒家讲明哲保身，孔子不欣赏侠勇士盲目的轻生举动，所以说，诚实人不学习会自害自。子路太勇敢，孔子这么说，是爱护他、警诫他。可惜，子路在孔子去世前一年，还是惨死于卫国的内乱。他系好断了的帽带，极为绅士地从容赴乱刀。

这段孔子语录，明确肯定仁爱、智慧、诚实、正直、勇敢、刚强，都是优良品质，但必须同爱好学习，研究学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完美的品质。否则，优点都会变成缺点，美德都可能与弊病同行。

乐园大门刻上这语重心长的《论语·阳货》名言，寄望深远。艺术性强，很漂亮，惜哉效果不彰，“其蔽也字难识”。

淹城遗址，青铜是其时空纵横座标，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铮铮作响于雉堞；“五霸”争雄于天下，“百家”争鸣于朝野。淹城旅游，研学始于其青铜艺术大门，确具科学性。

淹城春秋乐园青铜艺术大门



名家写序见个性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定居，因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所以他一直在穷困中度日，但依然没有失掉自己的风骨。

当地有个前清遗老，叫杨鲁丞，在地方上有些名望，对经史的研究也有建树，死后留下了一些遗稿。陈独秀到江津后，曾对杨鲁丞的文章做过评论，杨的孙子杨庆馀听说后，便跑了几十里路来见陈独秀，请其帮助校正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和《杨氏厄林》两部书稿，并许诺付酬，陈独秀答应了，并很快将两部书稿校对完毕。杨庆馀又将杨鲁丞的其他遗稿交给陈独秀整理、校正，并请陈为其做序。陈独秀看完遗稿后，感觉没什么价值，就对杨庆馀说：“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部认真看过了，多系重复古人学说而已，创见太少，不值费心，所以，我不想再整理、校正了。拿这样的东西让我做序，我虽是食人俸禄，当忠人之事，但下不了笔啊！”

1978年秋，历史学家唐德刚邀请夏志清

先生为其所作的《胡适杂忆》一书写篇序言，夏志清很快就完成了这篇序言，在序言中，夏志清当然也肯定了此书的优点，但对唐德刚书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也进行了批评，用详尽的论据阐明自己的论点，以自己的论点否定唐德刚的观点。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力气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审评。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住作者，也对得住读者。”

一般来说，所谓的“序言”，基本上都是捧场之作，极尽吹捧之能事，把书吹得天花乱坠。但陈独秀和夏志清二位在为别人写序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却很值得称道。他们在“写序”过程中棱角分明的个性，表现出了令人仰望的风骨。

《闽南日报》2025年7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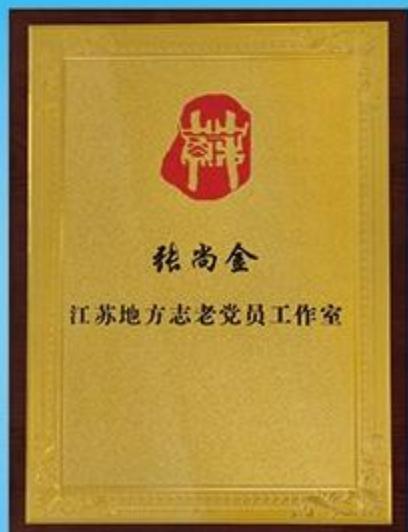


雕塑：苏东坡与常州
报恩寺长老（清凉寺内）
娄家骐 创作

庆祝中国科学院成立76周年常州武进院士博物馆(常州院士展示馆)成立五周年活动
暨江苏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合影 2025.11.01



第一排左起：冯科镜 彭新立 吴建忠 吴永欣 陶春健 张步东 郝建成 赵贤德 杨迪平 张懿炜 任洪兴 张尚金 赵忠和 周晓东 李梅香 于晓庆 虞建安
杨美英 周建春 吴仁山 张 颖 张小峰 莫金华 张浩典 冯 良 吴云良
第二排左起：李竺柯 吴晓鹏 吴亚荣 吴平苏 唐立峰 郑 华 马 翟 邵效忠 刘小茂 朱剑虹 淳翔科 陈晓缅 吴建国 许国裕 储宁玲 吴胜英 薛 飞
吴建俊 冯和年 郑国强 孟建英 万惠芬 夷香萍 马如良 蒋 真 赵利娟 吴春燕 秦 文 谢雪梅 王抗美 吴 爽 赵小萍 吴百英
第三排左起：何建军 张泽来 金华兴 周叙春 吴明刚 罗 泽 杜仁彬 冯国平 张永方 陈 平 黄海国 章顺明 余忠良 张 军 陆林深 张祥海 肖 飞
吴士德 秦大峰 吴建东 鲍惠舫 崔柏松 吴 强 张汉忠 吴仁兴 徐亚清 程中伟 马小鸿 孙晓锋 钱凯良 潘洪坤 仇松强 吴振达



编印单位：徐州市促进地方文献研究会
发送对象：研究会成员
印刷单位：徐州市促进地方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5年12月
印 数：500本